

广东文革掠影



根据叶曙明、武传斌等文章
辑录，仅供学习交流，不对
其准确性与观点负责

学习编辑组 汇编

目录

第一部分：2013 年以来发表在《羊城晚报》“荒唐岁月”专栏文章.....	6
第二部分：其它一些文革研究文章.....	6
1966 年，破四旧的风暴.....	7
封闭《红卫报》.....	9
一月夺权.....	10
广州武斗的开始.....	12
实行军管.....	13
周恩来在广州.....	14
浴血中山纪念堂.....	16
武斗升级.....	18
华工武斗.....	20
7、8 月的抢枪潮！.....	22
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25
迟泽厚访谈（节录）.....	28
批陶联成立，武斗开始升级.....	35
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40
读《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的疑问.....	43
1、1 月 21 日，林李明有没有被抓去中大？.....	43
2、省委大印由谁保管？.....	43
3、林李明给中央的电话是在哪里打的？.....	43
4、造反派到底有没有夺到大印？.....	43
5、夺权以后省委的工作是否“完全停滞”？.....	44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46
《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目录.....	49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的广东省委... 3.....	49
第二章 红卫兵运动的崛起... 29.....	49
第三章 “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 58.....	49
第四章 一月风暴... 84.....	49
第五章 军管广州... 109.....	49
第六章 在沉寂中爆发... 138.....	50
第七章 反帝抗暴与武斗的开端... 163.....	50
第八章 “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 190.....	50
第九章 “战士指看南粤” ... 223.....	50
第十章 东风派、红旗派的覆灭... 253.....	51
代序：历史需要反省.....	52
斗争巴伦事件.....	54
《北京来信》引起轩然大波.....	56
主义兵来了！.....	60
黑材料风波.....	64
广州红卫兵的诞生.....	66
广州破四旧狂潮.....	76
“破四旧”时广州的改名风潮.....	85
红卫兵心中的“新社会”.....	90

“万岁”与“战歌”	95
大串联时期之广州.....	97
一月夺权.....	98
广州武斗的开始.....	100
省革联组织被瓦解了.....	101
周恩来在广州.....	102
动乱中的广交会.....	104
广州日报事件.....	106
省市当权派被监护.....	112
高官辩论会.....	114
中南林学院的武斗.....	116
八月抢枪狂潮.....	118
广州市总工会武斗.....	120
“红警司”掀起反军浪潮.....	122
三元里武斗.....	124
北京在谈广州在打.....	126
交枪前后.....	128
支农青年大闹广州.....	130
省革委会成立.....	132
第一秘书组：	134
“砸烂旧招牌”	136
东较场武斗.....	138
派性回潮武斗再起.....	140
中大“六三”武斗.....	142
广雅中学的武斗.....	144
造反派的末日.....	146
无中生有的“第二套黑班子”	148
清理阶级队伍.....	150
上山下乡运动.....	152
广州“一打三反”运动.....	154
广州地区“文革”小报掠影.....	156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158
叶曙明（一听）：当年红卫兵今何在？	162
叶曙明（一听）：与晓刚探讨广东地方主义问题.....	166
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4）炮轰广州军区.....	172
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5）砸烂“旧省委”	179
一、组织工作问题.....	179
二、深入发动问题.....	180
三、要解决一个“看风”的问题.....	180
一、土改时，赵（××）把广东党组织踢开，重新扎根串连，讲广东党靠不住；	182
二、反地方主义把它扩大化，我只赞成反几个头头，中间干部不要搞；	182
三、广东没有大军不能解放，土改没有外援搞不好，我不同意。	182
一、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183
二、写一个告全省人民书或大字报。	183

三、以廖似光材料为基础，写一个陶铸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183
第一部分：武传斌自述.....	195
第二部分 阿陀九问.....	202
第一个问题：会议名称是什么？.....	202
一、“一月风暴”，不斗不相知.....	208
二、“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210
三、渡尽“风波”，患难吐真言.....	210
第一阶段：进入革委会前后积极参与工作.....	222
第二阶段：1968 年秋清查运动后一派代表名存实亡.....	225
第三阶段：批林批孔后“补台”.....	226
第四阶段：“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228
第五阶段：清查“三种人”.....	229
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232
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	232
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	233
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	233
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	233
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233
把赵紫阳揪上审判台——赵紫阳镇压省直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滔天罪行.....	236
一、亦步亦趋的 1 9 6 6 年.....	241
二、在夺权风暴的风口浪尖上.....	245
三、被“监护”的日子.....	250
四、重新工作的五年.....	253

地方网叶曙明广州文革研究文章汇编

地方网编者按：

就笔者所知，及今为止研究广州文革史并成书出版的共有四人，他们分别是海枫、王希哲、刘国凯和叶曙明。

海枫《广州地区文革历程述略》（香港“海枫出版社”一九七一年出版）。作者据说是惠阳地区的一位逃港知青，从内容分析，作者本人不属于文革弄潮儿，书中没有什么自身的亲历、亲睹，应该主要是凭道听途说加上剪裁地方小报拼凑而成的。故学术价值不大。

王希哲自传体《走向黑暗》（香港“民主大学”，1996年）。文革前期，王是广州十七中造反派的头头，武斗中有出生入死的刻骨铭心经历。文革后期，王是轰动全国的“李一哲大字报”《民主与法治》的三位撰稿人之一。《走向黑暗》是作者本人的所历所见所闻所思，一方面这是一份非常有研究价值的“口述历史”，另一方面作者的个人主观色彩太强，缺少学术研究需要的客观冷静。龚小夏评价该书：“书中最大的缺憾之一，是作者对待文革时期的经历似乎缺乏批判与反省。……在写下自己年轻时代的历史时，似乎难免流露出了几分对那个轰轰烈烈时期的留恋。”（龚小夏）

刘国凯《红旗派的兴亡》（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实际开始写于1996年，作者意图写成三年群众运动时期的广州文革简史。刘本人是基层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对当时群众运动的方方面面都有比较细致的观察，因此该书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但这只是一部造反派回顾自己道路的简史，就全面性客观性而言，还称不上“广州文革简史”。

叶曙明，百度百科介绍：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 1、曾经的先锋小说作家 2、图书界的资深出版人 3、成就斐然的近代史学者 4、广东文化的代言人。

《见证一九七六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是叶曙明长期调查广州文革历史，集腋成裘的最新成果。去年成书以后，并没有正式公开发行。四川网上杂志《昨天》曾登载余樵的推荐文章，节录如下：

这是一部厚重的力作（共十章，近500页，50余万字），也是一本写成多年却始终无法正式出版，只好在2011年6月再次校改定稿后自印分送亲友的自印书。

许多年前就在网上读到了叶曙明有关广州文革的系列文章，当时就觉得内容丰富，文笔生动，而且态度客观，用语平和，全然不像许多“网络大字报”那样偏激、虚骄，是同类文章中的佳作。作者虽然用的是纪实写法，但却没有某些纪实类畅销书中常见的虚构、夸张等哗众取宠的描写，没有因追求可读性而损伤可信性。后来得知，作者在写作中曾采访了不少广州文革的重要当事人（如黄惹坚、莫超海、高翔、焦林义、梁锦棠、黄秀琨、黄兆邦、迟泽厚等），查阅了当年的许多传单小报和档案资料，特别是通读了当年广东省军管会的《情况反映》、《斗批动态》及值班室日记、谈话记录、专案材料等大量历史文献。现在读到此书，更从书中的注释知道了许多有关史料的具体出处，大大增加了此书的学术价值。

此书对历史资料的引用也是十分慎重的。在第412页引用周恩来一段讲话的注释中，作者写道：“周恩来的讲话在许多群众组织的小报上都有刊载，不同派别的记录略有不同，显然是各取所需。此处参考了两派的记录稿，取其一致的精

神，再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互相印证，务求准确地反映出周恩来讲话的原意。本书多处引用周恩来的讲话，除已经正式发表的之外，都采取这种办法。”可见作者的苦心。

……此书虽以“见证一九六七年”为重点，但他并未局限于这一年，而是将内容延伸到了1968年广州两大派的再次武斗，《七三》、《七二四》布告之后的两派组织再次停火、大联合、“铲平山头”，直到年底的中学生全部下乡……也就是——一直写到了群众组织退出历史舞台为止，可以说是一部广州地区的文革群众组织史。

作者在此书的最后写了一段沉甸甸的话：“历史沉重的一页，虽然已翻过去了，但由于在很长时期内，文革仍然是个敏感的研究禁区，得不到认真的正视，因此中国注定还将在文革的阴影中，度过很漫长的一段岁月。”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沉重的历史责任感，作者才能坚持不懈地在许多年里不畏艰难、不计报酬，为记录广州文革历史而辛苦耕耘的吧？

笔者阅读后的初步印象是：该书作者不同于前述三位，书中没有个人特定立场，基本是只叙不议，特别注重历史资料的“实录”。笔者以为，由一位立场超然的学者撰写的广州文革史，它的客观性、真实性、公正性和严谨性，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这里汇编的文章，部分内容收录在《见证一九七六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一书里。其中几篇关于武斗的文章，阅后觉得多少有些失望，原因何在？笔者尚在思考中……

目录:

第一部分：2013年以来发表在《羊城晚报》“荒唐岁月”专栏文章

1966年，破四旧的风暴

封闭《红卫报》

一月夺权

实行军管

周恩来在广州

浴血中山纪念堂

武斗升级

华工武斗

第二部分：其它一些文革研究文章

7、8月的抢枪潮！

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迟泽厚访谈（节录）

批陶联成立，武斗开始升级

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读《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的疑问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附《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目录

第一部分

1966年，破四旧的风暴

1966年的8月，一场“破四旧”风暴，平地而起。广州和全国各地一样，从8月中旬开始，受到全面冲击。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君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统统被撤销；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8月15日，华南师范学院实验中学的七名学生在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捣毁了大佛寺等14个教堂和寺庙，烧毁了各种神品。全市有40间天主教和基督教教堂被扫荡，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被揪斗、关押和被迫还俗。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自由神像也被砸毁了。8月30日，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也被抄了，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都被抄走。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黄洁（归侨，原广东省副省长）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9月4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红卫兵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广州的路牌，纷纷换上“延安路、红书路、朝阳路、曙光路”。全市89条马路，合并为24条，换上了新名字。永汉路改为北京路，恩宁路、第十甫、上九路、下九路、大德路，合并为一条秀丽路。

这股改名风卷向各行各业。全市有2300家商店被改名，换成“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革命化名字。理发店取消电发、落香水、发油、发蜡等项目，不理怪异发型；服装店不做奇装异服。陶陶居改为东风楼，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有人甚至提议把白云山改为红云山。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一律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无数家庭被抄家，名贵的酸枝木家具被砸

烂；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被投入火中；金银首饰被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1966年12月，广州举办了一次“革命造反成果”展览，其中有一件奇怪的展品：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姚碧澄用来给病人检查胃病的胃镜。姚碧澄是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

胃镜怎么会成为罪证呢？展品的说明这么写：“这是反革命分子姚碧澄对我长征老干部进行阶级报复的工具，姚先后用它对我长征干部张××作所谓胃镜检查，把这把长约80公分的铁管从极度衰弱的病人口中插入胃，给病人造成极大的痛苦，最后把这个长征干部活活折磨死在病床上。”这不是什么笑话，而是一幕真实的悲剧，姚碧澄因此遭到没完没了的批斗，最后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本文首发于《羊城晚报》，此处为作者所赐原稿。

封闭《红卫报》

“文革”初期，《羊城晚报》是广州三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造反派对《羊城晚报》副刊《晚会》“放毒草”作了一个统计，从1960年至1962年，共计发表毒草223篇，有严重问题的103篇。这些作品中，有攻击共产党和大跃进；有和吴晗相呼应、相配合的；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的；有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有鼓吹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的；有封建主义、封建迷信、低级趣味的。

按造反派的标准，大凡知识性、趣味性、文艺性、多样性、地方性，都是抹杀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和复杂性。任何生活情趣、娱乐、消闲，甚至生活常识，都有可能成为“毒草”，诸如“薛觉先生活二三事”、“红线女温泉游泳”、“元代女艺人朱廉秀的知心朋友是谁”、“畅谈养生之道”之类的文章，统统属于“无聊之极，庸俗之极，长期腐蚀广大群众”的毒草。而作者除了工农兵之外，其它全部是有问题的。

从7月开始，“文革”的暴风骤雨，已发展成群众斗群众，报社内贴出了1335张大字报，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击，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当时，报社的“老晚报”（指1964年7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有37名，其中33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20多人的反革命集团”，这种谣言，本来是无稽之谈，但闹得人人自危。9月1日，羊城晚报社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

可惜，改名也逃不过被封的命运。红卫兵在此之前已经封掉了《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现在轮到《红卫报》了。红卫兵指控《红卫报》的当权派，“大部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坏蛋”，从1966年“6月6日到7月的一个月里，就有15天没有刊登毛主席语录”；另外一项罪名，曾以“二盏路灯”为题，刊登了暴露性专题报道，“以广州一条小街缺路灯为名，恶毒地攻击我们党的干部和社会主义制度”。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派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派”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12月15日，中南局宣传部正式发出了停刊通知。

一石激起千重浪。封闭《红卫报》的行动，迅速导致群众分裂。一部分人热烈支持，而另一部分人则强烈反对。一批工人和大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组成了“中南地区反对封闭、停刊《红卫报》联络总部”。封报后，丰宁路的红卫报社门外，整天人山人海，两派群众在马路上展开激烈辩论，大标语和大字报铺天盖地。

“文革”以来，广州地区成立不计其数的群众组织，从封闭《红卫报》事件开始，逐渐分裂成两大派，并出现跨行业、跨地区的趋势。这一事件，对广州局势的影响，至为巨大。

“反封派”没有能够启封《红卫报》，“封报派”也没有能够拿出一份新的《红卫报》给读者。对《红卫报》被封问题，他们最后也没有取得一致认识。直到1980年2月，《红卫报》才重新以《羊城晚报》这个老招牌正式复刊。

载《羊城晚报》2013年5月18日

一月夺权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震撼大江南北。活跃于广州的九个群众组织，五个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红旗工人、中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东艺专东方红，以及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二司、三司、红色造反团等外地组织代表，1月20日，在中山大学开会，开始策划夺权。

哈军工最积极，主张立即夺权，但“广医红旗”和“红旗工人赤卫队”的代表，认为各革命组织还没有形成联合，夺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决定不参加对省委的夺权行动。会议讨论的结果：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权。夺权时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名称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会上，由哈军工的人执笔起草省革联夺权宣言（通令），并由北航红旗派人乘飞机送往北京，争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最后未能发表）。

次日，造反派继续在省委党校开会，决定了行动时间：当晚夺权！空气变得骤然紧张。新北大在1月21日接到聂元梓指示，要他们退出，说广东的夺权不彻底，是假的。他们便匆匆退出了。

1月21日下午，省委机关在省委党校礼堂开大会。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的部分红卫兵把省委书记们从会场拉出来，用车载到中山大学。1月22日清晨6时许，中大红旗的两名代表，向省委书记们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然后宣读《夺权通令》。

学生念完《夺权通令》后，问书记们有什么意见。大家无奈地表示，夺权是革命造反派的决定，你们夺权我们支持，没什么意见。红卫兵要他们立即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

在场的书记给在省委值班的书记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红卫兵带着这条子，到省委取大印了。

不料，在省委值班的书记却不肯交印，非要打电话向中央请示不可。红卫兵咄咄逼人地说：“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交印，你们不交，将来责任由你们负责。”值班书记说：“你们造反有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作主。”双方争吵起来。值班书记坚持要打电话报告中央，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已向毛主席报喜了。值班书记质问：“造反派何必怕中央？你报你的，我报我的。”

最后，红卫兵同意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电话接通了，对方也是一位值班人员，不敢定夺，答复请示一下，等一会再回电，却再没有了下文。

红卫兵也没耐心等了，把值班书记押到中大。这时，已有四位书记在场，大家商量了一下，虽然对是否要请示中央，仍有不同意见，但最后大家觉得，即使请示中央，也不会那么快有答复。这时，红卫兵跑进房间，一个个逼问书记们同不同意交印，结果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书记都在交印协议上签了名：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签名略）

一月二十二日

1月22日下午，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有四五名红卫兵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部委、各战线负责人都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

会议还要求各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夺权之后，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

会上，省委、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了学生。造反派兴高采烈，草草签了一张收条：“兹收到省委办公厅、文革、省委章子三个。”

当天晚上，省委各部委的印章也统统交给造反派保管。省委书记们在交印通知上签了名：“省委书记处同意省委各部委（不包括办公厅及文革）和办公厅属下的各单位的印章，今晚一律暂时由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收存。然后再由该委员会交给派往各单位的监督小组监督使用。”

23日，省委发表《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宣称：“1月22日，在广州地区的本地和外来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的权，把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是一件大好事，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个伟大创举。省委坚决支持这个革命行动，并且庄严地宣布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

省委被夺权的消息传到省人委，以办公厅为主的一群干部，匆匆召开会议。对省人委被夺权，大家都认为，只是迟早的事情。有人提议，与其让外单位的人来夺权，不如自己先夺了权。这个主意，得到许多人支持。于是便通知各位省长回来省人委，准备交印。

当他们酝酿夺权时，中大红旗的十几名学生也来了，串连了印刷厂、保卫部门等几个下属单位的工人、干部，宣布由他们夺权，并把省长们拉到别的房间，勒令签字交出大印。在场的省长、副省长都签字了，但监印的干部却乘乱溜走，赶到办公厅，问管政工的干部：“现在他们要拿印，省长也答应给他们，好不好给？给了以后弄丢了怎么办？我可不能负责。”这时，干部们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不能给他们！他们找工人，我们也找工人。于是找了幼儿园、招待所的工人，号召大家保卫印，不让外单位的人把印拿走。

闻讯赶来的工人有一两百人，把房间围住，不让中大红旗的人走。闹到深夜，达成协议，由省人委办公厅、机关印刷厂、中大红旗三方各出一人，负责监印。用印时至少要两方签字，加上一位省委书记的签字，方才有效。印放在办公厅保管，派两人日夜住在那里，谁也不能单独使用。

1月24日，一部分群众组织也仿照省革联形式，成立“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市革联），并发出《夺权通告》，宣布“从1967年1月25日零时起，中共广州市委的一切权力归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月25日，市委请示省委：“现在他们强迫要交权，怎么办？”省委答复：“现在都是一样了，我们都交了权了，你们也交吧。”“群众组织那么多，交给谁呀？”“你们看看究竟哪一个是革命的，就交给那一个。”

结果，市委也被夺权了。

刊于《羊城晚报》2013年6月15日

广州武斗的开始

当广东省委被夺权时，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也被造反派接管了。1967年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大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了一位副局长，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起来，晚上12时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招揽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1月23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接管监督小组发布“通令”。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法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市公安局内部的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了一位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吵得沸反盈天。

下午，一总部与政法系统一些造反派另组“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他们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25日凌晨，大夜弥天，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双方抛砖掷瓦，打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有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派人到现场调解，但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一派关起铁门，在里面顶住，另一派在外面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一声冲开了，外面的一下子冲了进去，把一总部砸垮了。两派组织事后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自从公安局发生“一·二五事件”之后，一总部与省革联监督小组矛盾非常尖锐，形同水火，公安局内部四个总部，斗得一塌糊涂，公安业务已处于瘫痪状态。1月26日，广州警司宣布派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省革联召开控诉大会，批斗一总部负责人，并派了由中大红旗等八个单位组成的监督小组，到省公安厅，以公安厅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参与了“一·二五反革命事件”为由，要求“广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交出所掌管的印和一切权力”。

从这时起，广州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武斗的阴影开始笼罩全城。

刊于《羊城晚报》2013年6月22日

实行军管

“二八冲军区”事件发生以后，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变得形同水火。3月2日，警司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这是一个信号，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随即全面铺开。3月1日凌晨4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袭形式，捣毁了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

与此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3月4日，省电台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宣读布告：“勒令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所有成员，下午三点到礼堂开会，不得有误，如有违抗，后果自负！”当天下午，全台召开了“揭发控诉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及其首恶分子罪行大会”。这两个组织的五名成员被拘留。3月3日至6日，军区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

3月4日清晨4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15名干警，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800多人，包围了在“二八冲军区”事件中表现活跃的造反组织“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3月5日上午9时，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三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浩浩荡荡，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三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

经过这一轮急风骤雨般的打击，省革联组织被瓦解了。3月15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兴元、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为副主任。广州“文革”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在广州

一年一度的春交会是缓和广州形势的良机。中央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但当时军管会深感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亲自飞赴广州，下榻军区大院留园七号。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接见春交会负责人和群众组织头头，讲解中央关于开好春交会的指示，晚上又出席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中山纪念堂是主会场，市体育馆是分会场。周恩来先到分会场与群众见面，然后在主会场作了长篇讲话，逐条讲解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指示，要求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军管工作。大会结束时，已过了午夜，周恩来又驱车赶往海珠广场，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视察。

4月15日，交易会如期开幕。当晚23时至次日清晨7时30分，周恩来和群众组织代表举行第一次座谈。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几个大山头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学生代表和外地的红卫兵代表。座谈一开始，有些造反派代表便指责广东军管，是支一派，压一派。

4月17日零时35分至清晨8时30分，周恩来与群众组织代表第二次座谈。他批评中大造反派以电影《清宫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把中山纪念堂内孙中山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他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4月18日零时30分至上午9时，周恩来再次和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经过三次座谈，以及连日来听取军区、省军管会和中央文革小组驻广州记者的汇报，阅读由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之后，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4月18日傍晚19时30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他在总结中否定了一·二二夺权，他指出这个夺权行动当时就犯了错误，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群众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

周恩来不同意以支持或反对封《红卫报》划分革命派和保守派，他还提到了广东军管以后，军区捕人的事情。虽然捕的人数多了一些，但不像别的地方多。经事后核实，连取缔的组织在内，总共捕了450人。现在已经放了169人，准备再放100多人。还有因交易会开幕，整顿社会秩序，从3月22日开始，一个星期内抓了508人，其中大部分是炒买炒卖、流氓分子，经教育后已放了280多人，交易会完了还会再放一批。他说：“在我们全面看起来，广东很谨慎的。”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

左派。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地总、红总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

4月19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地总、红总是当时广州地区两个规模最大的工人组织，对周恩来批评他们“保守”想不通，纷纷到军管会质问。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

载《羊城晚报》2013年7月13日

浴血中山纪念堂

今天人们一提起广州“文革”期间的武斗，都会说到1967年7月23日发生在中山纪念堂的那场大武斗，但能说清其来龙去脉的人并不多，很多谜团也许将永远埋藏在历史的浓雾之中。

现在，让我们回到46年前的那个夏天。7月23日，东风派的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举行总部成立纪念大会，而红旗派则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追悼糖厂武斗死难者的大会。时间、地点都十分接近，危机再次逼近了。

当时，两派要召开大型群众集会，均须事先向军管会申报，最初主义兵的成立大会是在军区后勤礼堂（即陵园西路），旗派是在东较场，但最后却改为两个十分接近的地点，这是为什么？事后没人说得清楚。

这天下午，从中山纪念堂到越秀山体育场一带，聚集了成千上万的群众，有旗派的，也有东风派的。一些本来准备摆放在追悼会上的花圈，索性摆到中山纪念堂门口，以示抗议。午饭之后，一批旗派群众抬着花圈，分乘两辆汽车前往越秀山开追悼会。12时半左右，车在纪念堂东侧停下，准备集队前往越秀山。广钢、广船的旗派工人到得比较早，天气很热，大家熙熙攘攘地在纪念堂旁边的树阴底下休息。纪念堂内的主义兵十分紧张，一直用望远镜监视着。

忽然之间，有几十个身份不明的人冲进那班乘凉的工人中，挥刀把广船的一个人捅死了。然后这帮人就爬栏杆跑进纪念堂，混入了主义兵的人群当中。这个突发事件，把所有人都惊呆了，当时主义兵也纷纷追问，这是不是他们的人，都说不认识。但再去追查时，已经找不到这些人了。

这时，在纪念堂另一边，纺织学校的主义兵在进入中山纪念堂时，与堵在外面的旗派组织发生冲突，于是大规模的武斗就开始了。

也许，在事隔多年以后，再追查当时武斗的起因，已不重要。不管是谁先动手，不管是谁有备而来，蓄意制造事端，挑起武斗，对于事情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影响。很可能，双方都是有备而来的，双方都打算与对方大拼一场。但也有可能，他们都跳进了一个预先挖好的陷阱之中。

军管会的值班人员对事件起因也不清楚。值班日记这么记录：“今日下午，红旗工人、工联、三司在越秀山体育场开追悼大会，主义兵在中山纪念堂开总部成立大会。于3时发生武斗（事因不详），至5时左右，旗派在外面包围主义兵，约有一万多人，主义兵在纪念堂内约有二千多人，在外面也有部分。事情发生后，警司杨（阳）司令员和省军区黄司令员均到现场制止武斗，被旗派围攻，被部队救出。武斗初，警司派去二个连，后增派六个连、二个营，后增至二个团的兵力，下午6时40分所有大门被部队占领，部队并把双方隔开，方制止武斗。”

武斗最后停火的时间是晚上8时左右。在此期间，省军管会频频接到各方的告急电话：“地总在海珠广场集结了一千多人向北走；西村地总有二三百人向中山纪念堂移动，打伤了旗派三个人；地总总部有十多辆卡车准备拉人，还准备有十多辆汽车石灰，封锁了北京路；郊贫（联）在新村和沙河集中，人数不详。”入夜，地总把纪念堂内的主义兵接走。

解放军从混乱的武斗现场，抢救出89名伤员，其中五人送往医院后死亡。实际伤亡人数，无从统计。当时旗派声称他们最少有33人死亡，400多人受伤。主义兵则称他们有九人死亡，100多人重伤。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承认：“武斗中，双方伤很多，无法统计。”文革后，两派组织头头都否认这次武斗有死亡。也许，实际伤亡人数，永远无法大白于天下了。

“七·二三武斗”之后，广州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据7月24日省军管会总值班室，记录了街头动态：

△中山纪念堂今上午有一千余学生（新组织的）冲进场内，打乱设备，已派二个连队制止。

△中大红旗在校开会，有的准备武斗凶器，要求不准单独外出。

△广医红旗上午将水、粮食搬上大楼，并用石头修工事。

△17时反春雷派在南站集结队伍，并派30人手持凶器到办公室将门封锁。

△据红司、三司反映，明、后天有大型武斗，十六中旗派已全部转移到七中。

△广州体院造反派（三司）今下午带行李和体育器材（手榴弹和标枪）离校，声言要干到底。

△市一中七一造反派（旗）将可作凶器的东西都搬上三楼。

“血洗广州”的叫嚣声，喧腾一时。铁路南站从7月24日起，全部瘫痪，货物不能装卸；工业用煤来源断绝。两派都在酝酿新的武斗。7月22日，南站武装部民兵的枪支，被造反派夺走重机枪二支、轻机枪二支、冲锋枪14支、步枪45支，他们扬言要“砸烂南站家属宿舍”、“血洗西村”。两派的列车，机车乘务员因互相对抗，都没有上车，在家准备武斗。列车无法开出，广深线的火车也停了，不少外宾上车后也被迫返回。市内公共交通大部分停顿。

7月25日，旗派在省体育场召开“‘七·二一’、‘七·二三’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军管会正担心广州会步武汉后尘，偏偏武汉钢二司赴穗调查组、首都红代会北航红旗八三支队、哈军工红色造反团九四三支队等17个组织，在7月25日联合发表声明，声称“七·二三事件是大规模武斗的讯号”。武汉三司硬革联亦于7月29日发表《严正声明》，显示出北方的造反派正积极介入广州地区的文革。广州形势危疑震惧，已到全面溃决的边缘。

载《羊城晚报》2013年7月27日（原作2006-03-06刊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武斗升级

中山纪念堂的武斗之后，各派组织都在磨刀霍霍，准备更大规模的武斗。1967年7月23日晚上，华南农学院东方红公社把学院的几大箱硫酸、硝酸和盐酸取走，宣称作自卫之用。24日下午，中大红旗强占了学院的化学大楼，里面贮藏了大量的硫酸、硝酸和盐酸。中山医东方红也打烂了学院仓库大门，抢走了500多公斤硫酸、硝酸和盐酸。广州农药厂加紧生产刀叉等武器。同一天，工联接管了广州灯泡厂全部消防设备，并运了几麻袋匕首进厂。中大红旗、湘江风雷、八一战斗兵团等组织，在八中开会，研究包围广钢大楼的行动。

7月31日，中大红旗在康乐园新化学楼召开会议讨论武斗问题，留下一段会议记录稿：“他（指广州军区——引注）如果今夜打，我们有无准备？现我们提出打倒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这是短兵相接，对反动派，对走资派决不能施以善良。我们不希望用这些东西，但用与否不决定于我们。不但要试验，而且要正式生产。生产一批，等到要用时，我们也就（有）准备了。现在搞易的，以后慢慢搞难的，将来逐步升级，能做多大效力就做多大。”

会议记录中的“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

据事后公布的材料称，是一种“化学弹”。8月1日，中大红旗正式试验了化学弹，并印发了公告：“我们欣喜地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向全广州人民庄严宣布：今天，1967年8月1日23时正，中山大学红旗公社第一颗化学弹在中山大学东南地区爆炸成功了。我们欢呼，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辉煌成果。”听起来像当年中国试爆原子弹成功的公告。

当事人事后交代，8月27日，在研制炸药和化学弹过程中，有人违反操作规程，引起爆炸，造成一死一伤。死者是中大学生陈秋泉，伤者叫高生亮。

当时制造化学弹的，不仅有中大化学系，还有中科院中南分院的化学研究所。有一份材料称，中南分院造反派制造大刀长矛、雷管、化学弹等，并在实验大楼构筑武斗工事。同时，向外单位提供化学药品制造弹药，为分院各所制造武斗器械。后来，中大红旗把数量不等的自制化学弹送给了广重、广钢、鱼轮厂、文冲造船厂、二十二中东方红等单位的造反组织。

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消息都表明，广州武斗规模将愈来愈大，动用的武器将愈来愈先进，杀伤力也将愈来愈大。据公安厅二办的情报称：

明天（7月28日）武装暴动，全市夺权。

明天火烧越秀山会场。

华工红旗出海报，明天8时在中山纪念堂开会，每人带武器。

在市委党校（沙河），旗派开保姆会，动员明天带好小孩，不要怕。

明天冲击陆军医院。

明、后天对市一宫总攻击（据说市一宫也作了准备）。

对主义兵逐个抄家，干掉。

武汉来三人，能制炸弹，对付市一宫。

与此同时，从其它地方，也传来类似的消息。有人说，广州氮肥厂开始疏散家属，准备武斗凶器；华师的小工厂正在加班加点，制造武器；还有人说，省技工学校这几天都在赶制长矛、大刀；重型机器厂宣传组的一名军代表打电话给军管会报告：

他们的口号是：

红旗战士随时准备上山打游击。

红旗战士一定要走武汉造反派的路。

红旗战士这次参加武斗是真假革命的考验。

如果广州地区的武斗，和武汉地区南北呼应，推波助澜，甚至在广州重演武汉事件的一幕，大局将不堪设想。

武汉事件以后，北京举行了百万军民支持武汉革命派的集会，中央要求军队支持左派，迫使广州军区不得不改变口风，不敢再公开支持保守派（东风派）了，但他们也不愿意公开支持造反派（旗派）。于是，便以要一碗水端平为由，抗拒支持左派的指示。

7月26日，省军管会起草了一份《广州地区革命群众组织关于制止武斗的协议书》，向工厂、学校、机关各群众组织征求意见。协议书内容大致如下：一、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二、如有武斗事件发生时，各革命群众组织应以大局为重，约束自己一方的群众，绝不能调队伍增援。在解放军进行劝阻和调解时，各方都应以支持和尊重。三、农民在任何时候都坚决不要进城参加武斗。四、任何群众组织都不得自由抓人，已经抓去的人，应立即释放。五、任何组织、任何个人都不准使用民兵武器、小口径步枪、猎枪、毒品等进行武斗。六、工人、农民、干部必须坚守生产（工作）岗位。学生必须积极投入复课闹革命。七、各革命群众组织和部队支左人员，应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动群众制止武斗，坚决揭露一小撮挑动武斗的人，粉碎他们的阴谋诡计。但这份协议草案没有得到正准备大干一场的造反派积极回应，局势在继续恶化。

7月28日，东风派13万人召开“支持湖南、武汉造反派的革命大会暨坚持文斗，反对武斗誓师大会”，会后举行了全市大游行。这天从广州开往北方的50次列车，因沿途发生武斗，被迫停开，列车退回到中山一路铁路大厦前，无数标语、大字报立即贴满了车厢，甚至贴满全市。车上的乘客发生鼓噪，在广铁总司的鼓动下，围攻军管值班人员，冲击了军管会。

气氛更加紧张，一股蓄势待发的杀气，飒飒逼来，令人心胆俱寒。各群众组织纷纷制造长矛、大刀等武器，如果再爆发武斗，那就不再是用棍棒石头的打群架了，而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了。

载《羊城晚报》2013年8月2日（原作2006-04-04刊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华工武斗

8月份是抢枪的高潮，也是武斗的高潮。这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一场大武斗，发生在华工。8月4日，华工红旗声称八一八偷了他们的“发射机”（其实是电子管），集结了几百人包围冲击八一八总部大楼。双方对峙了十几个小时，退守楼上的八一八，既没有水，也没有粮，于8月5日零时向广州军区、省军管会发出紧急“照会”：“我八一八直捣黑省委前线总指挥部限令你们在明早8时以前解决数百名八一八战士的食饭问题，逾期以后不给予解决，我们将对军管会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责。”

省军区派了一个步兵连前往华工制止武斗，双方谈判了一个通宵，八一八要华工红旗先撤走，才交电子管；华工红旗要他们先交出电子管才撤。谁也不肯让步。省军区政委和参谋长都到现场调停，他们建议，一、把伤员运走；二、把饼干、水运上三、四楼给八一八的人充饥。但部队被堵在外面进不去，送水送饭也被挡了回去。

中午12时50分左右，华工红旗开始动员准备冲击八一八大楼；八一八也动员准备反冲。形势愈来愈紧张。下午3时左右，三个连的解放军从前后门强行进入校内，将两派隔开。但红旗仍有许多人占据楼下。

据军管会值班日志记录：“步兵连进去之后带了六部电台，被砸坏了五部。把双方隔开了，八一八受伤十人，运不出来。现在旗派还有人在楼下。4点钟听到两声步枪声，谁放的未查清。要求军管会派人去协助他们做工作。5时半院校组王副科长报告，华工红旗对着八一八架起了机枪。八一八下面一、二楼失火。双方还没坐下谈。”

大楼失火时间约是傍晚6时40分左右。二楼首先起火，华工红旗乘势冲上二楼，用小口径步枪向三楼开火，并投掷教练用手榴弹，部队无法靠近。8时40分，武斗已基本停止，火渐熄灭。双方从12时45分开始谈判，八一八提出三条：一、将八一八被扣留的人放了；二、允许把伤员（79人，枪伤34人）运出来；三、电子管可交解放军代管。但华工红旗不同意。8月5日，R! K; H

8月6日凌晨4时，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华工红旗同意把八一八伤员接下楼，但很快他们又反悔了。直到早上8时，院校组、机关组和工交组共八名军管人员匆匆赶赴华工，协助进行谈判。部队陆续派了六个营去。

省军区的意见是：一、把伤员运走；二、把饼干、水运上三、四楼给八一八充饥（因已被围了几十个小时）。军区曾计划用直升机向楼上投放饼干和汽水，但经请示中央军委不同意，只好作罢。在《红旗》杂志的一名记者斡旋下，下午3时许，华工红旗同意让八一八人员下楼，但要一个一个下。而八一八坚持要成批成批下。华工红旗不允，双方又谈崩了。下午4时，华工红旗准备向楼上发动进攻。气氛一触即发。军管会值班日志记录：

双方伤亡情况（据张××部长今晨7时40分向白副政委汇报）：八一八伤97人，其中被小口径步枪打伤的34人；红旗伤30余人，其中一人重伤送医院后死亡。省军区已准备了饼干900余斤，汽水270余瓶，下午运至华工，因送不上去，又折回省军区。

下午一个连队冲了上去，至三、四楼间，被红旗战士逼进一个房间，不出来。

18时20分，红旗冲上四楼，把八一八战士逼进一小房间，八一八战士齐背语录，高唱语录歌。

晚8时10分，《红旗》杂志的记者陪着省军区的几名干部上了四楼，和八一八的

人见面。但群众一见军队干部就高呼：“打倒广谭！”情绪十分对抗。大家谈了一会，谈不出什么结果。

华工谈判未有进展，校外的八一八却奔走呼号，纷纷涌到省军管会请愿，要求军管会采取强硬措施。傍晚，八一八的群众在军管会大楼前静坐绝食。与此同时，华工校内被围的八一八，已经交出了电子管。华工红旗同意他们撤出，但不能以“八一八战士”名义下来，不能住在华工校内。八一八坚决不干，只撤出了22名伤员，其余的170人拒绝离开，在四楼静坐绝食绝水。军管会的值班日志写道：8月7日6时。省军区作战处刘×同志电话：华工的武斗已停止，现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八一八态度很强硬，坚决要绝食，不下楼，因华工红旗提出的条件太刻薄，八一八不能接收（受）。红旗杂志记者已于今早1时多回来，他说这已超出了他的职权范围，他做工作只能做到这种程度了。部队已撤回二个营休息，还有四个营在那里继续做工作。四楼上的一个连队与下边的部队可以联系。

八一八坚持到当天晚上，终于同意撤出学院。所有人在解放军护送下，进入学院外的高炮营营房，然后由部队把他们转移走。

华工武斗之后，广州市内到处可以听见刺耳的枪声。人们体验着危机逼近时积聚着愈来愈强烈的压迫感。行人寥落的街头，时时有飞驰而过的卡车，上面满载着头戴钢盔、藤帽，手持长矛、冲锋枪，车头架着机枪的工人和学生。驾驶室门口的踏板上，还站着几个耀武扬威的人，狂呼乱喊，路人心胆俱寒。一般市民也弄不清他们是东风派的，还是旗派的，局势极其凶险。

载《羊城晚报》2013年8月10日（原作2006-03-06刊于《历史现场的黑白记忆》）

第二部分

7、8月的抢枪潮！

七二三武斗之前，广州两派的冲突，并未动用热兵器，甚至连用棍棒的都不多。8月4日，毛泽东指示，当前文革的中心任务，一是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文攻武卫”使武斗变得合法化，各群众组织开始纷纷制造武器。而炮轰军区，则为抢夺军队枪支弹药、军用设备，提供了一个“革命”的理由。广州到底是何时何地发生第一宗的抢枪事件的呢？据一些群众组织的材料称，是7月19日，抢夺铁路武装部和驻军枪支。但新一司的黄XX披露，旗派的第一次抢枪，就是他们干的。抢的是农民运动讲习所里陈列的枪支（展品）。

他们最初的计划，是抢烈士陵园内革命历史博物馆的枪支展品。他们为自己找了一个“合理的理由”是：那地方以前是国民党的党部，抢国民党党部的枪是革命行动。但他们派人侦察后，没有找到枪支。于是改变计划，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翻墙进入农讲所，抢走了里面所有的枪支，包括农讲所保卫人员的两支驳壳枪。由于农讲所内部的旗派事先给他们画好了地图，整个行动非常顺利。

我问黄XX：“那些几十年前的破枪还能打吗？有撞针吗？”

他回答：“能打。后来配了子弹，都打得响。”

然而，抢农讲所的枪，和抢国民党党部的枪，性质完全不同了。文革后期，这次行动受到严厉的追查。从此以后，抢枪风开始四处蔓延，两派群众都参与了，并演变成抢夺公安部门和军队武器，在7月下旬，形成了一股狂潮。

员村的地总工人缴了一车解放军的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广船地总在厂区埋设地雷，布岗放哨，把工厂变成戒备森严的兵营，对不上暗号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厂区，否则格杀勿论。黄埔岛由427工厂的地总和4801工厂的人所控制，抢了两艘炮艇、几门双管三七炮和多挺12.5高射机枪，每个山头都架起了机枪。长洲的兵械修理厂、海军的大批装备，都在地总的控制之下。他们甚至扬言要把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白鹅潭，谁敢乱动就开炮打谁。

7月25日，体工红旗几百人包围该校武装部，抢走了87支步枪、20支小口径步枪、三挺重机枪和三挺轻机枪；26日，中山医东方红也接管了学院武装部，抢走两支左轮、两支驳壳枪、一支五四式手枪和几百发子弹。据警司民兵组织处7月26日的反映：

关于学校收武器情况，15间大专院校中，五所已收枪弹（中大、广医、艺专、暨大、外语），七所的子弹、枪机已收，枪筒未收。另三所的枪拿不出来（中南林的枪被东方红7.23晚抢走，要自卫，不给我们。老保有枪，按江青同志讲为了自卫，我们只好留这些枪），共抢了步枪10支，小口径43支，刺刀两把，系7.23半夜从武装部抢走。华农，内有一专职干部把收枪问题先告了东方红，枪就不给拿出来。昨晚半夜组织几百人围攻武装部要枪，枪机未拿出，因司机是三〇一的，不让拿枪。要广州军区命令才行）。以上三个单位共有枪支220支，至今未取去。

华工的枪（113支，含轻、重机六挺）枪机取出，但枪身全部被抢。我们派武装部两同志去交涉，被扣，至今未放回。要枪机送回后再放人……

另外反映，省直武装部今晨到省科委取枪（步枪九，冲锋枪二），科委红司阻碍不让拿枪，至今二百多人围攻，要军委规定，并要经过群众，我宣传员也在现场说要经群众才能解决，请告宣传员帮我们做工作，速解围，把枪取回。

8月初，群众抢武器达到了高潮。8月3日，绢麻厂地总分部红筹总部和麻袋厂地总分部的80多人，大闹工交武装部，声言要造工交武装部的反，扰攘了两个多小时后，封了武装部办公室和文件柜的门，抢走了政工科一只装有机密文件的柜子，还抢了训练科180发小口径子弹和40发半自动步枪子弹。

8月5日，中大红旗、八三一、八一战斗兵团、中南林红色造反者、公安红司、华工红旗、八一八、暨大东方红、军区千钧棒、陆海军卫校、湘江风雷猛虎造反队等组织数千群众，冲击警司办公楼，从下午5时30分开始，先冲作战大楼，再冲政治部大楼。在混乱之中，五人重伤，89人轻伤，打字机、电话机各砸坏一部。韩滔副参谋长和一名保密员被群众绑走了。中大红旗提出三个放人条件：一、交出八一战斗兵团的全部材料；二、要黄永胜、温玉成、陈德和中大红旗进行一次大辩论；三、把八一战斗兵团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报告。

仅8月6日一天，全市就发了44宗抢武器事件。被抢的单位多是公安部门（41次）。据报有1000多人强行冲入公安局武器库，把全部武器洗劫一空。另外法院、军队、远洋公司各一次。把这一天军管会总值班室接到的各方报警，不厌其详地抄录下来，可以一窥当时局势的混乱和凶险：

- 1、公安局仓库在今晨4.00被抢去枪支2621支，其中包括机枪六挺，步枪178支、手枪2437支，子弹176820发。具体是由哪些单位抢的，现在还不能完全断定，但是据说在抢武器时发现他们拿的凶器上写有广医红旗的字样（内应外合）。

- 2、航运公安局在4.50和5.00先后两次被抢，抢去枪支164支，其中包括轻机枪六挺，卡宾枪10支，冲锋枪14支，步枪31支，手枪103支，弹药15815发，短剑、刀13把。第一次是广医红旗抢的，第二次是三司抢的。

- 3、十一处在今晨7.00枪支被抢去134支，轻重机枪各一挺，冲锋枪四支，三八步枪20支（枪机被拿），猎枪二支，小口径一支，手枪105支，弹药1000发以上，东洋刀一把，可能是一二五总部抢去。

- 4、海珠分局10.00枪支被抢，是三司、红旗工人抢的，共抢去37支枪，其中步枪33支，轻机枪二挺，卡宾枪二支。

- 5、12时公安红旗将八处的枪全部分了。

- 6、越秀分局的枪在1.00被手持大刀、长矛的工人全部抢去，是用车运走的，车号14-15692，数量待查，谁抢的不清。

- 7、3.30荔湾分局的枪被抢（三司抢的），机枪二挺，其它武器不详，子弹一万多发。

- 8、今天早上6.00~下午1.00航运公安局炮艇和派出所的枪支交给三司保管共41支，其中包括重机枪12挺，其它39支，子弹数不详。

- 9、4.30郊区分局的枪支被抢，来抢的单位和被抢的数量不详。

- 10、公安局政治部办公室下午发现短枪14支、子弹800发丢失。荔湾分局有19个派出所现报有六个派出所被冲击，有15个派出所没有人。南源派出所反映，四类分子要血洗南源。

- 11、光扬派出所4.00多有20多人冲进去抢去冲锋枪一支，手枪六支，弹药300多发，哪个组织抢的不清楚，派出所的人员现在全部走光。

- 12、岑南派出所在4.00被冲击，抢走全部枪支弹药，数量不清，被谁抢也不清。派出所人员全部走光。

- 13、文安派出所在4.00被冲击，抢走全部弹药武器，数量不清，被谁抢也不清。派出所人员现已全部走光。

14、黄沙派出所 9.10 有几百人包围，现情况不明。

15、清平和人兴隆派出所也受到冲击，大概也是想夺枪，现情况不明。

16、郊区分局在 7.00~7.30 又被抢了一次。

17、东山分局在 8.00 先后去了两批人抢枪，第一批是公安红司（车号：15-10496），抢去卡宾枪六支，步枪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冲锋枪 12 支，枪机已被拿。第二批是三司，因来迟了未抢到。

18、6.30 三司、红旗工人到六处抢去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卡宾枪八支，步枪八支，子弹不详。

19、7.00~7.10，三司、红旗工人抢了十二处短枪 31 支，子弹不详，把保险柜抬走了，内有机密文件。

20、7.30 有两车人去防空委员（会），将武器弹药全部抢走。是谁抢的不知，数量不详。

21、广东省军区报告有 30 余人扛着 60 多支步枪，两挺轻机，两箱子子弹向二沙头方向走去。

△白副政委 4.00 指示，告诉警司对还没有抢去的分局：东山分局、郊区分局、六处、十处及派出所要尽快采取措施，将枪机拿掉（已告警司佟参谋）。

22、省军区作战处冯参谋报告：今天 17 时许有两卡车约 60~70 人左右，带着凶器冲击市人民法院，打开保密室，抢走武器一批，计步枪七支、手枪 28 支、轻机枪一挺、卡宾枪六支、汽枪二支、小口径一支、猎枪一支、手榴弹 284 枚。

23、荔湾分局的 19 个派出所全部被抢，海珠分局有五个，越秀分局二个，东山分局一个也被抢，数目不清，是谁抢的也不知道。

24、今天下午 10.30~11.00，广州军区用汽车送三个建设兵团去上阳岗，在农林下被铁中将汽车（车号丙 9-5429）抢去，将司机的一支手枪和 24 发子弹也抢走了。

这份记录字迹潦草、凌乱，可以想象得出当时人们的紧张心情。8 月 7 日，远洋公司黄埔仓库的枪支弹药被抢；8 月 10 日，长堤人民银行负责保卫金库的一连解放军武器被抢；8 月 12 日，军区后勤部被抢，全部军用卡车和整整两车军火被劫；8 月 20 日，石井海军仓库被抢。

在中科院中南分院化学所一份清查“五一六分子”的材料中，我看到这样一段文字：“华农野战团抢来很多解放军的枪支，但没有枪栓不能用，他们通过苗圃红旗工人找我们所联系，兵团派×××（在部队搞机修的，会修枪）和××去华农修枪，这样要了两挺轻机枪（带转盘的），一挺被分院总部要去，一挺架在实验大楼三楼顶上……机枪带两盘转盘，子弹也是从华农要来的。”华工红旗也送了三箱抢回来的炸药给中造总。

据迟泽厚后来告诉我，武斗期间，广州两派一共抢了一万多支枪。

毕竟，中共执政 17 年来，甚至包括在战争年代的根据地政权，这种情况，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一个执政党号召人民起来夺自己的权，并坐视人民抢夺军队的武器，在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

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当武斗进入高潮之际，一个离奇而吓人的谣言，在市民之中，一传十，十传百。据说市收容遣送站放走了 84 名收容人员，并拒收从樟木头收容站送来的两车偷渡人员。这些“劳改犯”已经流入了广州市了，他们有武器，到处抢劫。广州市民的神经，在经过这几个月的动乱，早已脆弱不堪，哪怕风吹草动，也会诱发天崩地陷的反应。大街小巷都炸开了锅。市民们冲上街头，敲着铜锣，狂呼“打劳改犯”的口号。

所谓劳改犯流入广州的谣言，最初究竟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已经难以考证了。但可以肯定，不是完全无凭无据。查阅省军管会值班日记，早在 7 月 15 日，就有这么一段记录：

（十九号办谭干事电话）：市公安局第十三、十六处所属的劳改所犯人无人管。

温玉成副司令员批示：此事由革命委员会查办。

革委会查办的结果，没有记录，但问题肯定没有解决。到了 8 月初，各地都在冲击公安机关，情况就更加恶化了。8 月 7 日，市军管会一名参谋打电话向省军管会报告：

市公安局的公安人员都跑了，海珠区有三个犯人没有人看。东山区监狱有 19 人，郊区有 12 人，越秀区有 30 人，荔湾 20 人。目前还有人看，但力量很薄弱，没有接班。他们意见把犯人集中起来，派部队去看守。

（黄秘书请示白政委，同意他们意见集中起来派部队看守。）

8 月 8 日，市军管会又向省军管会报告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这个消息和广州市哄传劳改犯流入市区的谣言，如出一辙：

公安局十六处在茶头的亚岗农场有五百多犯人，其中四类分子占 17%，从昨天到现在已跑了四百多人，还在继续跑。

由此可见，关于劳改犯逃跑的消息，如果不是从公安部门，就是从军管会传出来的。据黄意坚忆及，省航运局的军代表曾警告海员总司，北江有 1000 多劳改犯坐花尾渡前往广州，已经在途中了。并且说这是军区的情报，造反派要做好准备。海员总司立即通知了黄意坚。但航运厅厅长认为消息不可靠。因为当时北江根本没有花尾渡，而且在那种混乱的局面下，北江的全部航运能力加起来，也不可能同时运载 1000 多人。

然而，流言四播，令人莫辨真伪。一位在商品检验局工作的市民向军管会报告：“现有三千多劳改犯进入广州，昨天到处抢劫，群众联防后打死了一些，还抓到了一个头头。据说他们有军装和机关枪，他们准备今晚和最近几天晚上要反扑，大干一场，群众十分恐惶，现在不敢上街和上班，群众对军管会抱了很大希望，要求你们马上采取措施。”他显然夸大其词了。劳改犯逃跑问题，实际上，并没有传说中那么严重，而且也未对社会构成明显的威胁。

然而，8 月 11 日夜晚，是一个谣诼繁兴、人心惶惶的夜晚，市民四出搜捕劳改犯，一旦发现可疑的陌生人，便穷追猛打，棍棒石头齐下，围观的人呼喝助威，好象着了邪魔一样。当惨淡的曙光照亮大地时，广州街头到处是夜间被打死的所谓劳改犯尸体。永汉电影院门口有一个人被吊在树上还没死，群众仍然围着打；万福路也有三个人被吊起来，两个已经死了，一个还没断气，群众也不敢停手，拼命地痛打。惠福路、上下九路、北京路、丰宁路、爱群大厦、中山六路、解放电影院门前、东山等地方都吊着一具具尸体，在初秋的微风中晃晃荡荡，有

些已经肿胀发臭。据黄意坚说，他们统计过死人数目，约在 187 至 197 具之间。（黄意坚说）大概 8 月 11 日、12 日左右，在红警司成立前一两日，广州市忽然说打劳改犯。整个广州市所有主要街道，一晚吊了少则 187，多则 197 个尸体——我们统计过，是一个一个点的——当时我是红警司政委，红警司掌的权，是广州市半个公安局，因为公安红旗全部参加了红警司。我找派出所一个个点的，然后又找中学生由头到尾坐着车去点数……

市民打电话给军管会，愤然质问：“现在广州市到处吊的死人有的已吊了三天，群众反映很大，据说劳改场跑出来的犯人，这些犯人到处抢劫，破坏文化大革命，现在街上到处是死人，市民十分惊惶，到处排队买米买煤，为什么军管会不管？”

8 月 12 日，省军管会收到来自广州基立新村、素社新村、万松园、南园新村、小港新村等地居民的来信，信内表达了人们对目前广州形势的强烈不安和愤怒，居民们埋怨，他们“被来犯的强盗弄得已五天五夜未睡觉了。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市面上什么也无买，米也非常难买到。”居民们警告说，“如果你们再不火速采取坚决有效措施的话，我们就联络各村的数万大男细女老老少少，进驻军管（会）及军区，并实行其它革命行动。”信封上没有贴邮票，而且还加注了一行字：“买不到邮票”。

打劳改犯事件，在广州地区文革史上，是一个奇异的案例。因为死亡人数之多，令人震惊，但事后竟不了了之，没有人说得清，死的究竟是什么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被打死？是谁把他们吊到街头的？多年以后，东风、红旗两派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坐在一起谈论这件事，仍然感到困惑不解。

黄意坚：8 月 10 日死的人，你问一下，广州人谁说过我们街坊、我们邻居的人死了？没有。

莫超海：这件事我们一直在考虑，我们曾经在会议上问过这件事……

笔者：会不会是从殡仪馆拖出来的尸体挂上去的？

莫超海：不会。

黄意坚：死的人是什么人？肯定不是广州市人。文化革命后很多年我还反复问，谁能够讲得出死的人是你们的街坊，你们的亲戚？我当时问过这么多中学生——当时全广州的中学生有一半是听我的话的，我叫他们去探听那些是什么人，结果没有人能讲得出死的是什么人。死那么多人，后来竟然没有下文的。

莫超海：也没有去追。上面没有组织去追。我们问过这件事，但没反应。群众中也没有人追。有些人被批被斗，送回农村，后来要求返回广州，他会千方百计找到我们。但这件事真是一点消息也没有。我们是有所怀疑的。

黄意坚：67 年底我就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我。67 年还有派性，我还能指挥公安局、公安厅的人，帮我去调查……公安局组织了十几人去破这个案。我说你帮我破，但破不了。死的人身份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始终是一个谜。最后，黄意坚还反问我：“就算按你所说，那些人是从殡仪馆拉出来的，那么，谁有这样的能力，动员那么多人，一夜之间把尸体都挂起来呢？”他说，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让中学生去做，但是他没有。像地总、红总这样的工人组织，也未必有样的能力。

在我查阅军管会的档案时，发现军管会就劳改犯逃跑问题，曾请示过中央，当劳改犯发生暴乱时，可否开枪镇压？8 月 13 日，中央答复：

一、发现暴乱，应首先向其警告，指出他们必须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否则，将罪上加罪。

二、警告无效，发现暴乱、冲监或越狱逃跑，坚决开枪镇压。（以上两条可向群众组织讲。）

三、对外部夺取看守监狱部队武装的群众组织，仍应坚持耐心说服，说明利害，坚决不准开枪。（只限军内同志知道。）

为了稳定广州秩序，省军管会决定，由省军区分别派出三个巡逻队，负责四个区的治安。第一巡逻队在东山区，第二巡逻队在越秀区和海珠区，第三巡逻队在荔湾区。巡逻队的标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治安巡逻队。并知会各群众组织，希望共同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不要阻拦巡逻的解放军。

但广州市民，对军队能否稳定秩序，维持治安，并没有多少信心。在惶急惊惧的心理之下，人们纷纷构筑街闸，建立联防。清末民初，广州由于治安非常恶劣，大街小巷几乎都筑有街闸。没想到今天竟重现广州街头。所有大楼的楼梯口都架起木闸，在天台构筑工事，贮存木棍、砖块、石灰等物，作为自卫武器。一有风吹草动，便鸣锣传递警讯，各街闸立即关闭，行人绝迹。

各街的联防，实际上也是由两派组织划分地盘，各自把持的。中大红旗的高建亚是其中一条街道的联防负责人，他留下的一段交待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联防在两派武斗中的作用：

当时广州为了维护秩序，保护居民安全，搞了居民联防。我被选为百灵路居民联防的负责人之一。一次市工会有一个同志，来找居民组长，组长介绍给我认识，他说他是工联的，有些事需要我们协助。他说，市工会里有几个造反派单位，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攻击，如果发生了顶不住的时候，就想通过百灵路撤到市一人民医院去，希望百灵路的联防组织给予安全通过。我说，这是不难的，如果打起，周围的人民群众一定不会出来，你们要通过还不是非常容易吗？我说我保证给他们方便。也就是看到他是工联的造反派，有证件，因此，一定照顾他们。

迟泽厚访谈（节录）

叶：您认为文革分几个阶段？

迟：我认为文革分三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以前，大致上可以称为破四旧阶段，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阶段。这一阶段的主力军是红五类，也就是保守派的社会基础。全国有两个有名的代表人物，一个是贺龙的儿子贺鹏飞，一个是谭力夫，这两人提出了血统论。这时打击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一批人，抄家啊，杀人啊，干得很来劲。社会乱起来了，学校停课了，红卫兵组织起来了，党政机关也开始不那么灵验了，文化大革命被提到日程上，全国人民都卷进去了。群众都发动起来了，开始形成一个气候了。

到了上海夺权以后，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以造反派为主体的。批判反动血统了。血统论就是要保护旧的官僚体制，维护旧秩序。毛泽东说17年形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要把这条黑线彻底搞掉，就要冲击各级党委。结果贺龙被关起来整死了，刘少奇也关起来了，大部分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红五类以前骂别人是狗崽子，现在自己变狗崽子了，马上偃旗息鼓，灰溜溜了。

这时造反派起来了。造反派是不讲出身的，当然也有干部家庭的，但大部分不是。我记得1967年5月，黄永胜、温玉成在军区接见华工红旗的头头高翔，当时就有人揭发，说高翔的父亲是13级干部，在当时算是高级干部了，是一个进出口公司的副总经理，相当于厅局级干部，所以他（高翔）不能当（群众组织）一把手。后来连周恩来都过问此事，可见当时大家对高干子弟是很忌讳的。高翔的父亲算是最大的干部了，当时一般市民家庭、工农家庭可以（参加造反组织），高干不行，臭了。高干子弟差不多百分之百参加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叶：广州主义兵和军区的关系一直不错吧？

迟：主义兵都是军区领导的子弟嘛，像七中、铁中、八一中学都是军区领导的小孩在上中学。那时军区领导的孩子都在上中学这个档次，上大学是个别的。主义兵（和军区）有这样一个天然的联系嘛。后来都偃旗息鼓，躲到家里了。

叶：广州主义兵杀人与外地相比，不算多吧？

迟：广州总体来说，比较注意政策。广州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死人最少的一个城市。社会上很多人胡说八道，上次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XXX写了一篇关于广东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东西，千把字，拿给我审稿。列举了一二十条，说军区和林彪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啦。我看了以后不客气地说：这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完全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甚至是颠倒黑白的。这是第一。第二，你写地方志，就写地方的问题嘛，军队支左做了什么错事，你可以写，但你写军队的事情干吗？又是军队印了多少万本林立果的小册子啦；又是林立果到哪个工地搞什么活动啦；又是军队给林彪修了什么房子啦；又是9月13日那天出动演习，形迹可疑啦。我说这些事由军队查去，和你有什么关系？全都是牵强附会！

军队天天训练，9月12日训练没事情，9月13日就不行了？9月13日不训练，军队干什么去？都关在营房里？躲在营房里不是更成问题了？你躲在营房里干什么？是不是在等候命令？这是胡闹嘛。说9月13日有一趟军列进入广州，

这军列天天在运，军火天天在消耗，当然要不断补充了。兵工厂在北方，在三线，当然要往广州运，不是广州往北运。那都是胡说八道嘛。

我是广州市志军事志的主编之一，最后定稿也是我定的。写到文革那一段，我就坚持这个原则。广州文化大革命的损失在全国是最小的。全市死亡在全国更是微乎其微。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1967年）6月份就死了，广西更早，广州到7月下旬（才死人）。总说广州是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二三百万人，才死了200多人，在全国算什么呀？湖南死多少人？江西死多少人？广西南宁一次死几百人，广州一共才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劳改犯——叶注）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而且大部分都属于两派武斗中死的，真正抓到后凌迟刀刮的，基本上没有。如果不是广州军区在这里，管住这个局面，那还不乱套了？

叶：1967年二·八冲军区的事件是怎么回事呢？

迟：这文革第二阶段是造反派当家，冲冲杀杀。开始对着党政机关，后来不过瘾了，就转向军队。为什么要冲军区呢？就是因为军队支左，不支持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所以就到军区造反，把军区包围起来。既有地方的，也有军队的，地方的就是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都是些知识分子。这知识分子既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珠影有些演员、编导，要保自己过关，为了活命，就不惜踩着别人。他们包围着军区，用半导体喇叭——那时还是一种新科技——开着宣传车大声叫：希望解放军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指挥员。这是我亲耳听见的。

军队里的也有，主要是文艺团体，歌舞团的、文工团的、体工队的，小知识分子，都是过去不受重用的，这些人也容易煽动起来。2月8日把军区包围起来了。后来中央军委下了命令，这才撤离了。

叶：那时军队的文艺兵已经搞起群众组织了吧？像千钧棒。

迟：搞起来了。千钧棒人不多，只有十几个人。

叶：军区机关有没有搞？

迟：广州军区的机关是全军最稳定的，军区的党政机关没有群众组织，一直比较团结。个别人有看法，有活动，但整个机关是团结的。司令部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没有泄露出去，如果分成两派，那还有什么重大机密？都荡然无存，没有机密啦！

这是造反派最风光的时期，持续到1968年7月。这时刘、邓、陶司令部已经被彻底打倒了，造反派的使命就完成了，他们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可这些人的头脑继续发热，据说蒯大富还拉了个班子，准备筹备九大呢。这件事是康生讲的，康生这个人虽然经常撒谎，可这件事蒯大富是做得出来的。他们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占个一席之地，是理直气壮的。

到1968年对广西的七·三布告为标志，造反派从此以后就一蹶不振了。一个七·三布告，一个七·二四布告。七·二四布告是对陕西的。从1967年1月开始，军队一直不敢行动的，包括军区站岗哨兵的枪，都没有撞针，没有子弹，是用来装样子吓唬人的。军队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死不开枪。军队是不得不干这工作，勉为其难，夹在当中很难受。部队不断有伤亡，被造反打死的也就打死了。

8月23日那次冲军区最严重了，连军区作战大楼都占领了，就是作战室没敢进，趴在窗户看看，里面确实挂满地图，门口写着“机要重地，闲人免进”，关着门。就这里没进去。温玉成还真躲在里面，躲在作战室的电话楼里。其余大楼都进去了，连红旗都插到楼顶了，造反派确实嚣张。警卫员徒手挡住他们，不让他们上

，他们五六人抓住一个战士，一拖就拖出去了，他们的人源源不绝，几千人上万都进来了，你一个警卫连堵住楼梯口，拖一个少一个，拖一个少一个，最后毫无办法。如果军队可以开枪，一个排可以打一万人，但不行嘛。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就不客气了，真开枪了，造反派马上就老实了。

7月26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北京接见五大司令，蒯大富、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既不斗，也不批，也不改。他们五人联合发表了一个认错声明，然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以那为标志，造反派从此完成历史使命了，以后陆陆续续被抓起来了。这就是第二阶段。

叶：文革中有很多事情至今仍讲不清。

迟：能讲得清，怎么讲不清？是不想讲清。现在有档案在，有人在，怎么会弄不清呢？有很多禁区不想弄清。九·一三事件搞不清？林彪事件那么多活口都在，那么多材料都在，怎么搞不清？搞得清，就是不想搞清。我举个例子来讲。1975年由《南方日报》发起，批判前省委主要领导人，实际是指刘兴元，说他反对江青同志，反对由江青倡导的样板戏创作路线，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谁打头呢？把红线女推到了第一线。

有这事情吗？根本没有。刘政委在省委会议上讲过要走自己的路？刘兴元是非常谨慎的，他能这么说吗？哪有这个事情啊？有没有在军队讲过？军队也没有！军区文化部长都很熟啊，哪有这事？可当时铺天盖地，《南方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批前省委的主要领导，就是配合四人帮的政治需要，要整广州军区的某些领导。半年以后，四人帮垮台了，江青的三突出也受了批判了。如果刘兴元当年有这个发明创造的话，刘兴元不就成了反江青的英雄了吗？可刘兴元照样臭。你说想不想搞清？肯定是不想搞清，需要就给你扣上去。江青倒了，刘兴元还是无声无息的，也没说他反对过江青，倒是说刘兴元他们在林彪垮台以后，又一头扎进了江青的怀抱。

叶：周恩来1967年4月在广州的讲话，对广州文革有什么影响？

迟：1972年基辛格访华前夕，中央集中了一些人在北京钓鱼台，整天准备材料，军事方面的、外交方面的。总理的顾问班子、外交部的老领导干部都在。周恩来的秘书钱家栋——就是1967年跟总理来（广州）的那个秘书，他的名字叫家栋，“家庭的栋梁”，有四旧意识，文革后期到外交部当大使时改了个名字叫嘉冬——钱家栋见到了阎仲川，就凑上来对阎仲川讲：“唉呀，总理叫我向你说道个话，总理讲，67年4月那次啊，他在珠江宾馆讲话，那时候啊，他要是不表那个态就好啦。”

叶：这话是1972年讲的吗？

迟：是1972年大概1月吧，因为2月份尼克松就来了嘛。这就说明总理当时在珠江宾馆的那个讲话，很多是违心的。调子是中央文革定的。那时很多材料是中央文革广州记者站的记者给总理提供的，其中的记者五花八门，既有新华社的，也有军队调来的，那些记者都是极左分子，其中有一个政治学院姓姜的，浙江人，他是主要的。好象还有一个女同胞韩舞燕，驻香港特派记者，写了长篇文章。他们在广州采访广东文化大革命，这些人我不具体评论，但谎报军情、煽风点火的事情干了不少。

比如七·二〇事件以后，8月13日我到了北京。杨成武和黄永胜关系很好，都是原来红一军团的嘛。杨成武那时是军委办事组组长，跟毛泽东到南方巡视。中央文件他都看了，他悄悄地把他的情况简报给黄永胜看——黄永胜经常往杨成武那儿跑——黄永胜拿回来看，我就看到其中一份，是反映广州军区对七·二〇事

件的反应。七·二〇事件是个测温表啊，你什么态度？对武汉事件你拥护谁？是拥护三钢造反派，还是拥护百万雄师？是同情陈再道，还是拥护谢富治、王力？这是不能含糊的。这个驻广州记者写得很厉害，说七·二〇事件传到广州后，广州革命群众组织——就是说旗派了——怎么样同仇敌忾啦、义愤填膺啦，对百万雄师反革命保守组织怎么样愤慨啦，怎么样对谢富治、王力同志表示敬佩啦，什么慰问啦等等。“我们也到了广州军区大院，令人不解的是，广州军区营房的墙上，却见不到一张拥护中央对七·二〇事件指示的大标语。”

这家伙没有直接说你广州军区怎么样坏，就像说廉颇一饭三矢，一顿饭拉三泡屎，还能上阵吗？这廉颇的前途就被葬送了。我很纳闷，广州军区表了态了呀，不对呀。我回来一看，（军区）墙上还写着“向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致敬”、“拥护中央对七·二〇事件的英明指示”呢，敢不表态吗？

叶：是新华社记者写的？

迟：就是中央文革的记者，刚才说了，来自四面八方，有新华社的，也有从一些大学调来的，也有从军队调来的，都打着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名义，其实什么人都有。哪个人写的我不知道，但像这样的简报报上去，让上面的人看了作何感想？这不是害了你吗？记者就干这种事。

所以，总理（在珠江宾馆）那个座谈会，总理就是听他们的，他们提供的材料，一迭一迭，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他是兼听的，但最后的表态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哪个保，哪个革，总理是不能讲的。

叶：总理回到北京以后，还打电话到广州，对一些提法作了更正。

迟：是的。原来讲的更激，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更正了，就是思想上偏于保，而且他们有那么多的人，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就没有用原来那个话了，原来那个话让造反派抓住更不得了，用这个来压东风派，东风派就更艰难了。就在他（周恩来）到北京的当晚，又叫他的秘书周家鼎给广州军区打了电话，对他离开广州前的讲话作了补充和修改。来电特别指出，东风派的两个最大的工人组织，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这就定了个性。

那时的造反派分几个等次，叫做无产阶级革命派群众组织，也叫造反派组织，是响当当的；革命群众组织是中间派，不死不活的，可以不打倒；再就是保守组织。后来总理发明创造出“思想上偏于保守”。所以后来就叫东风派“偏于保”。偏于保还是保，也还是要打倒。七·二〇事件以后就压军区，一定要把它打倒。保守派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社会基础，从理论上讲是敌我矛盾，是要镇压的。

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叶：军区支左的指导思想是怎么样的？

迟：（文革）第三阶段就是从七·三、七·二四布告到九大前后。九大以后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就是尾声了。以后说文化大革命是76年结束，那也是一种算法了，

但基本上没有暴风骤雨式的大运动了。

这时右倾保守派抬头了，造反派倒了，保守派自然就扬眉吐气了。革委会在此之前已经陆续建立了，广州的革委会是1968年2月21日建立的。当然，建立起来以后没有权威，他们（造反派）要冲就冲进来了。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只要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

文革分这三个阶段，两头是保守派为主，中间是造反派为主。闹得最凶的是造反派，时间也比较长，一年多吧。广州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在这个总的格局下发展的。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第二阶段开始，就不断地受到冲击。那真是疲于应付，可以说是狼狈不堪。军队的政策、纪律观念是很强的，你上面要支左，我当然就要去支左了，介入群众运动中去。但支持谁？为什么支持保守派？主要还是根据上面。几十年所受的教育、实践经验，什么叫群众？不就是劳动人民吗？到这些组织一查，他是工人，他是农民，他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个体劳动者，这个组织不错，都是正经人；他们拥护共产党，感谢共产党，政治态度好；拥护解放军，支持解放军，那（解放军）当然支持他了。造反派不是，他们来了以后咄咄逼人：你们对赵紫阳什么态度？你们对旧省委什么态度？你们对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什么态度？对军队怀有很大的敌意，训斥、责难，军队能有好感吗？像黄永胜接见造反派头头，武传斌在黄永胜跟前，叼着个烟卷，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根本不放在眼里，很自傲，军队对你能有好感吗？所以军队必然支保，开始都支保。

后来中央文革一再指示：你们错了。毛泽东讲得更形象，你们不要“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尽管这么说，但很难改，思想上还是倾向保守派。你不是说群众嘛？群众就是多数人嘛！可后来毛泽东讲了，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大家就不理解了。不是说要和多数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吗？群众总有个量吧？这就拧不过来了。

军队在支左问题上，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以前，广东一直是坚定地非常明确地支持保守派。七·二〇事件以后，理论上讲，要改变态度、端正态度了，要支持左派群众了。但是，形势稍微一变，广州军区马上又提出来，要一碗水端平。而且这个很快《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承认了。一碗水端平总不能说错吧？用一碗水端平来抗拒支持左派这个上面的指示。

应该说，自始至终，广州的支左，对两派一直没有采取有的地方支持一派，镇压一派，像湖南最后出现的那个情况，像四川出现的情况，更不用说像上海了。没有出现这情况。开始支持保守派，后来上面讲要支持左派，不支持不行。特别出现武汉七·二〇事件，表示要支持，但并没有完全支持，对保守派也没有把它压垮、解散。七·三布告以后，造反派倒霉了，被整下去了。这时，广州军区以刘兴元为代表的领导班子提出来，只要他们（指结合进革委会的群众组织头头——叶注）己不坏事做绝，就叫他自生自灭。也就是保留他的位置，没借这个机会把造反派整下去，你当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还继续当；你当省革委会常委的，还继续当，让他慢慢地自然地消亡，也没采取组织措施。所以广东两派比较稳定，没有大量死人，1969年以后再没出现群众对立场面。这应该归功于当时的军区领导，在对待群众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

叶：广州空军的支左是不是也由广州军区领导的？

迟：广州空军、海军——海军机构不在这里，它有基地。后来怕口径不一致，在

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在宣传的时候，三军联合组织宣传车。军区有权威，空军、海军基本上按照军区的指示办。

叶：省革联时对军区冲得比较厉害，到1967年8月份以后炮轰军区，也搞得比较厉害。

迟：炮轰就早啦。我记得1967年6月6日，中山大学八三一战斗队就登了小报，“炮轰黄永胜动员令”。那时批二月逆流，全国以谭震林为代表，各地都有谭震林式的人物嘛。广东的谭震林是谁呢？就是黄永胜嘛，“抓广谭”。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戚本禹当着周恩来的面问黄永胜：黄司令，现在抓广谭啦，谁是广谭啊？是不是讲你啊？戚本禹也是得意忘形。抓广谭实际上就是抓黄永胜、刘兴元。有人说广谭是代数的X，X就是任何值，你反对中央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政策，你就是广谭。这是胡说八道嘛，广谭还是要有对象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黄永胜。

叶：当时军区是怎么应付这种炮轰军区的局面的？

迟：由你轰，你轰吧，没办法。小报到处出，我们也买小报回来看，也找一点给黄永胜看看。“炮轰黄永胜动员令”就给他看了嘛。

我就说这一条，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支持了粮食部（？），一次支持几亿斤粮食。粮食、油料都上调的。拿交易会来讲，只有1967年10月份那次推迟了一个月，应该10月15日开，推迟到11月15日。其它每一次都是照样开，那么多外国人，没有出一个伤害外国人的事故。这本身就说明问题了。你不能拿今天改革开放的情况来对比，那时候人身没有保证，动不动就拿枪，广州抢枪抢了一万多支，随便杀个人还不容易吗？杀个外国人制造点事端还不容易吗？可交易会照开，生意照做，外国人没有伤害一个，没有点工作基础，没有点力量，没有点政策，行吗？文化大革命既然整个是在错误路线领导之下，当然无功绩可言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但辩证地讲，成绩还是有的，损失少就是成绩。打仗谁都失败了，但你全军覆没，我只损失10%，我就比你全军覆没的强嘛。你要提拔应该提拔我这个10%的嘛，不能说打了败仗，都是五十步笑百步，不能这么说的。为什么你全军覆没，我还保存了90%呢？为什么你6月就大批死人，我拖到7月底才死人呢？就是工作不一样嘛。还是有差别的，差别还是很大的。要说政治局面哪都没广东复杂，人头也是，中南哪个城市也没有广州人多，但广州出现的问题相比较少。

叶：军区对八一战斗兵团的处理，从开始取缔，到后来平反，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

迟：对八一战斗兵团，是抓住它成分不纯这一点，取缔了它。军区（因此）犯了路线错误。八一战斗兵团造反太强了，它是造反派里的骨干组织。对学生组织军区不好抓，八一战斗兵团是社会组织，第一它跨行业，第二它有假复员退伍军人。当然也有真的复员军人，莫竞伟（八一战斗兵团的头头——叶注）确实是复员军人，但这人行为不端。（军区）抓住他，调查这个组织有多少社会闲杂人员，有多少在部队犯过错误的，调查回来一汇报，就决定趁着军管这个东风取缔它。

后来这些人不服，旗派抓住这个事情反复地攻。到底给攻下来了，给平了反。当然这个组织到最后也没成气候。因为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太高，没受过好教育，跟在学生后面冲冲杀杀的。军队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取缔它了。中山大学的一个工人组织，叫什么工人赤卫队的，也是抓住它这个，牌子也砸了，门封了。我亲自去了嘛。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会）的工人当然鼓掌欢迎了，广播站高声广播，赞扬军管会的行动。

在谈到军队介入地方文革时，迟说：

军队真正介入文化大革命应该是1967年1月23日，毛泽东对安徽造反派的批示：“人民解放军应当支持左派广大群众。”因为安徽要批斗省委书记李葆华，南京军区（似应为安徽省军区——叶注）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要求军队组织警戒。南京军区接到安徽省军区报告，不敢怠慢，马上请示中央军委，毛批了：“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的问题。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左派。”

军队接到命令了，要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回避了。军队过去是很谨慎的，不能干预地方党委的事情。但这时地方党委实际上已经基本瘫痪了，政令不通，赵紫阳这帮人已经是躲躲藏藏的了。

在这之前已经感到一点苗头了。除了电台工作组外，应该说，我是军区最早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我是秘书科副科长，是首长的参谋、助手，当时文革席卷全国，对军队的冲击很大。首长也很关心，我要向首长提供一些情况。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前，阎仲川叫我去了解地方文革的情况。我就代表军区去找北京三司驻广州联络站了解。北京三司是清华井冈山蒯大富那一派的，联络站在广东工学院。1月23日的指示下达后，就不需要再遮遮掩掩了，我们到处去调查。广州名气比较大的造反组织都去了，像地总——就是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后来周恩来说，名字这么长，就叫地总吧。莫超海是名义上的总理（管），他是广东人，比较斯文一点；孙亦武是江苏人，复员兵，广州氮肥厂的，他是武斗司令。这些组织我们都去了。

军队介入文革，广东应该说是没有思想准备，是奉命行事的。到了1967年9月一月风暴以后，军队就坐不住了，特别是1月23日的指示下来后，军队就要介入了。紧接着2月北京开生产会议，要军队出面抓生产，因为省委、政府都瘫痪了。广东省就由陈德出面了，他是省委常委，又是省军区政委，当然责无旁贷了。

陈德去北京开会。赵紫阳也去了。他们回来还议论，赵紫阳虽然是走资派挨斗了，但到北京还照住京西宾馆的套间，陈德是实际负责的，却只住单间。上面对赵紫阳还是以礼相待的。会上要军队抓生产，成立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那时还没有实行军管。到3月初，内部就下通知了，广东要实行军管。3月15日就全省实行军管了。广东省、广州市同一天挂牌成立军管会。

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全国几乎没有例外，军队只要一介入，支持的一定是保守派。什么叫保守派？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比较拥护、支持、接近党政机关的，主张小修小补的，也就是过去说改良的这么一些群众组织。他们拥护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号召，参加文革，但你说要打倒广东省委、打倒广州市委，他们就感到过头了。撤换某个领导可以，但如果说整个都是黑线，他们就受不了。

华夏文摘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批陶联成立，武斗开始升级

6月初，广州一司与市委遵义公社组成市委联络站，专揪王德、焦林义；与毛泽东思想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组成市人委联络站，专搞曾生、钟明、罗培元问题；6月中旬，一司与省直大联合总部、工交红旗、红旗工人、地总、红总、暨大1226、华工太阳升、华师一月革命总部、中大革委会等，组成斗尹（林平）联络站。

6月15日，一司、工交红旗、红旗工人、省直大联合、省委东方红、省委机关遵义公社、市人委革命造反司令部、省财贸总部、电台工农兵等组织，联合组成“广东省革命造反派捣毁黑省委联络部”。7月1日，“广州地区高等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个筹委会，实际上是以红一司为核心。

6月中下旬，以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作为楔子，闹得满城风雨。6月22日晚上，工联、中大红旗的头头们，在交通部中南公路工程修配厂开会，研究形势。他们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分化瓦解地总、红总，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准备第二次夺权”等等。他们认为，东风派现约有90万人，旗派约有60万人，力量对比差不多，可以夺权。估计8、9月份毕业生要分配，学校要复课，因此红代会的召开和第二次夺权，必须在7月份进行。

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将成为一个缺口。在旗派的奔走呼号下，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浪，渐成奔腾咆哮之势。6月23日，广东省军区就八一战斗兵团问题，作了五点说明。

一、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我们要坚决拥护中央这一批示，对“八一战斗兵团”不能平反。

二、“八一战斗兵团”是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把持操纵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罪行。经过复查，语气确凿，完全属实。

三、“八一战斗兵团”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非法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按单位、按部门实行大联合的精神，这个组织也不能恢复。

四、对“八一战斗兵团”的一般成员和少数有罪恶的头头，我们早已作了严格区分……

五、广州面临港澳，地处国防前线，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复杂，战备任务十分繁重……（下略）

然而，这不仅不能平息造反派的骚动，反而起了刺激作用。6月24日，红司、中大红旗、中大八三一联合发表反驳省军区五点说明，为八一战斗兵团平反的声明

一、“八一战斗兵团”绝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群众组织，省军区硬说它是反革命组织，请拿出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组织纲领、行动计划和反革命罪行来辩论，我们奉陪到底。

二、省军区某些人说宣布“八一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是经中央批准的，我们强烈要求公布事实真相。

三、“八一战斗兵团”的确是一个跨行业、跨部门的组织，并确实混进少数坏分子，但绝对不能以此为理由把整个组织打成“反革命”予以取缔。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是另有企图的。

四、3月黑风中把“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就是刘邓路线迫害革命群众的产物，是一桩极其严重的政治迫害事件。

6月26日，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发表《严正声明》称，“回顾‘八一战斗

兵团’的战斗史，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大方向是始终正确的，我们就是革命造反派。”“虽然我们在2月23日退出了‘八一战斗兵团’总部，但是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革命造反派必须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对广州谭震林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必须彻底造反，我们决定重新打出革命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的鲜红大旗”。

声明提出：一、毛泽东思想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1967年6月21日正式宣布恢复；二、广东军区3月1日取缔八一战斗兵团的通告是错误的，我们强烈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公开彻底平反，为被打成“反革命”的八一广大革命战士公开彻底平反；三、我们坚决与工联、红旗工人、广东红旗农民、红司、三司、新一司等革命造反组织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当天傍晚7时，八一战斗兵团工交分部在东较场召开平反大会。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华工红旗、中山医东方红、暨大东方红、机关红司等组织1.2万人，参加了大会。6月29日，八一战斗兵团也在东较场举行平反大会，参加的组织包括工联、工人红司、红旗贫下中农、新一司、广铁总司等五万多人。

这时，除了学生、工人造反派，还有一批人在广州相当活跃，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支农青年。他们大部分是从上世纪50年代初起，因未能升学而被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高中、初中毕业学生。他们许多人在农村曾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政府最初承诺三年轮换下乡，也没有兑现。因此，积压了一肚子的怨气。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在农村造反，“首先揭发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红色政权夺回革命群众手中”，并且“封闭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替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组织平了反”。但很快他们的斗争锋芒，便指向所谓的“刘、邓、陶为首的旧安置系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一批批支农青年喊着“支农青年要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纷纷杀回广州“闹革命”。他们真正要争取的，主要是城市户口和回城工作的权利。

支农青年先是包围省军管会，又是要钱，又是要粮。陈德指示：“给线、给粮、给饭吃，如未带粮、带钱，可采取开条子、记账的办法。”并在省军管会里腾出地方给他们住。但支农青年在省军管会住下以后，又转去包围农垦厅。7月6日，他们闯进农垦厅职工饭堂，砸开仓库，抢去1000公斤大米。7月7日，又扬言要再去抢粮，还要揪斗罗天。但这次农垦厅属下劳动大学的潮州学生，已经严阵以待，双方发生了械斗。

支农青年6123支队（一个群众组织名称）400多人，包围了农垦厅大楼，用楸木、棍棒、石头往里攻。晚上，住在省军管会大院内的100多名支农青年，啸聚成群，前往农垦厅支持，一路上叫嚷“不夺回罗天誓不罢休”，吓得沿途居民家家关门闭户。据警司作战处的报告称：

罗天在农垦厅被围，劳动大学在楼上，楼下是支农青年，现双方谈判（警司主持，军管小组参加，双方代表参加）。谈判结果：一、8日下午15时30分劳动大学交给支农青年，到12日上午8时30分支农青年把罗天交给劳动大学。二、双方都要保证罗天的生命安全。

但到了7月12日，支农青年没有把罗天交还。据农林水军管小组反映，为了抢斗罗天，可能发生大规模武斗，6123支队已准备好了七辆汽车和凶器。劳动大学也在准备去抢罗天。

农垦厅的武斗还未解决，广州市技工学校又传警报。技校原有两派，一派是

红色造反团（三司），一派是技工红旗（一司）。双方从6月初就开始忙着制造火枪、大马刀、刺刀、匕首，准备武斗。最近连工厂仓库里的20多瓶氰化钾，竟也下落不明。

7月7日，警司召集双方开会，经过协商定出五条：一、学习“六六通令”；二、不能武斗，谁先挑起武斗谁负全部责任；三、双方都不能到外面调队伍来；四、交出武器，撤除武斗工事；五、成立监督小组。双方都在协议上签了字，但后来警司发现红色造反团又在私造武器，还偷了刀，并拒绝交出。

警司请示军区，如发生武斗可能就是较严重的大武斗，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现在还在做工作，但效果不大。“在一定情况下，是否可进驻部队到技工学校？情况搞清楚可否强行收缴武器？”温玉成副司令员指示：“即派部队进去，将凶器等收缴。”黄业副参谋长的指示称：“请转告警司马副参谋长，要把情况确实查清，确实属实，请按温副司令指示执行。”话虽如此，但在那种环境之下，要真正查清情况，谈何容易。

有时对支持哪一派，省、市军管会之间也有分歧；军管会与其它军种之间也有分歧。毫无疑问，这些分歧会使制止武斗的工作受到影响，甚至使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中，有这么一段记录：

（市军管会来电）郊区军管会根据军区后勤支农小组从郊区贫农得来的情况：沙河“红卫”大队（旗派），从我们内部是倾向这个队的。省军管会要求支持贫革联，但现在6904部队71分队他们在行动上与观点上都支持了“红卫”。因此，郊区农民两派都有反映：军队内部有两派，发展下去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提出建议：

一、了解6904部队71分队，为什么支持旗派的“红卫”？而这个队的情况郊区军管会正在摸底，是什么情况尚未弄清。

二、要求军区支左办公室明确一下，把口径统一了，是否由郊区军管会、后勤支农小组和6904部队71分队合起来开个会，研究协商一下，情况搞清，统一口径。

中央愈强调支左不支派，军队内部愈容易出现分歧，因为谁也弄不清，究竟哪个是左，哪个是派。当两派出现冲突时，往往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采取坚决措施，只好无所作为地坐待事态发展，直到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6月24日，中共中央下达禁令：一、不上街游行；二、互不打架，互不冲击；三、不抓人，不扣人；四、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五、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六、不夺枪，不开枪。但未有效地控制大局。当农民开始卷入武斗以后，事情就不仅仅是“打群架”那么简单了。没有人比毛泽东更清楚“农民战争”的威力。1967年夏天，全国已濒临全面内战边缘了。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一、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一律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进城武斗，更不能为了武斗，发动农民制造凶器，发给枪支弹药。

二、不准以任何借口，挑动农民在铁路、公路、水路沿线设置关卡，拦阻车船，破坏交通运输。

三、已经进城参加武斗和破坏交通运输的社员立即返回农村“抓革命，促生产”，所发的武器一律收回。

四、对参加武斗的社员所作的各种所谓“优待”，例如工分补贴等，一律无效，不准实行。因进城参加武斗而造成的伤亡事故、生产损失、误工补贴，一概由挑动者负责。

五、从“通知”下达之日起，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应立即改正错误，立功补过；如坚持错误不改，一再违犯上述各条的人，要严肃处理，其首恶应依法惩办。

7月11日，在一片揪“广谭”的喊杀声中，12万红旗工人、工联、红旗农民、广铁总司、红司、机关红司、三司、新一司群众，在越秀山召开“庆祝广州批陶联合委员会诞生暨彻底砸烂陶家黑店誓师大会”。

批陶联委由首都批陶联委驻穗办事处脱胎而来的，其核心成员包括中大红旗、珠影东方红、中南局联络总部等旗派组织。批陶联设有几个工作组，政治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工交政治部主任车学藻，干部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央监委驻中南局监察小组副组长闵一帆，财贸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财委副主任张天陶，生产管理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经委副主任李逖、市场管理小组负责人是原财贸政治部主任王世琳，资料专案小组负责人是原中南局监察组办公室副主任郝湘基，工交分会负责人是原中南局工交政治部主任杨国峰。

批陶联委在1967年下半年，对广州地区文革将起着重要作用。

7月13日，广州地区东风派六万多人，冒着倾盆大雨，在越秀山召开“庆祝广州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斗陶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大会发出“打倒中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陶铸”的《紧急动员令》。仅东风派主持的“批陶”专栏，在基层就达五万多个，在街头的约有4000多个，各系统写出了30多万字的批判文章。

7月15日，东风派的斗陶总指挥部在越秀山体育场，再组织七万人的“声讨、斗争、批判”陶铸大会，会后举行了全市大游行。旗派的批陶联委也于7月16日在广州日报社举行批判陶铸大会，把王匡、陈越平、黄文俞、丁希凌、杜导正、杨奇、林里、田蔚等新闻系统的干部，揪出来猛轰一番。

7月17日，省军管会革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广州地区文革情况。会议认为：批陶斗争发动后，各个群众组织劲头很大，写出了不少有份量的大字报。问题是两大派联合不起来，连一个统一行动也搞不成。再就是有的组织大肆攻击7月15日《南方日报》编者按；有的提出批陶必先揪广谭；这些都可能干扰批陶大方向。支港的形势不如批陶形势好，问题也是两大派不能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大家认为，“广州地区两大派现已基本形成，两派都有造反派，也都有保守组织，所以不能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也不能以某一派为核心，而应以左派为核心。若什么都要以旗派占优势，以旗派为核心，就必然在客观上产生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后果，不利于联合起来批陶、支港斗争。”

事实上，这一轮批陶高潮，并未能广州地区的武斗降温，反而有急速升级之势。7月6日，工联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大坑口演出时，与春雷大坑口联合总部发生冲突，双方动用了木棍、刀子等武器，互相攻击。

7月15日，广州机务段的春雷工人和郊区农民，与反春雷发生武斗，造成八人受伤。据一些参加了当天武斗的反春雷派群众，后来又“反戈一击”，讲述事情的经过：“7月15日要下班时，头头突然通知我们集合，说广北机务段打伤了我们的人，要马上派人去支持。反正每次都是这样说我们的人挨打，要我们去，前天刚打完一中主义兵，今天又去打人，总感到有些怕，但是头头好象看透了我们的意思，一直在盯着我们，只好跟着大队人马去机务段。一进机务段，当然又是一场大武斗，我们手上都有利器，我们拿着锄头、木棒、杉钩就往外冲”，“这次我们冲上去，打伤了机务段的人，他们就拼命反抗，向我们这里冲上来了，天黑一片，又不知有多少人，真有点令人心怕，如果被打伤了，一家大小怎么办啊！我们只好走在后面，做个样子，幸好，后来解放军来了，才制止了武斗，直到了

第二天早晨 4 点多钟，我们才走了出来。”

7 月 19 日，工联宣传部在街上贴“批陶不忘陶老二”（陶老二即指广州军区）时，受到主义兵围攻。同一天，1000 多任务联工人冲进八一中学，和主义兵发生武斗，警司的宣传车制止无效，又派了两个连前去调解。双方进行谈判，工联以强硬态度提出：一、武斗是主义兵挑起来的；二、主义兵要交出凶手和幕后指挥；三、今天工人不上班，是主义兵挑起武斗的结果，是警司处理不当的结果，所有一切损失，应由警司负责。工联群众不停地起哄、喊口号，有人还怒吼：“刘少奇都拉下马了，黄永胜有什么了不起！”

据省军区作战处称：“现在武斗是谁挑起来的，还搞不清楚，工联给主义兵扣了很多帽子，主义兵都不承认，工联的人都不走，有的人想走，头头不让走。”军区首长指示：“两个连队撤回来，对工联的无理要求不答复，他们的人不走，不管他。”由此可见，军区支持主义兵的态度，彰明昭著。

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周恩来的讲话很快传遍了广州。“三面红旗”、工联、红旗工人一边，欢声雷动。而地总、红总一边，则神丧气沮。4月19日，地总头头赵振业在向组织传达周恩来讲话时，“下面反映强烈，立即围攻赵正（振）业，他们说：‘总部领导不得力，要造总部的反。中大红旗经常整我们，总部总是不许我们还手，总部为什么不向总理如实反映情况？’赵被责问得晕倒”。

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忽然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秘书周家鼎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这两个组织和其它工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争论，只能通过各自的整风，通过企业、事业单位中对党内、省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运动，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求得解决，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而绝不能以一派压倒另一派。

周恩来肯定了地总、红总是“革命组织”，虽然还拖着一条“偏于保”的尾巴，但对于广州军区来说，已经大大松了一口气了。革命组织与保守组织，寥寥二字，对广州形势的影响，可以说是天渊之别。迟泽厚认为，周恩来最初作的“保守”结论，是中央文革定的调子，也是受中央文革驻广州的记者们提供的材料影响。“他们提供的材料，一迭一迭，一口袋一口袋的。当然总理不会完全被他们蒙蔽，有时晚上听他们的，白天总理就在留园听军区常委们的汇报。”迟泽厚说：对总理在广州的表态，应该说，广大群众组织是不满意的，军区领导是表示遗憾的，但也有它的好处。他没有把这些组织说成是保守组织，军区以后就守住这条线，总理已经讲了，他们只是思想上偏于保守，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反对把他们瓦解。这就比武汉的百万雄师、四川的产业军强多了，那些地方对保守组织是格杀勿论的，打得家破人亡，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基础”啊。广州就紧紧守住总理的这条线，对这些人还要教育、争取、团结、改造，他们（造反派）就没话可讲了。从这点上讲，总理还是留有余地的。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下，他没有完全按四人帮定的口径做结论，这是不幸中之大幸。

从这时起，广州的群众组织，正式分化为红旗派和东风派，两大对立派别。红旗派的名称，来源于“三面红旗”，成员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也有工联、红旗工人等几个工人组织，后来简称为“旗派”；而东风派的名称，则来源于他们常说的“三月东风浩荡”，成员主要是地总、红总，以及铁路分局的春雷（这个号称广州地区第一个实行三结合的夺权单位，其实不过是众多群众组织中的一个），也包括主义兵等一些学生组织。

双方都坚称自己是左派组织，大联合只能以自己为中心。新一司的一篇文章说：“广州革命造反派工人的大联合，必须而且只能是以‘红旗工人’、‘工联’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红旗工人’、‘工联’是广州工人运动的两面红旗。”曾经一度好象近在咫尺的大联合，正远离人们而去，消失在昧色笼烟的前方。

周恩来讲话之后，军区对旗派的态度，再次出现反复。“一二二夺权”后，军区对省革联有过短暂的支持，现在支持旗派的声音，又一次占了上风。黄永胜、温玉成在接见八三一时，都明确表示了支持的态度。不过，与上次一样，为时甚短，但影响甚巨。许多中南局、省委、市委机关干部，都是在这段时间表态支持旗派的。

据黄意坚回忆，大概在5月20日，他正在筹备红司的时候——红司成立于

5月22日，也即周恩来在广州讲话“一周月”之际——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温玉成曾派秘书找过他，转达了康生的一段讲话，可以说，这段讲话把整个形势再次扭转。

（据温玉成秘书传达）康生对老周（恩来）在广州的讲话很大意见，（康生说）“他（周恩来）所搞的一贯和稀泥的作风，在广州表露无遗……他支持的中大红旗、八三一是左派，那我是什么派？”——这个原话应该是真的。康生来广州唱的调，与老周是完全相反的。

黄意坚还忆及，1979年底，黄永胜的儿子来找他谈过一次话，当时黄永胜已经因牵涉林彪一案，被判了18年徒刑。“他说他见过父亲，他父亲对于文化大革命后期（1968年以后）整旗派，他（黄永胜）自己也觉得很过意不去，他也是苦衷的——这是黄永胜儿子转达的话。”

4月21日，广州三司在东较场召开“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派大会”，下午，三司的华工、中山医学生，在东较场前面马路，围攻半工半读总部的宣传车，抢走车上的喇叭，砸烂车牌。广东红旗正式发表声明，退出大联合。

5月22日，一批原参加过省革联的学生，在广医成立了“广州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司令部”（简称红司），负责人武传斌、黄意坚。下辖大专院校组织16个，中专组织17个，中学组织48个。同一天，工人造反团宣布退出大联合；工交红旗革命造反委员会成立；工联在友谊剧院举行集会，欢呼北京市革委会成立暨工联命名。军管前后一度似乎就要实现的大联合，至此，全面瓦解了。

这天，东风派和旗派群众，在中山医学院内发生大型冲突。消息传开，双方的增援队伍，源源不绝开来，多达一万余人，中山医学院外的马路，挤得水泄不通。市军管会主任黄荣海，赶赴武斗现场，传召两派代表，在学院武装部进行谈判。入夜，几百名解放军奉命开入医学院，守住学院大门，阻止外面的群众继续冲入校内，同时勒令武斗双方立即退出现场。事态在深夜逐渐平息。双方群众退出医学院。校外群众也陆续散去。

这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看来今后的武斗，规模还会愈来愈大。4月23日，陈德作出指示：

一、凡发生武斗，一律报警备司令部作战处，他们已组织专门人员、部队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二、警司派出防止、制止武斗人员，部队不带武器，不抓人，带公安人员。

三、并带宣传车，宣传政策，要文斗不要武斗。

四、军管人员要有坚定信心，军管这条线不能突破。保持军管尊严，遇事要冷静，加强值班工作。

4月23日，人民造纸厂地总分部一辆宣传车，在东山被中山医一一五师五六百人围攻，人群扰攘了一个多小时。地总海珠区总部的一辆宣传车，在北京路也遭到工人学生围攻。4月24日，红总的一辆宣传车，在烈士陵园被几百名中山医东方红的学生包围，把墨汁往车里投掷。

4月25日，广艺、华工、一一五师等学生，在广州日报社外撕地总的大字报，受到300多名地总工人的围攻。学生寡不敌众，只好向军管小组求救，承认他们撕大字报不对，请工人不要再围攻，并要求军管会帮助解围。警司派人前去处理。

4月26日，原来从广州一司分裂出来的组织，包括中山医东方红革委会、中南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广州中医院三〇一、广东艺专东方红红卫兵、仲恺农校等20个单位，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新一司”（简称新一司）。在成

立大会上，登台发言的人，无不叫嚷要揪出广州谭震林，“不揪出广州谭震林死不瞑目”，他们还指“《颠倒》就是大毒草，地总、红总、主义兵就是大老保，‘广州第一声春雷’是广州谭震林一手泡制出来的”。三司、红司宣称要和新一司“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三司甚至表示：“我们虽然是两个司令部，实是一个司令部。”从此，“揪广谭”的声浪愈加奔腾高涨。

这天，中大红旗和革造会因看电影争座位的小事，大打出手，双方混战了两个小时，造成重伤一人，轻伤四人。

一篇题为《在流血事件的背后》的文章披露，“近日来（指4月下旬至5月初——笔者注），铁中、市四十八中、四十六中、十五中、三十中、三十六中先后发生大小规模武斗现象，最大规模的达千人之巨，受伤人数尚无法统计。”文章称有人“播弄是非，挑拨离间，制造流言蜚语，甚至当面造谣，在张三面前说李四要砸张三，在李四面前说张三要砸李四。”“5月×日，七中红旗公社得到主义兵来砸的消息，广雅401同样于5月×日从电话中得到主义兵来砸的恐吓。而在此同时，不少主义兵得到红旗战士5月血洗主义兵的谣言。”文章认为，这是“广州谭震林精心策划的一场大阴谋。”

事实上，军管会为了制止武斗，疲于奔命，已经焦头烂额。

两派群众都预言交易会结束（5月15日）之后，广州将出现更大规模的动乱，出现你死我活的斗争。4月下旬，广州街头出现了许多充满凶兆的标语：

“到5月还有多少天？”

“广州运动又处在关键时刻了！”

“迎接5月的大决战！”

这是一些明显的先兆，两派群众都打算以武力争夺“左派”的桂冠。往后的局势，将更加凶险和混乱。

读《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的疑问

读了原广东省委干部李美清的文章《造反派逼我们交出省委大印》一文(下称李文)，据书中介绍，她在文革前担任省委常委秘书、机要室文电科科长。这篇文章回忆了1967年1月22日，广东省委被造反派夺权的经过。

事情已经过去了40年，有一些细节记不清或记错，那是在所难免的，但这篇文章却留下了太多的疑问。

1、1月21日，林李明有没有被抓去中大？

李文说，1月21日，造反派把区梦觉、林李明等人胁迫到中山大学，第二天又押着林李明回省委取省委大印。

但据林李明说：1月21日被省革联拉到中山大学的省委领导有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等人，并没有林李明。1月22日清晨（李文说是凌晨，林李明说是上午8点多），省革联到省委取印时，林李明正好在省委值班，并不是被造反派从中大押回省委的。

2、省委大印由谁保管？

李文虽然没有直言省委大印在她那儿（文电科）保管，但从她的行文看，大印应该在文电科。因为她说造反派到他们那儿要印，他们不交。文电科的干部周琳想给中央打电话请示，被造反派制止。

但据林李明说，大印是由综合处统一保管的。林说：“我对来取印的人说：‘你们造反有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作主。印也不在我手里。’造反派说：‘叫管印的人来。’胡庆勋、韩宗祐同志都先后来了。他们都说要中央命令或者省委决定才能交印。”林李明并没有提及大印在文电科保管。文革前机要室文电科是否综合处的下属部门？

3、林李明给中央的电话是在哪里打的？

李文说她与林李明一起到省军区，由她直接打电话给中央机要局。而林李明则说电话是由他打的，是打给中央办公厅的。李文说中央机要局答复不能交印，把印交给省军区保管。而林李明则说中央办公厅接电话的只是一位值班的人，不敢定夺，答复请示一下以后，等一会再回电。但还没等到回电，林李明就被造反派押走了。也就是说没有等到中央的答复。

李文说这个电话是因为造反派不让他们给中央打电话，她和林李明只好到省军区打。但当时造反派对林是步步紧盯，哪里会让他私自跑到省军区？林说他打电话是经过造反派同意的，而且造反派就在一旁听着。既然如此，在省委打就行了，何必去省军区？省军区也不会允许这些造反派跟随进去打电话的。

4、造反派到底有没有夺到大印？

李文说他们偷偷把省委大印交给了省军区副政委黄业，而且是按正常手续封存交接的。她明确地说：“此事并不像社会上流传的‘交印’。实际上，造反派并没有夺走省委大印。”

但林李明的讲述却不是这样，林说，造反派把他押到中大，与在中大的省委领导一起，共同签署了交印协议。交印协议如下：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

赵紫阳 林李明

区梦觉 张云

一月二十二日

林李明说：“当天下午（22日下午）回到东一楼召开会，省委书记都参加了，学生代表有四五个人参加了会。都同意交印。把印交给了学生代表。省委表明态度，并发表了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见林李明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

据赵紫阳说，在晚上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之后，“省委办公厅革命造反联络部的同志，写了几条通令，要我们书记处签名，因为不少问题执行不通，我们只同意省委各部委、办公厅各处科的印章要在当天晚上暂时交给‘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然后由他们交给派出各单位的监督组。各书记都签了名。”（赵紫阳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

随即由省委领导签署了通令：

省委书记处同意省委各部委（不包括办公厅及文革）和办公厅属下的各单位的印章，今晚一律暂时由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收存。然后再由该委员会交给派往各单位的监督小组监督使用。

赵紫阳、林李明、李坚真、张云、李子元、刘田夫、区梦觉、尹林平
元月二十二日夜十一时

广东省军管会的一份内部材料也说：“（1月22日）上午10点钟，（造反派）又把林李明以及其它几个书记拉到中大召开了‘夺权’后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大家签了字，交了印，‘夺权’就告完成。”

这里说得很清楚，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各部委的大印都交出去了，但不是交给造反派带走，而是由造反派监督使用。以上省委的各项协议、通令原件，都在省档案馆，我也在档案馆看到了造反派接收大印时打的收条原件：“兹收到省委办公厅、文革、省委章子三个。”如果没有夺到大印，他们怎么可能打收条呢？

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也对我忆及，1月25号，“造反派把市委的一些人都召集起来，要交权。当时就是我负责了，没有别人了。怎么办呢？我也没办法，就打电话找赵紫阳，我说，现在他们强迫要交权，怎么办？赵紫阳说：现在都是一样了，我们都交了权了，你们也交吧。”

由此可见，李文说当时没有交印，与其它众多的材料是有矛盾的。

5、夺权以后省委的工作是否“完全停滞”？

李文说：“‘省革联’夺权后，省委的工作完全停滞”，似乎也是不够准确的。当时省委并没有完全停止运作。广东的夺权模式是采取监督小组的形式，在夺权后保留省委。省革联夺权后，把省委书记们集中在省委大院东一楼办公，规定“今后造反派拉书记们要通过监督小组安排”。据档案记录，在1月22日至26日期间，省委书记处至少开过三次会议，一次是接待问题，一次是有关陶铸问题，一次内容不详。

1月26日，省委书记处开会，监督小组提出四点意见：一、省委文革办公室要做好接待工作，不能说没有权。二、抓革命促生产，要组织一个班子，由省委提出名单，经监督小组审查后可抓工作。三、监督小组决定省委书记集中在东二楼办公。四、省委一定要大抓防治脑膜炎工作。正是由于省委的工作没有停止，才被其它造反派说省委是假让权、真反扑，后来也导致了广东的夺权模式被否定，省革联垮台。

对历史，当事人如果出于各种顾虑而保持缄默，是可以理解的，由于时间太

久而偶有记错，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决不应该捏造历史。当然，我不是说李美清的文章捏造事实，因为到底是她错，还是其它档案材料错了，还需要进一步考证。我非常希望她能够提供更多的史料，以澄清事实，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

以上关于广东夺权的经过，见林李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检讨》（1967年10月7日）、林李明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赵紫阳与广东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团谈话记录、省军管会《关于省革联问题的综合材料》等。

李美清的文章载于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我的一九七六年》，2008年1月第1版。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达《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规定指出，公安部门的任务是“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后来在运动过程中，只要给对方扣上一顶“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就可以把任何人列入公安六条的打击范围了。因此，公安六条在军管以后镇压造反派，以及1968年彻底瓦解造反派组织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省委被夺权时，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被接管了。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到副局长王丰业，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到省联站，晚上12时以省联站名义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吸收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

林李明曾经说过，对省委、省委办公厅、文革办公室的三个印是夺权，在监督下使用；对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是接管。刘田夫在回忆录中，也把夺权和接管区分开来，但不同的是，他把省人委的夺权也称为接管：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广东省部分群众组织组成省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并于1月22日，宣布夺了中共广东省委的权，省人民政府、省公安厅也先后被造反派接管。这一细微的区别，也许不为人们所留意。

按照一般的理解，被外单位人员夺权的，称之为“夺权”；被系统内人员夺权的，则称之为“接管”。接管和夺权，其实并无实质的区别，人们也把接管视作事实上的夺权。在林李明的同一次谈话中，他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也使用了“夺权”这个词。

问：中央对这次夺权（指省委夺权——笔者注）有没有表态？

（林李明）答：对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夺权我们告诉军区，军区打电话给中央，周总理打了电话说：革命行动支持，必要时派军队维持秩序。

公安局的问题，对广州地区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弄清当时公安系统内部群众组织之间的关系。

省公安厅有四个群众组织：一、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一总部）；二、革命火炬造反联络总部（简称二总部）；三、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因内部意见分歧，于2月16日宣告解散）；四、劳改局红色造反总部（简称四总部）。前三个总部，在北京政法公社等组织支持下，参加了1月22日的夺权，四总部因成立较迟，没有参加。

广州市公安局内，也有四个群众组织：一、毛泽东思想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1966年12月30日成立，人数约2000至3000，属反对省革联的组织；二、毛泽东思想红色战斗兵团（简称二总部），1967年1月3日成立，人数约1000，属支持省革联的组织；三、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红旗联合总部（简称三总部），1967年1月9日成立，人数约800至900，参加了省革联，但军管后宣布退出；四、广州公安战斗兵团总部（简称四总部），1967年1月27日成立，支持省革联；另外还有一个广州公安公社（五总部），2月间成立，支持省

革联；广州起义公社（六总部），2月23日成立，反对省革联。但五、六总部人数很少，不起什么作用。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治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邹力志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马上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省军管会的调查材料称）由于盖公安局大印的一些文件，都是关于对敌斗争、国家机密的，没有让外单位的监督小组成员看，外单位的某些监督小组成员就认为这是邹力志“独断专行”，从中操纵的结果。于是，在监督小组内部，以邹力志和“一总部”的四名委员为一方，以其它组织的八名成员为一方，发生了矛盾。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正式决裂。据黄意坚说，军代表授意一总部实行反夺权。

下午，一总部派人到省公安厅与政法系统各群众组织开会研究，决定成立“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这个组织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省革联”代表便认为是“反革命政变”，随即调集了数千名不明真相的群众向市公安局冲击，铸成了“一二五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有18名干警和群众被殴打、踩挤成重伤送医院。“政法革委会”被“省革联”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命令立即解散，几千名革命干警被打成“反革命”，北京政法学院学生邹力志（共产党员，贫农出身，复员军人）被挂上黑牌、戴上高帽斗争，斗争后又又在市公安局院内“游院”，还扣押了邹力志和“一总部”负责人黄××、陈××、梁××等人。

这是引自广州军区的一份关于省革联的材料。当时市内各大造反派组织都闻风而动了。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造反总部（简称中造总）--这是1月16日由中科院中南分院下属单位的10个战斗队共400多人组成的造反组织--打电话给下属各单位：“北航红旗被围了！北航红旗是江青同志肯定的，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要求各单位立即派人增援。25日凌晨，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殴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有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迟泽厚在现场，他是最早介入广州地方文革的军队干部之一。后来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我去给他们调解，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我估计里里外外有万把人吧。一二五总部很多人在里面顶住，关起铁门。外面的就上去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的就冲开了，一下子冲进去了。就把一二五总部砸垮了。”

从那以后，一二五总部成了造反派里面的一个“修正组织”。既不是保守派，保守派也不承认它，它自己也不甘成为保守派；可是造反派又不承认它是响当当的造反派。迟泽厚说，“它变成游离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的这么一个组织了。”

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的观察认为：

1月25日，广州市公安局发生了由“监督小组”内部分裂而引起的二次夺权斗

争。"监督小组"中的多数派（包括北航红旗、哈尔滨军工、武汉三司、中大红旗公社、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珠影东方红等单位），取得这场斗争的表面胜利；少数派（北京政法公社的几名学生和公安局的"革命造反第一总部"）被赶出"监督小组"，并被宣布为"反革命"。

这次夺权斗争，非但未使双方的矛盾得到缓和，反而发展得更加复杂和尖锐，而且把"监督小组"以外的许多组织也卷入这一斗争中来。

在这次事件中，双方都对军队表示不满。两派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对我们力主协商调解的态度，认为是"合稀泥"、"搞折中"，甚至说军区是"制造"这次事件的"幕后人"、"凶手"。

《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目录

-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的广东省委... 3
 - “五·一六通知”：暴风雨来了... 4
 - 陶铸给自己扣了一顶右倾帽子... 5
 - 工作队进驻文教单位... 7
 - 抓右派导致群众斗群众... 10
 - 《北京来信》引起轩然大波... 15
 - 全线撤退，阵脚大乱... 19
 - 运动初期的斗批情况... 24
 - 赵紫阳说：“最多搞得天翻地覆，下台。” ... 28

- 第二章 红卫兵运动的崛起... 29
 - 林李明陷入了中医学院事件... 30
 - 红卫兵从学校杀向社会... 32
 - “老子英雄儿好汉” ... 35
 - 破四旧，立四新的狂潮... 38
 - 北方红卫兵把广州闹翻天... 43
 - 八月红色恐怖... 45
 - 震撼全国的大串连... 49
 - “尽快把学生送走” ... 54

- 第三章 “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 58
 - “黑材料”风波使省委成为众矢之的... 59
 - 省委烧材料，学生抢档案... 61
 - 黄伟经事件和《韶山的节日》 ... 64
 - 封闭《红卫报》（原《羊城晚报》）成为形势的转折点... 68
 - 学生与工人终于不可避免地走到一起了... 71
 - 陶铸倒台，省、市委面临瘫痪... 75
 - 八百诸侯大封相... 78
 - 群众组织背后有没有省、市委支持？ ... 81
 - 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均被群众接管... 83

- 第四章 一月风暴... 84
 - “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 85
 - 市公安局的夺权和反夺权... 92
 - 地总总部被砸... 95
 - 群众组织指责省委“假让权，真反扑” ... 96
 - 广州的夺权模式被中央否定... 98
 - 焦林义代表市委作检查... 99
 - 各条战线全面开花... 102
 - 军队开始介入地方文革... 105
 - 群众组织互相抄家... 107
- 第五章 军管广州... 109

“二·八事件”激怒了军区... 110
军委连下两道命令，省革联垮台已成定局... 113
《广州日报》被军管，群众组织小报纷纷出笼... 118
对市公安局实行军管... 121
军队严厉打击造反派组织... 123
有名无实的大联合... 127
毛泽东请军区查一查赵紫阳等人的政治态度... 130
霹雳一声军管... 134

第六章 在沉寂中爆发... 138
省军管会连续召开党政干部座谈会... 139
对军管的反应：有人欢喜有人愁... 142
《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144
中央文革对《广州日报》问题的指示... 146
春交会成了形势恶化的缓冲期... 148
周恩来亲赴广州... 150
广州群众组织正式分裂成东风、红旗两大派... 154
“捣毁陶赵黑店”... 156
赵紫阳等人被关进梅花园... 159

第七章 反帝抗暴与武斗的开端... 163
捉放曹的“项明事件”... 164
广州军区被迫向中央检讨... 169
印尼排华事件，造反派批斗印尼驻华代办... 171
支持香港反英抗暴斗争... 173
铁路全线告急... 177
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令军区尴尬... 180
广州武斗第一次出现死人... 185
浴血中山纪念堂... 187

第八章 “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0
中山大学在制造“化学武器”... 191
炮轰广州军区... 194
一股抢夺武器的浪潮席卷广州... 197
武斗此起彼伏，大局岌岌可危... 200
神秘的“打劳改犯”之谜... 203
机关领导干部联署表态支持旗派... 206
“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成立... 208
“内交2号”喋血珠江... 210
围攻省总工会... 212
北京在谈，广州在打... 215

第九章 “战士指看南粤”... 223

中央调查团抵达广州... 224
东风派在军区和省军管会静坐请愿... 226
“斗私批修，实现革命大联合” ... 229
东风、红旗两派签订十二条协议... 235
中央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 ... 240
砸烂旧招牌... 243
旗派召开佛山会议，所谓“八五思潮” ... 244
封档案室、封武装部、封政治部... 247
一月革命纪念日，东较场爆发大型武斗... 249
权力重新分配，各山头明争暗斗... 251

第十章 东风派、红旗派的覆灭... 253
一篇《激战前的沉寂》又起风波... 254
“现在主要危险是右倾” ... 259 3
造反派纷纷死灰复燃... 263
中山大学“六·三武斗”事件... 266
抢汽车之风愈刮愈烈，全市交通瘫痪... 268
红旗派已走到了终点... 270
群众组织的全面瓦解... 275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78

代序：历史需要反省

文化大革命是 20 世纪改变中国命运的一次大规模政治动乱。在“文革”中，执政党、政府、军队、人民群众，以及和所谓“敌对阶级”（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等）之间的关系，如此错综复杂，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种奇特的政治文化的体验，它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无比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广州地区一系列大型武斗，究竟是怎么打起来的，事实隐藏在重重雾障之后。我采访过不少亲历这些武斗的人，有些甚至是重要的指挥者，他们也说不清楚。可能是不愿说，也可能是真的说不清楚。因为在各个群众组织的背后，都有一张犬牙交错的关系网，各有各通往北京、通往中央文革小组、通往“两报一刊”的渠道，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

对“文革”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两派群众组织互相攻讦的文字，几乎都是谩骂式的，其中有无数的夸大其辞、面壁虚构的东西，真假难辨，但无论如何信口雌黄，只要它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总能够从某个侧面、某个角度反映出某些事实，反映出某种社会文化心态，为研究者提供真实有用的线索。

客观而论，1966 年至 1968 年，广州的“文革”与全国许多大城市相比，并不算太乱。用一位军管会干部的话说，广州不但生产没停顿，而且生产形势在全国是最好的。广东历来是从外地买粮食吃的，但“文革”期间，广东还支援了中央几亿斤粮食；粮食和油料都有宽裕，上调国家。

究其原因，首先，这是广州军区的大本营。广州军区前身是四野，是林彪的基本部队，靠山强大，造反派屡次炮轰军区，炮轰黄永胜，都是有头威无尾阵。军区的态度对局势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次，广州毗邻港澳，地处国防前线，周恩来每次与广州群众组织见面，都强调敌情问题，以敌情为由压制内乱。再次，广州每年有两届交易会，对形势起了缓冲作用。一到交易会期间，大家都会暂时停火，上街打扫卫生。群众组织之间虽然对立，但在对外问题上，还是能够以大局为重，听从中央劝导的。

许多人都会关心，广州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这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政治动乱？虽然迄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据公布，但军管会的干部告诉我，广州武斗期间死了两百多人，因为广州武斗发生最晚，清理最早，死伤最少。湖南在 1967 年 6 月份就死人了，广西更早。广州到 7 月下旬才死人。广州面临港澳，情况复杂，这么一个大城市，两三百万人，一共死两百人，连那些被当成监狱逃跑人员（即所谓“劳改犯”）打死的吊死鬼也算了，也就两百人左右。但这个数字显然是不够准确的，因为仅仅在 1967 年 8 月被当作“劳改犯”打死的，就已近两百。

关于因武斗而死的人员数字，各方面的统计，相差很大。比如像 1967 年 7 月 23 日的中山纪念堂武斗，军管会的干部告诉我，死了 4 个人，但旗派一位头头则说，一个人也没有死。准确的数字也许永远是个谜，即使统计出来了，也不过是一个“统计数字”而已。死者长已矣，留给人世间只有无限的感慨与思考。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当我写这个“荒唐岁月”的系列文章时，又重读了那个年代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传单、小报和油印资料。它们早已变黄变脆了，静静地散发着发霉纸张的气味。那些写传单的人，那些印小报的人，他们当时在想些什么？他们现在又在哪里？如果他们还在，也已步入晚年了，在他们日渐苍老的心底，还残留着多少当年的激情？年轻时的理想是否早已悄然破灭？他们有所忏悔了吗？或者仍然觉得“青春无悔”？

历史沉重的一页，虽然已翻过去了，但对“文革”历史的正视与反省，还远远不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负起的责任。

斗争巴伦事件

信息来源：2014.03.22 羊城晚报

“文革”以后，“解放全人类”成为响彻大江南北的口号，“把红旗插到莫斯科去”、“把白宫变成红宫”之类的叫嚷，一度成为非常时髦的“革命口号”，时见于造反派的“革命宣言”之中。“文革”把这种世界革命情结，发展到极致。1967年3月，林彪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一个讲话中直言：“因为中国，就现时说，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对于革命来说，对世界革命来说，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起决定因素的国家……只要中国不倒，中国不变色，世界就有希望。”

然而，中国的外交政策，这时已全线亮起红灯。对西方、对苏联、对东南亚的关系，全部陷于死火和停顿状态，甚至更糟。差不多全部驻外大使都奉召回国，外交部被造反派接管，外交部长陈毅受到猛烈的批判。

对于广州来说，最具震撼性的外交事情，莫过于中国与印尼绝交。因为印尼有众多的粤籍华侨。

中国与印尼关系的恶化，可以追溯到1965年9月，由于当地发生政治动乱，爆发了激烈的排华浪潮，有二十万人惨遭屠杀。10月16日印尼武装冲砸中国使馆商参处，并对中国在印尼帮助建设棉纺厂的专家实行侮辱性的检查和搜身。

1966年4月15日上午，千余暴徒在100多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和装甲车的协同配合下，用卡车撞开中国驻印尼使馆大门，大肆破坏使馆的办公室、大厅和宿舍，捣毁了门窗、家具和客厅的全部陈列物品，劫走汽车3辆，砸坏7辆。1967年4月22日，印尼军警包围和封锁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并宣布中国驻印尼临时代办和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中国宣布与印尼正式断交，雅加达驱逐了中国代办姚登山，他在回国时受到了英雄式的热烈欢迎。大批印尼华侨也陆续返国。直到1967年5月13日，已经有四批印尼华侨回到广东，他们在黄埔港下船时，受到盛大的欢迎。全国各地响起了一片抗议印尼右派迫害华侨暴行的声音。

中国政府于4月29日下令驱逐印尼驻中国代办巴伦和新闻参赞苏玛尔诺，以及他们的家属共12人。他们于当天飞抵广州，准备经香港返国。但他们一下飞机，就被2500多名愤怒的广州群众包围了。人们挥舞拳头，狂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印尼反动派”、“绞死苏哈托”、“绞死纳苏蒂安”等口号，声闻四野，惊天动地。有的群众还向印尼外交人员递交抗议书。

据省人委外事办当时一份报告写道：

巴伦等离开停机坪后，愤怒的群众即把他们团团围住，最后把他们冲散围成四堆。苏玛尔诺夫妇及其孩子在人群的冲击下，曾跌倒数次，并高声叫喊，神情十分恐慌。另外，发现有个别中学生企图用拳头揍巴伦，但及时被人说服制止。他们被围困约达40分钟，始先后上车，但群众仍围住汽车高呼口号，并用标语牌、拳头敲击车身，经过十来分钟，汽车才得以缓慢驶离机场。在前往宾馆途中，

红卫兵的宣传车一直尾随着，并不断广播谴责印尼反动派的反华排华罪行。

载着印尼外交人员的汽车驶进了羊城宾馆（即后来的东方宾馆），群众穷追不舍，红卫兵的宣传车把外交人员的车夹在中间，宾馆的汽车也驶过来助威，口号声震耳欲聋。当他们拖着疲惫的步履，进入宾馆房间时，一个个筋疲力尽，又饥又渴。

参赞夫人一进宾馆就问：“是否有饭给我们吃？”翻译告诉她，可以到餐厅去吃。他们要求把饭打到房间里来吃，服务员不同意，他们表示不吃。双方坚持了十来分钟，最后他们乖乖地到餐厅去了。但一进餐厅，又碰到二十多个服务员和参加广交会的翻译向他们呼喊口号，他们只好狼狈地退回房间。

当晚 10 时半左右，有几十名新归国侨生（华侨补校学生）冲进宾馆，要求斗争巴伦。省人委外事办没有拒绝，但向他们交代政策，只能文斗，不能武斗。随即由他们派代表进入宾馆，把巴伦和苏玛尔诺揪到宾馆前广场，群情激昂，斗争气氛炽烈，巴伦和苏玛尔诺站在人群中低头不语。

当斗争会正在举行时，又有许多群众蜂拥而至。斗争会开到半夜两点，归侨学生在宣读抗议书后，把巴伦等人放了。在场群众坚持要把巴伦等人揪出来继续斗争。外事办的人劝说无效，只好又派人上楼把巴伦从房间拖出来。这时广场上已经聚集了四五百人，广播车也开进宾馆，用高音喇叭不断高呼口号和朗读毛主席语录。对宾馆内所有客人来说，那都是个不眠之夜。

最后，群众勒令巴伦低头认罪，绕场一周。巴伦不肯，人们一涌上前，把巴伦推来搡去，一直闹到清晨 6 时许，巴伦的家属下楼准备去火车站时，才放他上车。部分群众还涌上他们坐的大客车，和他们一起去火车站，一路上不断地高呼“打倒苏哈托”、“打倒纳苏蒂安”的口号。两辆宣传车一前一后，押送着这批外交人员和家眷到火车站。

在火车站门口，巴伦和苏玛尔诺又受到千多名学生的包围（大部分是暨大和华侨补校的侨生），他们把巴伦和苏玛尔诺带到场中央，又斗了约一小时。军管会为了预防不测事故的发生，临时调来了一些解放军协助维持秩序。

7 时左右，群众才放他们进车站。由于人群拥挤，秩序较难维持。在混乱中，发现有人用拳头揍了巴伦两下，同时有人朝他脸上丢糨糊。这几个印尼外交人员狼狈不堪，上火车后，群众的代表还走上火车，要他们站在窗口，直到火车开后才准许他们坐下。

中国与印尼直到 1990 年 8 月 8 日，才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北京来信》引起轩然大波

事实证明，当导致学生一哄而起的诱因出现时，省委根本无法加以有效控制。6月23日，华南工学院五年级学生高翔，收到他妹妹高眉扬从北京医学院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声称，除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外，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都可以怀疑、批判。斗争矛头应集中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信件呼吁广州地区各大专院校革命同学要联合起来，互相串连，互相支援。

高翔出身于高干家庭。工作队进驻华工后，高翔是有名的左派学生，直到学生中划分左、中、右时，他还是工作队依靠的学生骨干之一。但他对学校斗教授一直有不同意见，认为运动应该整党内走资派，不应整教授，整教授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北京来信”正好道出了他的想法，因此他立即把信抄成大字报，在校内张贴，同时张贴了一张《告全院学生党员书》。工作组连夜抄录送给省委。

这封信，就是文革初期，在广州学生中引起激烈争论的《北京来信》。

赵紫阳在看到信以后，大吃一惊，立即派张云到华南工学院了解情况。这时学生队伍的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据1967年省军管会的一份材料称：

《北京来信》是去年（1966年——笔者注）6月23日，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收到北京他妹妹写来的一封信，“这封信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方向、重点和一些斗争策略等问题，充满了革命造反精神”，华南工学院革命小将将《北京来信》贴出后，省委得知，赵紫阳等认为这封信，煽动性很大，是一株大毒草。赵特派张云到该院亲自抓，组织学生反击。

对《北京来信》，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形成水火不容的两种意见。校方组织反击，把《北京来信》指为“反革命暴动的宣言”，“是裴多菲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板”。甚至如临大敌，出动民兵警戒，公安机关介入调查。原定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66届毕业典礼，也因校方担心高翔在会上发表演说而临时取消了。高翔被开除出左派领导核心。

省委与校方对“北京来信”的处理，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张云在学院受到一部分学生的围攻。有的学生开始提出成立学生组织，有的学生上街游行了。高翔曾和我回顾这段历史，他说，华工是广州市最早出现学生组织的学校，红旗战斗队就是华工最早的学生组织之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是最早出现于华工的。华工之所以走在全市各校的前面，与“北京来信”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赵紫阳随即召开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工作队队长会议。他在6月24日的会上明确表态：“上街游行，我们坚决不赞成。要向学生讲明，根本没有此需要。游行的矛头是对准谁呢？游行要达到什么目的呢？牛鬼蛇神在学校里，你为什么上街呢？上街游行，搞大民主，就是矛头对准政府，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在6月26日的会上，赵紫阳说：“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部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

他承认工作队派得太仓促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总的就是领导跟不上去。对这种大的革命风暴，中央通过报纸社论直接同广大青年学生见面，学生闻风而动，而我们感觉迟缓，行动得慢。学校党委跟不上，不敢革命，怕乱，怕引火烧身，顾虑重重，诸多限制。工作队一下子又组织不起来，组织起来了，也不够强，完全没有经验。总之是仓促上阵，看来这种形势很难避免。前一段时间，学校党委不敢革命，工作队仓促上阵，所以前一段情况比较乱。”

赵紫阳给大家打气：“今天开会，是有意义的，大的框框统一一下也好。因为大家都没有经验，有些是非界线也划得不清楚。前一段学校党委对学生的革命行动限制多，不敢领导；当然，《人民日报》6月24日《党的阳光照亮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这篇社论发表以后，我们又不要忘记了总的方向。今天总的来讲，我们还是处于被动状态，还要经过一段时间，这种局面才能扭转过来。”

但这“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谁也说不清，局面很可能还会趋向恶化。对运动的领导权，赵紫阳提出三种可能性，“一是我们党所领导，这是我们要争取做到；二是自发、半自发状态，如像现在许多院校的情况那样；三是为个别坏人所操纵。自发久了，也势必被别人所操纵。对这些，我们要有所认识。”

赵紫阳说：“学生在这场大革命中，一定会有很大提高，一定会锻炼出真正的左派，但必然要经过曲折的斗争，不仅要靠正面教育，也要靠反面教育，跌了跤子，上了当，有了教训，辨别能力就高了。有些地方出现曲折、混乱现象，如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一个时期，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那是可能的，这也是反面教训。”

省委认为，《北京来信》说明，确有一部分学生“被偏激情绪的人操纵”，或者，“甚至被坏人操纵一个时期”。6月25日凌晨1时左右，工作队和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把学生中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子弟从床上叫起，开紧急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给《北京来信》定调子：“敌人已冒出来了，我们要进行反击，必要时付出鲜血和生命。”在工作队布置下，不少同学连夜写大字报，写批判文章，“《北京来信》是反革命暴动的宣言书”，“是裴多斐俱乐部反革命纲领的翻版”，“是匈牙利暴乱的前奏”等等，铺天盖地而来。

6月26日，《北京来信》有关学生派出五名代表上京告状。据尹林平1967年写的一份材料说：赵紫阳知道后，“又下令省公安厅打电话给湖南、湖北公安机关，妄图中途拦住这些小将上京”。并要省公安厅给公安部打电话，说“广州有五个反动分子要去北京闹事，要求派人跟踪，并监视他们的行动”。

6月28日，赵紫阳在自己家里和主管政法口的省委书记尹林平、省公安厅长王宁碰头。赵紫阳说：“阶级斗争很复杂，出头的人有些是别有用心的，广州各大专院校可能会出现乱的情况。”他指示尹、王二人：“对乱后暴露出来的明显坏人，可及时揭露，一般的记下一笔账，很恶劣的，公安部门要配合。”

尹林平1967年的那份材料，证实赵紫阳确实曾要求公安机关配合。他说，赵紫阳一开始认定《北京来信》的实质是反党中央，因而下令省市公安机关彻查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对《北京来信》事件的有关学生使用专政手段，检查他们的信件”。后来造反派的小报，有更为详尽的记述：

6月29日，公安厅侦察处向厅党委写了个报告，题目是：“广州市大专院校开展技术侦察工作的意见”内容说“为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拟在石牌成立一个临时侦察组，对六间大专院校进行侦察。”7月7日省委批示说“同意这个报告，可增加中山医学院。”工作时间为三个月。7月3日，公安厅又向省委写了一个《关于对华南工学院七种人进行侦察工作的报告》，提出对200名对象进行技术侦察，有学生，教师，干部等。上述工作直至8月份中央公安部通报某省利用技术侦察进行违法乱纪事件之后才被迫停止。

他们还把贴《北京来信》的1016班和呼吁建立联合指挥的7059班档案逐一审查，认为里面有“反革命”，工作队特别对1016、1026、1038和7059班进行严密控制。当时，工作队关于情况的报告有如下纪实：“工作队发现后（即对《北京来信》）立即采取措施，了解各系情况，封锁消息，调查情况，研究对策，当晚召

开工作队员会议，进行布置，串联骨干活动，同时将原信抄送王阡西（副省长，三反分子，已停职）和文教政治部”。为了镇压革命群众运动，黑省委竟以对付敌人的专政手段来对付革命同学，真是恶毒至极！

高翔同志更是受到非人的迫害，《北京来信》事件发生后，他们派人跟踪，监视，剥夺高翔和其它许多同学应有的政治权利，不准他们参加援越抗美游行，阻挠他们在学代会上发言。他们还通过了解高翔父母的政治情况，以找到借口把高翔的材料送到公安厅，列举了高翔六大罪状：（1）召集党员写《告全院学生党员书》（2）张贴反动信件，到处煽风点火；（3）成立统一行动指挥部；（4）举行接待会，反对工作组；（5）组织退却，伺机反扑；（6）坚持错误，坚决反对工作队。

在7月7日的工作队长会议上，《北京来信》仍然是讨论的焦点之一。会议把这封信印发给大家看。

（据军管会称）张云把《北京来信》称为反革命信件。他说：“北京来的是反革命信件，反对革命的这一小撮人斗争是十分激烈的。我们要有领导的让他暴露一下。目前学校两条道路的斗争经常有遭遇战，我们要准备好，遭遇了就主攻。这封信就是北京、广州联合起来干的。各学校也要准备暴露一下。”

人们普遍忧虑，《北京来信》是一个信号，处理不慎，将触发破坏中共组织和政府的大规模群众行动，如自发夺权之类。现在谁也不清楚运动如何发展，一切将视北京的情况而定，赵紫阳指望公安机关能够控制局势，未免太过天真了。

7月7日，赵紫阳作了一个报告，明确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革命就是四清”。这时，夺权的呼声，已经由远而近，由弱转强了。薄怀奇在传达这个报告时，强调指出：“矛头指向党内，千万不要一般化。”7月9日，薄怀奇传达了赵紫阳的指示：“不论机关、学校，自发夺权不承认，要夺权必须在上级单位领导下进行。”

7月12日，根据赵紫阳的意见，省委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重新调整运动部署的指示》，旨在控制运动的发展。指示要求：“当前文化革命的重点，首先放在中等城市（包括地委所在的城市）以上的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这些地方的大、中学校、文教部门一定要按照原定部署，派出得力的工作队，认真把运动搞好搞彻底。”指示强调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各级党委必须认真重视，加强领导，派出强有力的工作队。第一书记要亲自掌握运动，并指定一个书记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接着，指示在严厉禁止自发夺权的同时，再次谈到工作队的重要性，“不论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一律不允许搞自发的夺权。凡是未经上级领导机关同意自发夺权的，一律宣布无效。夺权必须在上级党委和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

7月14日，薄怀奇在一个讲话中强调，“中学的运动，说来说去就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把学生引向正轨。”但这时的学生运动，还能纳入省委所指望的正轨吗？不能了。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组组长开会，讨论运动情况。张云作了讲话，区梦觉作了总结。会议认为，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妨碍运动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目前许多单位的主要问题，就是左、中、右的阵线还未划清。只有在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里让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都上台“表演”，才能真正分清左、中、右。因此，在当前运动的第一阶段，应着重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暴露隐蔽的假左派真右派。首先是总结前段发动群众的经验和针对存在问题，有领导地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掀起一个大揭发、大

暴露的新高潮。会议纪要指出：

“第一，领导干部要敢于革命，敢于引火烧身。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把正确的意见带出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牛鬼蛇神引出来。

“第二，对于限制群众活动的清规戒律，都要取消；对于压制群众的错误行为，应当及时地严肃处理，要坚决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第三，对已经暴露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分析，摸清情况，研究‘乱’的原因、性质，分析各种人在‘乱’的过程中的不同态度和‘表演’内容等。

“第四，还正在‘乱’的单位，要有领导地放手让它乱一阵，让革命群众在大风大浪中锻炼、考验、成长。同时也可以让牛鬼蛇神来个彻底暴露。有些单位，牛鬼蛇神露了一下头，由于回击过早，又缩了回去。应注意在下一段鸣放、揭发的高潮中，有意识地给予一定的温度，让他们再暴露出来。

“第五，对已经露了头的假左派真右派，领导上要沉得住气，记一笔账，放在最后再组织反击，让他们充分暴露。反击必须十分谨慎，一定要放在运动的最后才进行。过早反击，有可能错打在真左派的身上。

“第六，要放手让各种人物去进行活动，允许自由交换意见，放手让他们去大讨论，大辩论，不要什么都先由领导上定好调子和框框，要充分发挥革命师生的革命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会议要求，要收缩的单位，应当坚决收缩。下一批要开展“四清”的县，也要坚决暂时收缩，等到开展“四清”时才结合进行文化革命。已经收缩和正在收缩的单位，一定要按中南局、省委规定，认真做好善后工作。

学校运动大致分为三段，对其他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也是完全适用的。这就是：第一段，解决领导权问题，重点解决敌我问题；第二段，清思想，进行思想批判，清除各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段，是搞教育制度的改革，彻底打破旧的制度，创立新的制度，进行组织建设。有经济问题的，还要清一下经济。

直到目前为止，省委手里剩下最后一张王牌，就是工作队。这是省委能够控制运动进程的唯一希望。但这个希望在7月下旬破灭了。

主义兵来了！

本文无意评价红卫兵的是非功过，只希望以平实的叙述，重现广州红卫兵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过程。

说广州红卫兵，不能不从华南师范学院附中说起，华师附中位于广州高校集中的石牌地区，是1952年由中山大学附中、广东省文理学院附中、岭南大学附中、华南联合大学附中合并而成。学生之中不乏广州军区、中南局和省委的高干子弟，他们住在校内，周末回家与父母团聚，周日晚回校，过着半军事化的生活。旧军装、白衬衫、蓝长裤是最常见的服装，男生剪小平头，女生扎小辫。晚上自习课完了熄灯睡觉，早上起床号一响，用最快速度整理好床铺，冲到操场集合，排着整齐的队列，踏着薄薄的晨雾进行操练。傍晚，红火的夕阳缓缓西下，从学校的墙头望出去，远远近近的田野，镀上了一片金黄。

同学们的课余时间，都投入到数学、文学、诗歌、航模、无线电、田径各种小组的活动。每个班都有自己的菜地，每周到菜地劳动一个下午，把收获的蔬菜送到学校饭堂。一位华附学生回忆说：华附的每一天，既平凡又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但进入1966年5月以后，一些同学开始感到，可能会有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北京的许多消息，通过他们的高干父母，传到他们听惯了“叔叔伯伯在客厅谈话”的耳朵里，刺激着他们年轻的血脉。

今日华附

5月27日，高三一位学生写了一张大字报《学校的“教育”》，张贴在华师附中的饭堂，马上引来大批师生围观。这是广州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

大字报写道：“每个假期同学们离校前，学校总要宣布假期一定要回校劳动一天。这是谁指示的？就是管人太甚。”这位学生家长在贵州，因为假期回家没有参加劳动，回校后就是不给注册，说没有劳动“证明”。他提出注册再补“劳动”，但老师说这要由校长决定。最后校长同意开个证明让他去劳动了一个上午，“但还不行，说我没有‘照肺’。开学第二天了，老师说我没注册不准上课。”大字报质问：“学校贯彻的是什么教育制度？这样的劳动是为了造就接班人吗？为什么不狠抓人的思想教育！这一天的劳动为什么那么重要？”

晚饭时，围观同学愈来愈多，赞成的，反对的，质疑的，众议纷纭。当人们围着大字报讨论时，有人开始写大字报反击了。一个小时后，一位高二的学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质问：“你是在向学校领导提意见？还是想在毕业前夕发泄一下自己的私愤？在眼里有没有学校领导？”

正反意见都亮出来了，学校似乎没有干涉。学生有“四大”权利，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开展文革的武器，谁也不能剥夺。于是，从下午到晚上，有更多大字报陆续出笼，连初一学生也不甘后人。大字报内容五花八门，有人认为对校领导有意见应该以书面提，不应写大字报；有的批评大字报分散了批邓拓的火力。也有表示支持的大字报，把火力指向学校提倡的“勤奋、刻苦、认真、踏实”八字学风：“当年不是因为有了‘八字学风’，课业负担才那么重，学生的健康才遭到严重的摧残吗？学生的睡眠时间压缩了，课堂提问测验增多了。想看课外书都没有时间，更谈不上突出政治了。‘八字学风’是我校某些领导人用以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的法宝。”

这张大字报的出现，意味着辩论范围，扩大到整个学校的治学精神、治学态

度和治学方法等问题

6月4日是星期六。华附、广雅、省实、执信等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在执信女中开会，提出给中央写信，要求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应届毕业生不进行高考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市委文教工作队总团的干部匆匆赶来，试图劝阻，但学生不听他们的。

事情显得有点奇怪。北京女一中、四中分别在这个月的6日和10日写信给党中央，提出废除高考制度。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13日发出了通知，将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南北几所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几乎在同一时间，做同一件事，而中央又这么快作出反应，让人觉得事情并非巧合。北京女一中的学生后来坚持说她们是自发的，但广州几所学校的学生，在6月4日就准备向中央提出废除高考的建议了，时间上甚至比北京还早了两天。他们的“灵感”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就在华附的学生代表在执信女中开会的同时，省委派出的第一支工作组，已进入华附了。工作队要做三件事：一、恢复秩序；二、组织起来继续鸣放；三、恢复上课。但怎么才能落实呢？火头已经点燃了，怎么才能回到5月之前的局面？继续鸣放与恢复秩序、恢复上课，怎么才能并行不悖？

6月5日，芒种前一天，这是一个让人头脑发热的星期天，几乎没有人想到要回家休息，大家都忙着东奔西走，互相打探，尽可能多了解些情况，生怕自己错过了什么。

持不同观点的同学也把第一张大字报视作反击的标靶，批评的调门不断提升，从开始说这张字报冲淡了对邓拓的批判，上升到宣称这是反右斗争，甚至是“匈牙利事件的前夕”，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学生是被反革命老师利用了，大字报“起了反党的作用”。

学校闹翻天了，校长王屏山还在紫金，党团员召开紧急会议，强调“当前文化大革命中心还是以反邓拓为主，这是没错的，至于提意见也是可以的，让他们提”。但学校突然接到省委电话，提醒要“小心贴大字报的人被坏人利用”。空气再度紧张起来。一旦提到“被坏人利用”的高度，就有一个“坏人是谁”的问题了，学校就有反击坏人、揪出坏人的责任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全校没人上课。课室挤满了激动的学生，操场上、饭堂里沸反盈天，辩论的声浪此起彼伏。哪里有新大字报贴出来，人们就一窝蜂涌过去看，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忙着抄录。

就在这时，一副对联出现于北京的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几天之内，风靡全国，刮起了一股“血统论”的狂风。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瑟瑟颤抖了。

华附高干子弟甚多，血统论一向很有市场。北京成立红卫兵的消息传到广州，一批高干子弟心情激动，决定仿效北京，成立广州的红卫兵组织。1966年8月11日上午，广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附中红卫兵，便成立了。

8月12日，华附同学在操场举行了一场大辩论，八一中学、华师实验中学等学校都有学生参加，一些北京学生也跑来了，时间长达一整天。对血统论，一方赞成，一方反对。主擂台上，个个争着发言；主擂台下，东一簇西一簇，分成多个“小辩论台”。辩论会以血统论取得压倒性胜利的结果告终。就在辩论会期间，附中红卫兵组织正式亮旗。在校内贴出广州市第一份“红卫兵成立宣言”。

在华附红卫兵成立12天之后，又有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出现了一一南海红卫兵。主要的组织者也是高干子弟。

在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第二天，一批八一中学的学生，喊着口号，唱着歌曲，到华师附中张贴“贺信”。八一中学也是军干子弟萃集之地，还没成立红卫兵，但已跃跃欲试了。贺信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真理永远在革命者一边！天下是我们父母打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许我们讲话难道让资产阶级讲话？！不让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难道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不成？！”

八一中学是最先走出校园，进行校际串连的中学之一。红卫兵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全市性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他们串连了华附、二中、六中、八中、二十一中、执信女中等16间中学，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临时总部。

筹备会议在8月21日至9月2日期间开过几次，参加者是清一色的高干和军干子弟。

在参与筹备的学校中，没有广雅中学。广雅的情况比较特殊。8月初，各校的工作队已成“过街老鼠”，忙着准备撤退了，广雅的工作队8月2日还召开核心小组长会议，布置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8月5日、6日连续两天召开批斗老师的大会。直到撤走前夕，工作队还主持筹组“广雅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甚至声称自己即使撤退，也还会担任“参谋”角色。

学校内早已纷纷传言，工作队待不长了。直到市委宣布撤走所有工作队之后，学生分裂为支持工作队与反对工作队的两大派。后者要求改选广雅文革委员会，清算工作队的错误。前者则认为工作队成绩是主要的，不能恶意攻击。双方从贴大字报，发展到8月10日在高三乙班课室进行了通宵的大辩论。

直到这时，广雅还没有成立红卫兵。8月22日，工作队正式撤出广雅，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一些“自来红”的革干子弟戴上了自制的红卫兵袖章，在校园里一亮相，吸引了无数艳羡、敬佩的目光。第二天，广雅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中学红卫兵（后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宣告成立。

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必须是红五类。思想兵在礼堂敲锣打鼓，公布首批红卫兵名单，大约有五百人，骨干多是高二级的原团干部和班干部。思想兵一成立，就在校内贴满了“顺自来红者存，逆自来红者亡”的大标语，气势凌厉，触目惊心。

红卫兵组织一经出现，就像燎原之火，在广州的中学迅速蔓延开了。到9月份，已有一百多间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呼之欲出。但也有不愿意成立跨校组织，而希望自立为王，称雄一方的。当八一中学的红卫兵来串连广雅思想兵，成立全市红卫兵总部时，就遭到思想兵的拒绝，他们以反对成立跨校组织为由，把八一中学的红卫兵轰出了校门。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四千多名以中学生为主的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到场，并发表讲话，赞扬和支持红卫兵。

总部设在中山二路东较场旁边的工商联办公楼。各区的工商联也成了主义兵的东、南、西、北片分部的办公室。

这时的工商联已停止办公，人去楼空。主义兵临时总部想要一个办公地方，市委就把这个地方给了他们。对主义兵，市委几乎是有求必应的，在临时总部成立前，就有一名专职干部负责与主义兵联络；临时总部成立后，市委成立了红卫兵联络组，由一名局级干部以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兼联络组组长，配备两名处级干部任副组长，要钱给钱，要物给物。

主义兵前期的活动经费，都是定时向市委报销的。市委先后拨给红卫兵联络

组三万元，其中四千三百多元给了主义兵临时总部和各分部，用来印刷袖章、房租、水电、办报纸、办公费用等。国庆节期间，市委还拨了几辆汽车、十几辆摩托车和几十辆自行车，供主义兵使用（其中有六辆摩托车因没有灯无法使用，退了回去），甚至有些军衣，也是市委从军队拿来给主义兵的。

10月初，中央否定了黑七类的提法。随着血统论的垮台，第一批起来的红卫兵——即所谓的老红卫兵——突然挨了当头一棒。一夜之间，他们从理所当然的天生革命派，变成了和非红五类一样，不得不为证明自己的身家清白，而苦苦挣扎奋斗。中央领导要求高干子弟退出红卫兵领导层。这个讲话传到广州，引起社会上对主义兵的诸多批评，促使主义兵领导层改组。一批高干子弟以参加长征串连为由，相继退出主义兵临时总部。

由于一部分主义兵在揪斗牛鬼蛇神、四类分子和破四旧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残暴，也令市民深感恐惧与痛恨，因此，主义兵的名声并不太好，人们把他们视为“黑打手”和“御用工具”。

血统论从7月冒出来，令全国风云变色，在8、9月间，发展到病态的狂热巅峰，破四旧和红色恐怖的主力军，就是这批红五类红卫兵。

10月22日，主义兵还在中山纪念堂召开了“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但到12月底，北京联动垮台，全国各地都展开“打联动”。老红卫兵几乎全部瓦解。广州也在广州火车站抓从北京来的“联动分子”，全市风声鹤唳。在8、9月破四旧中打人打得顺手、抄家抄得痛快的那些人，现在被其他一些后起的红卫兵组织指为“广州的联动”，主义兵各个分片指挥部、各学校的队部，都被砸得稀烂。

随着原来一批头头的退出，主义兵临时总部的活动便基本停止了，设在工商联的办公室人去楼空，东、南、西、北片指挥部的人员也各散东西，到冬天到来的时候，曾经煊赫一时的广州主义兵，虽然宣称仍可以随时召集五六千人，但实际上已差不多处于名存实亡的“冬眠”状态。

然而，故事还没完，主义兵很快又重整旗鼓，再出江湖了。这个组织是如何死灰复燃的，且听下回分解。

黑材料风波

信息来源：2013.05.25 羊城晚报 B10 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叶曙明

“文革”时广州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广东文革看广州，广州文革看中大。”1966年6月1日，中山大学成立左派核心小组，各个系都派人参加，核心小组最初的任务是组织大批判，但到了6月7日，情况发生了急剧变化。

6月7日夜晚，数学系党总支召集五人小组开会，决定在学生当中抓右派。但在学生中抓右派，无论抓谁，都必然引起剧烈的震动和分化。当晚，二年级的一些“成分不好”的学生先闹起来，在校内游行，抄了党总支。

当时很多大学的书记、校长都罢官了，中大的学生也要罢党委书记和校长的官。在一张以校党委名义贴出的大字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牛鬼蛇神揪出来！打倒一切资产阶级权威》前，围满了抄写的师生。与此同时，校园内还出现了大量“坚决捍卫中大党委”的大字报。两派学生形成尖锐对立。

广州医学院是唯一的市属高校，成了市教育系统的运动重点，市委先后派了四批工作队进驻，在师生中抓右派，全校有30%的教职工被打成“右派”、“反革命”；17%被关进“牛栏”，有的教研组100%被打成“牛鬼蛇神”；学生中有9%被打成“右派”，极右1.2%。这种情况，引起部分学生不满，认为是“压制运动”，大字报的火头，开始烧向校党委和工作组。

6月中旬，省委匆匆增派工作队员进驻中大，十几名中大的政治辅导员被停职反省，并关进了管教队（即“牛栏”）。全省（主要是广州地区）以“压制运动”的罪名，处分了120多名干部和政治辅导员。中大在“文革”中分成两派，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一派要抓右派，一派反对抓右派；一派要炮轰党委，一派要保卫党委。

6月下旬，整个中山大学被无数的大字报覆盖了。围绕着政治辅导员问题，学生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激烈。6月24日，有几个人在校内贴大字报，对同学斗争辅导员多有指责，并要赞同者在后面签名。忽然有一群同学围上来了，劝阻签名，而且激动地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想压制群众运动，那是不行的。”人群越聚越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初工作队在各院校搞运动时，沿用以前历次政治运动的做法，首先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一部分被视为右派的学生，受到批判斗争，工作队整理了大量材料，包括一些个人交代材料和会议记录等等。当工作队被中央宣布为错误路线的产物而撤销以后，原来那些挨整的学生，纷纷要求平反，勒令工作队立即交出所有“黑材料”。11月初，抢“黑材料”就像一股平地而起的旋风，在各院校猛烈地刮起来了。

中大全校抢抄“黑材料”之风盛行，后来终于抢到党委的机要室去了。第一次是在11月9日，凌晨2时许，高音广播号召党员起来到党委，保卫国家机密。

人群包围住党委大楼，水泄不通，门窗挤破，外面高音喇叭，两面齐开，吵破了天。

11月30日，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哄抢校党委机要室的事件。因为大批“黑材料”存放在机要室里，学生进行了哄抢，许多桌椅柜子都被砸烂。

这时，抢“黑材料”的风，已刮到校外。11月9日，学生冲击了省委专案组、秘书组、地区组，抢走了部分材料。组织部档案被封。11月23日，大批红卫兵包围和冲击省委大院，长达15个小时，勒令交出“黑材料”。“文革”期间（1967年3月以前），国家机密文件、资料被抢的有中南局、省委、省人委、中南科学分院，以及厅、局、大专院校等25个单位；被强行冲进机要室翻阅材料的有重工业厅、省经委等单位。

广州红卫兵的诞生

1966年7月，正当工作队在各个学校遭到学生围攻，焦头烂额之际，在北京，一副对联出现于北航附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几天之内，风靡北京，在全国刮起了一股“血统论”的狂风。

红卫兵这个组织，最初出现于6月初。北京清华附中一群学生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的秘密组织。之所以要“秘密”，表明这个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已不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反映出它渴望成为一支直接听命于党中央、毛主席的“红卫士”、“羽林军”。

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给毛泽东，托江青带去《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毛泽东在8月1日复信给红卫兵，盛赞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并表示热烈的支持。红卫兵运动瞬间席卷大江南北。

党委的瘫痪、工作队的垮台、血统论的兴起，都与红卫兵的诞生密切相关。在反工作队的事情上，让学生们产生了一种与党中央建立直接联系的幻觉，只要红司令一声令下，他们将“长驱贼庭，一战扫定”。

这样一支直隶于红司令的“羽林军”队伍，要求血统纯之又纯，政治上绝对可靠，对领袖的忠诚要达到愚忠的程度，对领袖的服从要达到盲从的程度。在1966年，青年学生们的许多行动，潜意识里的动机，都可以理解为他们谋求与毛泽东建立直接的上下级关系。希望红司令的每道命令，都是直接下达到他们头上，而不是通过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

8月10日，毛泽东在北京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接见了首都群众，毛泽东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个“特大喜讯”传到全国各地，有如翻江倒海，一片沸腾。

血统论的盛行，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家庭出身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关乎一生的特殊意义。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按一定比例划分左、中、右，最简单易行的办法，就是先按家庭出身排队。出身于地主、富农、反革命、资本家、甚至小商小贩这类非无产阶级家庭的人，往往会首先成为运动的牺牲品。不同家庭出身的人，际遇截然不同，有些人“根正苗红”，天生是无产阶级的坯子，是为革别人的命而生的；有些人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每次运动都在劫难逃，天生是被人革命的料。

华附高干子弟甚多，血统论一向很有市场。蔡晓彦等11位同学，已商定要仿效北京清华附中，成立红卫兵组织。但怎么才能让红卫兵的旗子一亮出，就能造成轰动效应呢？他们策划了一场关于血统论对联的辩论会，发函邀请广州各校同学来华附参加，以便在辩论会当天正式亮旗。

8月11日，华附同学在操场举行了一场大辩论，时间长达一整天。对血统论，

一方赞成，一方反对。主擂台上，个个争着发言；主擂台下，东一簇西一簇，分成无数个“小辩论台”。一位高二女生冲到台上呐喊：“我们天生就是革命的！因为血管里流着的是革命父辈们沸腾的热血，身上有革命先辈人的钢筋铁骨，因此我们就是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红得发紫了！天塌下来我们都擎得住！”台下有学生嘲笑说：“什么天塌下来擎得住！一担粪桶就把你压扁了！”大家都知道这位女生在下乡劳动时，挑不起一担粪桶的笑话。

华附学生黎服兵记述北方红卫兵到来与华附血统论大辩论的情况：

附中比较老成的高三同学本意是引来北京客人，支持他们反对省委工作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谁知客人一来，反客为主，主席台成了宣传血统论的讲坛。当时主持辩论会的同学也出身革命家庭，一反校党委、二反工作队，都得到毛泽东支持，连续赢了两盘，正是热血沸腾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不免从心底里认同血统论。更有些激进的同学为了革命，为了进步，对自己已经成为革命对象的父母（走资派、学术权威、反动文人）心生怨恨，跳上台自称混蛋，竟获得全场一片掌声。

在一面倒的叫好声中，有些冷静客观的意见根本传不出来，偶有不同意见，便是一片叫打声。这时有个初三的同学上台提出一个新论题：毛泽东思想能否一分为二？话音未落，即在一派狂热叫嚣声中被推下台暴打，关进教务处楼梯底杂物间。就在辩论会当天，8月11日，蔡晓彦、李重明等11位高干、军干子弟，在校内贴出广州市第一份“红卫兵成立宣言”：

附中红卫兵组织于八月十一日正式宣布成立了！

红卫兵——是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红色战士，它以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做到：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重视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每一个红卫兵战士任何时候都不允忘阶级和阶级斗争。对旧社会的血泪深仇，对革命先辈的英勇奋斗，每一个红卫兵战士都要牢记心中。忘记过去，就意味背叛，阶级仇恨化为我们的勇气，先辈的英勇奋斗的事迹是我们光辉的榜样，革命、革命、革命——红卫兵神圣的天职。造反、造反、造反——乃是我们阶级的真理，斗争的哲学。

红卫兵绝大部分出身于工农兵家庭，要说血液里天生就有革命的因素，那就是扯淡！要说在斗争中锻炼成铁骨红心，那是真理！前辈的光荣固然不等于我们的光荣，前辈的革命传统，我们必须继承。革命的担子再重我们也要接！接过艰苦奋斗，流血牺牲的担子。

红卫兵中也有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他们是资产阶级的叛子逆孙。他们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斗争中，只要他们敢于和家庭划清界线，努力改造思想，清除剥削家庭的烙印，也一样能锻炼成无畏的战士。

红卫兵不是唯成份论，更不是无成份论。老子——革命前辈，儿子——革命下一代，老子英雄儿好汉——长江后浪退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红卫兵组织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组长、副组长的产生由群众选举，不称职的可以随时撤换。红卫兵贯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

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术。

内部的问题要摆到桌面上谈，充分发表意见后采取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处理。

红卫兵组织一切活动围绕斗、批、改三大任务进行。目前狠抓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阶级教育这两条。

红卫兵坚决贯彻党中央指定的一切方针政策。

附中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

这是广州地区第一个真正冠以“红卫兵”名称的学生组织。虽然宣言中声称欢迎与家庭划清了界线的剥削家庭子女加入红卫兵，但实际上，这个组织是一个红五类组织。附中红卫兵有一个外围组织，叫红卫星，“资产阶级的叛子逆孙”可以加入这个外围组织。

华附还有一群同学成立了第二个红卫兵组织——南海红卫兵。杨小村在回忆录中记述：“同学们推举我，为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命名。我说：‘毛主席住在中南海，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就叫中南海红卫兵。同时，我们位于祖国的南海，我们红卫兵就叫华师附中南海红卫兵吧！’” [2]尽管杨小村声称南海红卫兵比附中红卫兵温和、保守，但从南海红卫兵的一份宣言来看，他们比附中红卫兵更为激进地宣称：“我们都是‘红五类’的子弟，我们是天生的旧世界的造反者！”南海红卫兵也有自己的外围组织叫红外围。南海红卫兵成立伊始，即发出夺权命令：今天，我们宣布：班内过去的一切组织，什么团支部，班委会、班代表小组、民兵组织……统统解散！

一切权利归彻底革命的“红卫兵”要武小组！

我们从今天起接管一切！我们将根据阶级斗争的需要逐步重新建立各种组织。

南海红卫兵的诞生比附中红卫兵稍迟，但一成立就宣布接管权力了。在附中红卫兵成立的第二天，接到来自八一中学的“贺信”。八一中学也是军干子弟萃集之地，当时还没成立红卫兵，但已经跃跃欲试了。

全体“红卫兵”的同志们：

我们来你校听了两方面的意见，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真理永远在革命者一边！天下是我们父母打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的天下，不许我们讲话难道让资产阶级讲话？！不让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难道让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不成？！

这办不到！我们革命干部子弟都应向“红卫兵”学习，听毛主席的话，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造一切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反！全无敌！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平常儿骑墙！

老子反动儿混蛋！

重在表现！

广州八一中学

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八一中学战友们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红卫兵们十二万分拥护这张大字报！”附中红卫兵在给八一中学的复信中，志高气扬地宣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

——革命先辈！儿子——革命后代！长江后浪推前浪，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谁咒骂这句话，谁就是站在杜勒斯的立场上去了！这张大字报革了无成份论的命！”

省市委一直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中学的校际串连开始了，而他们手上却没有可以出的牌。

8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百万红卫兵，他指出：“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5]林彪号召全国红卫兵“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即“四旧”），誓言“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

当晚，第一批北京红卫兵到达广州串连，他们是北京师范大学的13名学生。此后，陆续有北京红卫兵南下。据省委文革办公室的一份材料声称：

截至9月7日止，北京和外省到广东来的学生人数先后共达一万二千多人，其中北京来的七千多人……北京一〇一中学来广州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28日至9月5日止，陆续来了五批65人，他们分成13队，分散到各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进行活动。

这些北京红卫兵先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等高等院校，进行巡回演讲，介绍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垮黑帮”的经验。

8月20日，北京十六中的五个红卫兵到达广州，市委安排他们在越秀宾馆住宿，但他们却一口拒绝，宣称他们来广州的目的，是帮助建立红卫兵组织，所以不愿住宾馆，希望能到学校去。市委介绍了几间学校的情况，最后他们选定了到八一中学。

八一中学对北京学生非常欢迎。大家连夜召开座谈会，北京红卫兵运动的风起云涌，听得广州学生们热血沸腾。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就在北京学生的推动下，连夜成立了。

在八一中学红卫兵的成立宣言中，提出红卫兵应以革、干、军、革烈、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为主，但还应吸收一些出身于非劳动家庭的同学，只要他们能背叛剥削阶级家庭，为群众公认表现好的，也可以吸收。

8月22日，二中一批革干、革军子弟在一片“自来红万岁”、“自来红们站起来”的呼号声中，成立了该校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紧接着，从愈来愈多学校里传出红卫兵成立的消息，人心大振，生怕落后。北京红卫兵跨省跨市来串连，我们在市内跨校串连又有什么不可？八一中学是最先走出校园，进行校际串连的学校之一。红卫兵成立后，马上着手筹备全市性的红卫兵联合组织。他们串连了华附、二中、六中、八中、二十一中、执信女中等16间中学，发起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临时总部。

在参与筹备的学校中，没有广雅中学。广雅的情况一直比较特殊。8月初，各校的工作队已成“过街老鼠”，忙着准备撤退了，但广雅工作队8月2日还在召开核心小组长会议，布置斗争“走资派”和“牛鬼蛇神”，8月5日、6日连续两天召开批斗老师的大会。直到撤走前夕，工作队还主持筹组“广雅中学文化革命委

员会”，甚至声称自己即使撤退，也还会担任“参谋”角色。

学校内已纷纷传言，工作队待不长了。直到市委宣布撤走所有工作队之后，学生马上分裂为支持工作队与反对工作队的两大派。反对一方贴出《十六问工作队》《我们的看法》等大字报，要求改选广雅文革委员会，清算工作队的错误。支持一方贴出《替工作队翻案》的大字报，认为工作队成绩是主要的，不能恶意攻击。双方8月10日在高三乙班课室进行了通宵的大辩论。

关于工作队的大辩论余音未消，关于“自来红”的大辩论，又接踵而来。当时在广雅中学内也贴满了那副血统论对联，8月中旬，新四级四位学生首先贴出大字报，支持对联。但马上遭到高三乙班一男生贴出大字报《自来红有点黑》，反击“自来红”论。高三甲班男生还敲锣打鼓，要求支持对联的“自来红”同学站出来辩论，但无人应战。有人在食堂贴出对联：“老子英雄儿接班，老子反动儿造反——重在表现”。

支持对联的学生组织“自来红战斗队”贴出了大字报《这是一场阶级斗争》，声称校文革会不能否定，向校文革会提意见的人“是别有用心、要夺权，对他们要实行专政”。随后又贴出大字报《共青团是修正主义的全民团》，要求团员不要佩戴团徽。在开大会时，公开勒令黑七类“滚出会场”。

直到这时，广雅还没有成立红卫兵，8月22日，工作队正式撤出广雅，同一天，有学生开始佩戴自制的红卫兵袖章，他们在校园里一亮相，马上吸引了无数艳羡、敬佩的目光。他们是一批“自来红”的革干子弟。

8月23日，广雅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旗中学红卫兵（后改名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成立，规定参加红卫兵的条件必须是出身红五类。第二天，思想兵在礼堂敲锣打鼓，公布红卫兵名单，约有500人，骨干大部分是高二级的原团干部和班干部。思想兵一成立，就在校内贴满了“顺自来红者存，逆自来红者亡”的大标语，气势凌厉，触目惊心。思想兵也有一个外围组织叫红警卫，不戴袖章，而是戴一条三角形的黄带子。不是纯正红五类的学生，只能参加红警兵。

9月上旬，广雅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这是与思想兵观点不尽相同的组织，以革干子弟为主，开始是海军的几个子弟当头，后来高干子弟退出，改以工人子弟梁**为头。

红卫兵组织一经出现，就像燎原之火一样，在广州的中学迅速蔓延开了，到9月份，广州市已有一百多间中学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已呼之欲出。

8月31日，发生了一件令省委十分担忧的事情。北京清华大学南下学生给广东省委贴了一张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内容大致称广东省的司令部——省委大有问题，要炮打司令部。

一、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

二、赵紫阳说，广东省派出的工作队虽有问題，但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现象，那么华南工学院出现群众对抗现象，责任由谁负？

三、拍照斗争牛鬼蛇神的场面，使他们颜面扫地，遗臭万年，这本是一种革命行动，但在这里却遭到意外的攻击。

四、……（大字报已丢失）

五、最近赵紫阳提出，选举筹委由各派代表组成。但筹委一定要由坚定的革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议会制。这样做，实际上就是要把保皇派、守旧派保留在筹委内阻碍运动。

北京学生是最令省委头痛的一群人，他们千方百计把火引向省市委，如果让他们操纵了广州的运动，局面一定会更加混乱，更难以收拾。省委一直考虑怎么对付这群北京学生。早在8月下旬，开过多次会议研究应付办法，最后决定尽快建立全市性的红卫兵统一指挥机构，名义上是为了解决红卫兵组织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是省市委为了掌控广州红卫兵，想利用广州红卫兵对抗北方红卫兵。

因此，当八一中学提出组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后，官方是积极支持的。李尔重从中南局带来了王任重的指示，把红卫兵定位为“阶级队伍，民兵组织”，明确红卫兵的任务是：维持社会秩序；做好保卫工作；调解纠纷；宣传党的政策。

红卫兵要在中山纪念堂开成立大会，市委二话不说，立即答应；红卫兵要求印制袖章、印宣言，市委统统予以解决；红卫兵希望有党政军领导参加大会，市委承诺陈郁、赵紫阳、吴芝圃、郭成柱、焦林义、李尔重等领导会出席；红卫兵提出不能让区梦觉、王阑西来，这两人是“镇压学生运动的”，市委马上同意不请这两个人。

其实，党政领导们都乐见总部的成立，中南局、省市委的有关人员还亲自在中南局礼堂和主义兵开过筹备会议。大会前一天，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还专门打电话给市委，催问请帖发到省委去没有，很担心红卫兵不请他们。

9月3日上午9时许，广州地区四千多名红卫兵代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广州临时总部。中南局、中共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陈郁、赵紫阳、郭成柱、焦林义等到场，并发表讲话，赞扬和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

陈郁说：“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我们一定要分清敌友，注意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斗争中，要坚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其灵魂，只有文斗，才能教育群众，才能最有效地把敌人斗臭、斗垮、斗倒。”

陈郁又说：“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你们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于革命、敢于造反。你们敢于向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开火，向一切剥削阶

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宣战。你们红卫兵的组织诞生不久，就显示了极大的威力，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整个旧世界。”

赵紫阳穿了一身军装出席大会。他说：“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要注意斗争方式，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我们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向解放军学习，坚持四个第一，大兴三八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保护人民利益，保卫国家财产。把红卫兵建设成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纪律性战斗队伍，成为人民解放军可靠的强大后备军，永远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红卫兵为他们戴上了红袖章。大会通过了广州红卫兵宣言：“谁敢反对毛主席，谁敢反对毛泽东思想，谁敢反对党中央，谁敢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要革他的命，专他的政，夺他的权，造他的反，就要和他刺刀见红。”这个宣言是八一中学的人起草的，事先给过中南局农委主任李尔重（在广州市委担任顾问）看，李尔重建议删去宣言中“狗崽子”一类字眼，但后来宣言中，只把“狗”字删了，仍称“崽子”。

不过，大会还在进行中，会场内外的本地红卫兵与外地红卫兵，已发生争执。广雅中学的思想兵 100 多人从外面冲击会场；北京一〇一中学八人，串联广州市二十一中部分红卫兵 20 多人，不听劝阻，直闯上讲台，声称“我们要造大会的反”。李尔重劝他们到后台商量，他们说：“你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硬冲上台，秩序大乱。这些人抢过扩音器，迫令大会主持人请参加大会的中南局、省委、市委负责人先退场，红卫兵留下来和他们辩论，称“大会是失败的”，“是一次修正主义的大会”。

主义兵成立时，家庭出身好坏，成为能否参加这个组织的重要条件。主义兵总指挥是华附的蔡晓彦，副总指挥杨秋元、王长林、詹和平。但后来因为蔡晓彦一直不到总部视事，实际由杨秋元主事。陶瑞、黄春阳、黄春义负责纠察队，曾克南负责政治宣传部。在总部工作的还有华附的陈立波、陈立泽，王继鸥、白少华等。总部最初设在八一中学，很快就迁到中山二路东较场旁边。

当时在市委与主义兵之间担任联络员的市委干部，后来写了一份材料，详细介绍了市委对主义兵是如何重视的：

临时总部筹建期间，本来只有一个干部负责做联络工作，临时总部一成立，（市委）书记处就决定成立红卫兵联络组，调来一名局级干部以文化革命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兼联络组组长，还配备两名处级干部任副组长。这个组直属专管财贸战线的书记杜祯祥亲自领导，要钱要物，只要他大笔一挥就马上办到。

9月中旬，总部在东、南、西、北片成立分部或指挥部，为了对口控制，杜祯祥指定各片接待站（由原分团改头换面而成）也相应设立红卫兵联络组，并由原来的分团长任组长。

为了取得控制红卫兵的经验，9月底还专派一名干部陪同总部组成的北上参观学习团到雍文涛那里取经。10月初取经的干部回来，书记老爷仿效北京的“经验”，

把各片的接待站改为红卫兵联络站，并拨给一批物资和现款，以便“接待”红卫兵。

北京的红卫兵有着一种本能的政治敏感，马上嗅出主义兵有“御用工具”的味道。9月4日，首都东方红大学（原科技大学）“南下革命造反派”，散发了一份题为《揭穿一个大骗局》的油印材料，指广东省委利用红卫兵大会，“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想利用毛主席的莫大威望，利用红卫兵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建立的伟大功勋，施放烟幕，迷惑群众，转移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掩护省委过关”。

他们质问，为什么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大会，且接受红卫兵的袖章呢？“广东省委想把自己与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相提并论，以此说明自己是代表党中央，代表党的领导”。他们发出震撼人心的号召：“广州的红卫兵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应该走出学校的大门、机关的大门，炮轰司令部，火烧广东省委，火烧广州市委，这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

他们说的也不完全是捏造。主义兵临时总部确实从省市党委得到许多支持，包括金钱与物资的支持。主义兵前期的整个活动费用，包括租金、活动经费以及汽车、摩托车、单车等（据称有近二十辆单车，十几辆摩托车和几辆汽车），全部都由市委拨的。甚至有些军衣，都是他们从军队里拿来给他们的。他们的所有开支费用，全部找市委定时报账。临时总部成立后，市委专门成立一个红卫兵联络组，负责协调与红卫兵的关系，协助解决红卫兵的问题。在市委干部的材料中记载：红卫兵联络组成立以后，并没有按照总理提出的三项任务办事，即支持帮助、爱护保护、宣传解释政策，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物质供应站。杜祯祥先后拨给红卫兵联络组三万元，都花完了，其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临时总部和各分部共花了四千三百九十元（包括印刷袖章、房租、水电、办报纸、办公费用等等，他们自己从破四旧仓库借用的物资未计在内）。当时为了讨好总部，凡提出的要求都予以满足，在国庆节期间，还前后借给摩托车十五部（有六部因无灯退回原单位）。这个问题引起了社会议论，杜祯祥不引为教训，不顾干部反对，在去年（1966年）秋季交易会时，又借给摩托车及电动单车各一辆。为了给总部找办公用房，书记们还专门研究，由联络组组长四出奔忙了三天。

这份由联络员写的材料还说，市委并不是对主义兵才如此慷慨，对其他群众组织亦复如此。11月份以前成立的中学生全市性组织，一般的都给解决房子、自行车、电话、办公用具和现款。11月份以后，由于有干部反对，才只解决袖章、印章、宣传用品了。

但如果市委希望通过建立全市性组织，对中学的红卫兵运动予以控制，那么，很快就会发现此路不通了。因为事实上，临时总部控制不了各个中学的红卫兵，它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部，召集各校主义兵开个大会，组织个游行示威什么的，还是可以的，但各个学校、各个小组的行动，它就鞭长莫及了。

省委在中学成立主义兵临时总部后，希望把这个方法推广到大专院校。9月14日，赵紫阳把高等院校的一些红卫兵负责人召集到省委开会，商谈成立红卫兵联络总部的事情。赵紫阳在大学生中，看中了两个人，一个是华工的高翔，一个是

广工的易作才，觉得这两个人有号召力，有组织力，是把高校红卫兵统一起来的理想人选。

高翔的态度是摇摆不定，他由于经历过《北京来信》事件，对省委有一些看法，至今还没完全从事件的阴影中走出来。易作才没有经过高翔那种风波，他是一位学生党员，思想十分正统，对上级、对组织毫不怀疑的人。当初他在广工造党委书记兼副院长郭大同的反，也是听从工作队的安排，属于典型的“奉命造反”。他的老朋友王树群评论他：“易作才这个人是比较守规矩的，赵紫阳不倒，他就相信省委；省委不行了，他相信军区。他心目中总是要有一个领导。”因此，他把赵紫阳的要求视为“党的需要”，马上答应。

两人的性格、经历与思想如此不同，合作筹建联络总部，肯定话不投机。高翔的态度若即若离，没有实际参与，易作才独力把它勉强建起来了，9月13日，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联络总部成立，设在泰康路一幢旧楼里，但基本上空置的，平时没有人上班，也没人当它存在。不过，经过筹建联络总部，易作才与其他院校的红卫兵有了更广泛的接触，产生了建立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的想法。

在中医学院事件中，广工与广医、中医学院本来就有一段“战斗情谊”，大家一商量，都觉得这事意义重大，表示愿意共同进退。于是，由易作才联合了广州医学院、广州中医学院、中南林学院、中山医学院等高校，在联络总部的基础上，筹备成立“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总司令部”。

10月28日，以广东工学院红卫兵为首，联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南林学院总部、中医学院三〇一总部、广州人民教育学院红卫兵、中山医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大队、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东艺专东方红等10个组织，联合成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一司”），人数约1.5万。以广东工学院学生易作才、中南林学院黄朗秋、中山医学院学生洪祥发等七人为常委。总司令下设宣传部、组织部、指挥部、联络部、中学部和办公室。刚成立时在泰康路原红卫兵联络总部的地方办公，后搬到广东工学院内。

“当时，”身为一司常委的王树群说，“成立的宗旨就是，第一批判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就是揭开广东两条路线斗争的这个盖子，是不是忠于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省委可不可靠，要经过大揭发，大批判，找出答案。”当时盛传一司开始筹建时，高翔的华工红旗是有参与的，但省委觉得高翔没那么听话，暗中叫易作才把高翔排斥出去。于是，易作才“借着广工当时在社会上的地位，暗中拉了一批人，操纵会场，竟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把华工红旗驱逐（出）一司”。

王树群在后来的回忆中，否定了这种说法，他说不是踢了高翔出局，而是华工想自立门户。当时《北京来信》不仅仅在华工引起很大的反响，而且整个广州的大专院校都受到影响，人们对高翔还是很敬佩的，不可能主动把他踢出去。

11月4日，一司在东较场首次召开揭发批判赵紫阳大会。据一司自称：“11月4日下午，赵紫阳‘主动要求检查’，在会上我们发现赵紫阳是在假检查，故我们上台造其反，不让他再‘检查’下去了，把这个会变成揭发、批判赵紫阳罪行大

会。”

一个星期后，11月12日，一司又串连广州三司、首都三司，在东较场召开有四万人参加的“广州地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揭发批判广东省委。11月25日，在自办的小报《广州红卫兵》上，发出了“炮打广东省委，火烧赵紫阳”的动员令。一司自称，“这是广东省最早向赵紫阳开火的。”

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比一司晚了两天成立。二司是以中山大学红卫兵兵团、华工红卫兵心向党大队等组织为核心，负责人是原广东学联主席、中大学生会主席卓凤仪。其观点是保省委、保赵紫阳的，认为对工作队不能完全否定。总部设在六榕路。由于原学联成员分布很广，二司一度号称是广州最大的红卫兵总部。

卓凤仪的个人经历是一出悲剧。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卓凤仪作为广州代表上天安门，陶铸与他相识，安排卓凤仪把红卫兵袖章献给刘少奇。他没有宋彬彬幸运，献袖章之余，还被领袖赐名“要武”，刘少奇被打倒后，卓凤仪莫名其妙成了“刘少奇的马前卒”、“保皇派”，受到各种攻讦，一直郁郁不得志。二司保省委立场过于鲜明，当省委被夺权后，二司便陷于被动，不得不宣布解散了。

11月1日，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简称“三司”）由华工红旗牵头组织成立。人数近两万，本部下设10个部：政治部、组织部、宣传部、后勤部、联络部、接待部、工人部、农民部、中专部、中学部。属下兵团、战斗队等组织50多个，14个大专院校学生组织，8个工人组织，1个农民组织，26个中专学生组织，10个中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是华南工学院学生高翔，曾在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还有广东工学院学生曾涛、华南工学院学生陈新伟、吴开东、华南农学院学生李东、暨南大学廖才泉等人。

至此，广州红卫兵的各大总部，都相继成立了。这个夏季似乎格外漫长，虽然立秋已过，但气温仍如燃烧般火热。舞台已经搭好，灯光已经亮起，红卫兵，以他们独创的时代形象——身穿绿军装，腰扎武装带，臂带红袖章，挟着风雨雷电，挟着青春烈火，正式登上舞台，开始谱写它的历史了。

广州破四旧狂潮

8月是一个经纬万端的月份。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广州和全国一样，刮起了破四旧的旋风。这股旋风并非单纯的移风易俗，而是伴随着普遍的抄家、没收财产、焚书、批斗、打人、把“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赶出城市，在8、9月份，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恐怖。

很多人事后都想不起来，广州到底是从几月开始有抄家、打人的情况，一般以为是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做了关于破四旧的讲话以后才有，其实早在7月就开始了。最初是在校园内抄教授的家，设立牛棚，关押老师和同学，后来发展到校外去打、砸、抄。

中大学生7月份就到离学校不远的纯阳观破四旧了。当时工作队还在，对学生的行动是支持的。工作队队长杨行说，要让工作队组织的阶级队伍，去见见世面。于是数力学和物理系的几十个学生，跑到漱珠岗的纯阳观“见世面”去了。这座始建于1824年的道观十分破败，没什么东西可砸，学生们把唯一一座丘处机像砸了，然后用封条封了山门，把道士统统赶走。

7月2日，省委决定撤销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田蔚（她是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夫人）的一切职务。中大学生在田蔚被公开点名批判后，便组织对王匡、田蔚家进行抄家。当时王匡的女儿在中大读书，是中大大文革筹成员。据说，抄王匡家是由文革筹组织的，卓凤仪从省委开会回来布置，因为中大对田蔚问题要表态，否则文革筹会受其女儿拖累，抄王匡和田蔚的家，是为了表明中大支持中南局、省委对王匡和田蔚的处理。

在抄王匡家时，发现了一张集体照片，上面有王匡和中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李普，照片背面注明每个人的名字，但其中两个人没写名字，只写了“报务员”和“译电员”。学生怀疑这是一张特务成员的名单和照片，于是又去抄了李普的家。

到8月中旬，抄家已发展成全市性的行动，波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当红卫兵的队伍气势汹汹地出现在大街小巷时，杂沓急遽的脚步声，由远而近，伴随着高亢刺耳的口号声、唱歌声，让人心惊胆战，不知祸临谁家。恐怖弥漫全城。

抄家是破四旧的形式之一，家里的金银财物、古董、字画、书籍、传统艺术品，都列入封、资、修之列，或砸烂、或焚烧，或没收。破四旧的另一种形式，是改名，给学校改名，街道改名，商店改名，凡是看不顺眼的名称，都要改。8月15日，华师附中的七名学生在永汉路（今北京路）广州皮革工业公司供销经理部门口贴出了号称“全市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社会上公开张贴），指责他们用10尺长的大皮鞋做商业广告是“资本主义的经营典型方式”。

紧接着，8月17日，十六中高三（3）班十几名学生也走上永汉路，在“全市闻名”的美利权冰室门口张贴大字报，“批判其崇美亲美的奴才思想和严重的地方色彩”，并贴了一副对联：“美利权奴颜婢膝多可耻，新中国光芒万丈放风华——破旧立新”。在红卫兵监督下，把“美利权”招牌拆下来，换上“新中国”店名。红卫兵勒令他们要彻底改变经营的旧思想、旧方式、旧态度，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

《南方日报》的报道说：“永汉北路‘美利权’冰室的店名，是‘美利坚’的译音。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不共戴天的死敌，可是以美国译音为名字的臭招牌，

竟然在市中心悬挂了十七年。广州市十六中高三（3）班和高二（2）班的革命小将们，义愤填胸地在这间冰室贴了大字报，坚决要求把这个奴才相十足的招牌砸碎。在他们的推动下，该店职工已把旧招牌废除。”

另一批十六中高二学生也跑到中山四路，给高级理发店“一乐也”贴大字报和“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对联，斥责他们专为牛仔、牛女、“大人物”服务，把工农兵拒之门外的金钱挂帅的资产阶级思想。当场把旧店名拆了，换成“新风理发店”。

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皮鞋事件、美利权事件、一乐也事件。这三大事件比北京红卫兵走上街头大破四旧更早，首先在广州点燃起横扫四旧、大立四新的熊熊烈火。

由此可见，破四旧运动在广州的兴起，实早于林彪的8月18日讲话。而林彪讲话则把这种疯狂的破坏活动，推到了一个高潮。华师附中红卫兵向全市红卫兵发出倡议，掀起一个“破四旧”的集体行动高潮。各校红卫兵一起行动，用分片包干、重点搜查的办法，向市内所有名胜古迹、寺观庵堂、文化遗址，进行全面扫荡。

市文化局宣布撤销古海遗迹、南海神庙、九曜石、大司成牌坊、海瑞牌坊、南朝砖墓、绍武群臣冢、王兴将军墓等文物保护单位；对名胜古迹、寺观庵堂“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文字、绘画，一律进行清除。

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啸聚街头，到处张贴标语、传单、大字报，集会演说。8月25日、26日，红卫兵和部分群众一声呐喊，先后扫荡了教堂、寺庙49处，包括历史悠久的天主教石室教堂、光孝堂、寺贝通津教堂；佛教的六榕寺、光孝寺、华林寺、海幢寺；道教三元宫；伊斯兰教怀圣寺等。市内多处历史文物遭到破坏：海幢寺的四大金刚被毁坏；华林寺的五百罗汉被捣碎；伊斯兰教的“先贤古墓”被铲了一半；全市的“封建迷信场所”统统销声匿迹，各种神品付之一炬。宗教活动全部停止，神职人员也不能避过尘世的浊浪，一时间，揪斗的揪斗，关押的关押，还俗的还俗，落得个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的收场。

位于一德路的圣心大教堂（俗称石室）也被砸了。红卫兵把从教堂里搜出来的书籍、衣物、宗教器皿和画册，堆放在教堂前的空地上，放火焚烧。在教堂哥特式建筑的巨大窗口上，原装的拿破仑时代的彩色玻璃，被砸得稀烂，碎片散落一地。唱诗台上的脚风琴也被大卸八块。红卫兵们把神职人员押到空地上斗争，逼他们跪在烧书和物资的火堆前。焚烧后的纸灰漫天飞舞，直冲云霄。

在砸了石室之后，因为珠江电影制片厂想拍纪录片，红卫兵又把上次抄、砸、烧、斗的场面重演一遍，以便拍摄。其后，石室做了主义兵堆放破四旧抄家物资的仓库。市人委派人来帮助清点物资，造册登记。

8月28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的自由神像也被红卫兵砸毁了。参加这次行动的有华工八一八红卫兵和一些中学的红卫兵、北京红卫兵，共近千人，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开批判会，宣称自由、平等、博爱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今天绝不能再毒害人民。然后七手八脚就把纪功坊上的自由神像砸个粉身碎骨。红卫兵还在大街小巷设立哨卡，拦截路人，检查他们的裤子是否太窄，头发是否

卷曲，妇女是否涂脂抹粉。凡是被他们认定属于资产阶级的衣服，一律当众用剪刀绞烂，或泼上墨水；抹了发油的头发，或扎了长辫子，也成为攻击目标，红卫兵们一哄而上，七手八脚，把他们的头发剪成一窝乱草，再当众训斥一番，方可放行；皮鞋不能太窄，也不能太尖，窄和尖都是生活糜烂和颓废的标志。人们除了军用皮鞋之外，什么皮鞋都不敢穿了，满街都是胶底布面的解放鞋（即仿军鞋）；“革命青少年要向解放军学习”，《人民日报》号召。于是，衣服的式样和颜色、帽子、鞋子、发型，以至书包，都得向军队看齐。所有自行车的车把上，都得安装毛主席语录牌，否则就会被红卫兵罚背毛主席语录。广州南方服装厂职工贴出大字报，表示不做奇装异服，大字报写道：

红卫兵、革命学生们：你们在当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正在冲破种种阻力，横扫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是一件大好事。好得很！我们全体革命职工、革命干部，誓做你们的后盾，坚定地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决不做奇装异服，大做革命新装，努力做到下面几点：

一、大破资产阶级的审美观点。二、树立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三、坚决不做以下几种服装：1.不做不符合工农兵要求的一切奇装异服。2.不做封建迷信的寿袍及封建结婚礼服。3.不做贴身、窄脚、无领、无袖、高领、浅裤裆、窄裤脚等服装。

参加破四旧的，不仅仅是红卫兵，工人、街道居民都参与了。广州机电厂工人梁锦棠回忆：

到运动初期，破“四旧”的时候，学生涌起来了。他们出现了红卫兵，我们工厂的半工半读也成立了红卫兵，那天邀请了我 and 党委书记参加他们的成立大会。但第二天，我们也宣布成立工人红卫兵，把原来的工人宣传队全部变成工人红卫兵，我们也戴红卫兵袖章。那时开始破四旧了。我们（厂里）原来也有资本家、地主婆、旧的国民党军官，诸如此类的“黑七类”，学生已经搞起来了，我们和半工半读的学生混合编队，他们是很听我们的，因为大家都在一个工厂里，工人是他们的师傅，所以他们很尊重我们。

我们叫他们一起去（破四旧），实际上的意思是怕他们乱来。现在回过头看，有些情况是比较乱来的，但工人和学生一起去就做得比较规范一点，没有打打杀杀，我们是比较斯文一点。“你有没有外币？有没有金银首饰？自己拿出来。”基本上是采取讲道理的方式，没有打人。但确实抄到资本家很多金，有些藏到井里，也捞了上来；有些放在花盆里面；有些藏在墙隙里。我们通过做工作，都找出来了，不然鬼知道他放在哪里？

在我经手的——不是我亲自经手，是我的属下一——最重手（下手最重）的是在人民中路，靠近儿童医院住的那个资本家，有人说他态度不好，用绳子绑个寿星公，要他背着在人民路兜个圈。那天我回到厂，人家告诉我。我说下次不要这样搞了，他年纪大了，万一晕过去倒在地上，就麻烦了。

8月18日，广州中药总厂所属九间药厂的工人和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向所属各厂职工发出信件，建议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一、坚决把一些还保留资本家的名字和资本家宗族堂号的工厂名号全部更换新名。二、各厂门前批荡的厂名、橱窗，凡是有资本家名称、堂号和封建色彩及资本主义的宣传装饰，立即废除。三、产品的包装装潢，凡是有资本家名字和黄色毒素的立即停止印刷、使用。四、通知本市及外地有关单位，立即拆除或更改本厂在市内

外设置的有毒素的广告牌、霓虹光管、橱窗广告等。

红卫兵热衷于为街道、医院、公园、酒家和工厂、商店换上新名字。8月25日，广州市中心主要马路永汉路改名为北京路。1000多工人、干部、学生和街道居民，拿着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牌、《毛泽东选集》模型，扛着红旗，在北京路上载歌载舞游行，庆祝街道改名。经市人委批准同时改名的还有：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统一改为人民路；长寿路改为曙光路；朝天路和米市路统一改为朝阳路。9月18日又进行了第二批改路名，包括：

- 一、光明路（原光复南、中、北路）。分南路、中路、北路。
- 二、秀丽路（原恩宁路、第十甫、下九路、上九路、大德路）。分为三段，原恩宁路、第十甫为一路；原下九路、上九路为二路；原大德路为三路。
- 三、向阳路（原龙津西、中、东路，惠福西、东路）。分为五段，原龙津西路为一路；原龙津中路为二路；原龙津东路为三路；原惠福西路为四路；原惠福东路为五路。
- 四、新风路（原如意坊东路、时敏路、多宝路）。
- 五、荔湾路（原宝华路、华贵路、荔湾东路）。分为三段，原宝华路为南路；原华贵路为中路；原荔湾东路为北路。
- 六、红云路（原白云路）。全路不分段。
- 七、延安路（原大南路、文明路、东华西、东路）。分为四段，原大南路为一路；原文明路为二路；原东华西路为三路；原东华东路为四路。
- 八、沿江路（原西堤、长堤靠江边的一段、新堤、南堤、八旗大马路、东堤、大沙头的滨江路）。全路分为三段，第二海珠桥以东至海珠桥以西为一路；海珠桥以东至东濠涌铁桥以西为二路；东濠涌铁桥以东至原大沙头的滨江路为三路。
- 九、教育路（原教育路、吉祥路、莲塘路、应元路东北段）。全路分为两段，原教育路为南路；其他为北路。
- 十、广州起义路（原维新南、北路）。不分段。
- 十一、东风路（从西村电厂河边起沿德泥路、德宣西、中、东路接新开路至天河机场与中山路汇合点止）。全路分为五段，西村电厂河边至人民路以西为一路；人民路以东至教育路以西为二路；教育路以东至越秀北路以西为三路；越秀北路以东至执信路以西为四路；执信路以东至天河机场中山路汇合点为五路。
- 十二、红书路（原天成路、诗书路、纸行路、光孝路）。分为三段，原天成路为南路；原诗书路、纸行路为二路；原光孝路为三路。
- 十三、立新路（原德政南、中、北路）。仍按原路分南路、中路、北路。
- 十四、登峰路（原仓边路、小北路、登峰路至环市路口止）。分为三段，东风路（原德宣路）以南为南路；东风路以北为中路；原登峰路为北路。
- 十五、解放路（原解放南、中、北路，大北路以及广花公路三元里与机场路分岔口以南为止）。分为三段，原解放南路仍为南路；解放中路仍为中路；解放北路、大北路一直至终点为北路。
- 十六、向群路（原同福西、中、东路）。分为二段，原同福西路江边至福场路以西为一路；福场路以东至河南中路以西为二路。
- 十七、跃进路（原河南中路）。不分段。
- 十八、前进路（原小港路东段及云桂路）。不分段。
- 十九、革新路（原凤乐路、金沙路）。不分段。

二十、群众路（原高第路）。不分段。

据统计，红卫兵把全市 89 条马路，合并为 24 条，换上了新名字。

全市有 2300 家商店被改名。在北京路上，触目皆是“东方红”、“太阳升”、“新文化”一类商店招牌。名闻省港澳的酒家陶陶居改为东风楼，蛇王满改为卫红饭店，泮溪酒家改为友谊饭店，华侨大厦改为东风大厦，平安大戏院改为前进剧院，保滋堂、陈李济药厂改为广州中药一厂、二厂。中学也纷纷改名，广雅中学改为红旗中学，华师附中改为东方红中学，执信女中改为红女中，建联中学甚至改名为红卫兵中学。

以消灭私有制为己任的红卫兵，强烈要求取缔小商小贩，并向小商小贩发出强硬通牒。为此，市委批转市财委《关于迅速取缔小商小贩并安排其出路的请示报告》。全市共 3.6 万个小商小贩，根据不同情况，作出转街道服务站、新组织合作商店或插进合作商店、收回牌照和取缔等几种处理。

饭店不再有服务员，顾客统统要实行“自我服务”，自端饭菜。红卫兵还倡议废除收房租、拿定息。广州市的脚踏三轮客车，一度停止载客。养金鱼、雀鸟和猫狗宠物，统统被斥之为“封、资、修”。他们闯入民居抄家，把名贵的酸枝木家具砸烂；把花鸟鱼虫的国画和线装书投入火中；把金银首饰当成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证据，拿去公开展览。

文革前流行的歌曲，绝大部分，被斥为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唱片被红卫兵从商店货架和人们的家中取走，用锤子砸烂，用脚踏碎，扫入了垃圾堆。“千言万语同一声，千歌万调同一曲，支支颂歌飞北京，歌颂领袖毛主席”。作曲家劫夫谱写的毛主席语录歌《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风行全国，成为群众集会、游行的必备节目。

9 月 4 日，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破四旧总行动日。整个广州沸腾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省委在同一天决定，撤消省文化革命小组，文化大革命由省委直接领导。翻开 9 月 4 日的中南局机关报《红卫报》，一个触目惊心的大标题，扑面而来：《广州红卫兵今天广泛出动大张旗鼓宣传十六条，掀起更大更猛烈的破“四旧”立“四新”革命风暴》，报道了这天广州的情况。

红旗中学的红卫兵们，高唱着《革命造反歌》到街头宣传。他们的宣传车，到处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宣传车在永红肉菜市场前停下来时，许多正在买菜和过路的人，马上围着宣传车，高呼“向红卫兵致敬”、“向红卫兵学习”，还跟着红卫兵一起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革命歌曲。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太婆拿到传单之后，激动地说：“革命小将太好了！将神啊鬼啊统统横扫清光，我要向他们学习，今后再也不拜神拜佛了。”一辆路过的肇庆专署的货车也停下来，司机跳下来向红卫兵要了一份传单，说要回去宣传。

从外地来广州串连的红卫兵，在破四旧运动中，也起了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北京邮电学院红卫兵战士们，根据目前广州市服务行业存在的问题，有目的地进行宣传，并提出了全市饭店、旅店等一切服务行业，必须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悬挂毛主席画像，和张贴毛主席语录；要面向工农兵，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的经营作风等措施，深受群众的赞扬和支持。

破四旧的运动，很快由街头闹剧，转向千家万户，登堂入室，一直破到了每个人家的床头灶头，这时再也不是闹剧，而是一幕幕悲剧了。

8月30日，广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欧阳山的家被抄了，所有稿件、书籍、资料、书信、衣物、家具，统统被抄走。据红卫兵公布的资料，他们从欧阳山家抄走了：24条毛毯、23箱衣服、22顶帽子、39双袜子、三部收音机、一部电视机、一部照相机、九块手表，116块布料、26捆毛线，还有65个衣架。[2]连衣架也被作为“四旧”物品，拿去公开展览。9月，又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批斗欧阳山的六千人大会。据称，“来他的家里搜去全部重要资料、对他进行残酷殴打的，是一股来自北方的‘红卫兵’。”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节在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集中劳动，下午送书籍、文件、唱片等物至筹委会。理发。又送历史系书物两批。晚十一时半，有同学两批来封存书物至夜分一时。”9月1日的日记又写道：“物理系同学又来查封书籍、陈设。下午小组学习。晚写检讨交代一段。做高帽一顶。”抄家抄到半夜，这个系抄完别的系再来抄。抄完再抄，斗完再斗。这种情况，在大学里几成普遍现象。

被抄家的还有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市卫生局副局长姚碧澄，一位毕业于法国里昂大学的医学博士，1941年在昆明创办“碧澄医院”，1950年代主持研究治疗胆绞痛、脑血管疾病的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具有领先水平。红卫兵在他家抄出“碧澄医院”的旧匾，成为“妄想变天复辟后重开‘碧澄医院’”的罪证。在批斗会上，姚碧澄一直倔强地不肯认罪，但后来一位非常亲近的亲属也上台斗他，他立即完全崩溃了。8月24日，姚碧澄在流花湖投湖自尽。

居住在光孝路型仁里的卢洁峰，当时只是一个小学生，她清楚地记得光孝堂（位于光孝路的基督堂）被红卫兵查抄、焚书的情景。她描述道：

一天早上，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光孝堂出事啦！于是，我就跟着几个小孩子冲过马路，进入教堂。只见到处是身穿淡黄色旧军装，腰扎武装带，左臂套一个十分宽大的红袖章的主义兵。他们把教堂全部图书都抄到教堂前的小广场上，有的人干脆就从教堂二楼的外廊向下方的广场直接抛书。书落满几乎整个小广场，堆成一座5—6米高的书山，正在冒烟、燃烧。

后来，住在公理坊（位于光孝堂北侧）的同班同学刘卓告诉我：那天清晨大概5点半钟左右，一班主义兵冲进公理坊10号地下黄牧师的家，抄家，批斗。另一班主义兵则冲进光孝堂。首先推倒门口那两座石狮子。在其中的一座石狮子底下搜出光孝堂的屋契，以及董事会的捐款名单……

那天在教堂里，我亲眼看见主义兵如何粗暴地抄黄牧师在教堂二楼的办公室。主义兵用木棍不断敲击墙壁，终于从夹墙中掏出一条用蓝色缎子紧紧裹住的像软蛇状的黄金长条。主义兵拆开看，原来这条“蛇”，是用分币大小的金币叠裹成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黄金……

黄牧师办公室的屋里堆满了被主义兵抄出来的布料、丝绸、服装和一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金属用品。我亲眼看着这些主义兵剪烂那些新布料、服装；看着他们砸烂礼堂里的风琴、书柜……反正什么都可以做（砸），无人敢劝阻。

“光孝堂的书山烧了两天两夜。”卢洁峰说，“大块大块的没有烧透的纸灰，随风飞过光孝路，飞到我们家的小院子里（位置就是西门口捷泰广场停车场的底端）。纸灰还继续飞过我们家楼顶，飞向祝寿巷小学的后花园，飞向更远处。从来没有见过这景象！”

主义兵严厉警告居民，谁不自觉地破四旧，小心他的狗头！在光孝堂附近，许多街坊都是基督徒，陷入了极大的恐慌之中，纷纷自动把家里的书烧掉或卖掉。卢洁峰家里有很多古老的线装书，还有各种碑帖，也一把火烧掉了。她妈妈有一套小说《金陵春梦》舍不得烧，用木糠藏起来，后来还是被烧掉了。

9月3日，北京南下的部分红卫兵，联合广州十几间中学的红卫兵，大闹华侨新村。他们搜查了原广东省副省长黄洁（归侨）等四户人家，全部没收了华侨资本家曹冠英的财产，装了九大车运走。他们声称，华侨新村是“小香港”，要大举清扫。

北京一〇一中学的10名南下学生，向省委递交“最后通牒”，要求在省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和在《南方日报》刊登。“通牒”声称：一、一切私营、公私合营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在明天（5日）上午立即封门，否则后果自负；二、广州市委立即把私营、公私合营国有化，同时要马上妥善安排市场，如果影响人民生活，要承担责任；三、一切旧商标、旧商品、旧招牌立即毁掉，否则格砸勿论，拿你们问罪；四、一切国营企业必须立即断绝与非国营企业的任何关系；五、一切收旧货的国营企业，立即停止收购具有封、资、修色彩的东西，如旧书、首饰等，要一律没收，决不允许坏分子投机；六、40岁以下的人，要戒烟、酒，商店出售烟酒要严格控制，烟酒工厂也要有计划地少量生产。

佛山青年粤剧团9月5日在广州文化公园文娱剧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和广州八一中学100多名红卫兵，在演出中途，突然跳上舞台质问观众：“你们搞好了文化革命吗？怎么有时间看戏？”“看戏是小市民习惯，要扫除。”观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有些人想走，又被喝住：“革命的留下，不革命的滚蛋！”就不敢走了。一些小孩被吓得哇哇大哭，妇女求情说家里还有小孩，才准许妇女、儿童离开，男的全部留下开斗争会，叫全剧团自报成份，红五类站左边，中间阶层靠边站，黑五类“滚蛋在一堆”。演南霸天的演员司马剑琴太老实，自报黑五类，编剧本放过毒，马上被红卫兵揪出来开现场斗争会，要观众检举揭发。观众都不知情，闹到深夜两时，群众纷纷求情，工人早上6时要上班，农民路远要回家，这才宣布散会。当天（6日清晨）司马剑琴触电自杀，幸被救回。

被抄家的还包括大量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干部、工人和市民。

据报纸报道，市二十九中的“赤卫军”，把海珠区一个“钻进工厂的日本侵略者占领时期的女汉奸”揪了出来。三十五中的红卫兵，在仁济路揪出了一个“不法资本家”，据说，“解放以后，这家资本家仍然靠剥削工人和定息收入，过着奢侈的寄生虫生活。红卫兵在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拿出了这个藏在暗角里的不法资本家的变天账：一叠叠的屋契、地契和账簿，这个资本家还把这些屋契和地契，用小胶卷全部拍摄下来，藏在手指头那样大的金属盒子里，妄图有朝一日算账变天。”

省财政厅一位科员，据红卫兵宣称，在他家搜出田契34张、土地所有权状78张、房、地契18张，还有高利贷契、穷人的卖身契、国民党债券等物。华侨特种商店供应公司一位机要秘书，被红卫兵抄出“大量反动证件、契据、账本”等。广州钢铁厂一名钳工也被抄出“大量变天账、反动证件、反动诗词、手摇发电机、军事望远镜，及空军军用物一批”。这些都成了“反动本性不改，对党对社会主

义怀有刻骨仇恨，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证据。[8]这类报道，报纸上连篇累牍。

据不完全统计，红卫兵，主要又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 8 至 9 月底破四旧的战果下，搜查出：

变天账：35000 件	反动证件 850 件
反动旗：76 幅	反动军服：一大批
反动纸币：42 立方	反动书刊：135 吨
各种手枪：31 支	手榴弹：7 枚 导火线：一批
炸药：10 斤	各种子弹：9000 多发
毒药：3 斤	军用刀：500 多把
电台：5 部	黄金：930 多斤
美金：1580040 元	港币：27643180 元
白银：24358 斤	白金：56423 克
银元：53845 斤	扫荡反动教堂：40 多间
商店改名：2300 家	改路名：89 条
押送四类分子回乡：2000 多人	
勒令四类分子回乡：6000 多人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破四旧的足迹不仅遍及广州市，还到了广东一些中等城市，甚至远达深圳边境。

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唱片、录音带、字、画、书籍、奇装异服、封建迷信品、珠宝首饰等等，被红卫兵抄没，分别堆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石室，另一个是广州市第一工人文化宫（简称“市一宫”）。前者存放较为精致名贵的物品，后者主要存放一些粗重物品。

据市革命委员会生产组 1968 年 12 月 7 日给省革命委员会生产组的报告称，广州地区“红卫兵、革命群众抄交的财物中有文物（包括古瓷、古字画、古书、雕刻等）共 60449 件”、“有珠宝玉器（包括翡翠、珍珠、钻戒等）共 38576 件”；“查封了他们认定的资本家、地、富、反、坏、右等房屋共约七万平方米”。

红卫兵还在市郊农村查抄了三千多户被认为地、富、反、坏、右和“不法分子”的家，收缴了一批黄金、白银、外币、收音机、照相机。连日常的生活用品如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风扇、衣服、布料、床、板、凳、柜等也不放过。据 9 月 5 日市公安局统计，全市近日“被红卫兵斗争的共 1466 人”，其中“有干部、职工、群众 298 人”；被抄家的“4570 户”，其中有“有归侨 119 户，干部、职工、群众 723 户”。

12 月 1 日，主义兵举办了一个广州地区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展览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跟着毛主席，彻底闹革命；第二部分：炮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三部分：彻底粉碎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第四部分：向旧世界猛烈开火；第五部分：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显而易见，广州市内的破四旧、抄家，都是在官方指引下进行的，没收的物资、金钱也都由官方接收，并非红卫兵自编自导自演的“杰作”。甚至连举行破四旧展览会，也是根据“上面”的要求。

关于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处理，中共中央在 1967 年 3 月作过四项规定：一、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他不法分子的财产，除日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如原物已遗失或损坏则不退赔）以外，一律上交。二、所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抄错的物资全部退还本人，原物遗失和损坏的作价赔还。三、贪污盗窃私自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但被小集团用于文化大革命的小量物资或现款，经说明情况，可不予追究。四、地、富、反、右或其他不法分子，不准借处理查抄财物的机会喊冤叫屈，反攻倒算。违者必须严加惩办。[12]但实际上，大部分被抄物资，都未能按规定退还。

“破四旧”时广州的改名风潮

广东人说“唔怕生错命，至怕改错名”。在1966年8月的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出现了一个改名热潮，个人改名，工厂改名，学校改名，商店改名。什么卫东、向东、向群、为民、继红、卫红、永红、永忠、学军、爱军之类，铺天盖地，有如蝗虫过境一般，广州也不例外。

8月17日，市十六、十三中的学生给“一乐也”理发店贴大字报，指该店的字号和经营方式带有严重的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理发店赶紧在当晚拆掉用了几十年的“一乐也”旧字号，换上“新风理发店”的新招牌。

永汉北路“美利权”冰室的店名，被说成是“美利坚”的译音。十六中高三（3）班和高二（2）班的学生到冰室贴大字报，坚决要求把这个“奴才相十足”的招牌砸碎，给冰室起了个新店名叫“反美帝”，并贴了一副对联：“昨扫昭彰臭名‘美利权’，今树磅礴伟号‘反美帝’；横批：破旧立新”。后来，店名还曾改为“东风”和“新中国”。

著名的“邱炳南恤衫店”被改名为“新风尚衬衣店”，商店职工贴出公开信响应学生倡议，坚决不生产奇装异服出售，要大做特做革命服装出售，如果有人要求加工奇装异服，坚决拒绝，并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

三十五中的学生给平安大戏院贴了一张大字报，称“平安”二字是宣传封建迷信的旧名词，要求改名。第二天剧院把旧招牌拆下，改名为“前进”剧场。市演出公司把金声电影院改为东方电影院；文化公园的文娱剧场改名为劳动剧场。

二中初三（6）班的学生到永汉路文一文化用品店门口贴大字报，称“文一”这个名字是宣扬“文化第一”。商店职工马上把店名改为“新文化用品商店”。

8月18日下午，广州中药总厂所属九间药厂的工人和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并向所属各厂职工发出信件，建议立即采取以下措施：一、坚决把一些还保留资本家的名字和资本家宗族堂号的工厂名号全部更换新名。二、各厂门前批荡的厂名、橱窗，凡是有资本家名称、堂号和封建色彩及资本主义的宣传装饰，立即废除。三、产品的包装装潢，凡是有资本家名字和黄色毒素的立即停止印刷、使用。四、通知本市及外地有关单位，立即拆除或更改本厂在市内外设置的有毒素的广告牌、霓虹光管、橱窗广告等。

广州中药总厂所属的保滋堂改为一厂、陈李济改为二厂、李众胜改为三厂，《广州日报》报道：“广州中药二厂的工人和革命干部，为了支持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接连苦战了两个晚上，把‘陈李济’这块吸尽劳动人民血汗达三百年的臭招牌彻底铲掉。”（一句话中恁多“革命”。不过虽然很“革命”，也要苦战两晚才铲掉那三个字，可见那三个字多么反革命）

捷和钢铁厂机修车间工人贴出了题为《封》的大字报，坚决要求立即封掉、拆除“捷和”这个“臭招牌”，当天就把工厂的招牌拆掉了，但新厂名却一时定不下

来，后来才改为广州轧钢厂。

报纸上的改名启事，居然还要“紧急”，急个也？

二中初三（1）班的学生就脚方便，跑到中央公园贴大字报，称“中央公园”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臭名，建议改为“人民公园”。马上得到公园响应，用红纸写了“人民公园”四字，覆盖在原名上面。公园内绘有古装仕女图和商品广告的花盆、椅子等，统统都作了处理。

解放北路的“花鸟乐园”改名为“解放茶座”。红荔音乐曲艺厅的职工贴大字报称：边喝茶，边食东西，边欣赏演出，是剥削阶级有闲分子、遗老遗少们腐朽庸俗的生活习惯；是对曲艺演员的表演的极不尊重的表现，严重影响了演出效果，建议取消茶座，观众在演出时不吃东西，不抽烟，不高声谈话。

8月19日，广州杂技团一些人到市二轻局所属平安福塑料厂贴大字报，声称平安福带有严重的封建色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斗争就是幸福，但它宣扬的却是“有平安才是福”，这是修正主义的货色。于是把厂名改为广州泡沫塑料厂，并利用星期天爬到高达三十多米的烟囱上，把写在烟囱上的“平安福”几个大字涂掉。市二轻局所属的厂（社）纷纷改名。

有50多年历史的协同和机器厂也要改名了，原因是协同和这名字的意思，是资本家妄想联成一气，永远骑在工人头上，“协力同心，一团和气”，共同压迫、剥削工人。于是在8月22日改名为广州柴油机厂。

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一文。又发表社论《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破四旧运动掀起了更大的狂潮。

中山大学哲学系一年级红卫兵发出倡议：“一、立即取缔广州市的一切具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色彩的街道的名称、商店字号、学校名称，并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愿望和意见，换上具有毛泽东时代色彩和革命内容的名称、字号。二、我们建议，把海珠广场改为东方红广场（跟着党中央、毛主席永远干革命），把永汉路改为北京路（身居广州心向北京），把新堤、西堤大马路改为援越路（援越抗美，永远和兄弟越南战斗在一起）。”

同时，他们还向全市倡议：一、立即行动起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同时，也在横扫千百年遗留下来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旧立新，用具有强烈革命内容的新名称、新字号去代替那些陈旧腐朽的旧名称、旧字号。二、商店不许出售奇装异服，服务行业不给顾客理怪发，不做港式衣裙、牛仔衫裤；书店不卖黄色书刊；人民广播电台必须全部播送革命歌曲。三、全市“红卫兵”们，立即冲出校门，奔上街头，举起革命的铁扫把，在广州市来一个“大扫除”，将旧世界扫一个片甲不留，扫出一个崭新的广州市来。

还有一些居民给沙面办事处写信，严正指出：现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你们要赶快起来扫除沙面长期存在的殖民主义的残余。沙面的街道名称，除“珠江路”之外，无不反映了殖民主义思想。什么“复兴”（路名，下同）、“敦睦”、“同仁”、“协力”、“博爱”、“肇和”等，通通是帝国主义者的用语。帝国主义者过去用鸦片和炮舰征服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强迫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取得赔款和割地之后，他们就共同奴役中国人民，所以他们“敦睦”了，“同仁”了，“协力”了，“博爱”了！“肇和”是开始“和好”的意思，这更暴露出帝国主义者用武力征服中国封建统治者之后的海盗的伪善面目。可是，解放十七年了，这些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名称还残留在沙面这块土地上。这简直是对我们伟大中国人民的侮辱，我们建议立即把它们改掉！

陶陶居茶楼的招牌被指是“反动旧官吏”康有为的手迹，遭到铲除。茶楼职工敲锣打鼓，燃放鞭炮，舞着醒狮，换上“东风楼”的招牌。越秀茶楼也把塑在楼门前两条柱子上的大龙铲掉。

8月24日，《广州日报》发表市三十五中初三（4）班学生来信称：“我们觉得‘皇上皇’（广州著名腊味店）这个名字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社会，不适用于轰轰烈烈的大学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时代。‘皇上皇’这个名字是资本家剥削人民的罪恶发家史的臭名（关于‘皇上皇’来由的问题在《羊城晚报》已有刊登），是资产阶级思想遗留下来的阴魂。它大大地向人民宣扬了资产阶级思想，这是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因此，我们坚决要求撤销‘皇上皇’这个名字，并建议将‘皇上皇’改名为‘红上红’。”

同时发表皇上皇商店职工的回信：“我们准备采取以下措施：一、把店内一切封建意识的招牌和文字铲除，接受你们的建议，把‘皇上皇’改为‘红上红’；二、发动全体职工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坚决破‘四旧’，立‘四新’。”（感觉腊味要放红色添加剂）

华师附中在高二（1）班学生的倡议下，改名为“广东省东方红学校”。当晚，学生们把旧校牌劈碎，挂上了红底黄字的新校牌。

二中也砸碎了旧校牌，把校名改为“广州市东方红战校”（本来想改为东方红学校，但被华附抢先一步，只好改为战校，不过听起来更响亮）。二十一中学的师生，“为纪念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8月18日在北京会见百万革命群众这个光辉的节日”，把校名改为“八一八继红中学”；广雅中学也除掉了由张之洞起的校名，改为“红旗中学”；十四中改名为“‘五七’南泥湾中学”；二十五中改名为“长征中学”；二十八中改名为“抗大附中”；执信中学改名为“红女中”，等等不一而足。

8月25日，人们敲锣打鼓庆祝永汉路正式改名为北京路。经市人委批准同时改名的还有：长庚路、丰宁路、太平路统一改为人民路；长寿路改为曙光路；朝天路和米市路统一改为朝阳路等（后来还有第二批的改名）。

爱群大厦职工在24日晚上，把悬挂在15层楼顶的“爱群”招牌砸碎。第二天上

午，职工们在一片咚咚锵锵的锣鼓声、乒乒乓乓的鞭炮声中，把“人民大厦”的新招牌挂上。

在北京红卫兵和广州八一中学红卫兵的倡议下，著名照相馆艳芳更名为“工农兵照相店”，并贴出一副对联：“文化革命除四旧，服务对象工农兵。”人民南路的昆仑摄影院改名为“人民摄影店”；中山五路的自良服装店改名为“曙光服装店”；花木兰商店改名为“向阳花商店”；聚美斋商店改名为“太阳升商店”；趣香饼家改名为“红花饼家”；泮溪酒家改名为“友谊饭店”；莲香楼改名为“东升楼”。

8月27日下午，两千多名机械工人举着“誓作革命小将的后盾”的巨幅横额，敲锣打鼓游行，沿路向各学校递送“最最坚决支持红卫兵革命壮举的公开信”，热烈欢呼红卫兵在几天之内，把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色彩的商店字号、街道名称和坏的风俗习惯，打得落花流水。30日又有两千多建筑工人抬着“向红卫兵致敬”的巨幅横额，在市内游行，支持红卫兵破四旧。

9月1日，《羊城晚报》宣布“接受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意见，经上级批准”，改名为《红卫报》。

郑州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一年级南下造反串联小组散发《告广州市人民书》，呼吁减少以孙中山命名地名、机构名。这份传单提出：“目前在广州（尤其是中山大学）听到不少关于中山路、中山大学等的易名问题的争论，有的同意改，有的不同意改。在有些时候有些地方争论得还相当激烈，在这里我们仅谈谈我们自己的看法，概括起来一个字，‘改’。”

他们的理由是：

- 1.孙中山先生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手，但他毕竟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而且孙中山先生不仅有其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还有更严重的阶级局限性。
- 2.广州是有名的革命圣地之一，无数无产阶级革命先烈为革命献身捐躯，雄迹壮业可歌可泣，而没有用他们的名字去命名一个地区、一处学校或机关、厂矿等，为什么独独要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来到处命名呢？
- 3.在广州市，仿佛是“中山先生”的广州市一样，诸如中山大学、中山博物馆、中山医学院、中山纪念堂、中山一路……中山八路等，使人一看到或一听到广州市，马上就“和中山先生”联系在一起。

孙中山先生是可以而且必须纪念的，但是决不能把这个纪念搞到不适当的地步，我们认为，孙中山先生的遗物、遗像、遗迹大可不必毁，而都把它们送到中山博物馆里就行了，全广州只留用“中山博物馆”这一个以“中山”命名的地方就行了，其余的全部易名。

从8月18日起，到9月上旬，广州服务行业已先后把330多间商店带有封建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旧店名，换上“具有革命内容的新店名”，如饮食业的大三元酒家改为今胜昔饭店，摄影业的凌烟阁改为东方红，理发业的一新理发店改为立新理发店、西桥理发店（在六二三路）改为反帝理发店等。

市第二商业局所属的市食品、食品杂货、蔬菜、水产、煤建、糖业烟酒等六个公司和肉菜市场管理处等单位的原有约600间商店和肉菜市场，已拆掉旧招牌，换上新招牌的有380多户。如糖业烟酒公司所属聚美斋商店改为太阳升商店，食品

公司所属的皇上皇商店改为红上红商店，食品杂货公司所属的致美斋商店改为永为民商店，都受到革命群众的赞扬。

市一商局属下 396 间商店中，已有 313 家换上了新招牌。如友邦药房改为人民药房，超群药房改为为众药房，长和乐器商店改为新文艺乐器商店，永乐收音机商店改为新声收音机商店，纶章棉布商店改为红星棉布商店，永安百货商店改为红旗百货商店，美华百货商店改为东方红百货商店等。

市供销社系统的日用杂品、木器、废品、土产、果品等五个公司所属的商店，已换上新店名的共有 329 间。

这股荒诞的改名风一直刮到九十月间。这些名字（尤其是学校名字）大都没有保留多久就取消了。个人改名的，学彪一类名字最先倒霉，学青一类名字稍后倒霉。当然，也有一些地名、厂名沿用至今。

载于：文史天地；2017 年 02 期 (2017/03/13)，P66 - 70

<http://wenshitiandi.com/Magazine/Article/Index/2414>

红卫兵心中的“新社会”

1966年8月，全国掀起一股破四旧，立四新的疯狂浪潮。所谓四旧，即“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是《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为人们定下的“战斗任务”。不破不立，破掉了四旧，自然就要立四新。但什么是四新呢？

几十年后，在某些不了解文革的年轻人想象之中，以为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要立一个道德高尚、公而忘私、朝气蓬勃、团结奋进的社会。很多人在目睹了今天现实中的种种痼疾之后，以为文革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他们对文革的怀念，往往是基于相信文革是要创造一个美好的社会。

那么，当年破四旧中勇当先锋的红卫兵，在他们心目中的“立四新”，到底要立什么？他们在抄家、烧书、砸文物之后，到底想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新社会出来？

1966年，徐州南下串联学生在广州散发了一份《破旧立新条例 108 条》，把当时在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千奇百怪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炒成一碟，但红卫兵们绝不是空喊口号，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其中有不少条文，当时已经在社会上强制推行过。不了解文革的人，或已经忘记文革的人，不妨认真读一下这份条例，然后想一想，这真的是我们向往的那个美好社会吗？我们真的愿意生活这样的社会里吗？

非常感谢周继能先生提供了这份条例的文本，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年代。作为一个普通的小市民，如果有一天真的置身于这种大时代狂潮中，我们能够作出怎样的反应？这份“条例”较长，但值得细细研读，条例分两天载完。

为了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更好地造资产阶级的反，造旧世界的反，使彻底砸烂旧世界的革命风暴吹遍全国，吹遍全世界，使革命的烈火烧得更旺、更猛，使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运动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我们特向全国人民发出紧急呼吁，并提出以下破旧立新条例。

1. 凡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臭气的校名，必须马上通通改掉，换上革命化的名称。
2. 在每个学校门口必须竖立起巨幅毛主席画像，校内必须有巨幅的革命标语（如教育方针，党的方针政策，毛主席语录等方面）。
3. 校徽上必须要有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红底金字（师生一律）。
4. 学生证第一页必须是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像，接下去是毛主席语录，如教育方针等……林彪同志提出的：“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废除过去学生证上的学生守则，印上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其次必须在学生证上标明该学生的家庭出身，政治面貌。
5. 校旗必须用红绸做成，上面应有毛主席像。坚决反对用白布作校旗。
6. 大学解放军，废除一切不合理的等级制度(如：干部应废除几级的提法，学校废除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的等级。科学界废除科学家、专家、工程师、技师、技术员等级别，等等)，一律为人民勤务员。革命队伍内部一律称同志。
7. 把毛主席著作作为主要教科书。
8. 学生必须加强军事训练、体育锻炼和生产劳动。作到亦工亦农、亦文亦武。
9. 学校要废除封建的师生礼节，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10. 今后师范大学，师范学校所招学生必须全部是红五类子弟，以便以后培养合格接班人。

- 11.今后各大学、中学、专业学校都要办成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共产主义学校，废除全日制。
- 12.我们坚决要求改革放假制度，在农忙时放假到农村去参加劳动，支援农业生产。
- 13.今后不管是社会青年或者是毕业学生，如有不服从分配者，一律不得去城市、工厂找工作，让他们到农村、山区去参加劳动锻炼，若是黑七类的狗崽子还要加以监督和管制。
- 14.我们要求教学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辅导为副。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能力。
- 15.主要街道由居民委员会负责、设立巨幅毛主席画像和巨幅标语，毛主席语录牌。
- 16.公园入口处要设置巨幅毛主席画像，公园里多多张贴毛主席语录。
- 17.街道居民由居民委员会负责突出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成立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核心辅导小组，以促使街道居民思想革命化。
- 18.不准私营企业存在，建议把所有公私合营企业都变为国营企业。
- 19.不容许任何流氓阿飞存在，命令马上改掉牛仔裤，剃去阿飞头，毁掉火箭鞋，退出黑组织。警告你们：不许你们胡非作为，不然，后果由你们自己负责。
- 20.一切服务行业，不许为资产阶级服务，服装店坚决不许做奇装怪服，一切服务行业的革命同志都该自觉严格遵守。
- 21.凡是不适用于为广大工农兵服务的日用品（香水、雪花膏等）应立刻停止出售，并把原有的回收另作别用。商品商标图案必须改革。
- 22.照相馆必须为广大工农兵服务，严禁照各种奇形怪像，橱窗应摆出工农兵朴素大方的相片。
- 23.停止生产扑克以及其他一切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
- 24.古衣店不准代卖古衣、西装等杂七杂八的资产阶级喜闻乐见的东西。
- 25.城市洗衣店只能为工人服务
- 26.废除搓澡、捏脚、捶背工作，重新统一安排这些工人的工作。
- 27.书店必须马上停止出售黄色小人书，废除一切古旧书店。
- 28.一切书店、图书馆必须清理内部，消灭一切毒草，不许这些东西再向青少年灌输资产阶级毒素。
- 29.任何人不能雇用保姆。谁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必须严加处理。
- 30.资产阶级的老王八蛋们，命令你们马上把你们在解放前剥削劳动人民的一切财产无条件交给人民政府。决不允许你们这些吸血鬼再挥霍浪费。
- 31.命令那些没有参加三轮车组织而又拉黑车的混蛋，马上停止你们的罪恶勾当，并自觉去公安局自首，不然若被红卫兵查出，加倍处理。
- 32.大街小巷和自由到别单位去的一切“单干”修鞋、修笔的，命令你们马上停止营业，在人民政府领导下组织起来。合理降低修补费。
- 33.黑七类家中的小汽车、电视机、摩托车等一律没收，并把没收的东西交给国家。
- 34.各公园、戏园，主要街道等公共场所，都要设立广播站，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内外人事。
- 35.勒令那些仍拿定息，股金过寄生生活的王八蛋们，立即取消这种寄生虫的生活方式，由工人、贫下中农监督老老实实在地进行劳动改造。

- 36.勒令仍有出租房屋的剥削阶级混蛋们，立即将房钱给国家，不许再白拿劳动人民的房租。
- 37.废除公园卖年票制度，若工农兵要休养的，一律由机关负责发。
- 38.建议以后凡是批判电影一律不收费，由集体组织看，个人不卖给票，凡是黑七类及其子弟一律不给看。
- 39.街道的领导一律由工农成份先进同志担任，不能让黑七类分子篡夺。
- 40.有关部门要尽量想方设法在胡同建立公共厕所，以减少清洁工人的繁重劳动。
- 41.金笔等一些很贵的物品，暂不要大量生产(出口除外)，因为这些不适用广大工农兵的要求。
- 42.各医院要面向工农兵、政革旧制度，取消一切繁琐的挂号手续。
- 43.玩具店必须停止出售欺骗儿童或变相毒害儿童的玩具，并停止生产。例如：小手表之类。
- 44.各工厂企业一律废除资产阶级的奖金制度，禁止搞物质刺激。
- 45.一切拿高薪的资产阶级老王八蛋们，你们解放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现在你们仍旧拿着比工人高几倍，甚至高几十倍的高薪，你们这是喝人民的血，你们有罪。从十月份起，令你们把高薪降低于人民水平。黑七类在银行里的存款，归公(酌情处理)。
- 46.除老弱病残者可坐三轮车外，其它人一律不准坐，三轮车只准载货用，三轮车工人要适当减少，适当安排其它工作。
- 47.黑七类(地、富、反、坏、右、资、黑帮)由红五类监督其劳动改造，违者严加处理。
- 48.黑七类及其狗崽子们的工薪及助学金，必须经过群众通过才许领取。
- 49.工厂、机关一律取消黑七类的退休金，取消一切待遇。
- 50.不准资产阶级老王八蛋们占有大量房屋，以三人一间为限，多余的一律没收，分配给缺房的红五类。
- 51.游手好闲的社会青年，应自觉到农村去参加劳动锻炼。
- 52.家家户户都要挂毛主席像和张贴毛主席语录。
- 53.农村凡是能够写标语的墙壁一律都要写上革命化的标语。
- 54.每个生产小队都必须开办阅览室或文化室(内容以毛主席著作、报刊、杂志、革命书籍等)。

http://www.sohu.com/a/122469816_526351

昨天本号文章上(可点击链接阅读)把红卫兵在1966年破四旧运动中各种千奇百怪的主张，逐一列出。今天看来，大部分都令人笑喷，但在当时，没人敢拿它当笑话看，有人因为反抗这些条文，甚至付出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代价。今天把《破旧立新条例108条》的后半部载完：

- 55.过年过节，禁止拜神、烧香，家家户户贴革命对联，革命年画，严禁张贴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东西。
- 56.凡是有遗留下来的封建庙宇、寺堂等必须彻底废除。
- 57.凡是搞封建迷信的人，必须马上停止活动。
- 58.建议各生产队根据具体情况大力组织社员唱革命歌曲，一律禁止唱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古歌。
- 59.建议各生产队根据自己具体情况，要充分利用田头田尾的休息时间，组织社

员学习毛主席著作。

60.凡藏有各种旧书籍，旧古董(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一律交出来，统一由上级作处理。

61.禁止家长或其他人对小孩讲古代的故事，以及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东西。

62.禁止家长打骂小孩，对犯有错误的，也应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严禁那些用打骂的犯法行为。

63.严禁黑七类流入城市，并监视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64.对黑七类出身的人，由当地单位定期组织进行学习，进行教育改造。

65.建议各大队、各公社组织宣传队，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方针政策。

66.勒令全国各地凡是靠欺骗人民生活的“变戏法”，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勾当。并去当地派出所报名登记，违令者，红卫兵抓到决不留情。

67.汽车、电车、火车头上都必须挂毛主席像。

68.汽车、电车、自行车、三轮车等都要挂毛主席语录，语录牌由所属单位统一制定安排，无挂的不能行驶。

69.汽车售票员、火车列车员等服务员，都必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首要任务。

70.制造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的工厂，必须增加制造毛主席语录牌这一工序，若无毛主席语录牌的车辆一律不准出厂使用。

71.建议国家大力发展汽车运输事业，减少板车工人的繁重劳动。

72.除有急事、要事持证明者外，出租汽车一律不准、不让资产阶级王八蛋坐。

73.今后出版的任何书籍，第一页必须有毛主席语录。

74.全国各地所有的摔跤场一律解散，统统由派出所登记参加其他工作和劳动。决不许你们再毒害青少年。

75.各杂技团、戏剧院的节目一律改革，要演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颂工农兵的好节目，演员一律不准打扮得妖里妖气，凡是有违犯社会主义新风格的肮脏东西一律停止。

76.写信、以及信封上一律不准写×××大人、×××小姐、女士等，要破除一切封建遗留下的旧风俗，大力提倡社会主义的新风格新习惯。

77.各印刷部门必须大量印刷毛主席语录标语，特别是逢年过节要大量出售毛主席语录标语和革命对联，满足革命群众的需要。

78.各印刷部门要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大量出售，做到全国每人都有一册毛主席语录。人人都要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不带者就不准进入电影场、戏院、公园等公共场所。

79.由工农兵来编写新国歌，废除旧国歌。国歌应是歌颂党、歌颂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内容。

80.儿童要唱革命歌曲，不准再唱猫狗之类的坏歌谣。

81.各种报刊杂志以后一律不准给过多的稿费，堵（堵）住黑风口。

82.废除封建残余的家长制度，孩子们可以给大人提意见，凡是因孩子给大人提意见而受打骂，要严加处理。

83.把一些不符合实战意义的体育项目适当削减，大力开展国防体育，如：游泳，登山，射击等，逐步做到十五岁以上的青少年每人有一套杀敌本领，响应毛主席的全民皆兵的伟大号召，时时刻刻准备消灭来犯敌人。

84.严禁开庸俗的玩笑，讲下流话，做下流事，人人互相监督，违犯者严加处理，严禁叫外号，称职务(如某支书)的恶习，一律称同志。黑七类的除外。

- 85.邮递员今后一律不上楼、不进院，各单位负责，减少邮递员同志的劳动。
- 86.结婚不要彩礼，不得铺张浪费，要提倡新风俗、新习惯。
- 87.禁止带手镯、耳环、长命锁等封建的东西。
- 88.建议有关部门考虑，废除银行的利息制度，让人们自觉本着节约爱国的精神储蓄，支援社会主义建设。
- 89.走亲戚串门买点心、水果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一律废除，希望工农兵群众支持这一行动。
- 90.沙发、躺椅等不得大量生产。
- 91.商旅一切商品不得起洋名，要用中国有意义的名字。
- 92.建议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人名改为革命化的名字。今后起名，必须起革命化的名字。黑七类以及带有严重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人一律不许改。
- 93.所有信封的封面、邮票、书籍、刊物等图案不许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货色 (如猫、狗、花草等等)，设计时应为歌颂毛主席和歌颂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图案。
- 94.少先队员过队日、团员过组织生活时，一律不准逛公园，游山玩水。应利用团日、队日搞些有意义的活动，加强阶级教育、思想教育。
- 95.电影院、戏院应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在放映前必须播送毛主席语录。全体观众一起读毛主席语录和唱革命歌曲。
- 96.文艺工作者应大量塑造工农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光辉形象。一切作品都必须突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 97.“乌兰牧骑”和“海上文化工作队”式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应多多建立，深入农村、山区，为广大的贫下中农服务。
- 98.严禁一切牛鬼蛇神教练武术、拳术、气功等害人的东西。
- 99.命令三十五岁以下的人戒烟戒酒。学生一律不准吸烟喝酒。
- 100.一切医务部门和医务工作者必须贯彻实行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为工人、贫下中农、革干和军烈属服务，开药方时不得用英文，一律用汉字。
- 101.电影、戏剧等不得上演导演、演员、指挥等人的名字。严防个人名利。
- 102.提倡简化字，今后各刊物印刷品一定要用简化字。
- 103.建议高薪的国家工作人员主动降低工资；一切牛鬼蛇神的工资必须大大降低，使他们的生活水平低于人民的水平。
- 104.地、富、反、坏、右、资、黑七类分子没有工作者一律回农村劳动改造。
- 105.立即取消拜年、芭蕾舞……等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毒习，并命令有关部门立即停止。
- 106.一律不准养蟋蟀、斗蟋蟀等这些资产阶级的坏习惯存在。
- 107.不许再有赌博及变相赌博之类的行为出现。违者必定严加处理。
- 108.建议把汽车、火车的通行讯号，改为“绿停红开”，“扬绿旗停、扬红旗开”，废除从西方传来的“停红绿开”，“扬红旗停、扬绿旗开”的讯号，望交通部门考虑。

好了。读完这 108 条“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这真的是我们愿意生活的社会吗？

“万岁”与“战歌”

1967年初夏，一股红卫兵排演大型合唱、歌舞的浪潮，从北京、上海席卷南下，《井冈山之路》《毛主席的红卫兵》《红卫兵组歌》《英雄的红卫兵万岁》《前进，毛主席的红卫兵》等，纷纷登上舞台。一位华附主义兵得到了一套从北京传来的《红卫兵组歌》曲词资料，这是模仿《长征组歌》，用《长征组歌》的旋律配上歌词演唱的，抒发了文革初期北京老红卫兵的情怀，这位主义兵同学建议广州主义兵也组织排演。

主义兵马上给予全力支持，从华附主义兵里选了一批文艺积极分子，再从各校抽调一些人，组成了一支合唱队，对外称“组歌连”。进行《红卫兵组歌》的排演。组歌连最初集中在华附排练，后来移师到八一中学。

红卫兵组歌

附中本身有一支乐队，但为这样庞大的合唱队伴奏，稍嫌单薄。而七中的乐队在广州市中学里，颇有名气，当时正在东莞参加劳动，华附便去邀请七中乐队参加组歌的伴奏，又从省实、二中、广州音专等学校的乐队里，找了一些擅长吹拉弹奏的同学加盟。附中的军训团派了一名文化干事到组歌连，自始至终进行“艺术指导”，还借了一些旧军装给他们。主义兵得到北京中学红卫兵的《红卫兵组歌》是10首歌：《造反》《诞生》《见毛主席》《八月风雷》《串联》《长征》《爬起来再前进》《灭刘邓》《迎亲人》《看未来》。歌词大多是“战鼓响，烈火熊，杀声起，军旗红”一类杀气腾腾的呐喊，广州主义兵自己加了一首《反工作队》，插在《造反》和《诞生》之间，一共是11首歌。这首《反工作队》唱道：雄关险，豺狼凶，恶风起，黑浪涌。白色恐怖遮目，刘邓扼杀大革命。日夜想念毛主席，威武不屈骨头硬……

红卫兵万岁演出团

当年每个演出者都怀着庄严、悲壮的感情，放开喉咙，震天动地，仿佛全身每个细胞都在燃烧。《红卫兵组歌》的主要演出场地是在市一宫，但也有到工厂、农村、学校演出，至1967年7月23日前，演出近五十场。在组歌的演出中，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是1967年7月23日，主义兵总部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在纪念堂发生大型武斗，双方都有不少人受伤。晚上，武斗稍歇，主义兵组歌连在纪念堂内登台表演《红卫兵组歌》，其中有些演员因为受伤，头上裹着纱布，在视觉上，营造了一种“英雄主义”效果，悲壮的气氛感染了全场的观众。主义兵在排演“组歌”的同时，也在筹备一场大型歌舞《红卫兵赞歌》，以音乐歌舞史诗《东方红》为样板，采用歌舞形式，表现主义兵参加文革的历程。由于需要大量的艺术创作，直到1968年3月前后才正式公演，改名为《红卫兵万岁》。“万岁”的演出团队，仍然以“组歌”人马为主。“万岁”断断续续演了一百场，到1968年8月前后谢幕退场。

主义兵的“组歌”面世后，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满城争说，轰动一时，不少歌曲在街头巷尾广泛流传，学生们纷纷传抄歌词曲谱。旗派也招兵买马，集合了一批文艺精英，在沙河顶的广州京剧团里，埋头磨剑，1967年秋天，创作了一台大型歌舞《红卫兵战歌》，与主义兵唱对台戏。)

《红卫兵战歌》的起点，比“万岁”要高，从音乐到舞蹈，都是自己编创的，内容虽然与主义兵的“万岁”差不多，都是反映红卫兵投身文革的历史过程，但由于得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军区战士歌舞团、省艺术专科学校、省粤剧学校等专业团体的帮助，其中有些人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广东演出团，有近两百场演出的丰富经验，所以整台歌舞具有不俗的艺术水准。从“战歌”的组建规模，可见其阵容的鼎盛。乐团由管弦乐队和民乐队两大部分组成，人数超过一百。管弦乐器的演奏者，大多来自原广州市中学生管乐队，也有从各个学校乐团遴选出来的；民族乐器的演奏者，则大多是省粤剧学校的老师和学生。据说，光是主要的乐器就值十几万元，在当时是个吓人的天文数字。打天幕的幻灯设备，十分先进，连国外都还没有，“‘战歌’领导还要求大家要注意保密，千万不能让港澳来的人员看到，以免被帝修反把这么高级的技术偷去。

1968年2月，《红卫兵战歌》文化公园劳动剧场正式公演，反响之热烈，丝毫不逊于主义兵的“组歌”和“万岁”。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台上在唱，台下观众跟着唱；台上呐喊，台下观众跟着呐喊；台上哭，台下也哭；台上笑，台下也笑。演员与观众已无清楚的界线，感情相激相荡，融为一体。“战歌”的整个演出团队，从市京剧团搬到了文化公园。它所创下最骄人的纪录，是在中山纪念堂连演四场，场场爆满。还到肇庆演出了两场，在当地造成极大轰动。演员们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大家意兴勃发飞扬。演出门票收入，除了交场租费、水电费之外，余下的钱用于购买道具和演出的化妆品。而演员们每人晚场结束后，可有一碗红豆粥食。

五个月后，由《红卫兵战歌》演出团再次创作排演大型组歌《门合颂》。但那时全国的文革形势，已节变岁移，旗派气数将尽，不复半年前的盛况。《门合颂》的公演，在社会上几乎没有引起任何涟漪。1968年8月，《红卫兵战歌》演出团便宣告解散，各自回校“复课闹革命”去了。一位“战歌”成员在几十年后，感慨地留言：“躲在战歌里的日子，无疑像一束透过密林照射到地面上的晨光，尽管稍纵即逝，但仍然给那个年代小草一般暗淡无光的生命罩上一丝光彩，仍不失为人生经历的一种微弱的丰富。”

“万岁”与“战歌”几乎同时诞生，也几乎同时解散。两者都是同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代表着那个年代的极权主义艺术审美标准，强调政治工具化作用，情感的表达，愈是简单粗暴，愈容易引起共鸣。最典型的舞台造型，就是让敌人匍伏在强壮的革命者脚下，簌簌发抖，任由群众羞辱和蹂躏。从歌词、曲调到舞蹈的编排，一举手一投足，一字一句，乃至每个音符，都充满着对领袖的崇拜，对暴力的歌颂，对死亡的美化。

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两台歌舞有如孪生兄弟，无论宗旨、内容，还是结构、概念、词句、表演风格，同出一辙，所传达虔诚、迷乱、狂热的红色宗教情绪，也毫无二致，根本看不出这是对立两派的作品。几十年后，如果人们还有机会重看这两台歌舞，大概会奇怪地问：他们之间打来打去，究竟所为何事？

大串联时期之广州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被视为大串联的开始。其实，在此之前，红卫兵的大串联已经开始了。各地到北京串联的学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到北大取经，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诞生地学习。与此同时，北京的学生也纷纷走出京门，奔赴全国各地，“煽风点火”。

第一批到广州串联的红卫兵，是8月18日抵达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一共13人。他们一来到广州，便先后在华南师范学院、中山大学、华南工学院等高等院校，进行巡回演讲，介绍他们在“文革”中“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斗垮黑帮”的经验。8月下旬，陆续有外地学生进入广州，也有广州学生北上，但并未形成大潮。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震撼全国的大串联正式爆发了。

这是一幕惊心动魄的世界奇观。火车站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学生，每一辆火车，包括运载牲口的车皮，都被串联的红卫兵挤满了。客运列车挤得快要爆炸了，厕所也被人霸占了，行李架上也躺满人；车厢门根本无法关上，因为门外的梯子上，也坐着好几个人。在火车站上不了车的人，就在沿线疯狂爬火车，不顾生死地坐在车顶，奔赴“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

由于可以免费旅行，广州学生汹涌北上。所有机关、团体、学校、企业，都设立了接待站、联络站，为串连学生提供食物、住宿、医疗、交通工具和宣传工具，没钱吃饭的可以要求补助或记账。大、中学校、党校、党政机关的办公室、招待所、礼堂、饭堂，全部腾出来，给学生们安营扎寨。连广东省人委办公大楼，也挤满了红卫兵。

在源源不绝地涌入广州的外地学生中，也有不少是为了游山玩水的。他们听说广州对没钱吃饭的学生，可以补助和记账，一下火车就说没钱吃饭，要求补助或记账。住在暨大的外地学生，为了要钱，想出种种办法：或多报居住日期，将多余的饭票退换成现金；或以外出串联不能回住地吃饭为借口，将饭票退换成现金；或钻吃饭不定量的空子，两人吃一份菜，将饭票换成现金；或用记账吃饭，把自己现金购买的饭票，退换成现金；个别学生或将自己花三角钱买的饭票，以五角钱卖给新来的同学。千奇百怪的手法，不一而足。

北方学生汹涌而来，广东各地准备外出串联的学生也云集广州，愈聚愈多，而离开的渠道却有限。随着深秋的到来，气温一天天下降，又出现了流行脑膜炎，御寒的衣物不足，钱也花光了，滞留的学生万分焦急，都急于离开。

11月中旬，广州市外来进行串联的学生已达40万人，其中外省市来的约占20万人，本省各市、县来广州进行串联的学生也达20万人。正在路上和即将步行来广州的还有二三十万人。11月14日晚12时，开往北京的火车进站还未停定，站台上的学生便蜂拥而上，争先恐后，互相推挤，结果武汉市四十五中四名学生被挤下路基，摔到车底，受了重伤。

11月15日，悲剧再度重演。海南劳动大学的一名学生，被火车压伤，不得不锯掉右腿。11月16日，当火车进入广州站时，一万多学生疯狂扑上去爬车，结果又有一名女学生被推至路轨被火车碾死，还有多人受伤。

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2月中旬，滞留在广州的外地学生，才大部分送走，大串联也告一段落。

一月夺权

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震撼大江南北。活跃于广州的九个群众组织，五个外地造反团体的驻穗机构：红旗工人、中大红旗、誓死保卫毛主席造反团广州工人联合总部、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广州体院革命造反总部、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广东艺专东方红，以及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二司、三司、红色造反团等外地组织代表，1月20日，在中山大学开会，开始策划夺权。

哈军工最积极，主张立即夺权，但“广医红旗”和“红旗工人赤卫队”的代表，认为各革命组织还没有形成联合，夺权的时机尚未成熟，决定不参加对省委的夺权行动。会议讨论的结果：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权。夺权时成立一个联合组织，名称为“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会上，由哈军工的人执笔起草省革联夺权宣言（通令），并由北航红旗派人乘飞机送往北京，争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最后未能发表）。

次日，造反派继续在省委党校开会，决定了行动时间：当晚夺权！空气变得骤然紧张。新北大在1月21日接到聂元梓指示，要他们退出，说广东的夺权不彻底，是假的。他们便匆匆退出了。

1月21日下午，省委机关在省委党校礼堂开大会。中山大学红旗公社和“八三一”的部分红卫兵把省委书记们从会场拉出来，用车载到中山大学。1月22日清晨6时许，中大红旗的两名代表，向省委书记们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然后宣读《夺权通令》。

学生念完《夺权通令》后，问书记们有什么意见。大家无奈地表示，夺权是革命造反派的决定，你们夺权我们支持，没什么意见。红卫兵要他们立即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

在场的书记给在省委值班的书记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红卫兵带着这条子，到省委取大印了。

不料，在省委值班的书记却不肯交印，非要打电话向中央请示不可。红卫兵咄咄逼人地说：“中央办公厅来通知交印，你们不交，将来责任由你们负责。”值班书记说：“你们造反有理，但这是大事，我不能作主。”双方争吵起来。值班书记坚持要打电话报告中央，红卫兵不答应，说他们已向毛主席报喜了。值班书记质问：“造反派何必怕中央？你报你的，我报我的。”

最后，红卫兵同意他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电话接通了，对方也是一位值班人员，不敢定夺，答复请示一下，等一会再回电，却再没有了下文。

红卫兵也没耐心等了，把值班书记押到中大。这时，已有四位书记在场，大家商量了一下，虽然对是否要请示中央，仍有不同意见，但最后大家觉得，即使请示中央，也不会那么快有答复。这时，红卫兵跑进房间，一个个逼问书记们不同意交印，结果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书记都在交印协议上签了名：

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

（签名略）一月二十二日（刊于《羊城晚报》2013年6月8日）

1月22日下午，省委召开书记处会议，有四五名红卫兵参加了会议。会议研究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部委、各战线负责人都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

会议还要求各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夺权之后，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

会上，省委、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了学生。造反派兴高采烈，草草签了一张收条：“兹收到省委办公厅、文革、省委章子三个。”

当天晚上，省委各部委的印章也统统交给造反派保管。省委书记们在交印通知上签了名：“省委书记处同意省委各部委（不包括办公厅及文革）和办公厅属下的各单位的印章，今晚一律暂时由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收存。然后再由该委员会交给派往各单位的监督小组监督使用。”

23日，省委发表《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宣称：“1月22日，在广州地区的本地和外来的革命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的权，把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革命造反派手中。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是一件大好事，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一个伟大创举。省委坚决支持这个革命行动，并且庄严地宣布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

省委被夺权的消息传到省人委，以办公厅为主的一群干部，匆匆召开会议。对省人委被夺权，大家都认为，只是迟早的事情。有人提议，与其让外单位的人来夺权，不如自己先夺了权。这个主意，得到许多人支持。于是便通知各位省长回来省人委，准备交印。

当他们酝酿夺权时，中大红旗的十几名学生也来了，串连了印刷厂、保卫部门等几个下属单位的工人、干部，宣布由他们夺权，并把省长们拉到别的房间，勒令签字交出大印。在场的省长、副省长都签字了，但监印的干部却乘乱溜走，赶到办公厅，问管政工的干部：“现在他们要拿印，省长也答应给他们，好不好给？给了以后弄丢了怎么办？我可不能负责。”这时，干部们还三五成群，议论纷纷。大家都说：不能给他们！他们找工人，我们也找工人。于是找了幼儿园、招待所的工人，号召大家保卫印，不让外单位的人把印拿走。

闻讯赶来的工人有一两百人，把房间围住，不让中大红旗的人走。闹到深夜，达成协议，由省人委办公厅、机关印刷厂、中大红旗三方各出一人，负责监印。用印时至少要两方签字，加上一位省委书记的签字，方才有效。印放在办公厅保管，派两人日夜住在那里，谁也不能单独使用。

1月24日，一部分群众组织也仿照省革联形式，成立“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市革联），并发出《夺权通告》，宣布“从1967年1月25日零时起，中共广州市委的一切权力归广州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1月25日，市委请示省委：“现在他们强迫要交权，怎么办？”省委答复：“现在都是一样了，我们都交了权了，你们也交吧。”“群众组织那么多，交给谁呀？”“你们看看究竟哪一个是革命的，就交给那一个。”

结果，市委也被夺权了。

《羊城晚报》2013年6月15日

广州武斗的开始

2013.06.22 羊城晚报 B10 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剑拔弩张的广州城

当广东省委被夺权时，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也被造反派接管了。1967年1月21日上午，负责接管公安厅大权的几个群众组织，包括暨大东方红、誓死保卫毛主席工人造反团等，把主管政法工作的副省长寇庆延抓来，勒令他通知厅、局长晚上开会，然后通过政法系统内部的造反派组织“北京政法公社驻穗联络站”，于当晚宣布接管，成立13人监督小组，其中本单位10人。

市公安局的接管大致相仿，1月21日下午，由武汉三司抓了一位副局长，令其将所有当权派集中起来，晚上12时口头宣布接管。局本部的造反派并未参与其事，后经政法公社说明，成立监督小组时，才招揽了四个本单位的组织代表参加。1月23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接管监督小组发布“通令”。

市公安局被接管后，由九个单位（外单位有北航红旗、哈军工、武汉三司、北京政法公社、中大红旗、广医红旗、珠影东方红等）派出了13人，成立监督小组，其中市公安局内部的一二五造反联合总部（简称一总部）派了四名代表参加。监督小组选举了一位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为组长。然而，当小组一开始运作时，就遇到问题了。由于公安局内部的大多数文件，对外都是保密的，不能让外单位的人看，而监督小组大部分是外单位的人。矛盾就出现了。

1月23日，一些监督小组成员提出，把一总部代表逐出监督小组，要他们交出大印。1月25日，省革联驻市公安局的监督小组开会时，要求一总部和北京政法公社成员退场，并交出大印。双方吵得沸反盈天。

下午，一总部与政法系统一些造反派另组“省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由他们接管广州市公安局的一切权力。下午4时，政法革命造反委员会全体代表，齐赴市公安局，宣读了《夺权通令》，要求监督小组离开公安局。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市公安局“二次夺权”。

25日凌晨，大夜弥天，包围公安局的群众组织愈聚愈多，包括中造总、省重工业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省水产厅系统驻穗单位革命造反联络站、中南林学院红卫军等等，共有上万人之多，双方抛砖掷瓦，打斗之激烈，是广州地区“文革”以来，在群众组织的冲突中，前所未见的。

广州军区司令部办公室派人到现场调解，但调解不行，两派打起来了。一派关起铁门，在里面顶住，另一派在外面攻，人海战术，使劲往里挤、挤、挤。顶到最后像决堤一样，“哗”一声冲开了，外面的一下子冲了进去，把一总部砸垮了。

两派组织事后互相指责对方犯了“路线错误”，是“现行反革命”，要求军队镇压。自从公安局发生“一·二五事件”之后，一总部与省革联监督小组矛盾非常尖锐，形同水火，公安局内部四个总部，斗得一塌糊涂，公安业务已处于瘫痪状态。1月26日，广州警司宣布派军代表接管市公安局。省革联召开控诉大会，批斗一总部负责人，并派了由中大红旗等八个单位组成的监督小组，到省公安厅，以公安厅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参与了“一·二五反革命事件”为由，要求“广东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交出所掌管的印和一切权力”。

从这时起，广州已处于风声鹤唳之中，武斗的阴影开始笼罩全城。

省革联组织被瓦解了

2013.12.14 羊城晚报 B10 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二八冲军区”事件发生以后，军区与造反派的关系变得形同水火。3月2日，警司对广州市公安局实行军管。这是一个信号，大规模的扫荡行动，随即全面铺开。3月1日凌晨4时，警司部队在公安机关和民兵配合下，以突袭形式，捣毁了造反组织“八一战斗兵团广州地区总部”及下属各分部，并宣布其为反革命组织。

与此同时，军区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沿街广播，并派直升机在广州市上空散发印有八一战斗兵团“十大罪状”的传单。3月4日，省电台的高音喇叭不停地宣读布告：“勒令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所有成员，下午三点到礼堂开会，不得有误，如有违抗，后果自负！”当天下午，全台召开了“揭发控诉反动组织东方红、红色广播兵及其首恶分子罪行大会”。这两个组织的五名成员被拘留。

3月3日至6日，军区陆续对市电信局、航运局、黄埔港务局、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广州发电厂实行军事管制。

3月4日清晨4时，警司出动了一个排，公安派了15名干警，重型机器厂、麻袋厂、橡胶等几个厂的民兵800多人，包围了在“二八冲军区”事件中表现活跃的造反组织“珠影东方红”。据警司的报告：“行动迅速，没有发生事故，民兵动作好，天冷衣服少，也坚持二、三步一岗。”三名头头当场被捕。上午6时开全厂大会，宣读布告，解散珠影东方红及其下属组织。

警司宣告：“一、勒令‘珠影东方红’及其所属组织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不得改头换面，名亡实存。二、对一小撮首恶分子，逮捕法办。三、所抢劫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必须立即全部交给本司令部处理，不得销毁或转移。所劫的一切财物，必须立即如数退还原单位。违者，从严处理。四、对受蒙蔽的一般成员，概不追究。”

3月5日上午9时，中山大学武装部召开中大师生员工群众两千多人大会。会上宣读警司对中大红旗、八一实行打击的命令，警司派出两个连全副武装的部队，浩浩荡荡，进驻中大，驻扎在教学大楼。

警司颁布命令，指中大红旗“一再违抗中共中央的指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袭击革命群众组织，围攻革命群众，任意打人抄家，大搞非法武斗，实行白色恐怖；多次冲击军事机关和已经实行军事管制的广东、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恶毒地攻击人民解放军，狂妄地叫嚣‘要夺军权’……”同时勒令中大红旗的五名头头，“自命令宣布之日起，限五天内，将本人和‘八一战斗团’所窃取、窝藏的国家机密文件、档案材料和烈性毒药全部交还，不得抵赖拖延、转移、销毁。并全部退还所抢劫、占用的一切公共财物，不得有任何损坏，对所进行的非法活动，必须彻底坦白交代，以实际行动改正错误，争取将功赎罪。违者，从严处理。”

被取缔的组织还包括：电台东方红、红色广播兵、石井小坪红农友，以及军内造反组织战士歌舞团的千钧棒等，一批头头被抓。

经过这一轮急风骤雨般的打击，省革联组织被瓦解了。3月15日，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全省实行军事管制。由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刘兴元、广东省军区政委陈德为副主任。广州“文革”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在广州

一年一度的春交会是缓和广州形势的良机。中央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但当时军管会深感局势难以控制，1967年4月14日清晨，周恩来亲自飞赴广州，下榻军区大院留园七号。经与军区和军管会研究后，周恩来决定，从15日晚上开始，连续三天召开群众组织座谈会。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珠江宾馆大楼二楼会议室接见春交会负责人和群众组织头头，讲解中央关于开好春交会的指示，晚上又出席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中山纪念堂是主会场，市体育馆是分会场。周恩来先到分会场与群众见面，然后在主会场作了长篇讲话，逐条讲解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指示，要求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军管工作。大会结束时，已过了午夜，周恩来又驱车赶往海珠广场，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视察。

4月15日，交易会如期开幕。当晚23时至次日清晨7时30分，周恩来和群众组织代表举行第一次座谈。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几个大山头的负责人，还有部分学生代表和外地的红卫兵代表。座谈一开始，有些造反派代表便指责广东军管，是支一派，压一派。

4月17日零时35分至清晨8时30分，周恩来与群众组织代表第二次座谈。他批评中大造反派以电影《清宫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把中山纪念堂内孙中山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他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4月18日零时30分至上午9时，周恩来再次和广州地区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经过三次座谈，以及连日来听取军区、省军管会和中央文革小组驻广州记者的汇报，阅读由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包括群众组织的小报之后，周恩来对广州的情况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4月18日傍晚19时30分，他作了一个很长的总结讲话。

他在总结中否定了一·二二夺权，他指出这个夺权行动当时就犯了错误，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群众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

周恩来不同意以支持或反对封《红卫报》划分革命派和保守派，他还提到了广东军管以后，军区捕人的事情。虽然捕的人数多了一些，但不像别的地方多。经事后核实，连取缔的组织在内，总共捕了450人。现在已经放了169人，准备再放100多人。还有因交易会开幕，整顿社会秩序，从3月22日开始，一个星期内抓了508人，其中大部分是炒买炒卖、流氓分子，经教育后已放了280多人，交易会完了还会再放一批。他说：“在我们全面看起来，广东很谨慎的。”

周恩来首先肯定了中大红旗八三一、华工红旗、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革命左派。在谈到广州的工人组织时，周恩来肯定了工联和红旗工人是革命左派。地总、红总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周恩来指出，各个组织都要开门整风，学生也要这么做，特别是工人组织，十几个组织，各自开门整风，首先自己批评自己，特别是在工厂，两个对立的组织，自己开门整风，这样比较好。

4月19日凌晨2时，会议结束。天亮以后，周恩来飞返北京。地总、红总是当时广州地区两个规模最大的工人组织，对周恩来批评他们“保守”想不通，纷纷到军管会质问。4月19日20时40分，省军管会接到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逐字逐句传达了周恩来对关于地总、红总评价的修改意见：“地总、红总拥有大量工人群众，他们都是广州工人的革命组织，只是有些偏于保守。这两个组织不能称为大老保，也不能笼统地称为保守派。”

载《羊城晚报》2013年7月13日

动乱中的广交会

2013.12.14 羊城晚报 B10 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1967年初，就在春季广交会前夕，全国各地都发生了造反派夺权的浪潮，许多党政机关都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3月15日，广东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维持社会的稳定。在这种“天外狂风吹海立”的形势下，广交会还要不要开？能不能如期顺利举办？成了考验军管会权威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这时，中央发来指示，一定要确保交易会如期正常地进行。

于是，春交会的筹备工作从3月中旬开始。军代表进馆作动员，要求在交易会内部，“暂停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坚持天天读（毛主席著作），搞阵地快报，表扬好人好事”，让广大革命群众行动起来，“以战斗的姿态奋战10昼夜”，做好准备工作。以往的市容整顿，是由中南财委按两个季度50万元拨款包干，今年情况虽然困难，但第一季度，仍拨了20万元给广州作市面清理工作。交易会货源由中央直接抓。

4月10日，一批造反派聚集在中苏友好大厦前，要砸掉展览会大门前的陈毅题词。解放军加以阻拦，双方僵持不下。广州匆匆请示北京周总理，答复是：要劝说，不要砸，没有中央指示不要砸。但经劝说无效，“陈毅题”三个字，终于手起锤落，被造反派砸得粉碎，其余的字用红纸封了起来。已进驻交易会展馆各贸易代表团中的一些造反派头头，也不断提出一些苛刻要求，使展出计划难以实施。

4月13日，周恩来在北京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给广东省军管会、中南财委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在修改时，他特意增写了“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

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指示：一、在交易会期间，不组织交易会以外的人员进馆参观，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机构内进行夺权。二、各省市自治区要积极组织交易会出口货源，除了派驻交易会的工作人员外，不要另外组织人员去交易会参观。三、所有参加交易会工作的人员，有接待任务的宾馆、旅店、剧场和参加演出的文艺单位，在交易会期间，一律暂停“四大”。四、在交易会期间，不要在出口商品陈列馆和接待外来商人的宾馆、旅店张贴大字报。五、交易会安排演出的文艺节目，不要再作变动。

当天，周恩来又约见了广东的领导人，继续谈交易会问题。这时，周恩来深感问题严重，特别是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窗口，已经连续举办了20届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如果不能按计划进行，那将在全世界造成恶劣影响。因此，4月1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15）日开幕，极为不利。”周恩来决定立即飞赴广州，亲自解决问题。

4月14日清晨，周恩来飞抵广州。当天下午，周恩来在珠江宾馆接见参加春交会的各方面负责人和群众组织头头。他在讲解中央关于开好春交会的五点指示之后，向与会者指出，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要保证把这个会开好。

当晚，周恩来出席广州地区各群众组织代表大会，有一万多人参加。中山纪念堂是主会场，市体育馆是分会场。他先到分会场与群众见面，然后在主会场发表长篇讲话，逐条讲解关于开好交易会的五点指示，要求群众支持解放军的军管工作。

大会结束时，已经过了午夜，周恩来又驱车赶往海珠广场，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视察。据亲历者的回忆，当时问题最多的是工艺品展厅。参展团中的造反派硬说有些展品是“封、资、修”的东西，有损中国形象，不能展出，更不能出口“毒害”世界人民。他们甚至把一些展橱贴上了封条。

周恩来说，越南人民正在流血牺牲，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除了在武器装备和其他物资方面给予支援外，还需要为他们提供一部分自由外汇，而这只有从西方获得。购买这些艺术品的是西方商人，我们怎么能要求人家和我们有同样的审美观？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毒害”世界人民的问题。造反派终于同意扯下封条。

当时，另一派的造反组织见广交会门口“陈毅题”三个字被砸后，也没有受到什么责难，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也派几个人爬上中山纪念堂的外檐，把孙中山的题词“天下为公”用纸盖起来了。周恩来与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时，批评造反派以电影《清宫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由，把中山纪念堂内孙中山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是“政治性错误”，责令天亮前必须恢复这四个字。他说：“天下为公”虽然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来的，但可以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周恩来临离开广州时，提出要去海珠广场看一个“破四旧展览”。这个展览就在广交会旁边，大量传统美术工艺精品，以前都是广交会上的热门商品，现在却被当作“四旧”，摆在那儿供人批判。

在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4月15日，第21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得以如期开幕。广州人很顾全大局，一到交易会期间，武斗也停了，街上的大字报也撕下来了，马路也打扫干净了。大家一夜之间似乎都变得彬彬有礼了。

这一届广交会有来自62个国家和地区的7849名采购商到会。当年的秋季广交会，因为受“文革”动乱的影响，推迟了一个月，于11月15日开幕，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6662名采购商来到广州参加广交会。两届广交会的成交金额合计824万美元。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形势下，这不啻创造了一个奇迹。

广州日报事件

(编者改写)

文革初期，广州本地的报纸，主要有中南局主办的《羊城晚报》、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日报》和广州市委主办的《广州日报》三家。《羊城晚报》被封后，剩下两家。在省革联问题上，《南方日报》与《广州日报》的立场相反。前者反省革联，后者支持省革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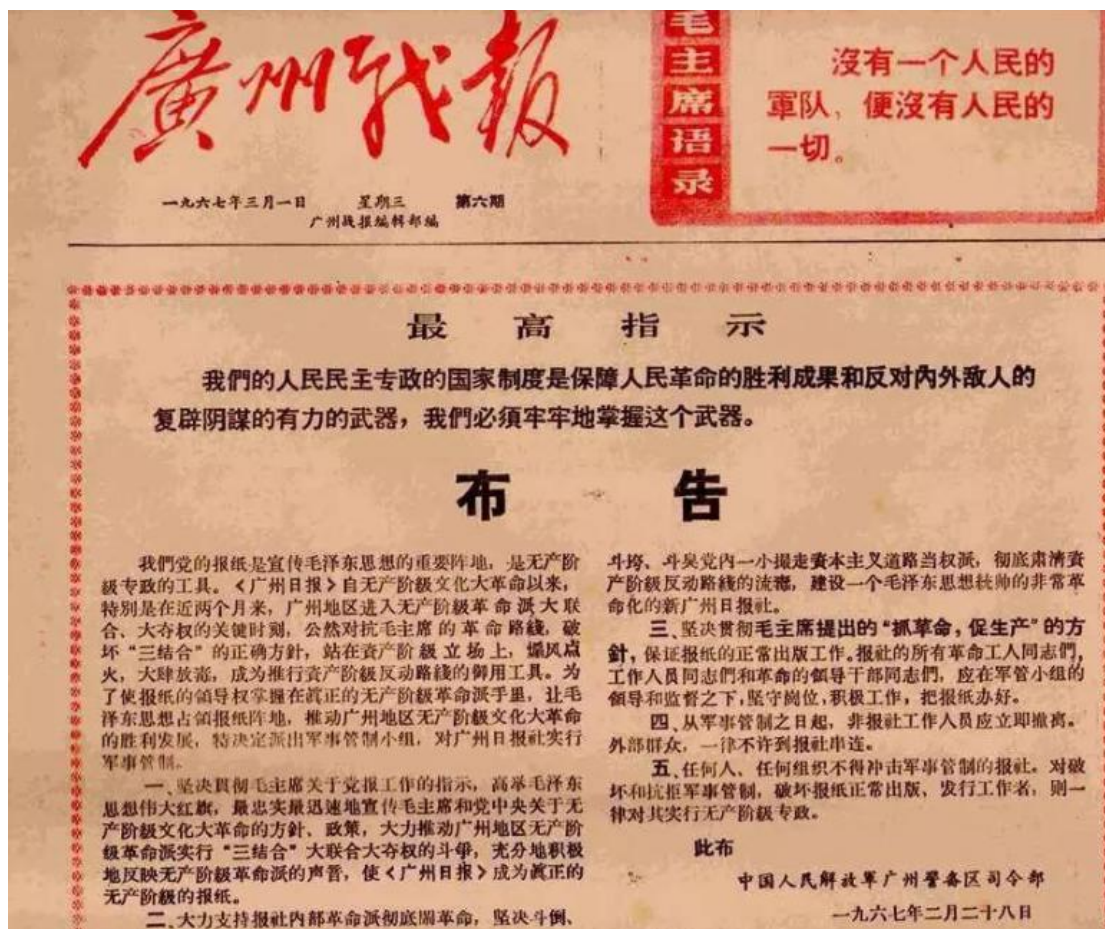
1967年1月11日上午，《广州日报》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军总部”和“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部”两个群众组织接管，但下午这两个组织又宣布取消接管，广州日报党委匆匆刊登启事，声明：“现广州日报无任何群众组织接管，仍然正常出报。报纸出迟，由党委负责。”到1月22日《广州日报》又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日报总部”和“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硬骨头赤卫队广州日报总部”两个群众组织接管。

2、3月间，《南方日报》连续发表了几十篇文章，对省革联展开批判，省革联则在《广州日报》上发表反击文章。双方针锋相对，口诛笔伐。封报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间断。2月15日，广州日报社发行科声言，只要省革联仍然接管《广州日报》，他们就拒绝为报纸办理发行和广告业务。当天，省革联调集了上千人到报社，要“保卫《广州日报》”。



“二八冲军区事件”后，省革联倒台已成定局，2月25日晚上，省革联驻《广州日报》监督小组突然宣布，他们的接管“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撤出广州日报社，并以大字报形式声称：“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

员会驻《广州日报》小组，于1967年2月25日20时起，正式宣告撤销。”2月28日，两个接管《广州日报》的群众组织仓促宣布，《广州日报》从3月1日起停刊。但在同一天，警司宣布对《广州日报》实行军管，将维持正常出版、发行。



3月12日，《南方日报》转载了《新北大》（广州版）的一篇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广州日报》也加以转载，并加了按语，号召大家讨论。文章回顾了广州地区的“文革”，声称“现在大翻案的日子到了，历史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

《广州日报》将维持正常出版、发行。消息传开，地总、红旗工人等几百个群众组织，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到广州日报社祝贺。“最最坚决支持对广州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打倒省革联，彻底闹革命！”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三日耳聋。

然而，各群众组织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所谓群众组织接管报社，到最后都难逃流产的命运。因此，在一月风暴前后，出于对大造舆论声势有迫切的实际需求，许多群众组织已经开始自办报纸了。



文章执笔者是北大物理系的一位学生，当时他是新北大驻广州联络站的人员。文章的提纲，是聂元梓亲自交来的，代表了聂元梓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宣称：“我们反对省革联，我们摆出省革联登台一个月来的全部所作所为，证明它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证明它与广州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流合污。”文章彻底否定了1月22日省革联对广东省委的夺权。文章一经刊出，立即掀起滔天巨浪，各群众组织都卷入了争论的漩涡，甚至引起剧烈的分化。

4月10日晚上8时左右，华工红旗、华农东方红、华师东方红的群众一百多人，涌到《广州日报》的门口，派了四十多人与军代表见面，要军代表回答：一、为什么《广州日报》要刊登《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二、为什么开始要讨论这篇文章，以后又不讨论了？三、军管后对《广州日报》怎样评价？办得好不好？群众批评该报，你们看法怎样？站在哪一边？四、《广州日报》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喉舌？要求马上答复。

军管代表以现在时间已晚为藉口，请他们回去休息，以后由军管会派人到学校去解答。但学生们坚决不答应。这时，外面的群众愈聚愈多，正门聚集了一千多人；后门也有一百多人静坐示威。广东华侨中学、北航红旗等二十多个单位，也赶来声援。他们的宣传车一直在大街上来往驱驰，呼吁群众到报社，一起造《广州日报》的反。

到午夜12时，群众组织再提出四点要求：一、马上开辟专栏批判《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广州日报》以前放了毒，现在要消毒。二、《广州日报》犯了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必须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三、撤

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军管小组。四、揪出《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的后台老板，否则一切后果由军管小组负责。

军管小组经请示陈德后，逐一回答：一、关于开辟批判专栏问题，中央3月19日指示，不要在报纸上刊登一个革命组织反对另一个革命组织的文章。以前我们犯了错误，今后不能再犯。二、军管小组现在不能撤离。三、对报纸的意见，如果报纸有缺点错误，我们可以检讨，双方可以派代表，采取交换意见的方式解决。四、关于后果问题，正因为我们考虑到后果问题，希望你们从全局出发，按《红旗》第五期社论执行，否则，产生的后果我们不能负责。

群众组织不肯罢休，高呼“《广州日报》的反我们造定了，誓与军管小组拼到底”的口号，并在报社门前筑起人墙，阻止报纸出版。他们要求撤换军管小组，报纸只能刊登新华社电讯稿。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举行绝食抗议。

4月11日晚上23时，中央文革就《广州日报》问题，发来了四点指示：

一、《广州日报》必须继续定期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

二、要维护报纸军管，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对报纸的军管工作，报纸军管小组成员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小组搞好报纸。

三、有意见可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用要报社军管小组请罪的方法。

四、《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是错误的，应当容许在报纸上继续进行讨论批判。

由于“文革”小组表态，形势突然急转下，群众组织出现严重分裂，一些在军管前后受到军队打击的组织，纷纷要求平反。军管会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了。

中央文革关于《广州日报》的四点指示，对军管会的权威是沉重的一击。省军管会阵脚已动，不得不节节退让。当天晚上，由驻中大工作组宣布中大红旗八三一是左派组织；八一战斗兵团被拘捕的九名成员，在此之前也获得释放。经过这么一番反复，省军管会的威信，大受打击。

4月12日，一直得到军队支持的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革造会）出现分裂，东方战斗团宣布退出革造会。他们发表一份《严正声明》：“受蒙蔽无罪，造反有理。我们紧急呼吁：‘革造会’的全体战士，现在是我们起来杀回马枪的时候啦！谭震林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千万不要睡大觉，让他们溜掉。现在广州的谭震林正在玩弄新阴谋，拉一批，打一批，挑起群众斗群众，制造混乱，以期溜掉。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千万不要上当，我们要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万炮齐轰广州的谭震林！”

同时退出革造会的还有红井冈山战斗队，他们也发表一篇《关于炮打广州军区谭震林的严正声明》。革造会的物分会东方红、数分会坚持真理战斗队也发表

《联合声明》称：“中大‘革造会’是个大杂烩，其中有左派、中间派，和以‘一二〇’为首的保守派。‘革命造反委员会’中的革命造反派赶快联合起来造反！保守派必须悬崖勒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否则自绝于人民！”中大革造会问题，闹得天翻地覆，其实是向军队示威，而军管会对此束手无策，眼睁睁坐看他们刚刚筑起的堤围，正迅速崩溃。

中央文革四点指示公布后，在报社周围静坐抗议的群众，于4月12日凌晨3时陆续散去，在街上游行后回校，但留下了三十多名代表，要求与陈德会面，落实四点指示，否则还是要绝食。12日上午，广州三司派人到报社发表四点声明：一、拥护中央文革四点指示；二、支持绝食代表的正义行动；三、陈德不见他们是不对的；四、陈德应立即接见他们，到群众中去回答问题。

陈德在4月13日凌晨3时许，接见了学生代表。陈德进入报社时，群众起哄乱嚷：“广州的谭震林抓住了！”“你为什么不早来？你为什么不关心小将的健康和生命？”那些已经散去的群众，闻讯再度聚集。学生向陈德提出四点要求：一、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文革四点指示；二、要求发40张到工厂、学校都可通行的串联证；三、参加报社版面小组；四、两三天后再与陈德会谈一次。

陈德答应了一、四点要求。二、三点经过协商后改为：参加版面小组问题由各革命组织协商解决；成立《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调查组，具体问题待陈德第二次接见时再定。11时许，中央文革给学生打来电话，11时半学生宣布停止绝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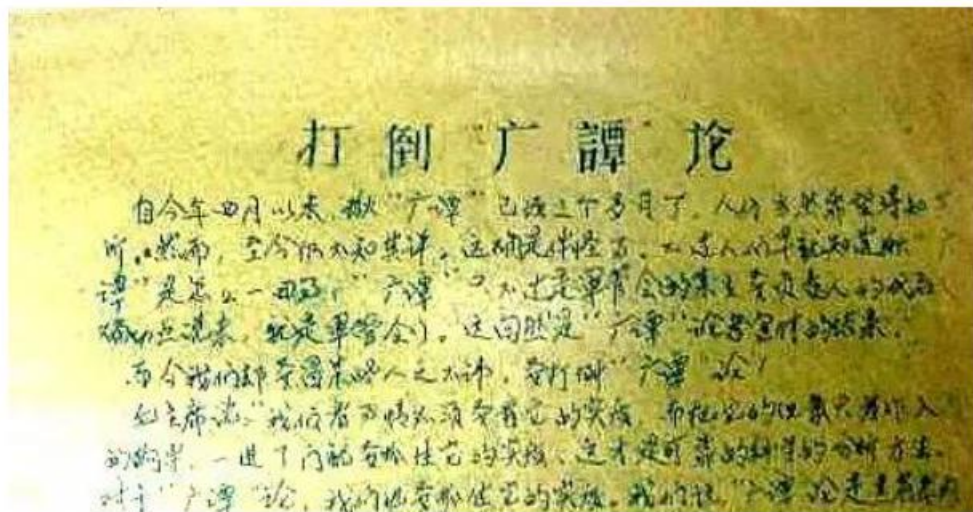
地总等组织听到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后，也像遭当头一棒。4月12日上午，大联筹召开了14个总部负责人的会议，并邀请铁路、港务、财贸、文教系统的人参加。会议首先讨论了中央文革的四点指示，过去他们对《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曾经表态支持，现在中央文革说是错误的，怎么办？大家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所有人都觉得中央文革对广州工人运动不甚了解，对学生情况了解得较多，因此决定派工人代表团赴京，向中央汇报广州工人运动情况，并在北京设联络站，专门打探中央文革的动向；打电报或长途电话向中央文革询问《颠倒》一文究竟错在何处。他们认为，承认中大红旗八三一是一左派组织，等于承认冲击军区、冲电台是正确的。军管会对这次会议的讨论内容，留下了这样的文字记录：

红总认为：中大红旗八三一不能算左派，更不能算坚定的左派，打砸抢抄的是左派，反对打砸抢抄的倒是保守派，我们也去砸。这样搞，我们两个总部（地总、红总）就要瓦解了，广州文化大革命怎么办？他要瓦解我们，我们就要和他打，难道我们还打不过他？中央文革听他们的多，对工人情况不了解，我们要派代表去北京汇报。

地总认为：在斗争这样尖锐复杂的时候，他们把矛头指向我们，这样宣布好不好，我们感到不妥当，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们现在上街喊：我们斗争初步取得了胜利，还要继续前进，誓把广州谭震林揪出来！

群众组织之间的冲突，又开始抬头了。4月13日晚上，八一中学、一中、十六中等校的主义兵，在中山三路撕十六中的大字报，和对立的学生组织发生殴斗，伤了五六人；华师附中学生在暨大附中的后门，和暨大两三百学生激烈冲突，也打伤了数人，警司派人到场制止。虽然军管只过了一个月，但3月底还能挂在嘴边的“军管以后形势大好，越来越好”这类话，现在已经难以启齿了。



5月15日，华南农学院野战团强行封闭了《广州日报》，5月16日晚上10时，以“‘五一五’革命行动临时指挥部”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广州日报》长期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量放毒，充当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我们为了坚决执行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关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的指示，《广州日报》必须立即停刊。”同时提出三点声明：“一、强烈要求广东省军管会责成有关部门从5月17日起给《广州日报》原订户发放《南方日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有关当局负完全责任；二、除此以外，在《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凡有重要新闻应由《南方日报》社扩大发行量加以解决；三、呼吁一切革命同志们，提高革命警惕性，随时揭露和粉碎有人利用《广州日报》停刊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

5月17日凌晨，省军管会宣传组对造反派封闭《广州日报》，作出三点回答：“一、《广州日报》是军管报纸，任何群众组织都要维护，有意见可提出协商解决，不能强行封闭，或勒令停刊。二、在两报合并筹备过程中《广州日报》继续出版新华社电讯稿，有利于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三、对目前《广州日报》订户不能继续看到报纸的问题，将来我们要说明事实真相。”

广州日报事件 2014.01.11 羊城晚报

省市当权派被监护

2014.01.25 羊城晚报 B10 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在疾风暴雨的批判斗争中，大部分挨斗的干部，无论精神还是肉体，都备受折磨。1967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致电广州军区，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并要求黄永胜把执行情况上报。据副市长罗培元追忆：“广州地区的，包括中南局的、省的、市的大多数党政当权派起初是分别监禁在各自机关的暗室、储藏室、防空洞、地下室里，后来通通集中到天河区的梅花园兵营里。”

尹林平、雍文涛、区梦觉、刘田夫、林锵云、张云、张根生、金明等人，都关在梅花园广州警司监护室里；另外一批人，饶彰风、周楠等，则远赴粤北，关押在乐昌的“31号办公室”里。饶彰风不久便病逝于粤北。林锵云也身患重病，于1970年辞世。对几位重点监护的省委书记，警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为贯彻总理5月5日关于“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经有关革命组织协商，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于5月5日22时30分之前，已将（他们）送往监护驻地（军区白灰场特务营房）。警司确定，由工交武装部政委负责，并抽调参谋、干事三人，警卫战士二人，在警司成立一个监护组（简称二组），采取二对一的办法实行监护，另由特务营抽调一个班负责驻地警卫。对（他们）在驻地的活动采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过远，不能互相往来和交谈。在某单位拉去斗争时，监护人员同行，斗争结束即返回驻地，监护人员主要负责安全、生活、思想活动，并及时向上反映。给每人订阅两份报纸及《红旗》杂志等。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开支。监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初步考虑有五条：一、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二、要做好斗批的准备；三、事先看好会场；四、研究确定往返路线；五、掌握斗争时间。

省委书记刘田夫说他是7月份被关进广州军区在人和镇的一幢楼房内，他在那里关了一个星期，又转去警司在梅花园的监护室。警司监护室还有林锵云、王全国、杨应彬、金明等人。警司还提出了几点建议：一、目前揪斗这些原省委当权派的群众组织很多（学生、工人、农民各系统都有），需要统一安排。现划由警司一组归口安排，文革专案组、机关组参与商定；二、需要尽快将总理的指示传达到较大的群众组织中去，充分依靠群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可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分别进行传达；三、是否可以安排这些当权派原配备的警卫员一同前来监护驻地，以方便工作。

省直大联合总部下工交总部组成“云广英（省计委副主任）专案组”，这是大联合总部“尹林平专案组”下属的一个小组，其目的是要“揭开以尹林平为首的地方主义翻案问题”。4月22日至29日，工交总部一连斗了云广英七个半天，硬要他交代如何鼓励这些“犯过地方主义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起来揭发陶铸问题”，承认对军管不满，对军区处理冲军区问题和组织领导生产班子问题不满，对古大存死因的怀疑等等。

4月26日，文教战线单位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批斗省委常务书记区梦觉大会。

4月28日下午，省教育厅和高教局召开两百多人参加的中型会议斗争区梦觉，晚上又轮到卫生厅系统开斗争区梦觉会议。从28日开始，文教系统以厅局为单位，分别进行批判，以便集中材料，再开全战线斗争大会。

5月2日晚，地总、红总的工人和一批红卫兵捣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搜走大批关于刘少奇的历史材料；5月5日，广州钢铁厂召开批判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大会；5月7日，地总、红总与“郊区贫下中农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郊贫联）等组织，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全总旧址的罪行大会”，当场焚烧全总旧址的牌子；5月8日，广州重型机器厂、电池厂、人民胶厂、造船厂等十几个分部，联合举行“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大会”；5月13日，广船分部召开批斗原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梁湘大会。

进入6月以后，批斗会继续升温。红司在一篇题为《猛揪彭、罗黑线，夺回专政大权》的社论中高呼：“政法黑线，我们轰定了！广州谭震林，我们揪定了！陶铸的独立王国，我们砸定了！”批斗省、市委领导，成了两派组织宣示“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斗精神”的手段，这派群众开会斗了某个领导，另一派马上也要开会再斗一回；这派开了万人大会，另一派也要开万人大会，决不能落后。斗争的方式，也变得愈来愈激烈和残酷了。

刘田夫回忆说：“我那时头生癣，脚又烂，不能穿鞋子走路，造反派迫着我们戴高帽游街，我只好提着两只鞋子，艰难地随游行队伍穿街过巷。在游街时，有个工人在行进时帮助我，用他的手抓住我的高帽，不让擦伤我的头皮，当时我很感激他，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方便问。”

6月17日，旗派的工联发出砸烂黑省委的“动员令”。东风派也不甘后人，6月19日，地总华工分部红色工人战斗兵团、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组织，联合发出“告全省人民书”，大声叫嚷：“我们希望，所有的革命干部，放下包袱，勇敢地站出来！大造黑省委的反！反，反，一反到底！”

整个夏季，宛如山川沸腾。天地变色，日月无光。

高官辩论会

1967年6月，在广州闹市中心的北京路，举行过两次所谓“高官辩论会”，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两次辩论会的主题，都是围绕广东1950年代的反地方主义问题。

由于群众组织对原广东省委领导的批斗，愈演愈烈，许多干部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5月间，周恩来致电广州军区，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实际上是为了把他们保护起来。省委书记尹林平早在4月份已被关在军区白灰场特务营房。5月12日，华工红旗的一批学生，想方设法，把尹林平从警司手中抢了出来，先是藏在中山医学院，后来转移到华南工学院。

华工红旗在抢走尹林平后，发表“严正声明”：“我们重申，在尹林平未解放之前，我司令部负责保护尹林平的生命安全及给予人身自由。”石牌一带出现了许多大标语：“尹林平我们保定了！”“尹林平是革命的领导干部！”

由于当时广东已经组织起“批陶联”，正掀起一股批判陶铸的狂潮，反地方主义问题，自然再次成为热门话题，当年在反地方主义运动中受到冲击的人，纷纷出来翻反地方主义老账。北京路的街头贴出了许多宣称“古大存（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50年代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子）的骨头是红的”大字报，指反地方主义是对地方干部的政治迫害，但也有大字报说“古大存的骨头是黑的”，反地方主义是正确的。引来无数市民围观，指指点点，议论纷纭。

自从华工红旗把尹林平藏起来以后，周恩来曾三番四次打电话要求华工红旗放人。华工红旗感到压力很大，但他们觉得，当初把尹林平抢了出来，现在要放人，这件事怎么收场？总得有个台阶才能下来。于是就决定开一次“高官辩论会”，开完会就放人，事情只能这样结束了。因此，华工红旗要求另一位省委书记林李明必须出席这次辩论会，他不来辩论会就开不成了。但林李明不肯来，华工红旗就派人把他绑架到会场。

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大致上，东风派反对翻案，红旗派支持翻案。地总认为，反地方主义虽然伤害了一些广东地方老同志，但总的来说没有什么大错，因为反地方主义不是陶铸决定的，而是中央的决定，必然有中央的理由。两派又是张贴大字报，又是编印小报，又是散发传单，又是开宣传车上街，针锋相对，闹得不亦乐乎。

在三司和红旗工人的组织下，6月底，就地方主义问题，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公开的“高官辩论会”。地点就在市中心的北京路。“红方代表”为尹林平，“黑方代表”为林李明。尹林平虽然明白这种辩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这是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必须认真对待。“不辩由己，要辩则要胜利”。

尹林平和一些老同志商量，认为现在要辩的是广东最重要的问题：干部问题，各个时间土改、三反、两次反地方主义等问题，“不联系到反地方主义，是揭不开的”。必须通过辩论，甩掉以往戴在他们头上的五顶帽子：一、矛头指向解放

军；二、反对军管；三、怀疑中央；四、资本主义复辟为地方主义翻案；五、三八会议（尹林平和一批老同志的一次聚会，后来被指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黑会）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纲领。

“高官辩论会”吸引了许多群众前来旁听。辩论双方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辩论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题目展开：一、林李明是不是陶铸死党？二、尹林平是不是地方主义分子？三、“三八会议”是不是黑会？双方唇枪舌剑，激烈陈词。尹林平大声疾呼：“搞错了就要翻案！”他在会上还散发了《我的经历》、《严正声明——揭穿对我政治陷害》等材料。其他老同志也在会上发放了一些文章。6月28日，双方又举行了第二轮的辩论，连省革委会副主任陈郁及夫人都到场聆听。

然而，地方主义一案，不仅关系到陶铸，也关系到军队，尤其是土改时踢开本地干部，南下大军挂帅问题，牵涉到许多军队干部；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文革正密锣紧鼓地准备“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为大抓“南方叛徒网”罗织材料，这时尹林平想为地方主义翻案，不过是自树标靶，引火烧身而已。

华工红旗再也保不住尹林平了。“高官辩论会”之后不久，7月4日，尹林平被押回警司监护。临行前，尹林平和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廖似光等人在二沙岛告别，大家互相鼓励。廖似光还勉励大家：“要继续奋斗！”

多年以后，文革已经结束，廖似光在回顾文革期间的“高官辩论会”时说：“实际上反‘地方主义’错误影响面很广，直至‘文革’期间还搞了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把尹林平、云广英、林锵云、冯燊和我等人打成为‘为地方主义翻案集团’，林和冯都被折磨死了。”地方主义一案，直到1980年代初，才得以完全平反。

高官辩论会 2014.01.18 羊城晚报

中南林学院的武斗

信息来源：2013.09.07 羊城晚报 B10 荒唐岁月 叶曙明

1967年8月，广州市内到处可以听见刺耳的枪声。8月7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发生武斗。据警司的报告，是五中东方红一批学生占领了地总在市二宫对面的一个分部办公室，地总要求他们退出，他们断然拒绝，并向外求援。地总、红总把路口堵死，准备夺回分部。但旗派的大队人马随即赶至，又从外面把他们反包围了。在这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军管会值班室的日记中，充满了一种箭在弦上的紧张感。

市二宫的武斗已开始。主义兵已去了，打上了。

市二宫：21：15。旗派打了二枪，同时向海珠桥打信号弹，谁打不清楚。市二宫内无灯光，电灯线被剪断。情况待查。（省军区报告）

中心区、越秀区，发现旗派的15台大汽车，坐满人，还有轻机、步枪等，准备去海珠桥，支援市二宫的武斗。（警司报告）

地总被围约五百人。旗派约有五千人。打了三枪，武斗正在进行。

8月9日，中南林学院也发生大型武斗。

中南林学院在广州地区的“文革”中，一直是处于风口浪尖。早在1966年11月，中南林学院和中大部分学生率先北上“揪陶（铸）”，在中南海西门贴出了炮轰陶铸的大字报《强烈要求陶铸和我们辩论黑材料问题》。大字报指陶铸“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包庇广东省委，抗拒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紧接着又在中南海西门、前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中宣部贴出了炮轰陶铸的第二张大字报《陶铸与广州大专院校学生保守派的一次秘密会见》。1967年1月，广州15间大专院校相继发生造反派“夺权”，而中南林学院是最早夺权的学校之一。1月25日的广州市公安局夺权，酿成“一·二五事件”，爆发“文革”以来最大规模的武斗，中南林学院红卫军也是积极参与武斗的组织之一。

1967年8月武斗的起因，据军管会驻中南林联络员的反映，8日晚上，江村铸管厂的地总和三元里江夏大队的农民一起抢了军队仓库，当他们把抢到的枪支弹药，用三辆卡车，运往新市，经过中南林学院时，被中南林东方红截住，车上的30多支手枪、一支冲锋枪和弹药，统统劫走，还抓了一名司机（随后放了）。

几十名三元里的农民赶来质问东方红，为什么抢他们的武器。东方红回答，武器要掌握在造反派手里。双方大吵大闹，东方红扣了一名农民和两名工人。其他农民跑回家召人，到清晨6时许，江夏大队开来了四五百名农民，大部分携带武器，气势汹汹，包围了中南林。

武斗随即爆发了。

两派群众都火速驰援。旗派去了17卡车的人，其中有新一司的警备团。地总、主义兵、春雷等群众组织也有队伍开去。双方都动用了机枪、冲锋枪和迫击炮。一时间，枪声不绝，炮声隆隆，宛若一个战场。

空军支左办：13时。

中南林被围，断水断电，情况严重。中医三〇一请求空军支援。三〇一不相信警司，说警司两面三刀，要求新华社发报中央，请援。

贫革联：要求中南林放人，治疗伤人；归还武器；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情况。

中南林：要求包围人全部撤退；要派部队进驻学院；重伤员住院；要军区向中央报告（到目前为止只派了警司二十几名干部，未派部队）。

院校组派了六名宣传员到中南林做工作；一二四师派了两个连到现场，但进不去。双方战斗激烈，步枪的“砰砰”声、冲锋枪的“嗒嗒”声、机枪的“嘎嘎”声，响成一片。据校院组的报告，中南林东方红有300多人被困在八、九号大楼内。双方均有伤亡，中南林东方红死一人，伤三人；郊贫联、地总死一人，伤五人。东方红提出，东风派先撤退，他们再放人。但地总则要求：东方红放人、归还抢去的武器。如6时前不答复，就用手榴弹炸毁大楼。

中南林的学生一面向军管会、警司发出照会，一面匆匆撤往山上。造反组织的《红色暴动》小报称：“‘春雷’、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在广谭的指使下，调集几千人，用轻重机枪、步枪对中南林学院革命造反派进行了疯狂围攻和扫射；‘天上掉下来’的炮弹打翻了前往救援的工联、八一战斗兵团、红旗工人等造反派的车辆；抓走了撤退上山的战士，许多人至今下落不明；基础楼、学生宿舍的财物被抢劫。在我有力自卫反击下，匪徒们才仓皇逃窜。堂堂的军管会、警备区在造反派的一再照会下却沉默不理，反而血口喷人，说什么是新一司和红司打内战。”文章把事件称作“广州兵变的第一步”。

虽然这类满天乱飞的小报文章，无不充满了互相谩骂、诋毁之辞，甚至不惜夸大、捏造，但当我们小心地拨开迷雾，总可以看到某些基本的事实：一、发生了武斗；二、参加武斗的组织；三、军管会的态度。

中南学院林武斗之后，人民汽车（即公共汽车）1、3、5路线全线停驶。从而揭开了广州城市交通瘫痪的序幕。其他各线也只维持有限度的行驶，一般只是早上9时至下午3时出车，有些线路实行“行日不行夜”，有些线路则缩短行程。市民的日常生活，备受干扰。

八月抢枪狂潮

2013.08.17 羊城晚报 B10 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1967年七·二三武斗之前，广州两派的冲突，并未动用热兵器。但“文攻武卫”使武斗合法化，各群众组织开始纷纷制造武器，发展到抢夺军队枪支弹药、军用设备。

广州是何时何地发生第一宗的抢枪事件的呢？有人说是7月19日抢夺铁路武装部和驻军枪支。也有人回忆，旗派的第一次抢枪，是几个学生抢了农民运动讲习所里的枪支（展品）。抢枪风开始四处蔓延，两派群众都参与了，在7月下旬，形成了一股狂潮。

员村的地总工人缴了一车解放军带红外线瞄准器的冲锋枪。广船地总在厂区埋设地雷，布岗放哨，对不上暗号的人，一律不准进入厂区，否则格杀勿论。黄埔岛的地总工人抢了两艘炮艇、几门双管三七炮和多挺12.5高射机枪，每个山头都架起了机枪。长洲的兵械修理厂、海军的大批装备，都在地总控制之下。他们扬言要把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白鹅潭，谁敢乱动就开炮打谁。

8月初，群众抢武器达到了高潮。8月5日下午，数千群众冲击警司办公楼。先冲作战大楼，再冲政治部大楼。在混乱之中，五人重伤，89人轻伤，一名副参谋长和一名保密员被群众绑走了。

仅8月6日一天，全市发生了44宗抢武器事件。这一天军管会总值班室接到的各方报警，触目惊心：

1、公安局仓库在今晨4.00被抢去枪支2621支，其中包括机枪六挺，步枪178支、手枪2437支，子弹176820发。具体是由哪些单位抢的，现在还不能完全断定，但是据说在抢武器时发现他们拿的凶器上写有广医红旗的字样（内应外合）。

2、航运公安局在4.50和5.00先后两次被抢，抢去枪支164支，其中包括轻机枪六挺，卡宾枪10支，冲锋枪14支，步枪31支，手枪103支，弹药15815发，短剑、刀13把。第一次是广医红旗抢的，第二次是三司抢的。

3、十一处在今晨7.00枪支被抢去134支，轻重机枪各一挺，冲锋枪四支，三八步枪20支（枪机被拿），猎枪二支，小口径一支，手枪105支，弹药1000发以上，东洋刀一把，可能是一二五总部抢去。

4、海珠分局10.00枪支被抢，是三司、红旗工人抢的，共抢去37支枪，其中步枪33支，轻机枪二挺，卡宾枪二支。

5、12时公安红旗将八处的枪全部分了。

6、越秀分局的枪在1.00被手持大刀、长矛的工人全部抢去，是用车运走的，车号14-15692，数量待查，谁抢的不清。

7、3.30荔湾分局的枪被抢（三司抢的），机枪二挺，其他武器不详，子弹一万多发。

8、今天早上6.00~下午1.00航运公安局炮艇和派出所的枪支交给三司保管共41支，其中包括重机枪12挺，其他39支，子弹数不详。

9、4.30郊区分局的枪支被抢，来抢的单位和被抢的数量不详。

10、公安局政治部办公室下午发现短枪14支、子弹800发丢失。荔湾分局

有 19 个派出所报有六个派出所被冲击，有 15 个派出所没有人。南源派出所反映，四类分子要血洗南源。

11、光扬派出所 4.00 多有 20 多人冲进去抢去冲锋枪一支，手枪六支，弹药 300 多发，哪个组织抢的不清楚，派出所的人员现在全部走光。

12、岑南派出所在 4.00 被冲击，抢走全部枪支弹药，数量不清，被谁抢也不清。派出所人员全部走光。

13、文安派出所在 4.00 被冲击，抢走全部弹药武器，数量不清，被谁抢也不清。派出所人员现已全部走光。

14、黄沙派出所 9.10 有几百人包围，现情况不明。

15、清平和人兴隆派出所也受到冲击，大概也是想夺枪，现情况不明。

16、郊区分局在 7.00~7.30 又被抢了一次。

17、东山分局在 8.00 先后去了两批人抢枪，第一批是公安红司（车号：15-10496），抢去卡宾枪六支，步枪十多支，轻机枪四挺，冲锋枪 12 支，枪机已被拿。第二批是三司，因来迟了未抢到。

18、6.30 三司、红旗工人到六处抢去重机枪一挺，轻机枪一挺，卡宾枪八支，步枪八支，子弹不详。

19、7.00~7.10，三司、红旗工人抢了十二处短枪 31 支，子弹不详，把保险柜抬走了，内有机密文件。

20、7.30 有两车人去防空委员（会），将武器弹药全部抢走。是谁抢的不知，数量不详。

21、广东省军区报告有 30 余人扛着 60 多支步枪，两挺轻机，两箱子弹向二沙头方向走去。

△白副政委 4.00 指示，告诉警司对还没有被抢的分局：东山分局、郊区分局、六处、十处及派出所要尽快采取措施，将枪机拿掉（已告警司佟参谋）。

22、省军区作战处冯参谋报告：今天 17 时许有两卡车约 60~70 人左右，带着凶器冲击市人民法院，打开保密室，抢走武器一批，共计步枪七支、手枪 28 支、轻机枪一挺、卡宾枪六支、气枪二支、小口径一支、猎枪一支、手榴弹 284 枚。

23、荔湾分局的 19 个派出所全部被抢，海珠分局有五个，越秀分局二个，东山分局也被抢，数目不清，是谁抢的也不知道。

24、今天下午 10.30~11.00，广州军区用汽车送三个建设兵团去上阳岗，在农林下被铁中将汽车（车号丙 9-5429）抢去，将司机的一支手枪和 24 发子弹也抢走了。

8 月 10 日，长堤人民银行负责保卫金库的一连解放军武器被抢；8 月 12 日，广州军区后勤部被抢，全部军用卡车和两车军火被劫；8 月 20 日，石井海军仓库被抢。当时军队内部也分成两派，有些人把武器收藏起来后，又暗中指引某些群众组织去抢夺，使得局势更加复杂混乱。据军管会的估计，武斗期间，广州两派共抢了一万多支枪。

广东省总工会武斗

1967年8月14日凌晨3时3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广州各群众组织驻京代表，其中包括工联、红旗工人、广铁总司、八一战斗兵团、省直红旗、新一司、三司、红警司等。他批评广铁总司8月12日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支的行动。他说：“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香港特务进来怎么办？外流逃窜犯交给谁？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周恩来一再强调，“我们首先要解决广州的治安问题”。

8月16日凌晨4时10分至6时40分，周恩来第二次接见上述几个组织的驻京代表，他仍然强调：“广州一定要马上恢复革命秩序。”省军管会随即发出《告广州人民书》，要求各群众组织迅速交还抢夺解放军的武器，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抢夺解放军的武器和军用物资，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根据中央指示，军管会要求红旗、东风两派，再派出主要负责人上京谈判。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的武斗却突然爆发了。

8月16日下午7时左右，一辆中卡从海珠桥方向，驶往省总工会。卡车上是工联和八一战斗兵团的人。在驶近总工会时，向天开了一枪。总工会大楼内是地总的一个分部。枪声一响，里面马上开枪迎击。双方对射了几分钟。

这是红警司成立后策划的第一次武斗，具体部署是，八一兵团从二轻大楼方向进攻，一批大、中学生从工人医院方向进攻，三司红旗兵团从海珠桥长堤方向进攻，海员总司负责封锁江面。旗派包围了省总工会，并全部控制了四周的制高点和附近的交通要道。枪战持续不断，警司多次派部队、联络员和救护车，都无法接近。

由于武斗发生在广州两派代表赴京谈判前夕，军区非常重视。陈德政委作出三点指示：一、警司立即派员去，弄清火力点在何处？有几处？火力点系何组织的？要与他们保持联系，做好工作。二、警司派员抢救该区的伤员。三、警司对上述执行情况，属实汇报。陈青山副主任也指示：请各组速通知各线宣传员、联络员，找各个组织的头头，做好工作，好好谈一谈，要把总工会这个点的武斗制止下来。

18日晚上9时，省军管会向北京告急——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并转黄永胜同志：

近三日来，广州市“工联”和住省总工会的“地总”发生枪战，双方都有伤亡。“工联”已占据总工会附近的几处制高点，并控制了周围的要道，今晚工联已紧缩了包围圈，通过广播要地总人员全部撤出，交出武器。“地总”的六十余人，表示与大楼共存亡，警司派人调解无效。为了避免继续流血，立即制止事态的扩大，我们除继续做工作外，特建议，中央文革给有关方面来电话指示，或转告双方在京的负责人紧急处理。当否，请示。

广东省军管会

总工会内的地总频频用电话求援。19日零时5分的电话称：“我们可能最后一次打电话，旗派打炮，电灯全部熄灭。情况紧急，要求派部队求（救）援。”另外有一个没有记录人姓名、时间、事由的电话记录，用红笔龙飞凤舞地写下：部队派出否？军管会采取什么措施？

王：部队派不出，接近不了，这里没办法。向北京报告，未表态，首长已走。到处戒严，根本进不去。

这是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19日零时以后，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二轻局方向首先打了三枪，各火力点一齐开火。省军管会一份综合材料记载：“到19日零时20分，工联发起总攻。使用了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和炸药包。打讯号调增援队伍，据查还有中大红旗、三司、华工红旗等组织也参加了，约千余人。到1点30分左右，工联等组织已冲上四楼，地总已退到五楼（最后一层），现正通过广播做瓦解工作……地总分部人也表示要与大楼共存亡，该总部也要采取行动，现事态正在发展中。”

凌晨1时05分，陈德亲自给警司打电话，要他们立即派出部队。1时15分，总工会方向突然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一股浓烟翻滚着升上天空。一共是六个炸药包爆炸。

3时15分总工会内的地总打电话给工交组，问军管会究竟是什么态度，再不采取措施，他们就要与大楼共存亡，用炸药炸毁大楼。工联已经攻入大楼了，并在楼下纵火，想把楼上的人逼出来。

据当事人回忆：攻打省总工会的人，很有作战经验，这批人打，掩护另一批人冲上前；这批人上去了，再掩护后面的人冲上前，这样作梯级前进，一排排地打枪，一队队地逼过来，是有作战指挥的，不是乱哄哄地嚷着“打总工会”就乱冲乱打的。

19日凌晨，周恩来从北京打来长途电话，命令立即停止武斗，撤走攻打总工会的队伍。广州军区派了大批解放军到总工会解围。中午11时，地总、春雷开来了三车援兵，冲进总工会内，登上顶楼，架起两挺机关枪，瞄准工人医院方向。11时33分，双方各种轻重火力一齐射击，枪声震耳，弹雨横飞。地总有几千人从河南经海珠桥，向海珠广场集结，举行游行抗议。队伍走到靖海路，遇上旗派的人，双方又打了起来，群众争相走避，互相践踏，一片混乱。

下午4时8分，部队突入总工会，把地总人员全部接出送走。当夕阳在珠江泛起粼粼波光时，省总工会大楼余烟缭绕，人去楼空。事件至此，暂告一段落。

叶曙明

省总工会武斗 2013.10.19 羊城晚报

“红警司”掀起反军浪潮

1967年8月初,《红旗》杂志发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两报一刊连续发表一系列关于“炮打司令部”的文章,全国形势急剧升温。造反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炮轰的调门,也愈提愈高,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的口号,遂响彻羊城。

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焦点的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8月11日,经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示,同意公开宣布摘掉其反革命组织的帽子。原八一战斗兵团的跨行业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同意在摘掉帽子后不再恢复。该组织原来的成员可参加本单位的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或另组不跨行业的基层组织。毛泽东在中央的电稿上加了一句:“但如广州其他群众组织尚有跨行业的,则应允许这个组织暂时跨行业,将来再归口。”

8月13日,广东省军区就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事,发出公告:“现正式宣布摘掉‘八一战斗兵团’反革命组织的帽子,政治上予以平反。‘八一战斗兵团’现在仍被拘留的人员,除极少数有现行罪恶的坏人,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的人一律释放,予以平反。被拘留的人员在拘留期间所写的检讨退还本人,讯问记录和其他材料由广州警备区在原‘八一战斗兵团’派出的代表监督下集中销毁。”

根据中央指示,八一战斗兵团政治上平反,组织不能恢复,但他们早已自己给自己平反了,不仅恢复了组织,而且还相当活跃。当军区宣布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之际,他们正和工联、广铁总司、石井红农友、红司、部队文体红司、机关红司共同组成“广州地区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

8月11日,由部分旗派的民警、复退军人、工人、干部、学生组成的“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后归入红联,改称“广州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警备司令部”,简称红警司)正式成立,下设参谋部、政治部、作战部等机构,配备有三个“警备团”,另有一支“前线突击队”,还派出巡逻车在市内巡逻。他们给自己定下的任务是:“一是夺取‘广州陈再道’掌握的警司大权,二是夺取权检法专政机关大权”,肩负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

广州批陶联委在8月14日召开会议,为批陶联委重新定位。会议认为,把批陶联委的作用仅仅局限于批陶,“显然不适合今天形势的要求了”。批陶联委必须升级,“将‘广州批陶联’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有条件时过渡到广州革命委员会,成为权力机构,这样,它就不仅‘批陶’了,而且要领导广州的整个运动,将社会治安、交通、供应都搞起来。”

8月12日上午,工联开了两卡车人到南方大厦,手执大刀、匕首、手枪、步枪、轻机枪,迅速守住了各个门口,逐层占领,直到六楼,并封闭了一、二、三楼,不准营业,做总部办公室之用。

8月14日中午,中南局联络总部的群众组织包围了军区司令部大院,并冲了进去,军区先后有四五位部长出面劝说都不肯散去,直到下午,由一位副参谋长出来与他们见面,造反派宣读了“强烈抗议”之后才离去。

造反派的目的，是改组省、市军管会，直至接管广州的地方政权。在他们心目中，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相炜和副主任江民风，是接替刘兴元（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德（广东省军区政委、省军管会副主任）领导军管会的人选。相炜在抗战期间曾任中共博兴县委军事部部长，参与组织抗日游击队，后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江民风是著名的“塔山英雄团”政委。这时，相、江二人都在军内接受隔离审查。

旗派组织新一司接到一个任务：要立即把相、江二人从军区抢出来。但他们只打算抢江民风，不抢相炜，因为当时关于相炜“历史上有叛徒嫌疑”的谣言甚盛，造反派有所疑虑。而江民风一直没离开过部队，又是塔山英雄团的政委，历史响当当。

造反派接到任务后，到军区附近侦察了一下地形。他们已经得到情报，江民风就关在达道路与烟墩路交界的一幢小洋楼里，而相炜则在旁边的小洋楼里，都有警卫看守，与军区大院的门口遥遥相望。他们的抢人计划是：组织一班人围住军区大院门口，要军区领导出来接见，发枪武装旗派。用这样的方法引开他们的注意力，然后冲进去把江民风抢出来。

8月17日，计划付诸实行。人民教育学院两三百个学生围在军区大院门口，吵吵嚷嚷；水泥厂的红旗工人负责封锁杨箕村、达道路、东山的所有路口。新一司造反派在一位军区家属的引路下，开着一辆吉普车到了江民风的门口，踢开木门冲进去。江民风的家属和相炜在，江民风却不在。

造反派追问江民风的妻子，江民风在哪里？她不清楚来者是什么人，就说不知道。这时，给造反派带路的那军区家属忽然高喊：江民风来了！江民风果然正从军区里面出来，有两个战士跟着。造反派马上跳上车，把吉普车开到马路中间停下，截住他们，几个人用枪指着那两个战士，问江民风：“你是江民风吗？”他回答：“我姓江。”造反派马上把他拉上车，两个战士急得大叫：“抢人啦！抢人啦！”造反派已经把车开走，直接把江民风送到了中山医的住院大楼。

8月，是造反派“炮轰广州军区”的高潮，也是批陶联委和红警司最活跃的一段时期。

“红警司”掀起反军浪潮 2013.08.31 羊城晚报

三元里武斗

两派组织在北京谈判还未开始，8月20日，广州又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武斗事件。武斗的起因，旗派方面说：8月20日上午，工联、广铁二司、中大红旗、十一中红旗、铁中红旗等组织的几百名群众，分乘17辆汽车，先后两批到石井。早上7时左右，在三元里到石井的公路上，遭遇地总、春雷、主义兵、大联总、郊贫联等组织的伏击。

当时的小报，把这次武斗描述得非常惨烈，“机枪不停地向这几辆车扫来，在周围不时有手榴弹爆炸”，“公路两旁遍是尸体”，光是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的就十多人，受伤住院的50多人。有的文章甚至声称，死亡人数达150人，轻重伤无法统计。

这次武斗旗派吃了大亏，伤亡惨重。可以说是广州“文革”以来武斗伤亡最严重的一次，但准确的伤亡数字，众说纷纭，已很难考证。当年郊区军管会有一份报告，讲述武斗经过，是这样写的：

早上旗派（红司、新一司、三司、工联）一车队共八台武装车前往石井方向……

先头车于8:30在红旗大队与汽车三厂的一部车（地总司机，车上坐的是郊贫联的三人，正在掉头）相遇，发生摩擦，旗派车旋即向之开枪并投手榴弹，炸伤郊贫联二人（还有些过路的亦有被炸伤的），此车至龙归被郊贫联截住，旗派的第二辆车在新市被截住，第三、四辆车未到新市就下车，散开向郊贫联开火。第五辆在园景大队与郊贫联交火被坏（毁），第六、七、八辆一路走一路打枪，亦在新市附近被截住。武斗从上午8:30起，11:30左右停止。

伤亡：据初步了解，旗派二人，重伤二人（有死的可能），轻伤不清。郊贫联死一人，伤七八人。旗派被抓75人。

8月21日上午9时，由北京、武汉等地的造反派组成的“战广州兵团”，在广东省军区门前聚集，要求会见军区领导。温玉成副司令和孔石泉政委接见他们时，出示了一份省军区作战处处理事件报告，并解释已经用电话报送北京转周总理处。这份报告所反映的事情经过，与郊区军管会最初的电话报告，略有不同：

8月20日上午7时许，旗派（红司、新一司、三司、工联）有八台汽车，据说是开往石井海军仓库搞枪的，途经三元里附近（棠溪村）郊贫联岗哨要停车检查，旗派的车不停，并边走边打枪，郊贫联岗哨也对空鸣枪。车到新市时，因郊贫联与新市车站、机电公司仓库有联防关系，该联防组织不让旗派的车通过，旗派的战士则打枪并投掷手榴弹，双方即对打起来，至11时停火。旗派死4人，伤17人；主义兵死一人（是在农村劳动的），郊贫联伤九人；另一过路者受伤。旗派被抓135人，其中在新市被抓100人，分四批释放……

处置经过：

上午8时30分，警司接到群众报告，三元里一带有发生武斗的可能。10时10分，接三元里301工厂军代表报告，三元里郊贫联与旗派已发生武斗，警司当即布置：

一、郊区军管会由负责干部带领工作组前往了解情况，并对郊贫联进行劝说工作。去了一副部长和两名干事。

二、警司派出一宣传组到现场。

三、通告总医院和各门诊部组织救护车前往抢救。共派出一大卡车和三部救护车 12 时左右到达现场。

警司 14 时 25 分报告省军区，要求派出部队；15 时 26 分，由警司王副司令和 371 团团团长率领两个连从警司出发到白云机场北面，遇到红农友拦阻，经反复进行工作，无法通过。当即由警司作战处张处长带一工作组绕道到新市开设指挥部，了解现场情况，组织抢救。

21 时 35 分，组织两个排，并派三台空车到龙归市，护送旗派 33 位同学直达中山医学院。

省军区作战处的这份报告，马上招致旗派的猛烈抨击，指它是“恶人先告状”。红旗工人总部提出七项要求：“一、要求严惩地总、红总、主义兵一小撮杀人凶手。二、要求军管会对八·二〇事件表态。三、要求军管会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要求保持现场。五、要求将全部伤员抢救出来。六、要求保证被地总等抓去的人员生命安全并无条件释放出来。七、八·二〇事件的责任应由省军管会负责。”红旗工人声称：“我们红旗工人十多万人是不好惹的，如果胆敢和我们对抗，我们就要和你们拼到底。”

造反派对广州军区发动一轮更猛烈的攻势。广州兵团叫喊着：“刺刀，刺刀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关键的时刻到了！”《广州兵变的序曲》、《坚决打倒广州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抓紧战机，向广谭发动总攻》、《夺枪以后》、《发动群众反兵变》、《广州告急！广州告急！广州十万火急!!!》一类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小报文章，宛如惊涛裂堤，铺天盖地，转瞬间淹没了广州。

8 月 20 日，也就是三元里武斗当天，广州军区党委在造反派的猛烈攻击下，被迫作出《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承认军区在介入地方“文革”以后，“没有首先肯定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大方向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打击和压制了某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武斗在广州地区凶猛蔓延，未有平息迹象。地总宣称他们有 36 个分部被砸，三个区的总部被毁，30% 的牌子被破坏。而旗派则指责 8 月 20 日武斗的同时，地总还袭击了渔轮厂的旗派汽车，打死一人，打伤十几人；在黄埔打伤省实红旗、十五中红旗多人。

8 月 21 日上午，由新华社记者、清华井冈山、批陶联委、省军管会等 30 多人组成的“八·二〇血案”调查组到现场调查时，又被主义兵伏击，打死一人，打伤司机一人。8 月 22 日，地总打死在员村百货商店贴大字报的四十四中红旗一人，打伤七人。许多指控，真假难辨，唯一可以说明的是，双方的气焰，都没有因为北京谈判而有所收敛，反而愈加高涨。

北京在谈广州在打

周恩来在北京主持广州两派组织的谈判。他在会上说：你们抢军用物资和援越物资，简直是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不要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以后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了。“军内一小撮”是七·二〇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

《红旗》杂志在第 14 期发表了社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可靠支柱》。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展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中央开始重新强调军队的权威，显示出要靠军队之力，来稳定大局了。

8 月 24 日，广州军区下达关于收交武器的三点指示：“一、各造反派，尽量做到将要去的武器，送交原地点、原单位。收缴武器单位要对送交武器的造反派热情接待，并给予鼓励。二、如果各造反派实在记不起，搞不清要去的武器原属的地点单位，属此类性质的武器，可送交附近驻军单位，该单位对送交武器的造反派要热情接待，并给予鼓励。要办理登记手续，双方负责人签字，报表，武器类别，数量，时间，何组织。三、军区作战部已通知广州驻军单位，负责上述第二点指示的具体工作。通知各组尽快转达上述指示。”指示婉转地把“抢夺武器”称之为“要去武器”。

然而，8 月 26 日，广州文冲船厂却被一片腥风血雾淹没了。文冲船厂内的两派组织（东风派的五湖四海和旗派的红革会），从 8 月 24 日开始，已处于临战状态，双方封锁厂区，劫走厂船，挖掘工事，埋设地雷，互相对峙，短短几天之内，发生了好几次开枪事件。

8 月 25 日晚上，双方在一片蔗田里短兵相接，动用了机枪和炸弹。8 月 26 日上午，五湖四海勒令红革会在当天下午 6 时以前，拆除牛山（厂生活区的一小山）上全部工事，全部人员撤下牛山，填平战壕，取出埋下的全部地雷；立即封存所有枪支弹药，不得私自转移，不得分散隐藏，全部交“联防指挥部”处理。厂区内的高音喇叭整天叫喊：“不要搞武斗了！不要搞武器！放下武器吧！”红革会断然拒绝了对方的命令。

当晚 9 时 45 分，武斗开始了，双方使用了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照明弹。地总的两条炮艇从黄埔驶来，利用“洪湖”、“建华”两艘远洋轮为掩护，向红革会的阵地扫射。经过 35 分钟激战，双方均有伤亡。广州军区派了六个连驰赴现场，制止武斗。

在此期间，广州冷冻厂、氮肥厂、西村水厂、电厂等地，武斗此起彼伏。在大街上互相伏击、打冷枪、绑架，更是层见叠现。

9 月 1 日凌晨，周恩来再次接见广州地区两派群众组织代表。他说：“我看派性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现在黄埔港无法卸货，每条船每天赔 500 英镑。这不是抓革命，促生产，

这是严重浪费。你们再这样搞，黄埔港就要实行军管。军管是可以武装保卫，可以抓人的。”

周恩来说：“上次我没有要求你们马上缴枪，只是封存起来，达成协议后，就要大联合，难道还要打个你死我活吗？你们还有什么不能联合的呢？工农联盟是主力军，我首先向工人、农民呼吁，立刻把武器封存起来，如果你们同意，我立刻派代表团跟你们一道下去。你们工人、农民要做模范，把武器封存起来，才能制止武斗。”

同日下午2时，两派组织代表在北京再签订《关于“拥军爱民”和制止武斗的四条协议》。最后商定以9月7日零时为封枪时间。但第二个四条签订之日，也是广州港河南作业区太古仓发生激烈武斗之时。

太古仓位于珠江边，与广州重型机器厂和广州造船厂相邻，是一个重要的进出口物资仓库。9月1日下午，工联与地总在这里发生冲突，工联据守在仓库三楼，地总四面围攻。三司的学生从大沙头乘船增援，战况愈加激烈。傍晚5时，仓库突然起火，火势相当猛烈，蔓延迅速，当夕阳西下以后，七、八、九仓基本付诸一炬，三、四、五、六仓也损毁严重。里面贮藏的3500吨白糖、几千吨大米、1000吨日用百货和100吨烟胶，全部变成一片灰烬。据当时报告的数字，武斗造成七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国家财产损失300多万元。

三司开来了两艘炮艇和一条木船，接载工联人员突围。他们在江面和地总再次展开了惨烈的战斗。子弹划破空气的光痕，在江面乱窜。三司的小报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

两艘炮艇、一艘木船满载着满腔怒火的三司战士飞驰而来！杀人成性的地匪把水面组成了一个火力网。坐在第一艘炮艇上的五十一中红旗战士，17岁的机枪手邝××，即以准确而猛烈的火力向地匪还击，打乱了地匪的阵脚！眼看炮艇就要冲过火力网了，地匪竟集中所有的火力向邝××打来！……将要冲出地匪火力网的时候，一颗万恶的子弹击中了邝××同志，但他咬着牙根，坚持着打完最后一梭子弹……

这种场面十分悲壮，但却让后人无法明白，这些人究竟是怎么了？是疯了吗？是脑筋出毛病了吗？这样以死相拼，究竟为了什么？双方都高喊着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为了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奇怪的战争。

交枪前后

两派在北京谈判，主持谈判的是中央文革，但处理广东问题是周总理出面最多。周恩来在会上严厉地批评东风派的头头：“你不要以为你的山头很大，我两句话可以叫你一个人也没有！你能不能处理好广州的武斗问题？”这位头头说：“只要按着毛泽东思想办事，我相信大家是听我的。我可以处理得好。”周恩来说：“好，既然你能处理得好，你明天就回广州，把武斗的事情处理好。”他告诉大家，中央调查团马上要到广州了。

这位头头回到广州后，马不停蹄，把北京的情况传达到各分部，他说：“你们再继续这样打，等于送我上断头台。我们有理由就不用怕，要把真实情况向中央调查团反映。希望大家相信我。大家还要抓好革命，促好生产，如果搞得广州乱糟糟，整个生产都停顿了，我们就是历史的罪人。”

军区派两名解放军陪着这位头头，负责保护他的安全。他去哪里，车就送他去那里。先到几个火药味最浓的地方开活跃分子小会，然后在总部市一宫开大会，广船、广氮、西村水厂、铸管等广州市产业工人比较多的地方，都派人去了。在员村、广氮收缴武器；到海珠区渔轮厂、黄埔船厂封存海军的武器，当时广船、黄船都有大批武器，是南海舰队的，如果用来武斗不得了。陪同的解放军不出声，但他们都看在眼里，向中央作了汇报。

9月2日，中央调查团抵达广州，开展调查，其实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收缴武器。当时的小报，全是这类报导：“9月5日，广铁总司就把全部枪支弹药集中封存，8号黄昏，广铁总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毅然把它统统交给支左部队”。中大红旗“把8月23号各分部封存的枪集中，9月8日，他们和驻军一起，敲锣打鼓把枪送到军区”。华师红旗在8月6日晚开车进城，把驻外单位的枪支全部收回，“9日，他们又愉快地把全部枪支弹药归还军区”。“7日零时之前，工革联的枪封了，八一战斗兵团的枪封了，珠江红司的枪封了，广州红司的枪封了……”

对于两派组织来说，这是一场热闹的政治表演。双方都摆出一副坚决拥护中央命令的姿态。实际上，交出的武器只是小部分，不管是旗派，还是东风派，大部分枪支弹药，都没有交出。9月7日以后，双方仍不时用枪互相袭击。广州市区仍不时可以听到阵阵枪声。

9月11日，东风派组织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大会，宣布“广州地区工人革命委员会”（简称工革会）成立。大会还未开会，吉祥路、财厅前、中山五路一带，已经纷纷乱乱，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省军管会值班记录：“据财厅‘东方红’反映，主义兵在财厅附近已向旗派开枪，打死一人，打伤二人，旗派已抓住一主义兵，现正在抓。估计，总派游行时，可能会发生武斗。现中山纪念堂附近成群的人正在进行辩论。”

会后东风派队伍向中山五路方向游行。据东风派称，他们在省人委、市人委、轻工局和吉祥路转弯处等地，分别遇上旗派用砖头、玻璃、铁棍袭击。在百花园、

中山五路百货商店和健民药房附近，旗派向他们开枪和投掷手榴弹。但旗派指责是东风派的汽车乱冲乱撞，撞倒了行人，激起民愤，才发生群众围攻工革会的事情。

1时50分，中央调查组转达周恩来指示：“告诉旗派同志们，不要拦阻东风派游行队伍。”但这时从北京路方向，却传来了手榴弹的爆炸声。省军管会有如下值班记录：“今天发生大型武斗一宗。武斗结果，东风派死八至十人，伤约三百人；旗派死一人，伤约四十人。东风派因被围越秀山，没有吃喝，晕倒二百人。武斗在上午11时发生，下午5时结束，郊贫联回不去，住了三个地方，省人委住四千人，市一宫住四千人，广州军区警卫营住二千人。”

这天，从化农民分乘80辆汽车来参加大会，有60辆开到省人委，其余的被围在中山五路，动弹不得。农民们很多是第一次到广州，情况不明，又怕走散，所以没有参加大会，他们向军管会求助，把被围的人和车接到省人委。

9月12日凌晨，两派群众在轻工模具厂又发生严重冲突。由于9月11日地总部分工人在珠江新桥受到工联的袭击，这天，地总进行报复，开炮轰击了位于新桥脚的工联第一总部，共计发炮数十响，一人死亡，多人受伤。

9月13日，地总和郊贫联一万多人，冲占军区大院，执意召开大会，并静坐请愿。早上5时，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地区两县一区郊贫联代表时指示：“一、你们的大会不要开了；二、马上从军区大院撤出，因为你们到军区大院是违反‘九·五’命令的；三、在农民、工人、学生从军区大院撤走时，旗派不要阻拦。”

经中央调查组和军区领导与东风派代表商定，东风派从9月14日中午开始撤出军区大院。军区领导一再指示：为了保证安全，军管会系统要做好具体布置，此事关系重大，务必十分重视，特别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

但是，东风派从军区大院撤出后，又有一部分移师到省军管会继续请愿。周恩来对地总又跑到军管会，更为不满，9月15日，他接见广州地区代表，严厉批评地总不听劝阻，执意召开大会，到军区静坐；限他们在本日12时以前退出军区大院。他说：“要增强党性，不要搞派性，这是目前的大方向。广州秩序必须尽快恢复，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广州的交易会不能停开。”在军管会请愿的地总群众，终于陆续散去。9月17日，省军管会在广州大街小巷张贴第39号公告，开始执行恢复广州市秩序的任务。

交枪前后 2013.11.09 羊城晚报

支农青年大闹广州

“文革”期间，在广州的两大派的武斗中，许多人觉得是中學生冲在最前头，打得最凶猛，其实，除了学生、工人外，还有一批人相当活跃，就是“文革”前上山下乡的支农青年。他们大部分是从1950年代初起，因未能升学而被动员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的高中、初中毕业学生。他们许多人在农村曾受到种种不公平待遇。政府最初承诺三年轮换下乡，也没有兑现。因此，积压了一肚子的怨气。

“文革”刚开始时，他们在农村造反，“首先揭发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红色政权夺回革命群众手中”，并且“封闭公社、各大队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替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革命组织平了反”。但很快他们的斗争锋芒，便指向所谓的“刘、邓、陶为首的旧安置系统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一批批支农青年喊着“支农青年要自己解放自己”的口号，纷纷杀回广州“闹革命”。

1966年底刮“经济主义”风的时候，许多支农青年已经返回广州。他们真正要争取的，主要是城市户口和回城工作的权利。武斗开始后，这批不愿返回农村的支农青年，便成了让军管会最头痛的人。支农青年由于怨气大，胆子也大，无所顾忌，先是包围省军管会，又是要钱，又是要粮。陈德指示：“给线、给粮、给饭吃，如未带粮、带钱，可采取开条子、记账的办法。”并在省军管会里腾出地方给他们住。

但支农青年在省军管会住下以后，又转去包围农垦厅。1967年的7月6日，支农青年6123支队（一个群众组织名称）闯进农垦厅职工饭堂，砸开仓库，抢去1000公斤大米。7月7日，又扬言要再去抢粮，还要揪斗广东省副省长罗天。但这次农垦厅属下劳动大学另一派组织的潮州学生，已经严阵以待，双方发生了械斗。

6123支队400多人，包围了农垦厅大楼，用撬木、棍棒、石头往里攻。晚上，住在省军管会大院内的100多名支农青年，啸聚成群，前往农垦厅支援，一路上叫嚷“不夺回罗天誓不罢休”，吓得沿途居民家家关门闭户。据警司作战处的报告称

罗天在农垦厅被围，劳动大学在楼上，楼下是支农青年，现双方谈判（警司主持，军管小组参加，双方代表参加）。谈判结果：一、8日下午15时30分劳动大学交给支农青年，到12日上午8时30分支农青年把罗天交给劳动大学。二、双方都要保证罗天的生命安全。

但到了7月12日，支农青年没有把罗天交还。据农林水军管小组反映，为了抢斗罗天，随时可能发生大规模武斗，6123支队已准备好了七辆汽车和凶器。劳动大学也在准备去抢罗天。两派抢来抢去，闹得满城风雨。

军省军管会革委会认为，“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干扰了斗争大方向。一是武斗增多；二是刮起了一股平反风；三是回到城市的两万多支农青年，有的受坏人利用，把斗争锋芒指向中央，指向周总理。”两万多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

数字，如果卷入武斗，对广州的局势，将造成非常严重的恶果。

因此，广东省军管会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发出警告：“当前武斗日益增多，不断发生伤人和死人的事件。据最近发生的几起武斗事件看来，搞武斗的人多是支农青年，此外还有广州兵团、八一战斗兵团等，已经使用了手榴弹，个别的动了枪……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武斗，打击挑动武斗的坏人和杀人凶手，而仅仅是发生武斗后才去劝劝架，事后又不作出严肃处理，那样，将会使我们渐渐控制不住局势，武斗就会越斗越大，出现新的反复。”

11月初，两派虽然都把大联合高唱入云，但一度沉寂的武斗，却有复炽迹象。11月2日，大批支农青年包围了市一宫、红半总总部和劳动局。他们向市一宫投了两枚手榴弹，炸伤三人（后死亡二人），又向劳动局投了两枚手榴弹。爆炸声震碎了市民的美梦，为大联合投下了浓浓的阴影。

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广州赴京双方代表。周恩来谈到支农青年问题。他说：“广州还有一些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好。首先是支农青年。不光是你们广州有，上海、南京、长沙、武汉……都有。他们说上山下乡是黑指示，这是错误的，是站不住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主席的号召，城市的青年要到农村去，城市的不能都在城市，要消灭三大差别嘛。农村是广阔的天地，农村需要大批的知识青年，有利于消灭工农差别嘛！他希望两派不要互相指责，要做自我批评，尽快解决这个问题，让支农青年回到农村去。”

到了1968年下半年，不仅支农青年要回农村去，广州市“老三届”的32万毕业生，大部分都要到农村去。昨天他们还是“破四旧，立四新”、夺权、武斗的急先锋，今天便落得个“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结局了。这也是他们始料所不及的。

省革委会成立

1967年底，广州地区的两大派虽然实现了大联合，但各组织仍然保留着自己的旗号。对这种情况，周恩来认为不能操之过急。他以广州的工人大联合为例说：“广东工人阶级联合了，有三派，工革联、工革会、工交红旗联合，开十几万人大会庆祝，我们中央也去电祝贺。军管人员出主意叫第二天开会都不打旗，当时头头同意了，结果第二天开会，群众把旗都插到主席台上去了，更麻烦了，后来还是把旗子给了群众，大家都高兴。”

周恩来同意“联合不倒旗”。他说：“大联合不等于马上倒旗嘛。双方签字，就是承认你原来的组织。群众对自己的战斗组织有感情，你硬是要解散它干什么？等大家感到原来的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都赞成解散了，再解散也不晚。”

11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随后，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正式成立了。

11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再次接见广州赴京双方代表。周恩来说，大联合要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要很长的时间。即使是一个组织了，还有激进一点的，缓进一点的，保守一点的，这是正常现象，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联合起来，不要势不两立。联合了就可以制止武斗，更好抓革命促生产。广州工人阶级联合了，带了个头，要促进农民、干部、学生的联合。学生、干部的联合慢了一点，不要紧，有步骤地进行嘛！

关于省革筹小组问题，周恩来说，成立省革筹小组要两派的代表参加，工人联合了各派的代表（工革联、工革会、工交红旗代表按2：2：1比例），参加省革筹小组，其他组织联合后可派代表参加革筹小组。没有联合时，可派代表开协商会，联合了可以取消，但不要勉强。组织的取消由群众决定，各组织中的坏人由群众自己来抓。

11月15日，广州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分乘两架飞机，回到广州。1968年1月13日上午，省革筹小组协商代表在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召开座谈会。黄永胜、孔石泉、阎仲川、邱国光等领导及各部门负责人和协商小组全体代表参加了会议。

对省革委会的名额分配，军管会提出的方案如下：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总共180人，其中工人占25%，农民占20%，学生占15%，革命干部占15%，军队代表占15%，其他战线及机动10%。地区分配：汕头、惠阳、梅县、韶关、肇庆、佛山、湛江、海南等八个地区共占总名额的50%，省直和广州市占40%，其他及机动10%。

根据上述比例，初步确定省直和广州市的委员名额72人。其中：工人16名，占总名额22%；农民四名，占5.5%；学生红卫兵14名（其中中学生四名），占19%；革命干部19名（其中市革干一人），占26%，军队代表19名（其中市二名），占26%。

黄永胜作了详细解释：“上述方案经革筹小组研究多次，各地情况不同，没经验，江西是149人，我省人口多，委员名额也相应增加。工人名额最多，体现

工人阶级为领导；农民其次。全省共三千多万农民，占总人口比例最大；革干15%，目前可能站不出这么多，名额先留下，目前站出多少算多少，但太少对工作是不利的。将来还要大批解放干部的。本市中学和郊贫联主要参加市革筹，省的名额就少些。要分级参加。省市革干、军队参加比例大，这是为了便于工作，不然就会变成空架子。机关干部由革命干部代表，其他考虑比较困难。要，就得搞干代会，目前其他省都没经验，合不合适？11个省市都没成立干代会。他们可以作为省革委会的工作人员。有的地区未成立革筹，可以先把名额留下，成立后选出补上；未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单位也照此办理。这里可以先提出初步意见，回去交给广大群众讨论再协商。”

在第一次座谈会上，各派对名额分配，意见分歧很大，都要求增加自己那一派的名额。1月17日，再开第二次座谈会。会议一开始，大家又为名额问题吵开了。主义兵代表提出，学生比例太大，可以减5%。海员、铁路代表都认为广州工人代表应增加至25%；工革联、郊贫联主张工人代表增加至30%。工革会认为，广州市的工人多，大厂多，应增加工人比例。三司也提出是否考虑给教工一定的名额。省机关红司提出：机关干部要有名额，工农的名额应适当增加一至二名。中南联络站、省直红旗认为一般干部应该参加，而省委东方红、市直大联总则主张一般机关干部还是不参加好。

大家争得沸反盈天，基本上都是要求增加名额。黄永胜说：“关于省革委名额分配，总名额、总比例变动比较困难，总共180人已不少了。总的分配比例中，工农的比例都大于其他阶层，体现了工农为主体的原则。至于个别调整可以考虑，大调整很困难，还得请示中央，由毛主席、林副主席、总理来批准。”

除了名额之外，各群众组织对哪些干部能够站出来三结合，参加省市革委会，观点也不能统一，大家各有各的推荐人选，会上争论不休。会议愈开愈长，争论没完没了。黄永胜累得快打瞌睡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同志们，全省人民等着我们，我们要顾全大局，求大同存小异，尽快拿出个结果来。”

在谈到革委会成立时间时，黄永胜说：“革委会何时诞生，同志们已表达了心情，但这不完全决定（于）我们，（要）决定于全省的革命群众，希望大家按照毛主席指示条条落实、照办，紧跟主席战略部署，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当然我们也有责任积极进行工作。主席、林总、总理很关心此事，总理曾通过温玉成同志打过两次电话，要求我们抓紧工作，早日做好筹备。”

其实，成立革委会的全盘计划，都在中央那儿捏着，这里争持的，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繁枝细节而已。座谈会最后转而讨论起《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关于开展节约闹革命运动的决定》，一切遂成定局。

在广东成立革委会之前，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以及黑龙江、贵州、内蒙古、江西、甘肃、河南、河北、湖北等省份，已经先后成立了革委会。人们也许以为，中央对各地成立革委会，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其实没有。至少在2月5日之前，省革筹对什么时候正式成立革委会，还心中无底。

2月1日，省革筹转达黄永胜的指示，对群众询问什么时候成立革委会，采取搪塞敷衍的态度，王顾左右而言他可也。指示称：

关于有问到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问题，为避免敌人造谣破坏，及一些群众产生不必要的怀疑，

一、建议，（如果有群众组织及群众问到此问题）可以适当透露：如全省形势大好，但个别地区还有问题，如海南岛问题。中央对海南问题很重视，召集两派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待解决海南问题，再成立省革命委员会更好。

二、黄司令员到北京，中央委托黄司令员接见海南代表，解决海南问题，另外接见湖南代表，解决湖南问题。

但实际上，省革筹暗中正忙着四处打听，其他省份成立革委会的时间，很显然，广东省既不希望落后于其他省份，但也不希望过于仓促。在2月5日的省革筹值班日记中记录着：

第一秘书组：

请向四川、陕西、宁夏、西藏、安徽、吉林、浙江、辽宁、江苏、福建、新疆、云南打个长途电话：1 D' Z" o8 l/ E7 z" ? 1 t% C

你省何时成立革命委员会，请提前两天电话通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政治部值班室。

答复如下：

福建：军管会秘书处季科长答：现在尚未打算，一个月以后再看情形决定。

南京：江苏军管会革委会秘书办公室王同志：现在革筹小组尚未成立，那革命委员会暂时更不用说了。

银川：宁夏军区文革办公室田同志：宁夏革命委员会大概在2月下旬或3月初成立。

成都：省革筹小组办公室王同志答：现大联合还未联合起来，时间未定。

西安：支左委员会秘书组李同志：现有一个协商委员会，不准备经过革筹小组，大概要到3月份成立革委会。

西藏：军管会秘书组：革筹小组未成立，什么时候成立不清楚。

新疆：军区文办联络组苏同志：现在两派没有联合起来，革筹小组尚未成立。

昆明：军管会值班室梁干事：现在革筹小组尚未成立。

杭州：军管会办公室张同志答：现正在北京汇报情况，具体时间未定。

沈阳：沈阳军区支左办公室尚同志答：现在还不知道。

长春：省军区支左办公室随同志答：现正在北京汇报情况，日期未定，大约2月中旬可能成立。

安徽：省军管会值班室说，革命委员会什么时候成立还未确定。

看来大部分地区的进度，都很缓慢，广东省可以走在他们前面。2月7日晚上7时，省革筹小组在海屋开会，研究省革委会成立机构问题。2月8日，广州市海珠区革委会成立。2月14日，越秀区革委会成立。这两个区的革委会成立

早于省、市革委会。2月15日，市军管会发出《关于成立各级革委会（筹备小组）和革命领导小组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

2月17日，广州市贫下中农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农民也实现大联合了。广州军区、省革筹、省军区的领导出席了大会。国务院、中央文革发来贺电。工人、学生、机关、农民都先后实现了大联合，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2月17日，黄永胜从北京返回广州。谁都知道，成立广东省革委会的方案，经中央批准，现在就在他的公文包里了。

从广州两派组织上京谈判开始，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完成了交枪、铲山头、大联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斗私、批修”等程序，广州两派对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初步达成谅解。黄永胜一回到广州，立即召开连串会议，着手组建革委会班子，起草有关文件，筹备成立大会。

2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同意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2月8日“关于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同日，省革命委员会发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告全省人民书》。提出全省人民要更广泛地、更深入地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群众运动；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群众性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正确对待干部；拥军爱民等八项任务。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一片激流险滩之中，宣告成立。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行使广东省党、政、财、文一切权利。军代表9人，占主导地位；原地方党政官员10人，工人6人，农民4人，学生4人。2月2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社论，“热烈欢呼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经省革委会批准，广州市也于2月21日成立革委会。3月5日，东山区革委会成立；3月13日，郊区革委会成立；3月20日，荔湾区革委会成立。这三个区是在省、市革委会之后成立革委会的。至此，广州市五个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所谓的“全市一片红”。

市革委会成立后，市军管会文教小组对小学的复课闹革命作出规定，“天天读”、“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大小讲用会制度，就是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市区逢星期一、三、五全日复课，二、四、六上午回校，下午在家自学，以便教职员“闹革命或研究工作”。

“砸烂旧招牌”

2013.11.16 羊城晚报 B10 版博闻周刊·羊城沧桑

1967年11月18日，广东司法革命联络部召开批判《法院组织法》大会，省军管会政法联络组派出代表参加了大会。广东政法革命总司令部和省、市、区的公安、检察、法院群众组织，以及佛山中级人民法院、花县、从化、三水、增城、南海等地的法院，都派代表出席大会。

广东司法革联下属的省法院“革命造反战斗兵团”、广州市中级法院“司法造反兵团广州地区总部”、郊区法院“红司战斗兵团”、东山区法院“红色革命造反兵团”、越秀区法院“红旗兵团”，纷纷登台发言，指斥《法院组织法》是“封、资、修的法学思想、法律观念和旧法制度”的产物，必须“彻底清算”。省法院革命造反战斗兵团一篇题为《砸烂〈法院组织法〉，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文章，更罗列了司法制度的种种罪名：“有资产阶级国家那套虚伪的‘立法原则’，所谓‘审判独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还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吹嘘的‘民主’标签，所谓‘保护被告’、‘无罪推定论’所派生的一套极为复杂繁琐的审判制度和诉讼程序，包括臭名昭著的讼棍‘律师’制度，真是式式皆备，样样俱全。”

一个砸烂公、检、法的高潮掀起来了。12月11日下午，广东政法革命总司令部在广州市公安局礼堂，第三次召开“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尹林平大会”，省、市政法系统一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乐昌县政法系统革命造反派赴省造反代表团也出席了斗争大会。

11月12日，江青在接见中直文艺系统部分单位军代表和群众代表时说，文艺界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敌人是很狡猾的，一套一套班子，你搞了它，它又换一套班子。有的单位乱一下，乱敌人，不是乱我们，这是完全应该的。于是，这股砸烂旧机构的风，便迅速蔓延到文艺界了。

11月30日下午，在广州文化艺术界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大院里，聚集了一批群众，把音协、美协、作协、剧协的招牌，统统拆下来，砸得稀烂，并批斗作家欧阳山。12月2日，文革会和广州地区工革会文艺系统委员会、省宣教战线斗私批修联合总部所属群众组织，召开“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誓师大会”，会后，造反派浩浩荡荡，直奔省摄影协会，只听一声呐喊，摄影协会的招牌，也逃脱不了被拆下捣毁的厄运。

造反派的一篇文章叫嚷：“广东文艺界必须大乱！乱什么人？乱阶级敌人。乱什么阶级？乱资产阶级，乱封建残余势力。乱什么路线？乱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乱保护这条黑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文章列举了所谓“文艺黑线”在广东的代理人包括：区梦觉、王阑西、王匡、吴南生、曾生、朱光、薄怀奇、杨康华、欧阳山、杜埃、华嘉等“黑省、市委的‘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和‘文教办公室主任’”。在他们之下，“还有一批盘踞在省、市委文艺处，省、市文化局、文联、制片厂和各直属文艺单位、艺术学院中的走资派，他们大多是30年代文艺黑线的干将”。

截至 12 月 5 日，被造反派砸烂招牌的还有省文联、省文化局、广东粤剧院、粤剧学校等单位。欧阳山、苏湘、黄三达、徐疾、黄宁婴、靓少佳、罗品超、文觉非、邓宝、陈仲华、罗家宝、吕玉郎、郎筠玉、杨子静等文艺界人士，又被押上批斗台，再遭劫难。

体育界也受到这股砸烂风的传染。12 月 23 日，广州体院运动系革命联合总部与红一司体院秋收起义红卫兵总部、红一司市体训班遵义兵团等群众组织一道，砸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广东分会、市足球协会、市篮球协会、市排球协会、市乒乓球协会、市羽毛球协会、市网球协会、市田径协会、市体操协会、市轻重竞技协会、市围棋协会、市象棋协会、市武术协会、市水上项目协会的招牌。

秋交会刚刚闭幕，东风派便掀起一个砸烂中南局的高潮。12 月 15 日，中大革造会和主义兵抄了中南局领导的家。一时间，“砸烂中南局”的大字报、大标语，排山倒海，遍布广州。1968 年元旦那天，中大革造会“连续作战”，抄了一些中南局干部的家，并发表“关于坚决打倒闯一帆，彻底砸烂中南局”的《严正声明》，宣称：“管他什么‘反革命’的帽子，管他什么‘打击革命干部’的叫嚣，我们铁定了心，鼓足了劲，就是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砸烂旧中南局的鬼门关，杀将进去，来一场大闹地府，把那些什么十殿阎罗、判官鬼吏统统揪出来！揪出来！”

砸中南局使社会的空气再趋紧张。1968 年 1 月 1 日大抄家之后，中南局联络总部召开一个“干部联防”动员大会，呼吁干部们组织起来，“严阵以待，务歼来犯之敌！”市面上谣诼纷纭，说交易会结束后，广州将有大型武斗，市场供应将完全停顿。因此，市民疯狂地进行抢购，粮、油、煤、盐供应全面告急。越秀区粮食供应紧张，已有六家粮店脱销。脱销原因，主要是运输问题，他们只有 10 辆汽车，即使日夜赶运都不够供应。市汽车运输公司没有汽油，不能支援。各粮店门前挤满了排队的人龙。

不仅粮油煤短缺，而且日用工业品供应也大减，从 11 月初开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等商品因供应短缺，实行凭工业券购买。1967 年由于武斗频繁，许多工厂的生产陷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广州市全年工业总产值完成了 30.1 亿元，为计划的 75%，比 1966 年下降约 12%；基本建设投资完成 4411 万元，只达到计划的 50%。

东较场武斗

1967年底，广州的武斗高潮，似乎已经过去。在中央的要求下，两派开始大联合。但到了1968年的元旦以后，社会上突然刮起一股“三封风”（封档案室、武装部、政治部），以广州财贸系统为例，局以上被封超过七成，公司被封超过一半。都是被群众组织贴了封条，不让办公。有些组织还一边封，一边抢。封的理由：一、砸烂公检法；二、政治部长期执行反动路线；三、这些部门和地方都藏有黑材料；四、这些部门是封锁中央消息，如中央九大征求意见文件，没有给他们传达；五、武装部是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产物。

这股封办公室的风潮，也引起了连串武斗。1968年1月8日，广州医药公司的工革联和工革会，就是因封办公室问题，争吵不休，最后以棍棒相见，三十六中、三十五中、二十三中的大批学生也加入了武斗，你抓我的人，我也抓你的人，使事态进一步恶化。

1月上、中旬，广州市各种小型武斗，仍然频频发生，电灯泡厂、珠影制片厂、果品公司等单位，不断有小冲突，起因都是些小事，这方要贴大字报，那方不让贴之类。但1月22日，是一个凶险的日子，因为这是省革联夺权一周年的纪念日。造反派已经大造舆论，准备在这一天隆重庆祝。

广州的任何风吹草动，北京都一清二楚。1月21日中午，周恩来与红司负责人通电话。周恩来劝说，广州形势很好，大联合形势不错，不要开派性会议，如果开派性会议，矛盾扩大了，就会发生挫折。周恩来说，你们带了头高姿态，联合起来了，不要再落后了，如果再出现曲折就不好。你们要赶快开一次紧急会议，庆祝一·二二的会议不要开。

但是，两派群众都不肯就此罢休。广东省一月革命周年纪念筹备小组还是坚持要在次日召开“隆重纪念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月革命一周年，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并准备在会上斗争原省委领导人，要求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派战士与首长参加，派部队维持秩序。估计有12万群众参加大会，散会后将举行游行。

经过军管会、省革筹的一再劝说，到1月22日凌晨3时30分，旗派才答应不开会了。陈德指示，要各个战线做东风派的工作，凡是在街上吊有草人的，要在天亮前撤掉。

天亮以后，东较场还是聚集了许多群众，而且愈来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赶来。清晨8时许，省革筹首先接到市电讯局军管小组的电话报告，会场内外的群众愈聚愈多，大约有两至三万人左右。

当时会场内吵翻了天，有人声称周总理的指示是假的，或者周总理不是这个意思，主张按计划开会，继续涌入会场；另有一些人则宣讲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主张对周总理指示要执行，不执行不好。当时有人挤进会场，有人退出会场，有人围观，乱成一片。

到了上午 9 时左右，双方的辩论，渐渐带有很浓的火药味。八一战斗兵团、工联、广州兵团突然广播，要求广州兵团马上集中。不久，广州兵团和“秋收起义”（一个群众组织）就打起来了。最初大家是用石块互相攻击，后来，广州兵团向体院大楼发起冲击。军管会的电话报告称：

这时 10 点半左右，对方便（把）桌子板凳、柴火、黑板往一楼搬，这时 11 点左右，开了五台车来，有八一警卫团、红司警卫团、铁锤兵团，后来不断往里面搬汽油，结果把火点着烧起来了。去了两辆救火车不准进，部队也不给进。刚进了一个连队结果给围了起来，把武器抢了（后来做工作退了回来）。当时他们就把部队战士的帽抢去多顶，领章多副，语录抢去拆碎，到处乱扔，并骂战士是支保兵，派了十多个连队不能进。中央调查组、监督小组做工作无效，有的拿着大铁锤往大楼砸，并扬言把大楼炸了。这时从外面来了一千多主义兵，拿着木棒，扛着大旗，往大楼里冲，结果把旗派所有在体院里的旗派全部赶走，直退到电讯局大楼，当他们进入时，部队也趁机往里面进。结果武斗持续到 7 点多钟，武斗基本上停止下来，部队重伤 16 人，秋收起义轻伤三人，旗派的无数，不敢告诉我们，他们自己送医院（据说伤是比较多的）。

下午 4 时，周恩来对东较场武斗事件，作了指示：“继续做政治宣传，说明广大群众是好的，是愿意革命的，但是他们受了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这样做。敌人就在我们身边，这样做是错误的。应当由群众自己把坏头头交出来，这样破坏国家财产是绝对不允许的。”广州警司也发表声明，要求全市革命群众起来立即制止武斗。当晚，东风派实行全市戒严。但这种做法，受到省革筹小组和军管会的批评。

1 月 26 日，广州工人阶级首届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 4100 多人，其中列席代表 1300 多人。国务院、中央文革发来贺电。广州部队、省革筹小组、省军区的领导出席了大会。1 月 28 日，大会闭幕。

不是所有工人都有权参加工代会的。以航运局为例，在 1.8 万多职工中，只有 3000 多人属船工，有权参加工代会，其余 1.5 万人是船民，因有入股金利息收入，不属于无产阶级，故被排斥在工代会之外。

在这次大会上，成立广州工人阶级首届代表大会委员会，委员 118 人，常委 17 人（工革会六人，工革联六人，工交红旗三人，海员二人），核心小组四人（工革会、工革联、工交红旗、海员各一人）。大会标志着广州 50 万工人正式实现大联合。

载《羊城晚报》2013 年 11 月 23 日

派性回潮武斗再起

1968年2月，广东省和广州市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局势平稳了两个月，从3月间开始，种种迹象表明，新一轮的暴风雨，已经在密云深处翻涌着，酝酿着了。

第一个信号是：3月下旬，广州市人民汽车八路线发生罢驶事件。虽然广州人民汽车工人联筹在3月8日已告成立，两派工人签订了“实行车归队，人归队（间）”的协定。但实际上，两派的对立，仍然十分严重。八路线停驶事件起因是广州市第43中学几名学生在泮塘“上车不买票”，被八路车的司乘人员殴打。43中旗派学生闻讯包围了八路车站，双方混战一场。随后，八路车以旗派“破坏八路交通”为由，全线停驶，上街游行。八路线瘫痪长达半月之久。紧接着，十八路线也从3月12日起全线停驶了。由旗派控制的九路线、四路线也先后发生停驶。至春交会闭幕之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发展到十几条汽车线路停驶，汽车被抢事件更是屡屡发生。

第二个信号是：4月26日，广州百货商店（即中山五路百货商店，现新大新公司）发生停业三天的事件。起因是百货商店有一名曾加入八一战斗兵团的职工，在1967年患了精神病，直至1968年4月仍未上班，商店扣发其40%的工资。商店内的群众组织声称，此职工是因去年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而疯的，属于政治迫害问题，应百分之百发给工资。并且发出《紧急呼吁》，要“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组织一切可以组织的人员，实行联合大罢工”。第三天又发表第二号声明，并多次对内外广播，要求立即得到解决，“否则将采取强硬的‘革命行动’”，罢市从26日开始了。

当天傍晚，市革委会和军代表到商店传达省、市革委会的指示，要求他们马上停止罢市，开店营业。事件僵持了三天，才告结束。被省革委会定性为“反革命罢工罢市事件”，直至1978年10月，市财贸战线对此事予以平反。

4月26日，省、市革委会召集省、市工代会的代表开会。孔石泉、陈郁、王首道、阎仲川、黄荣海等人出席了会议。孔石泉在讲话中质问广州市内公共交通瘫痪的问题。他说：“现在你们有人抢汽车，这是什么行为呀？昨天发生一起交通车被抢。这是土匪行为！使人民汽车司机觉得紧张，不敢开车，人民公共汽车停车就是上了敌人当。”孔石泉说：“搞武斗是少数，背后是有人支持和操纵的。但是这些坏人，终有一天人民觉悟后，阶级敌人是要原形毕露。”

陈郁在谈到全省形势时说：“全省111个县市，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有96个，余下的只有15个了，广东是可以很快实现全省一片红的。”在谈到广州市的形势时，他说，目前有人企图分裂工人纠察队。针对社会上有许多攻击工人纠察队的大字报，陈郁说：“广州工人纠察队不是哪一派的，是我们广州工人阶级自己的。广州的工人纠察队是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的，成立不到两个月，是有很大贡献的。”

尽管造反派对目前的局势十分不满，但在5月之前，种种不满还在地下酝酿

之中，没有公开爆发。4月27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对派性要进行阶级分析》。文章称：“派别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果抽掉了派性的阶级内容，就会分不清是非，就会抹杀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反动派的区别。”也就是说，派性也有无产阶级的派性和资产阶级的派性。

许多群众组织小报都转载了张春桥在杭州的一个讲话。张春桥说：“光讲联合，不讲是非是不对的。你错的就是错的，你是保守组织就是保守组织，保守组织不能翻案。是犯错误的老造反就是犯错误的老造反，你是造反派就是造反派，如果不分是非，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就要重写。那怎么行呢？”

此论一出，天下震荡。广州的造反派也纷纷丢掉“消灭派性”的旗子，重新打起派性的大旗。广州部分中学也在4月上旬召开串联会。有人提出：大多数中学革委会都是在右倾翻案风中成立的，是右倾翻案的产物，要彻底改组，彻底砸烂。

5月22日，位于海珠广场的广州供电公司发生1968年第一场大型武斗。供电公司内工革联与工革会两派群众，因张贴标语，发生口角冲突。工革联涂改了工革会的标语和大字报；21日，工革会又用大标语覆盖了工革联的大字报。工革联决定5月22日召开大会，组织人力，覆盖公司内工革会的所有标语。同时，联络四十一中、二十五中、二十六中的学生，随时准备增援。

22日上午8时半，工革联按计划召开全体人员大会，群众涌到覆盖标语的现场，与工革会的群众对骂，继而动起手来。工革会的人退守三楼办公室，工革联随即关上公司大门，武斗爆发了。这时是9时40分左右。

先后有两批中学生闻讯赶来支援工革联。两批学生进入公司不久，解放军的两辆巡逻车开到公司门口，要求开门进去制止武斗。但遭工革联拒绝。当广州电厂的军代表赶到现场时，亦被群众投掷石块拒之门外。

午夜12时，军队开始强行进入公司大楼，制止武斗。至5月23日清晨5时左右，军队根据省、市革委会的指示，将公司内的所有人员护送到指定地点集中，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据军区公布的材料，此次武斗共打死群众五人（其中小孩一人），重伤27人，轻伤15人；烧毁民房和办公大楼，损失数万元；烧毁电表近两千个，达14万余元。军人被打伤11名。广州面临再次大乱。

派性回潮武斗再起 2013.11.30 羊城晚报

中大“六三”武斗

供电公司的“五·二二”武斗后，预示着将有一连串的武斗随之而来。造反派对去年交枪感到后悔不迭，纷纷通过各种渠道重新武装起来，抢枪之风又刮起来了。有人自己制造武器，也有人北上武汉等地搞枪。当时在武汉，一张《拉兹之歌》（印度影片《流浪者》的插曲）的唱片可以换一支“五四”式手枪，配100发子弹。造反派就在中山医的破四旧仓库里，找了很多这些唱片，拿去武汉换枪。

1968年6月3日，中山大学发生一场严重的武斗。据旗派方面记述，武斗起因是东风派的革造会6月3日中午强占原由旗派占领的旧物理楼，并抓了在楼内的四名旗派成员。中大红旗、八三一闻讯前往抢救，革造会从楼上投掷了两枚手榴弹，炸伤五人。武斗于是爆发。旗派指责对方“用手榴弹、硫酸、毒气继续危害正义的红旗、八三一战士”。

一派占据楼上，一派在楼下包围，双方紧张对峙着。军区的一篇观察员文章说，旗派在武斗中动用了机枪、手枪、手榴弹、燃烧弹、炸药、毒气和由中大化学系制造的“化学弹”。直到次日下午，中大红旗、八三一勤务组下令总攻击。旗派在楼下纵火焚烧，大火迅速烧向物理楼的顶层。军管会办的《三军联委战报》文章是这么写的：

他们用炸药包连续爆炸，并灭绝人性地纵火烧楼。他们把群众的棉被、衣服集中在楼内，浇上汽油，撒上“六六六”粉和化学药品，用鼓风机煽风，企图将楼上的革命群众烧死、毒死、熏死。大火烧了整整六个小时，温度高达一千度以上，四层楼的楼顶烧塌了，楼内价值八十多万元的食物全部成了废品，楼上的群众也被烧伤，熏倒过去。

由于当年小报上的文章和交代材料，对武斗规模、死伤情况的描述，出于互相诋毁，或推卸责任的目的，真真假假，不乏夸张、捏造，甚至连军管会的文章，也难免有失实之处，但在这次武斗中，有一位叫阮向阳的革造会头头，不幸身亡，却成了当年一件轰动广州的事件。

武斗时，阮向阳冒死从三楼跳下来。有人说他是想逃走，有人估计他是想下来谈判。但不管他想干什么，都没有成功，因为他一落地，就被一群学生围上来，不容分说，乱棍殴打。后来，中央发出“七·三”、“七·二四”布告，开始清理派性组织时，参加中大“六·三”武斗的一些人，被扭送到警司。据他们交代，阮向阳并非在跳下楼后被当场乱棍打死的，其中一份问话记录写道：

问：这次抓你来，你将罪行交代清楚。

答：6月4日下午两点多，一群学生（有八中、二十一中、六中、中大八三一的）追赶一个人（阮向阳），有一个人叫：他是革造会头头，打。于是很多人扔石头，有的拿铁枝打，猛打。后送保健室抢救，当时死没有死，我没有看见。我没有动手打，人很多，我只是从家里出来上班在路上看见。

阮向阳跳下楼以后，朝教工第四宿舍方向仓皇逃跑。革造会方面学生写的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阮向阳同志跳得非常好，未有任何损伤。脚一着地，阮向阳就往西区第四宿舍方向飞跑。”这份学生材料写道：“此时看到后边已有四五

个暴徒在追阮向阳。他们并未知道是阮向阳同志，边追边叫：‘不管是谁，追上去再说。’”

阮向阳跑到教工宿舍后，躲进了一位教师的屋里，把门紧紧关上。“接着就有人用长矛、匕首拼命打门，”后来这位教师写了一份旁证材料，他写道：“当时阮向阳同志并没有负伤，头上带（戴）着藤帽并用一条擦汗用的手帕包住口。我们立即将他带（戴）的帽丢出外面，叫他解下手帕准备帮他跳窗逃跑。但这时已发现窗外站着一群武斗家伙，阮就说：‘不行，外面有人。’接着这班家伙不断地朝我们房里投石头。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叫阮躲到床铺下面。不久，门就被打开了。”阮向阳被蜂拥而入的人抓走了。那位革造会的学生说：

在往回带的中途为旗人（指旗派——引注）认出是阮向阳同志，便遭到各种棍棒的毒打，大刀砍杀，用长矛捅。到物理楼下，阮向阳已气息奄奄躺在担架上，围上来的暴徒又用脚拼命踢他。

这份材料还说：阮向阳被送到保健室时还没死，“岂知在保健室暴徒们下了更大毒手，又是用铁棍乱棒猛往（阮向阳）头上打，阮向阳眼睛翻白，只剩下一口气了。”就这样，广州“文革”又多了一名枉死者。

尽管省革委会发出呼吁，要求广州两派工人不要介入中大的武斗，但两派均不予理会。工人纠察队以东风派为主，但它不是一个自发的群众组织，而是受着革委会的领导，因此，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制止武斗为由，开入学校。

6月4日下午，旗派举行了大规模集会游行。6月6日，东风派工革会集合了数百人，包括大批郊贫联的农民，全副武装，包围中大。这种紧张对峙的局面，直至6月下旬，才慢慢平息。

6月8日，广雅中学也发生武斗。主义兵、地总、春雷、人汽六一五等东风派组织的群众，下午从广雅后门冲入校内，把旗派四一〇红色造反团的13人围困在一幢大楼里。这场武斗几乎是中大武斗的翻版，双方楼上楼下对峙的局面，又再出现，这回变成东风派在楼下，旗派在楼上。当时西片军训团学习班就在附近，工革联西片委员会、革联煤建系统委员会和十五中、十二中、西联中学、文昌中学的旗派学生纷纷赶来。形势非常紧张。

楼下的人开始纵火烧楼。最后，被困楼上的群众，有九人被迫跳楼逃生，四人被掳走，其中一人严重烧伤，三人严重骨折。大楼基本上被烧毁。

中大“六三”武斗 2013.12.07 羊城晚报

广雅中学的武斗

1968年6月，就在中大爆发“六三武斗”的同时，20多名造反派头头在沙面召开会议，讨论形势，他们对派性回潮、武斗再起，感到欢欣鼓舞，个个摩拳擦掌说：“形势大好，造反派爆发了。前一段围剿派性，不敢动，挫折了造反精神。现在起来了，是在胜利中前进，不是在反复中倒退。”有人则认为：“大好形势，而是在反复中前进，由低潮走向高潮。对于反复，我们应该制造舆论。”

尽管当时省市革委会都已成立，但会上再次提出要搞文攻武卫，并得到各个“造反司令部”的响应，纷纷表示要揪出革委会里的“小爬虫”，特别是要揪出革委会里的实力派。对于一些派性事件，不相信革委会的调查，要自行另组调查组。如果革委会不接受他们的主张，就退出革委会。

这个会只开了一天，因为中大发生的武斗，一些与会者在第二天不能到会，会议匆匆结束。这个会议，预示着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6月8日，广雅中学发生了严重武斗。广雅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是张之洞在光绪十三年（1887）创办的，“广雅”二字，取“广者大也，雅者正也”的意思。在1966年的破四旧运动中，改名为“红旗中学”。

当年旗派的小报是这样记述武斗经过的：

6月8日（星期六）我红旗革命委员会大部分战士已陆续离校回家。从下午开始西村地区空气霎时紧张起来。2点多钟，盘踞在人汽六一五、市建四公司的主义兵驾驶着抢来的三轮汽车在广雅附近频繁活动……住在广雅的主义兵在3点35分前也全部撤走了。

时针指向3点40分，几辆大卡车和三轮车，以最疯狂的高速向着西村，向着广雅疾驶，随着“嘎”的一声嘶叫，在西增粮店门口，在立体交叉桥头，在广雅正门刹住了！骇人听闻的六·八事件开始了！

这次武斗确实骇人听闻。主义兵、地总、春雷、人汽六一五等组织的群众，从广雅后门冲入校内，把旗派的十几名群众堵在一幢大楼里。消息传开后，工革联西片委员会、革联煤建系统委员会、十五中一〇一八红旗、十二中兵团、西联中学和文昌中学的旗派学生蜂拥而来支援。场面非常混乱，旗派的文章说是主义兵在楼下纵火，并阻止他们的人救火。文章写道：

“全校革命师生员工马上救火，马上救火……”西片学习班的大喇叭又响了，人们顾不得飞来的石块，奋力救火……（主义兵）拼命追打救火的工友，挥舞铁棒打伤了救火的教师，解放军战士也挨了石块。“全校师生员工马上……”呼喊救火的大喇叭突然哑了，原来是卒仔（主义兵）将西片军训团学习班的广播器砸了。

外面的旗派群众冲不进来，楼上的群众也下不了楼，最后，只好从楼上跳下来逃生，其中一人严重烧伤，三人严重骨折。大楼被烧通了顶。

自从社会上派性回潮，造反派号召“二次革命”之后，纷纷到社会上抢夺车辆，重新武装起来。市革委会、警司在5月10日发布通令，重申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抢劫汽车，但市内的抢车风却愈刮愈烈。今天，当我们翻开军区在“文革”时发表的一些文章，仍可以找到几宗当年比较轰动的抢车和公路行凶案的有关报道：

5月29日下午广州12路03号人民汽车，上来了六名冒充乘客的坏蛋，汽车到达大沙头总站，乘客下车后，他们随即拔出匕首，威逼司机把车子开到东湖附近停下，这几个灭绝人性的暴徒，拿起铁棒、木棍一齐朝司机头上身上猛打，又用匕首连刺三刀，司机当即倒在血泊中，奄奄一息。

6月13日，在小北总站，开往从化的192号车刚出站一百来米，在登峰路与环市路交叉的地方，就遭到早已埋伏在马路两旁的匪徒开枪袭击，客车司机为了保护乘客，加快速度，冲出了火力网，但是乘务员朱××和乘客李××中弹当场死去。另一个乘务员金××和乘客刘××中弹负重伤。接着，匪徒们又对着192号后面的371号车和小北总站疯狂扫射，当场又打倒两名过路人，继而匪徒们冲进小北总站洗劫一空，把371号班车也抢走了。

6月21日，某部队一辆拉汽油的大车，刚开出车站下坡时，就被几名亡命之徒拦劫，拉出司机，并残忍地向司机身上连刺了三刀，抢走了汽车。

6月下旬一天下午，从汕头开往广州的长途班车，在离广州30公里的长平，遭到一小撮手拿匕首、手榴弹等凶器的暴徒的拦车抢劫。这帮坏蛋，洗劫了旅客的东西，连司机仅带的几斤粮票和几元钱也抢光了，然后，把旅客全部赶下车来，抢走了汽车。

7月9日下午1时，一辆从佛冈到广州的客车，行至离广州40公里的长腰岭时，迎面碰上一辆车疾驶而来，车上坐着四个鬼鬼祟祟的坏蛋。客车司机一看知道要截车抢劫，忙靠右边慢行，这时暴徒便向右边拦截，司机又向左边闪避，暴徒又向左拦车，结果两车相碰……撞车后，不知又从哪儿钻出三十多个人，手持凶器，拆卸被撞坏的客车，洗劫旅客的财物。不一会，那群家伙又拦截了一部货车，拖着他们撞坏的车子扬长而去。

全市各大车辆调度场、汽车总站、停车场，纷纷遭到袭击，被抢汽车包括军车、一般客车、小车、运粮车、运煤车、消防车、救护车、死人收殓车等。甚至连环卫车也被抢去，全市的环卫车有半数被抢，造成市内到处垃圾成山，无人清理，恶臭熏天。运猪车被抢，造成大批生猪死亡，市场猪肉供应紧张。据统计，在6月前后一个月内，被抢劫、破坏的机动车辆，超过600辆之多。

造反派的末日

1968年6月30日，几名广州造反派的头头，到北京参加全国造反派的联合会议。7月17日，从全国各地来的造反派还包括贵州“四一一”、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全都是最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关于会议的内容，从后来中大八三一的一位头头的揭发中，可见概略：“整个（会议）过程就是讲中央怎么斗争，如何激烈；各地的革委会怎样犯错误；军区如何支保；造反派怎样受压。”

会议最关键的议题是：成立名为“全国造反派总部”的全国性统一的造反派组织。这是中央绝对不能容忍的，曾三令五申，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一旦出现这样的苗头，也就是造反派覆灭之时了。因此，中央决定对造反派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问题，发出著名的“七三布告”。广西问题与广州密切相关。东风派与广西联指、湖南高司、武汉百万雄师、河南造总等群众组织观点接近，而旗派则与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辽宁八三一、黑龙江炮轰派等群众组织接近。7月6日，广州的街头巷尾，哄传中央将广西“四二二”定为反革命组织。地总的高音喇叭，彻夜欢呼。

7月8日至10日，省革委会召开第八次党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市革委会常委、在广州的委员和军队参加三支两军各方面的负责人。第一天的会议是学习“七三”报告。第二天，刚从北京回来的孔石泉、黄荣海和陈郁、王首道、阎仲川、白平等参加了会议。阎仲川在发言时说：“现在少说废话，讲抢车的事吧！600多辆汽车被抢了，很多破坏了，这是明摆着的。就是有些人对革命委员会的话不听，对中央的话不听，对毛主席的话不听。我们到底要不要对全省4000万人民、广州300万人民负责？我们说了就要做，不要做两面派！”，阎仲川接着又说：“我建议先解决广州的问题。怎么办？交通中断、制高点占领、抢车、抢枪、殴打绑架、杀害解放军，是否这样下去？……现在还抢车，你们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有些组织不表态，暗中支持，占了粮食局，破坏粮食供应，还派人去表示支持。对广州目前的情况，参加会议的群众组织都要表态，参加会议的常委都要签字执行。”

会上两派组织的代表又互相指责起来。这时军队和革委会已明确表示了反对旗派的态度。阎仲川命令旗派设在三元里的关卡在12小时内拆除。“不拆，我们解放军把它消灭掉。”一位军队代表说。

孔石泉说：“现在还有人暗中支持占领制高点。外地来广州占领制高点，它干扰了广州文化大革命，搞武斗，打、砸、抢，这是什么人，这是为什么？……对社会上的人，同志们要好好调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陈郁说：“有一些人，甚至是农垦厅的干部，不防洪，还把人抢走搞串联，抢防洪车，这个人要枪决！”孔石泉接着说：“应该斗，应该游街。”陈郁愤怒地说：“轻了，我说要枪决他。”

旗派工农革联的代表在会上被要求“统统站起来，都要表态”。红旗工人的头头在会上带头做了检讨。会议最后通过了广东省革委会的一份文件，省革委会委员一一排队签名。

7月5日，一辆正在南站市一中附近执勤的军队小汽车被抢。7月8日上午，驻南站解放军执勤分队奉命追回被抢汽车，在黄沙大道上遇上市一中的学生正驾驶着那辆汽车。

队令其停车，将车收回，随即返回南站驻地。但当他们走到南站大门值班室附近时，被南站、市一中、市运二车队上百名群众截住，他们高呼：“南站是我们的，不准你们进去！”站内响起了钟声、哨子声，又有几百名群众闻声赶来，把24名军人团团围住。

混乱中，军人三次鸣枪警告，但未能驱散群众。大部分军人都被打伤。群众把负伤军人架到南站大门外，然后用车辆把大门堵死。这时，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双方在雨中对峙，长达六个小时。7月8日，广州市郊区东方红公社罗村大队，围攻、殴打、捆绑郊区革委会和解放军派去该地调查武斗情况的人员，连汽车也被砸烂。

7月24日，中央发布一个针对陕西问题的布告，但实际上，和“七三布告”一样，是向造反派发出的最后通牒，全国各地都适用。7月25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温玉成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周恩来严厉斥责了广西“四二二”造反派：“你们把杀人的、放火的、抢援越物资的、中断交通的，都说是受压的，还说别人是右倾翻案，这是反革命罪行，对这些人就是要实行专政嘛！”

周恩来批评旗派到北京开会，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

中央对广西问题的表态，不啻一纸判决书，宣判了广州旗派的“死刑”。自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之后，广州军区便放弃了所谓“一碗水端平”的政策，对造反派实行坚决镇压。军队接到命令，在受到造反派攻击时，可以开枪。一位在军管会工作的军队干部说：“从‘七·三’、‘七·二四’布告以后，造反派就老老实实了，你不听话的，真抓；你要敢动武的，真打。造反派都非常现实，过去放纵他们，他们当然厉害了，你不放纵他们，他们最老实了。”这时，造反派已经处于苟延残喘的处境了。

摘自作者的《共识网》思想者博客

无中生有的“第二套黑班子”

信息来源：2014.03.01 羊城晚报

1968年7月14日上午8时许，一支武装的解放军开到广州市29中，宣传和检查执行“七·三布告”和省革委会“七·一二布告”的情况，并要求拆除制高点和收缴武器。但他们遭到造反派群众的包围堵截。广船工人也赶来支援了，人群爬到军车上起哄，并关上校门，把校内和校外的军人分割开来。解放军开枪示警，但群众仍然不散。这时，解放军便朝造反派人群开枪了，当场击伤12人，击毙三人。

事件对造反派震动极大。7月16日晚，广州红旗各大组织的代表在文化公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7月17日下午在文化公园中心台开追悼大会，以“反翻案，反镇压，誓死捍卫毛主席”作为口号，并准备会后抬尸游行。

其中一位死者的父亲发表声明：一、明天8时半有关群众组织为我儿子杨××召开的所谓“追悼会”我已决定不参加、不发言。二、坚决不准将杨××抬上街游行，否则一切后果由主持者负责。三、更不准将杨××用药水防腐，继续蒙蔽群众。四、强烈要求省市革命委员会、军管会责成有关群众组织将杨××尸首交回本人处理。五、坚决支持省市革命委员会的十项决定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死跟阶级敌人做坏事的人所采取的有效措施，任何人都不能在杨××问题上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

解放军也加紧了对造反派据点的扫荡。7月15日，警司强行拔除登峰南路60号的旗派据点。同日，广州地区八万军民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中央‘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南方日报》发表题为《坚决拥护！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社论。24日，广州15万军民再次举行盛大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坚决拥护贯彻“七·三布告”。

造反派还在作着无望的抵抗，不肯轻易从制高点走下来，也不肯轻易交出手中的武器。省、市革委会广州地区检查组第二号公告称：“近日来各群众组织清理上交了部分武器装备、车辆，但上交的武器大都是自制的，而抢夺人民解放军的武器上交的很少。有的抢夺的国家财产至今拒不送还。”公告警告各造反派组织：

立即将抢夺和自制的各种武器装备上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拒不交出者，人民解放军、专政机关、工人纠察队、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治安委员会和广大革命群众，有权采取强制性行动。顽抗者，严加惩办。

至7月17日，广州市的交通基本恢复，人民汽车26条线路，大致恢复行驶。警司拔掉了90个制高点和据点；收缴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各种物资。

与此同时，一个“彻底摧毁陶铸在广东第二套黑班子；砸碎地方主义反革命集团”的运动，在全市掀起。由广州工代会、工革会、广州红代会主编的小报《直

捣中南》，连续出版“捣毁原中南局黑司令部专刊”，开列了一份黑名单，把原中南局监察小组副组长闵一帆、原中南局工交政治部主任车学藻、原中南局财贸政治部副主任张天陶、原中南局经委副主任张逖、原中南局工交政治部办公室主任金阳、原中南局计委副主任杨震等人，列为“第二套黑班子”的主角。

而对广东省委，也开展猛揪“第二套黑班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刘田夫；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张根生、李子元；原省委监委副书记曾昌明；原省委常委王阑西；原省委统战部部长罗范群；原省委宣传部部长陈越平；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杜埃等人，统统被扣上“陶铸在广东第二套黑班子”的罪名，再次受到批斗。

7月13日，广州军区发出布告，对原中共中央中南局机关实行军管。同日，广州警备区司令部对上述干部实行监护。张根生后来回忆：“‘七·三’、‘七·二四’布告后，省委书记、常委、副省长、厅局长，一天就抓起40多人，我和这些同志都长期一起工作，互相了解，怎么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

7月22日，旗派的群众把一批中南局、省委、省人委、市委等单位的干部“扭送”到警司，其中有原中南局梁嘉、吴南生等人；原省人委何世镛、庄岐洲、李健璇等人；原市委华嘉、高金榜、苏烈等人；原省委方骏、鄞庆云、谢强等人；还有左洪涛、崔文涛、龙康侯、金应熙等，共54人。

群众扭送干部到警司，很快发展成一股浪潮，蔓延到许多单位。7月13日，原市文化局党委书记兼局长陈一民被扭送到警司。7月26日，文化系统把陈东、杨奎章、靛少佳、廖冰兄、尹积昌等34名所谓“反动艺术权威、右派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押到文德路、北京路、中山路进行游斗。

9月份转入“深挖狠批”以后，仅当时省委宣传部一个单位，就挖出了所谓“叛徒、特务、隐蔽的‘四类分子’”共12名，等于8月份以前揪斗的总数。原省直机关共揪出了“叛徒、特务和其他反革命分子”823人，约占总人数的10%。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广州市仅工交战线被抓起来批斗的人数，就高达7010人，以致10、11月份广州市自杀成风。

据广东省革委会的统计，1968年10月至11月7日的不完全统计，广州市发生自杀121起（死亡98人，未死23人）。10月份连续发生四起全家或夫妻自杀案。省教育系统在十天内发生六起自杀事件，华南工学院甚至一个晚上发生两起。情况非常严重。

载 2014年3月1日《羊城晚报》

清理阶级队伍

“七·三”、“七·二四”布告前后，军管的范围在继续扩大。经省革委会批准，7月21日，市革委会决定对市财政局、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市航运管理局、市粮食局、市交通运输管理局等单位实行军管。7月26日，市革委会发布关于恢复交通运输的布告。7月30日，广州30万军民举行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誓师大会。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造反派组织趋于土崩瓦解，从此一蹶不振。8月5日，毛泽东向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赠送了芒果。8月15日又亲自接见了工农宣传队、工人宣传队和工人代表。自此，浩浩荡荡的产业工人大军，开入了各大、中、小学和教育单位。

从8月12日至14日，广州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陆续进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医学院、广东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华南工学院、华南农学院、中南林学院、广州外语学院等大专院校。至9月初，开入广州13所大专院校的工宣队人数，达2783人。各院校纷纷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回忆对比、搞三忠于活动，发动群众，拆除武斗工事、据点，收缴武器，揭批造反派的“坏头头”。

华工连续召开了20多次对敌斗争大会，华农则以“彻底揭开农院阶级斗争盖子”为号召，把造反派的头头揪上了批斗台。暨南大学在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后，大抓阶级斗争，“揪出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叛徒、特务共104人”。中南林学院共有师生1700人，原来分成三大组织、两大派，虽然搞了大联合，但并未铲山头，工宣队进驻后，迅速铲平山头，收缴了派旗、派章、手枪、子弹、匕首、长矛、硫酸等一批物品。各院校的斗争，闹得天昏地暗。

从8月初开始，省革委会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8月18日，广州市革委会也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原来作为群众代表进入了革委会的旗派头头，全体起立，接受批判和审查。批斗“坏头头”的群众大会，一场接着一场。这种场面，去年批斗走资派时司空见惯，但现在台上却换了主角，轮到造反派的头头被揪到台上示众了。

8月15日上午，广州工革联（旗派）、工革会（东风派）、工交红旗三大群众组织代表共几千人，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广州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大会”，宣布铲平山头，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归口闹革命。市革委会主任黄荣海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三大群众组织铲平山头的联合声明。曾经在广州呼风唤雨的东风派、红旗派，从此冰消瓦解，不复存在，成为历史的名词。

人们还没有从派性武斗的动乱中喘过一口气来，一场号称“二十四级台风”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已排山倒海，席卷而来了。

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要清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包括五花八门的“反动资本家”、“政治骗子”、“国民党嫌疑”、“阶级异己分子”等等。这时的派性武斗虽然已被

制止，但“文革”并没有结束，极左的思潮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更加登峰造极，把千疮百孔的中国，进一步推进灾难的深渊。

新的运动一来，各行各业、各个单位都举办大大小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人都要写自传，交代自己在“文革”中的表现，“向党和人民坦白交代自己的一切问题”。除了要交代7岁以后的所有历史问题，还要重点交代：“一、对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认识怎样？二、在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己对党做出了哪些贡献？做了哪些对不起党和人民的错事或者犯罪行为？三、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思想上有哪些提高？有什么经验和教训？四、今后继续改造自己的决心。”这种交代问题，不是针对个别重点人物，而是要人人过关。

从7月初至10月底，短短四个月内，广州全市举办了28261期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主要内容的学习班，261.7万人参加了学习。7月至11月，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和“有严重问题”的人，竟多达28738人。不少人被迫害致死。

从8月31日开始，广州进行全市户口大清查。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反复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清查行动，共出动11.4万人次，清查了5.75万多户，收容审查了8000多人。至此，大局已定。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欢呼全国（除台湾省外）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全部成立。

自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红卫兵运动、夺权斗争、大规模建立群众组织、濒临内战的武斗，至此，似乎要到收官阶段了。但历史却证明，前面的路还长着呢！

清理阶级队伍 2014.03.08 羊城晚报

上山下乡运动

广州市 1966 年、1967 年、1968 年的“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达 32 万人，其中高中 1.645 万人，初中 10.3 万人，高小 20 万人，他们热血沸腾地闹了两年红卫兵运动，现在也面临无业可就、无学可升，不知何去何从的困境。早在 1968 年 4 月 4 日，中央向全国各地提出，解决大、中、小学毕业生分配问题，应“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即所谓“四个面向”。但重点是前面两个面向，后面两个面向，在贯彻过程中，几乎无人提及。由于经济萎缩，生产滑坡，工矿企业也是人浮于事，严格控制招工，许多从农村来的工人，都被要求返回农村，对于“老三届”来说，工厂大门可望而不可入。在前面两个面向中，又以“面向农村”为重点。

广东省革委会在 9 月发出《关于中学招生和毕业生分配问题的决定》，毕业生的去向，以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农民为主。到了 9、10 月，历时 10 年的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10 月 25 日，广州七万多高、初中毕业生在越秀山体育场举行“下乡上山表忠誓师大会”，学生代表在会上宣读了《向毛主席表忠和向全市毕业生倡议书》：“我们 1966、67、68 年高、初中毕业生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忠心，我们庄严宣誓：最最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农村去，插社插队去，到贫下中农中间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1 月 5 日，广州市 30 万军民举行盛大集会，欢送 6 万多名中学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这些青年，穿着清一色的军装，胸前戴着大红花，背着军队式的背包，在越秀山体育场和各个分会场，举行隆重的宣誓、授旗仪式，然后在一片喧天震地的锣鼓声中，奔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去了。尽管许多人并不愿意离开城市，但他们别无选择。

截至 11 月 19 日止，广州市有 38893 人（不包括投亲靠友的近一万人），占应动员数 63.9%。在校的中学生分批参加军训，而在校的大学生，则被送往农村参加秋收劳动。10 月前后，广州地区 14 所大专院校的师生，奉命到清远、英德等县参加秋收。他们还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把毛泽东思想送下乡。中南林学院学生在秋收大忙的 10 天之内，召集贫下中农开了 91 场大小批判会；广州医学院的师生，揪出一个“隐藏了 19 年的地主分子”。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报道了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安家落户的消息，并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各大城市顿时沸腾起来，群众上街游行，热烈欢呼。五花八门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敲锣打鼓，深入大街小巷，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落实最新指示不过夜”。

知青下乡头一件事，就是“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像请到贫下中农家里”。给贫下中农送忠字品（即写着语录、忠字之类的东西），送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帮

助贫下中农布置“三忠于”、“四无限”环境。仅中山大学就向贫下中农送出了2.4万多件忠字品、1.8万件宣传品，布置了239间忠字室。许多院校还帮助生产队建立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等制度，开展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活动。人人做忠字牌，家家户户搞“忠”字环境。不论城镇乡村，也不论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忠”字海洋。

所有的机关、学校、商店、旅店，大凡有墙壁的地方，都画上一颗颗红心，心中有一个“忠”字。表忠心成了全国人民每天的功课，表忠献忠人人忠，传忠接忠代代忠。全民都学跳“忠字舞”，连八十老妪也加入了蹦蹦跳跳的行列。忠字舞有三个最典型的标准动作：一是双手高举，表示对红太阳的信仰；二是斜出弓步，表示永远追随伟大领袖；三是紧握双拳，表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嘹亮的歌声，传遍三街六市：“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满怀豪情迎九大，迎九大……”

那时，人们写信的第一句话，必定是“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人们在路上相遇，也不再是问“吃了饭没有”，而是停下脚步，严肃地告诫对方：“要斗私、批修。”电话接通以后，如果忘记先背诵毛主席语录，对方很可能会装聋扮哑不搭话；客人在饭店吃完饭，开单的服务员会冷不防大吼一声：“又来一个抓革命！”通知柜台收钱；客人付钱后，柜台的服务员也高喊一声：“促生产！”表示已经收到钱了。许多饭店都在饭桌四角吊上一些小草人，身上分别写着“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并打上红色的大叉叉。

那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年月，令人震撼，令人欷歔，令人悲哀。

上山下乡运动 2014.03.15 羊城晚报

广州“一打三反”运动

由于公检法都被砸碎，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1969年底至1970年上半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中，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形，愈演愈烈，不仅在城市，而且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乱捕乱杀的现象。这种情况，在“文革”中已甚猖獗，这从当年从化县良口公社联平大队“贫下中农特别法庭”的一份布告，可见一斑：

布告

查坚持反动立场的恶霸富农之仔何耀煌，现年24岁，系我联平大队人。其父是反动富农，解放前曾任国民党的财粮干事，一贯与人民为敌，解放后，困难逃法网，畏罪自杀。

何犯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极为不满，出于反动阶级本能，于1955年，在联平厕所大写反动标语和漫画，疯狂讽刺和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削尖脑袋，钻进群众组织，兴风作浪，无恶不作，大搞阶级报复活动，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并扬言要杀害革命群众何××、何××。

何犯实属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民愤极大，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广大贫下中农特设特别法庭，判处罪犯何耀煌死刑，立即执行。

此布

从化县良口公社联平大队贫下中农特别法庭

公元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这是值得历史铭记的一份文献。从今天的目光看，是非常荒唐、不可思议的。从布告中列举的“罪状”，除了1955年的问题外，在“文革”中的新问题，只是“扬言”要杀人，这就被农村自设的“法庭”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1970年元旦刚过，“一打三反”运动，如风卷残云，横扫全省了。各地接二连三召开宣判大会，判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和刑事犯罪分子。被判死刑的犯人，在押赴刑场之前，都要游街示众。当汽车驶过时，引来大批市民围观。一块块写着犯人姓名的牌子，从人们眼前一闪而过。

3月10日，“一打三反”进入高潮。广州市在越秀山体育场和全市7个分场，召开40万人的宣判大会。对77名特务、反革命分子、杀人犯和贪污盗窃罪犯进行宣判。全市各区局单位，闻风而起，组织了800多场检举坦白批斗会。许多历尽苦困、苟延至今的人，最终仍逃脱不了在运动中被打倒的命运。他们的可悲下场，刺激着那些似乎可以侥幸过关的人，不得不以更高昂的斗争热情，表白自己的革命立场。

市革委会连续20天，进行全市大检查、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其中不乏刑求盘问、屈打成招的冤案。与此同时，在党内也展开“吐故纳新”运动，实行淘汰清洗。一大批被指为“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党员，被

清除出党，或“挂起来”，停止组织生活。

以战备和精兵简政为由，继续大规模地把知识青年和干部遣送下乡。20世纪70年代的到来，并未给人们带来希望。省革委会还要求干部“两退一插”，即退职、退休、到农村插队当农民，并制订两年内处理15万名干部的指标，1970年将处理安置5万人。广州市成立了战备人口疏散领导小组，全力展开城市人口战备疏散工作。仅广州一地，便有5.8万人在70年代的头一年被疏散到农村，其中2.3万人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从5月开始，一部分工厂也陆续迁往山区。

也许有人以为，文革只对城市有影响，农村相对平静，生产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其实，“文革”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也相当严重。1969年以后，在广东地区的农村，刮起了一阵共产风。灾难从9个方面，向农民步步逼来：

一、并社。并社有两种并法，一是取消大队，并大生产队，实行二级管理。另一种是并大大队、并大生产队，维持三级管理。

二、改变核算单位。一是实行大队核算，二是取消大队，以并大后的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三是有些地方实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有的地方撤销生产队，恢复大跃进时期的连、排编制，以连为核算单位。有的公社改为大队核算之后，队队表忠、献忠、比忠，把生产队的财产无偿交给大队。富队献出厂场、生产资金和储备粮，穷队不甘落后，赶种麦子、蒜头、蔬菜，献给大队。

三、实行供给制。各地提出的供给制项目，包括粮、油、盐、糖、柴（草）、医（疗）、学、生（育）、葬、衣服、理发、电灯等十几种。多数地区实行粮、油供给。有的地方实行了供给制，由大队统一分配，取消工分，实行等级发薪，粮、柴（草）按需分配。

四、实行工资制。有的公社实行工资制，社员按“三忠于”表现和劳动强弱、劳动态度等条件，评为20个级别。一级为20元，20级为2.5元。一年发4次工资。

五、属社员所有和使用的房屋、厕所、自留地、开荒地、饲料地、“五边”地、自留果树和私养耕牛，一律收归集体。

六、队办集体食堂。

七、集体生产的农副产品不上自由市场，统统卖给国家。许多地方把它作为忠不忠于毛主席的一条标准来对待。

八、取消“公有私养”生猪，改为“公有公养”。

九、无偿交余粮。农民称之为“献忠字粮”。有的地方献“三鸟”表忠心。

所有这一切，足以令农村经济重新走向破产。

叶曙明

广州“一打三反”运动 2014.04.05 羊城晚报

广州地区“文革”小报掠影

“文革”时期，广州地区各派组织都印发了大量的小报，大致可分成几类：一、学生组织的小报（包括外地学生小报的广州版）；二、机关干部和文体界群众组织的小报；三、工人组织的小报；四、军队小报。之所以称为“小报”，主要因为它们大部分是群众自办的，且以8开4版居多。从时间上看，1967年1月以前，这类小报寥若晨星，较出名的有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三司）主办的《广州红卫兵报》。然进入2月以后，群众自办小报开始呈井喷之状，大量涌现。

学生组织小报

2月1日，由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小兵公社创办的《小兵》报面世。这份小报维持的时间较长，直到1968年夏季还在出版，但铲山头以后，编者已变成“广州中学红代会红卫兵广州总部”。

2月9日，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广州联络站主编的《新北大》（广州版）创刊。这是一份由北方学生编辑，在广州出版发行的报纸，创刊号的头版头条，一句触目惊心的口号，扑面而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巴黎公社式大夺权》。不久，该报因刊登了一篇《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激变成广州“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

与此同时，由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一司）主编的《广州红卫兵》也创刊了，名字与三司的《广州红卫兵报》，只是一字之差，甚至连字体也是完全一样的，均取自毛泽东的题词手迹。

后来陆续创办的学生报纸还包括：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的《中大战报》；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的《指点江山》（从第二期起改名为《广州红司》）；广州大中院红卫兵新一司的《新一司》；广州外语学院东方红总部的《东方红》等。还有一些中学的小报，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机关干部和文化界组织小报

最早一份由机关干部与文化界组织、学生组织联合主办的报纸，是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1967年初创刊的《广东战报》。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的《战报》、广州日报社群众组织的《广州战报》等，也在这个时期相继问世。由于1967年1月25日市公安局的夺权，乃广州“文革”初期所谓“四大事件”之一，轰动整个社会，所以公安系统内山头林立，出版的小报包括一·二五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的《一·二五战报》和广州红联市机关红司公安红旗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公安红旗》等。

由文化界出版的报纸包括：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合并《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工作委员会的《新南方》；广州革命造反派批判反动影片委员会的《电影战报》；广州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新闻战士》，等等。

工人组织小报

1967年初，各地各单位都在夺权，群众组织蜂起，天下大乱。但这时期工人组织基本上还没有自己的报纸，直到3月底至4月以后，才开始出现由工人组织主编的报纸。创刊较早的是由广州地区革命工人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工人战报》（大联筹散伙以后，改由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队广州革命工人联合总部主办）；广州红旗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的《红旗工人》；广州工联主办的《工联》；八一战斗兵团的《钢八一》，等等。

军队小报

军队小报也有两种，一是军内群众组织自办的，一种是由军管会主办的。当时部队出现群众组织，主要是在军事体育学院、战士歌舞团、战士杂技团一类的文体单位，然时间不长，小报品种也不多，如广州部队批陶联委主办的《部队红旗》等，寥寥数种，屈指可尽。另一类是由军管会主办的，如《三军联委战报》。

1967年7、8月以后，随着武斗之风愈刮愈烈，有更多的群众自办小报出现，加上外地的一些小报，也纷纷杀入广州，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1968年初，广州地区的群众小报，多达143家，每期用纸5000多令。

当年，大部分小报都是不定期出版的，但并不像传单那样免费散发，而是在市面上出售的，通常零售价为两分钱（有些6版的则售4分）。有一份小报这样揭露道：“一个几十人的组织，全力以赴，出版一张每期七八万份的小报，六小版的篇幅，每份售价四分钱，以小恩小惠收罗街上的小孩拿着到处兜售。这样的小报，每期单卖报就获得（除去成本）上千元，还伸手向国家要办报经费。他们拿着这些钱，大肆挥霍，坐飞机逛上海，买手表、毛衣，形形色色，应有尽有。”当时一个工作十几年的21级干部，月薪亦仅68.5元，而办报者多为初出茅庐的“革命小将”，千元堪称巨款。不过那是一个禁欲时代，胆敢中饱私囊者，少之又少。

1968年，经铲山头、大联合、成立“革委会”之后，工人宣传队进驻机关、学校，大部分群众组织小报便陆续奉命停办了。小报气焰万丈，盛极一时，实际上，只有短短一年光阴，嗣后虽然还有《广州红代会》、《广州工代会》、《广州农代会》和《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员》等小报支撑门面，一直苟延至1969年，不过，涟漪的尽头，已是波澜不兴，乏善可陈矣。

叶曙明（一听）：毛泽东与数字

此贴本是想与多元兄讨论的，后觉得以我们掌握的史料，在这里讨论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活动，未免流于臆测，不说也罢。这里只是罗列一些旧事，聊作谈资。

毛泽东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哲学家，而这两种身份的气质是恰恰相反的。哲学家是理性的，而诗人则是感性的。本来，对于治理国家来说，数字（数据）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东西，丝毫没有浪漫可言，但在既是诗人又是哲学家的毛泽东那里，却出现了以下的情形：

1957年11月，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958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撰写《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他写道：“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曾写了一份建议，提醒毛泽东：“原说15年赶上英国，现在说不需要从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25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多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也难为胡乔木，不敢说毛自相矛盾，只好说是“复杂”。

同一个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他在会议发言提纲中，有以下记录：“15年能否超过英国？15年超过英国的口号几年内不要变，不要何时超过美国口号，看几年再说。”他又回到15年了。

但仅仅一个月后，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

由此可见，对于毛泽东来说，7年、15年、25年，这些都不是一个严谨的科学数据，也没有经过调查论证的，很多时候不过是表达了他的愿望，有时甚至是一种语气助词。比方说，1958年1月南宁会议前后形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在今后5年内，或者6年内，或者7年内，或者8年内，完成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规定。”

这样提时限，弹性如此之大，究竟有什么依据？5年有什么依据？6年有什么依据？7年、8年又是根据什么定出来的？草案没解释。而毛泽东又在“六十条”中，加以规定，“10年决于3年，争取3年内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也就是说，一个也许要8年才完成的规划，变成在3年内要完成。而这3年又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同样也是没有解释。

现在再来看看在政治运动中，是怎么运用数字的。

每次政治运动，都有一个排队的程序，排左中右，划分阶级队伍。毛泽东几乎每次都提出一些划分的比例，但这些比例是根据什么推算的呢？人们不得而知。

1952年的三反五反，毛泽东谈到私人工商户类型时，定出守法与违法户数的比例，具体而言，“在‘五反’目标下划分私人工商户的类型，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就大城市说，前三类约占95%左右，后二类约占5%左右。各个大城市略有出入，大体相差不远。”这个数字是调查后得出的，还是调查前得出的？不得而知。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比例去进行“调查”和划分，甚至层层加码。仅广州一地，220个行业，4.7819万户工商业者，无一漏网。被查出有违法行为的，竟达4.2446万户。

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的“打虎”成绩很不满，他说：“特别是广东军区系统包

括海防和各军在内至少有几百只乃至上千只大中小老虎，而你们只分配该军区大老虎 20 只，中小老虎 180 只，这是完全不适当的。你们对各省压力太小，迁就他们的右倾思想，特别对广东是如此，望注意改正。”

仅 3 天以后，毛泽东对中南军区系统的老虎数字，又翻了几翻了。他说：“你们的打虎计划太小，大虎至少要增加 5 倍，即不是 107 只而是 500 多只。中小老虎不是 1100 多只，而是 5000 多只。”他是根据什么认定中南军区有 5500 多只老虎呢？不得而知。

1955 年底，毛泽东提出在 7 年内消灭普通的水灾旱灾；在 7 年内修好各种必要的道路；在 7 年内扫除文盲，每个人要认识 1500~2000 个字；在 7 年内建立有线广播网和电话网；在 7 年内基本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病害和虫害；在 7 年内消灭血吸虫病、血丝虫病、鼠疫、脑炎、牛瘟和猪瘟；他还想在 7 年内消灭老鼠（及其他害兽）、麻雀、苍蝇和蚊子。乌鸦是否也要消灭，他有点犹豫，他说：“此事尚待研究。”计划十分宏大，但在这里，我们同样不知道这 7 年之期是怎么算出来的，为什么不是 6 年，不是 8 年，而是 7 年？

人们仍然不得而知。

毛泽东很喜欢运用数字来说明问题，但这些数字是怎么推算出来的，有时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关于知识分子，1956 年，周恩来的估计，在全国 384 万知识分子中，有 40% 是中共的积极支持者，在其余的人中，有 40% 是政治上不够进步的一般支持者。大约有 10% 稍多一点的人，在意识形态上是反对中共的（见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1956 年 1 月 14 日）即 38 万。1957 年，毛泽东估计，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在 500 万知识分子中，“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 年 3 月 12 日）即 15 万。

大家是否从这个数字上看出什么问题呢？

在一年之内，知识分子的总数为什么会从 384 万增加至 500 万？而反对共产党的比例则大幅度下降？

5 月份，反右开始，毛泽东再次为党外知识分子划定“左、中、右派”比例。中间派占 70%，左派占 20%，右派占 1%、3%、5% 到 10%。这时离毛泽东 3 月份作出的估计不过才隔了两个月，右派的人数从 3% 激增至 10%。这种增幅不可谓不相当惊人。

如果说他 3 月的估计是指全体知识分子，而 5 月的估计是单指党外知识分子的话，那么右派总人数就不应该超过 15 万，但事实上是 55 万。

至于干部究竟有多少是好的，有多少是坏的。1960 年整风整社，广东坦州整社工作团向省委反映，坦州公社有 20% 的大队、30% 的小队领导权，掌握在坏人手里。1961 年毛泽东对这个估计，加以发挥，断言全国各地的基层组织，有 20% 已经烂掉。

1964 年 6 月 2 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城乡社教运动问题。刘少奇推翻了“后十条”关于依靠 95% 以上的干部和依靠基层的说法。他说：“和平演变已经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们的人……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不能强调团结 95% 以上的干部、依靠基层。”

刘少奇认为，许多基层组织，实际上，已经是被反革命控制的“两面政权”。四清工作队下乡，要和当年搞地下斗争一样，秘密扎根串连，先发动群众，再讲

团结干部；是要把全国农村所有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统统先打倒，后甄别。

毛泽东是支持刘少奇的做法的。他在6月8日的讲话中，明确地说，中国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共产党手里，而是掌握在敌人手里。

至于说有多少干部、知识分子被涮，全国情况不太清楚，广东一地，据官方公布的数字（这只是我从手边的资料中找出来的数字，肯定会有挂一漏万的情形出现）：

1951年广东镇反，不仅镇国民党残余分子，而且也在原共产党领导的两广纵队、粤赣湘边纵队、粤中纵队、琼崖纵队内镇反，华南分局社会部的一份材料称，在华南军区，每10个指战员之中，就有一个是可疑分子。这份材料说：“广东军区内部不纯情况是非常严重的，根据华南军区保卫部的报告看来，目前全军区各种复杂成份共9834人，占全数部队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做过特务的413人，自首叛变的152人，参加过反动党团者803人，匪霸分子52人，伪尉（区）级以上军政人员及来历不清者539人，在军区直属机关，仅司、政两部门排以上干部共约700人中，即有百余人值得严格审查。”

1952年的广东春耕整队，10%的土改干部受到处理，其中被撤销工作、集训审查、清理、扣押的，就有405人，占参加整队总人数的5.2%。

1955年广东全省进行肃反运动，分4期进行，结束于1958年底。清查出3万多“反革命嫌疑”和“坏分子”。

1957年反右运动，广东文教界、文艺界、卫生界、新闻界、科技界、工商界、民主党派中，揪出了3.661万名“右派分子”，占参加运动总人数5.5%，并以“极右”、“普右”、“中右”，分类归档。还有一种名目，叫做“疑似分子”，可以归入右，亦可以归入中右。民主党派中有20%成为“右派分子”；机关干部中的右派，占参加运动总人数3.68%。

1957年至1958年的反地方主义，仅海南地区，海南一级机关的3177名干部中，有1574人成了地方主义分子，占49%；286名县处级干部中，有154人扣上同样罪名，占54%。全省株连地方干部，达2万多人。

1958年至1960年间，广东省因反右倾、反瞒产和拔“白旗”，受处分的中共党员和非党干部（生产队正副队长以上），共14.1752万人，占受处分总数的31.5%。受批判的更不计其数。

参照上面提到的三分天下有其二，在四清中被涮的干部，更是多不胜数（因时间关系，未及翻查资料）。这还只是一些较大的运动，还有许多中小型运动未计算在内，如忠诚老实运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批胡适运动、62年的反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运动等等，如果把历次运动被整人数累计起来，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了。

作者：苦酷 Lv 4 时间：2002-06-03 21:36:44

你的研究很有趣。特别是58年前后的讲话。

但是为何要把周恩来和刘少奇的讲话也要加到毛身上呢？不要带着有色眼镜看问题哟。还有不应该把因基层人的错误行动而导致的社会问题加到中央领导身上，这是一个错误的作法，因为照这样的话，今天的问题同样不少，为何还要不断称颂邓的伟大呢？

作者：多元 Lv 4 时间：2002-06-03 23:09:48

一听兄：印象中，《介绍一个合作社》似乎没有你引用的那段话。

计算百分比，似乎不能把许多年各种运动中挨整的干部或知识分子加起来计算，否则你如何估计历年来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总人数？

另外，也不宜把毛在内部开会等场合临场发挥说的一些话，视为他对某个问题的成熟看法。

作者：zhkcy1Lv 13 时间：2002-06-03 23:32:11

多元兄，一听兄引的那段话是毛原手稿中有的，也确实是胡乔木写了建议，你可以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手稿》第七册，《介绍一个合作社》文后的注释 2。

作者：多元 Lv 4 时间：2002-06-04 00:04:24

zhkcy1 兄：承教。谢谢。

我不否认毛当时有迅速超英赶美的想法。毛的许多文章在正式发表时皆有修改增删。有个问题：现在我们研究毛，究竟应该以正式发表的为准，还是以原稿为准？当然，比较原稿和正式发表的东东，有助于分析其思想演变。

叶曙明（一听）：当年红卫兵今何在？

当年红卫兵今何在？（口述历史之一）

林丽（女，某海关副关长）

那是30年前的事情了。严格地说，我不属于老三届，因为我是70届高中毕业的，不过我们经历了同一个时代。我是在7中读书的，文革初期，7中是广州市红卫兵闹得最凶的学校之一。学校里面高干子弟多，军干子弟多，红卫兵起来得早。我参加过大串连、冲军区、夺权。你知道67年中山纪念堂的大武斗吗？你可能不知道，哦，你也知道？那次武斗，我在外面打，我弟弟在里面打。我弟弟是主义兵，我是7中红旗的。一见面就互相读语录，读完就打架。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

复课闹革命以后，学校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当过队长。经常要上街表演，什么最新指示发表啦，中央文件下来啦，都要通宵游行庆祝。我记得第一次街头表演是在中山五路的北京服装店门口，现在那间商店拆了没有？前几年还在，现在扩宽中山路，可能拆了。我们把大锣大鼓一敲，“咚咚咚咚”一阵乱响，然后就围过来一些人，三五七个，围成一圈，我们就在中间跳舞唱歌。现在回想起来，就跟那些江西老表耍猴的一模一样（笑了起来了）。

我们先是跳忠字舞，后来跳样板戏，跳出了名了，就开始到市一宫、市三宫演出。有一次在市三宫演《白毛女》，杨白劳被地主逼债，演得正凄惨哩，台下却是笑个不停，开始我奇怪，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原来演杨白劳那个男同学裤子没扣好，南风窗大开。当时我一下子急出一头大汗，真的是一头大汗，不是形容的。（大笑）还有，杨白劳被地主打死以后，本来应该哭的嘛，可观众偏偏哄堂大笑，原来又是那个男同学，躺在舞台上“死”了，还呼哧呼哧地直喘气，也难怪他，跳得正欢，忽地要躺下装死，不心脏病发作就算好了。

这个演杨白劳的男同学，80年代就已经全家移民了。

能够进宣传队，在那个时候，是人人羡慕的；能够做校宣队队长的，更是学校的大红人。不过，那个时候的红人，可不像现在的歌星，上台演出有追星族献花，甚至还有人献吻，那时越红越革命，别说谈恋爱，就是对男同学也要目不邪视，一本正经。心里想也不行，那怕是一闪念，想和哪个男同学亲近一点，也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的青春浪费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对青春都有不同的价值观，比方说，战争年代那些去当兵的年轻人，也没有读大学呀，也没有炒股票呀，也没有买奔驰车呀，他们的青春是不是浪费了呢？当然不是。我也不觉得我的青春都干了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因为历史本身是延续的，没有我们那个时候，也不会有现在

作者：瑞秋 Lv 1 时间：2001-04-28 19:41:50

打算为文革写几本书吗？这是你书中的一部分？文革的时候您在哪里？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1-04-28 19:45:29

不是打算写，而是已经写了一本《见证一九六七年》，但还没有出版。文革时我在广州，小学生一名。

当年红卫兵今何在？（口述历史之二）

沈碧容（女，某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我常常想起六七十年代。真的，年纪越大，越是容易想起以前的事情。我曾经在中学红代会宣传队当过一个小头目，你知道什么叫“红代会”吗？就是红卫兵代表大会，就像人代会、工代会什么的。我不是宣传队的队长，但是个小头目，具体什么职务忘了，可能是什么委员之类的吧。

宣传队的人都是从各学校调上来的文艺骨干，个个能歌善舞，当然是语录歌和忠字舞了。记得刚开始时，还没有样板戏，每次演出都是跳忠字舞，唱语录歌。那时候消息很闭塞，报纸有时会集中地发表几首新的语录歌，我们都非常留意收集。但许多语录歌，报纸都没正式发表，或者只是在一些小报上发表，我们都不知道，偶尔从别的学校或同学那儿发现一首新的语录歌，就会像发了达似的，兴高采烈地拿回宣传队，大家争着传抄，马上学唱，有时还编舞排练，忙到半夜也不回家。

那时候真有这个热情，（显出悠然神往的表情）说实话，那个时代让人怀念的，其实也就是这种热情，完全没有功利的一种投入。不像现在我做生意，每件事、每个动作都要计过算过，没钱赚的不做。

印象最深的一次，记得好象是在 68 年，“七·三”、“七·二四”布告是在 68 年的吧？对，是在 68 年。是关于制止武斗的。我们宣传队在儿童公园门口演出，当然都是什么“热烈欢呼”之类的；忽然另一派的宣传队也来了，他们人多，开始想冲击我们，我们就手挽着手，唱起“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词歌，满悲壮的嘛。（微笑着）那时真的是准备对方一动手，我们就流血牺牲，“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死”的了。换了现在，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溜烟跑到河南那么远了。就在这时，来了一队解放军，隔在我们两个宣传队中间。另一派的宣传队只好挪到对面，在致美斋门口敲锣打鼓，也是唱歌跳舞表演。你一首我一首比谁的嗓门大。我们唱得越大声，那些解放军越紧张，生怕我们唱着唱着打起来。后来？后来当然他们赢了，他们人多势众嘛。哈哈，所谓赢了，就是说他们的观众比我们多。

当时作为一个宣传队员，在其他人的面前确实是有很大的优越感的，因为宣传队员意味着“根正苗红”，三代贫农四代乞儿，响当当的革命派。而且做得宣传队员，自然交游广阔，和军代表之类的人物混得挺熟，可以听到许多小道消息，经常有“政治任务”，包括为各级首长演出，至于我嘛，最大的幸福就是为省、市革委会的头头演出过一回了，说来真是惭愧。（笑）但这些都足以让别人刮目相看的了。

我 69 年就因为要到海南岛当知青，离开宣传队了。走的时候真舍不得，哭了一个晚上。离开以后和宣传队的人一直没联系，这几年才陆续联系上，有些出国了，有些发达了，最令我感慨的是一个女同学，在宣传队时是唱歌能手，什么新歌她都不用学，一看谱子就能唱。她说自己是一只眼看谱子，一只眼看歌词。前年见到她，在惠福西路开了一家很小的粥粉铺，卖猪肠粉。一辈子就是这样过的了。

你想采访她？算了吧，我和她也不太熟，只是在聚会时见过面，她来宣传队时，我已经快走了。她未必愿意接受采访。

楼主：一听 Lv9 时间：2001-04-29 10:36:59

在我采访的老红卫兵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表示后悔。他们说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青春无悔”。但言辞之间，却又多少流露出“万事翻复如浮云，前人空在今人口”的感慨。

作者：朴素 4Lv 27 时间：2001-04-29 10:39:49

活着的人可以说“青春无悔”，但死去的人呢？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1-04-29 11:58:01

我想他们之所以说无悔，并不是对他们曾杀过人无悔，那是一场内战，这些活着的红卫兵，当年既是杀人者，也是被杀者。那些死去的人当中，有一些活着时杀人也是杀得极残忍和极疯狂的。

以我的理解，他们说无悔，并不是说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而是对自己参与和见证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感到自豪。在我接触的人当中，参与过文革的人，在和未参与过文革的人谈起文革时，多多少少总有点“见多识广”的优越感。

当年红卫兵今何在？（口述历史之三）

黄琼琼（女，香港某美资贸易公司香港支公司经理）

你怎么找到我的？是××介绍的吗？怪不得，他这个人真八卦。

文革期间我确实在宣传队痞过，宣传队在学校里是一群特殊的人，很有点贵族的味道。每次学校开大会，所有学生都是排队坐在操场上，只有宣传队员可以在舞台前后出出进进，摆摆桌子，拉拉横幅，调一下广播器，有时要领大家唱几首歌，喊几句口号。别人都在课室里读报纸学习，我们则在礼堂里排练，这些都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身份。因此，当时我们走在学生当中，都是特别挺胸昂首，趾高气扬的。

我是怎么进宣传队的？（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来了。可能是宣传队来选人时看中的吧？我记得我什么班干部都不是，但自从进了宣传队以后，班干部（那时候叫班排长）开会，都会把我叫去一起开，无形中，宣传队员也成了干部了。虚荣心是一种很强大的推动力。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70年到从化良口慰问知青演出。半夜忽然听见“当当当”的敲铁轨（是一截挂在树上的铁轨，开工收工时敲的），说山上着火了，大家都要去救火。我们跑出来一看，山上果然烧起来了。知青们都往山上跑，附近的农民都去了。我们宣传队也夹在人群中上山。但良口那些山都特别的陡，到了半山腰，累得实在跑不动了，不知谁说，我们在这里摆开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吧。大家都非常赞成。于是就在山路边停下来，又是打快板，又是念语录，给救火的人打气。

一直闹到天亮，火扑灭了，下山以后，我们给带队的军代表狠狠批评了一顿，还要追查是谁提议停下来不上山的，说我们是怕苦怕死。幸亏那晚很乱，大家实在弄不清是谁提议不上山的，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

我对这段生活有没有后悔？没有。现在回过头来看，自己这一辈子，也许就是只有那几年的生活值得回忆。从大串连开始，到武斗，到大联合，到复课闹革命，一直到上山下乡。经历过这些，一辈子就没有白活了。真的，这些年做生意，奔奔波波，忙忙碌碌，事情多得好象做不完，但静下心来一想，其实是一片空白。

当年红卫兵今何在？（口述历史之四）

陈惠华（女，广州某医院副院长）

最近去看了那个老三届的晚会，竟碰上4个同学，都是以前在校宣队的。台上表演的节目，有许多以前我们也表演过，那些歌我们也唱过。一切好象只是昨天的事情，怎么也不敢相信过去快30年了。

我13岁的时候坐在火车厢外的梯子上北京，那时候是11月，天寒地冻，一个男同学借了一件军大衣给我裹着，就这么从广州一直坐到长沙，才挤车厢里，到北京也没见着毛主席，在北京瞎转了一个半月，实在冷得熬不下去了，只好返回广州。一回来就碰上夺权，3月军管，6、7月到处武斗。我因为串连回来广州晚了，别人都组织了这个战斗队，那个总部，我和几个一起串连的同学也拉起一个组织，叫“战天斗地兵团”，只有十来个人。（她淡淡一笑，把目光转向窗外，沉默了好一会儿。）算了，那些事情不说了。

我第一次上台表演的时候是15岁，穿着军装，腰上扎着武装带，挥着一面红旗在台上跑来跑去，是什么节目已经忘了，只记得是这么跑来跑去，其他人在周围唱唱跳跳。后来我转得头晕眼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红旗不知怎么回事，打到了一个站在舞台边唱歌的同学身上，他一个大马趴摔到台下去了，这可把我吓傻了。不过，他倒没事儿似的，爬起来上台继续唱。

我16岁上山下乡。在海南岛终于结束了那个狂热的红色梦，后来我上了大学，是工农兵大学生。文革后恢复高考，我再次考上大学，我为自己的未来选择了医科。你应该明白我的用心吧？

对那段生活，我一点也不后悔。在海南岛的时候，曾经后悔过，但现在回想起来，不后悔。前一阵子有句流行口号叫“青春无悔”，后来又有人批评这句口号是替红卫兵辩护。不管别人怎么说，反正我不后悔。至少在我老了的时候，我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值得回忆。我不知道现在年轻的一代老了的时候，会回忆什么，是回忆他们怎么唱卡拉OK吗？还是怎么把头发染黄？当然，他们一定有他们认为值得回忆的东西，而我，值得回忆的东西，就在那个年代。

作者：小心求证 Lv 2 时间：2001-04-29 19:09:02

99年毕业，到火车站给哥们送行。平生坐火车无数，一直不知道卧铺是什么样子，因此趁机上他们的车厢参观参观。我坐在窗边的折叠凳上往外看，发现月台粗大的柱子下面站着一个人，穿着白色的文化衫，胸前一行字赫然入目：北大荒30年。我细细地凝视了他片刻，文化衫是很普通的那种，5—10元一件，市面上彼彼皆是，洗得也不干净，已经失却了先前的白色。这个男子显得很苍老，黝黑的面部满是皱纹，站在那里无神地发呆，看上去很忧郁的样子。久了，我也呆呆地沉思，臆断他在生活中一定遭受了许多坎坷和挫折。他们成长的时候，正是意识形态革命一波接一波地席卷中国大地，哺育他们的，是革命的原则和教条。在泛政治化的时代，知识和才能是居于次要地位的，对于革命理想的信仰和道德的纯洁性才是首要的。这对他们的知识和技能的培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了上山下乡的年代，刚刚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他们，自愿或被迫地奔赴僻远的地方，充当了革命平等主义实践的排头兵。

后来，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虽然重新回到了城市，但是早年所习得的知识技能，必定会让他们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而且，相对于那些没有离开城市的人来说，他们又似乎是后来者的角色，两者难以站在同样的高度，没有处于同一起跑线上。

希望一听也能够采访一些在竞争中失败的下放知青或红卫兵，我想，如以上四位成功者，是他们当中的极少数。

叶曙明（一听）：与晓刚探讨广东地方主义问题

晓刚兄请进：关于地方主义问题

晓刚兄：我从旧资料堆里翻出一份“蓬荊问题专辑”，是57年广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的。目录如下：

- 1、蓬荊的综合材料
- 2、对蓬荊反党言行的揭露和批判
 - (1) 为保卫党对水产事业的领导而斗争
 - (2) 必须与蓬荊反党集团辩论到底（摘录）
 - (3) 揭露蓬荊地方主义的思想本质。 16开本 20页。

另外，你说救过陶铸一命，事情是怎么样的？可否详细告知？如这里贴不方便，可否寄到我的邮箱？ysm2001@21cn.com

非常感谢。我有个计划，想写一本有关陶铸在广东的书。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03 19:45:57

哇哈，太妙了，我也很想看看，不知一听兄将来能否复制一份给我看看。

关于“救过陶铸一命”之事，我也只是听过只言片语（那时还没有保存史料意识），而且与杨立、温盛湘文中所说略有出入。我觉得“救过陶铸一命”之说，应是一种夸张的形容。

最早是文革后期，在家闲谈时听父亲所说。大意上，说是当时组织两广干部队南下，与陶铸（时任旅政委职务）同路。一夜，路遇顽军（国军），但敌情不明，陶有些惊慌失措。先父于是立即将两广干部队力量做了布署，抢占有力地形，利用夜色将情况应付了去。五十年代与人闲谈时聊到此事，听者说“那你等于是救了陶铸一命”。后此话被人传到陶铸处，陶铸听了很不高兴，……。

杨立、温盛湘文中则说的是“原来，蓬荊与陶铸相识，蓬曾讲过，当年他们从延安出关去东北时，途中闻枪声，陶铸躲进山沟里，后他们回头去寻找才把陶救出来。蓬因此而讲过陶是「怕死鬼」。也许，这才是陶铸要水产厅扣下蓬荊批门的一原因”。

以前曾在一些党史方面的资料中读到过，抗战后期，中共中央有意派人到南方开辟新根据地，此举有与国民党军抢地盘之意。

读家父简历，上有“1945年5月，参加中共中央组织的南下两广干部队，经太行山，过黄河南下。8月，日寇投降后，接延安命令转赴东北，……。”

后来在《中共党史人物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的《陶铸传》里也曾读到，陶铸“一行十几人”在那时先南下、后转赴东北的记载。看来资料上还是吻合的。以其人数情况看，突遇敌情会有不同对策，也很正常。只是如今陶与家父都已过世，也不知“一行十几人”还有没有人仍健在，要核实恐怕还是有相当难度。

一听兄是搞历史研究的吧？您的地址很眼熟，可能是曾向您索要过一篇有关陈炯明的文稿？

晓刚：“蓬荊问题专辑”只是全书中的一辑，还有其他很多专辑，因此全书很厚，扫描起来有困难，扫描仪的板子压它不住，扫出来总是歪歪扭扭。昨天扫了一页给你寄去了，如不行，只好复印。

50\60年代的广东，很值得一写。它在全国有许多的特殊性。首先它是中南

五省的心脏地，抓住它，对中南五省就有一个轮廓了。

其次，广东在这段时间出了几个人物，后来对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第一是叶剑英，第二是陶铸，第三是赵紫阳。鉴于后来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应与它的历史联系起来看。

读过高新一篇谈邓、叶恩怨的文章，认为广东能率先开放，与叶剑英关系很大，叶有重酬旧志的心态。

高新：《邓小平和叶剑英家族的历史恩怨》

作者：jhealthLv 6 时间：2002-06-07 11:17:02

真是莫名其妙！

删高新还能理解，曾志曾经是改革开放后中共中央中组部的第一副部长，她的回忆录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

看来，KGB的水平急待提高呀，不能草木皆兵啊！

叶剑英说："有人告了我的御状，陶铸这个人，在广西一脚踢开了张云逸(1950)，到广东，又一脚踢开了我叶剑英(1952)。"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2-06-07 15:12:37

曾志那本《一个革命的幸存者》，写得比我预想得要好。可能因为原对陶铸印象不佳，以为这本书又是八股文。但读起来还可以。书名也意味深长。

作者：jhealthLv 6 时间：2002-06-07 15:17:46

在当时的革命同志中，曾志以美貌知名，据说陶铸在厦门第一次见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07 15:25:16

曾志的书没看过，不过有一说，对方方的平反，她传话说应该平反，并说她与赵谈过，赵也赞成。

作者：jhealthLv 6 时间：2002-06-07 15:28:199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让我印象特深刻的是林彪的妻子叶群在“整风”期间被整得往曾志的脸盆里撒尿。好象叶群解放后在广州文教系统任职。

叶剑英的前妻危拱之（河南省委组织部长）特惨，在床上用裤带勒住脖子自杀，获救后精神有些失常，乱骂领导，乱谈恋爱，并嚷嚷着要脱党。"她没有儿女，没有丈夫，得不到亲情的关心。组织上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而调去一个女工作人员也不大尽心。危拱之上厕所跌断了大腿，她既不护理也不报告，听之任之，真是凄惨得很。文化大革命初期，危拱之就糊里糊涂、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07 16:19:33

倒没听先父母说过曾志的相貌，虽然他们与她是同路去的延安。据说延安整风时古大存负责审查曾志，并迟迟未让通过，最后弄到陶铸古交涉。这可能是陶铸古结怨的远因之一。同时也说明，无论是谁，当有某种大权在握时，情不自禁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不那么宽容。jhealth兄前面说到的“鸣冤叫屈”，其实也不敢。毕竟不知道在他们的“革命历程中”，是否就从来没有冤屈过别人。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2-06-07 16:52:03

jhealth 兄、晓刚兄：

你们二位对广东历史似乎都很熟，有一事想请教。1967年6月下旬，广州搞过一次高官辩论会，尹林平与林李明为地方主义问题进行了一场街头辩论，十分轰动。但我遍查资料，都找不出具体时间。辩论会似乎开过两场，第二场是6月28日，第一场就从未见过有具体时间，无论在军管会的记录中，还是在文革小报及材料中，都是说：“6月下旬”、“6月底”或干脆说“6月间”。不知二位是否知道具体时间？

作者：jhealthLv 6 时间：2002-06-08 07:05:23

晓刚兄：

"无论是谁，当有某种大权在握时，情不自禁之中任何人都有可能不那么宽容。"此言甚是有理！

57年广东第二次反地主主义的主要牺牲品古大存在整风中深得毛、刘、彭的信任，将党校一部的许多老干部打成"特务"、"特嫌"、"叛徒"。曾志也被认定是"有特务嫌疑"，曾不服，去找古要"说法"，但他不表态。陶当时还抗议："古老，你主观主义，不肯为曾志作结论，拖了两年，你有什么根据？你有没有作过自我批评？"

所以，大家谁也别指责谁，还是一起维护改革开放、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吧：)

作者：jhealthLv 6 时间：2002-06-09 08:04:128

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2-06-09 08:32:20

抬尸游行在当时是常见的。有一回在广州德宣路有大队人马抬尸游行，我爬到路边的榕树上看，竟看见其中一尸挠起痒来，原来是“活尸”。打劳改犯时，我也在市内好几个地方看见树上吊着尸体，那可是真尸了。我们家在警司旁，有一回有人到警司抢军车，警司的士兵开枪打，抓了几个人。我们听到枪声就跑去观看热闹，正看见士兵在拷打那几个抢车的人，用武装带狠抽，脖子、手臂都是整块皮撕下来，鲜血淋漓，真恐怖。人原来可以狠成这个样子的。

作者：jhealthLv 6 时间：2002-06-10 06:21:455

一听兄的劳作很有意义啊。下面是10年前一个人对“文革”研究的评论：十几年来，国内的“文革”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与国外同行和国内相关学科相比，也存在不少问题。

1、对“文革”的学术研究尚不深入。

“文化大革命”这场曾经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创伤的政治动乱，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正确结论。这个决议是我们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指导思想。但由于种种原因，史学界对“文革”的深入的学术研究还很不够。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研究现状来看，

全国除了几位屈指可数的老专家外，中青年学者简直寥若晨星。据不完全统计，“文革”结束16年来，在各种报刊上公开发表过5篇以上“文革”学术论文的全国只有9人，出版过“文革”学术专著的只有8人。其余大部分“文革”研究文章都是一些“散兵游勇”的“业余产品”。这与“文革”研究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

2、“文革”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亟待加强。

研究“文革”除了应有适当宽松的政治环境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研究资料。但目前国内“文革”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离“文革”研究的要求相差甚远，至今尚无一套公开出版的比较全面系统的“文革”研究资料。至于“文革”中出版的各种小报、传单和文物，当时没来得及系统收藏，现在有关部门也没有广泛进行征集和整理。“文革”中一些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亲历者所知道的重要情况也很少有人收集采访，以致随着时间的流失，这些重要资料也将随之散失。因此，加强“文革”资料的征集、整理和出版已经刻不容缓了。

3、“文革”研究的视野狭窄，方法陈旧。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个非常特殊、又非常复杂的现象，其影响之广、危害之大、历时之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一次政治运动都无法比拟的。研究“文化大革命”应从各个不同领域，运用现代科学的多种方法和手段，加强对“文革”的宏观与微观、综合与具体问题的研究。然而，纵观已发表和出版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研究者的视野一般都比较狭窄，方法也比较陈旧。从研究视野来看，出现了“三多三少”，即：研究政治思想斗争的多，研究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少；研究上层人物和斗争的多，研究下层人物和斗争的少；研究全国性事件的多，研究地方性事件的少。从研究方法来看，大都局限于传统的史学方法，很少运用现代科学的新方法和新手段。这都是来自研究本身的一种束缚，如不打破这种自我束缚，即使外部条件宽松了，“文革”研究也很难取得长足进展。

4、一些非严肃的“文革”纪实作品造成了不良影响。

前些年中，在“文革”学术研究处于沉寂的情况下，“文革”纪实作品却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客观地说，这些纪实作品的作者中，大多数人创作动机和创作态度是好的，旨在以史为鉴，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不少作者为了求真求实，查阅了许多资料，还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和知情人。作品发表或出版后，社会效果也是比较好的。但也应该承认，在一些小报和刊物上也出现了不少所谓“文革”“纪实”、“真相”、“内幕”等捕风捉影、哗众取宠之作。这些非严肃的“文革”纪实作品问世后，的确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对此，应当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管理。

5、对国外有关中国“文革”的著作翻译和评介不够。

国外学者对中国“文革”的研究从理论探讨到资料收集起步较早，而且发展也较快。据不完全统计，从“文革”开始以来，国外出版的“文革”专著已达200多种，发表的论文上千余篇。一些国外的“文革”学术论文论著，虽然由于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某些资料的限制，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之处。因此，适当地选择一些有学术价值的“文革”研究论文论著，并对西方一些有影响的（包括好坏两个方面）作品加以评论和介绍，同时将国内的“文革”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这对于推动对“文革”史的研究，加强“文革”研究中的学术交流是很有必要的。然而，这些年来，国内史学工作者在这些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很不够。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11 21:31:51

一听兄：“广州搞过一次高官辩论会，尹林平与林李明为地方主义问题进行了一场街头辩论，十分轰动。……不知二位是否知道具体时间？”

真的很惭愧，一点儿不知道。文革初的时候还小，很多事都不知道，更别说日期了。当然，有个别的日期还是有印象，象七二三武斗，七三布告什么的。再后来的，还有一批又一批的宣判大会，仍记得有个七十一岁的老太太，以国民党特务罪被判了二十年。

其实以前对地方主义问题一无所知，也就是近一两年才略知一二。“高官辩论”也是读了杨立的书才第一次知道，不过杨立并没有提日期，连年月都没提。这两天我，在这里问了一些来自广州又年纪较大的朋友，只有一个人“好象有这么个印象”。

或许温盛湘有办法找到了解详情的人，他与尹熟。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11 21:39:19

这有印象。那时好象是“公检法”瘫痪了，于是居民们“自己保卫自己”，搞起了“居民联防”。后来有谣传说英德劳改场的劳改犯逃窜广州，结果打杀不少“行迹可疑”分子。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11 21:40:51

上面少了一个开头——

一听兄：“打劳改犯时，我也在市内好几个地方看见树上吊着尸体，那可是真尸了”这有印象。那时好象是“公检法”瘫痪了，于是居民们“自己保卫自己”，搞起了“居民联防”。后来有谣传说英德劳改场的劳改犯逃窜广州，结果打杀不少“行迹可疑”分子。

还有省革联垮台时，听说在最后一次辩论会后，街上吊了不少代表省革联的“死尸”

jhealth 兄：“下面是 10 年前一个人对“文革”研究的评论……“文化大革命”这场曾经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造成巨大创伤的政治动乱，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作出正确结论”

嗯……。对文革以及任何历史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这类“已经作出”的“正确结论”。你看看，“正确结论”都有了（虽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同一历史事件可能会以不同的决议给出截然相反的“正确结论”），在研究中还如何可能不是“层层阻碍”、“处处禁区”？jhealth 兄稍微多嘴一两句，不把你删得个晕头转向就不算正确。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11 22:36:32/

对历史有禁区的结果，就是让后人不知前事，一再重复历史覆辙。象我们这一代，一九七八年以前就不知道“彭德怀上书”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他是大野心家。对“三年困难时期”，更是糊涂（小时听说，苏联逼债，用筛子验收鸡蛋。过大的鸡蛋会从筛子上滚到地下，过小的鸡蛋会从筛子孔里漏到地下，总之都摔破了，所以我们国家也就“困难”到没鸡蛋吃了）。文革后期的一天，珠影的导演张波（后来拍过文革后第一部警匪片《雾都茫茫》）来家小坐，回忆起抢救运动革命往事：“那天我被周扬叫去谈话之后，我从他那里出来，黑夜中一个人站在山崖边上，脑子里充满绝望，觉得还不如跳下去罢。忽又想到自己的父母，连

儿子身在何方都不知道，觉得就这么死了实在心有不甘，于是在山崖坐了一夜”。听到这里，我和姐姐大吃一惊。姐姐爬到我耳边说：“怎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不是‘史无前例呀’？”忙问其详，方知还有“抢救运动”这一档子事，……。父亲告诉说，当年“清理阶级队伍”的办法是这样的：将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者隔离起来，由几个人昼夜不停地审问，不让睡觉。几天几夜之后，你实在困得受不了，只好招认自己是特务，以求睡上一觉。一觉醒来，审讯又开始了：“既然你是特务，那谁是你的同夥？”“没有同夥，全是我自己一个人干。”那好，又得熬上几天几夜没觉睡，直到你胡乱指称“某甲是同夥”为止。这下轮到某甲睡不成觉了。于是某甲供出某乙，某乙供出某丙，……，接着审查别人的人也一个接着一个地被审查（被审查过的人后来也被用来待罪审查别人）。当时听得象是天方夜谭，后来在海外读到李志绥的回忆录，原来毛也对他讲过一模一样的故事：毛的剃头匠老王头在几天几夜没睡觉之后承认自己是特务，任务是利用剃头的机会刺杀主席。毛听了奇怪，叫人将他押来问：“那你为什么这么久还没动手？”“等国民党军到了再动手。”毛大笑，下令停止了抢救运动，……。

作者：jhealthLv 6 时间：2002-06-12 06:06:28

“抢救运动”在曾志的书中有详细而生动的描述。一听兄提的辩论之事，隐隐约约记得美国人怀特三世在《广州的文化大革命和 2000 名红卫兵访谈》一书中有此内容。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2-06-12 09:04:580

其实这种运动方式，还可以继续上溯至反 AB 团，也是如此.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究竟是一种什么文化心理或传统或什么怪胎在作祟？实在觉得匪夷所思。有人说这是唯物主义运用到政治，发展到极端的反映，把人看成是物质的一种，杀人和毁掉一件物品没什么区别。到底是不是这样，我也没研究。孙中山也是一个革命至上主义者，也是只求目的，不问手段的人，但他也没有想出用这样的方法去摧毁自己的政敌。

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4）炮轰广州军区

1967年8月广州和全国一样，掀起炮轰军区的浪潮，就广州地区来说，8月的风潮，其实是2月省革联冲击军区，炮打黄永胜的继续。2月8日省革联冲军区事件发生后，受到军区的镇压。3月军管以后，军区严厉取缔了与省革联关系最深的几个组织，如八一战斗兵团、珠影东方红、老红军总部等，通缉几名学生头头。

省革联的组织后来大部分成了广州红旗派的组织，他们从4、5月份就开始高喊着揪广谭的口号，要求为八一战斗兵团等翻案。所谓广谭，具体是指黄永胜和陈德，但泛指整个军管会和广州军区、广东省军区。揪广谭的主力是红旗派组织，第一个实际行动是封闭省军管会的专政小组。

造反派对专政小组的指责，自军管以后，几乎从未间断，特别是对公安厅二办整理造反派材料问题，一直穷追不舍。6月4日，中央文革曾经就广州地区公安机关文革问题，电示省军管会：

广东面临港澳，对敌斗争任务繁重，公安机关文化大革命，在军管会领导下，主要依靠公安机关内部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外部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可向军管会送大字报，揭发问题，提供材料和线索，公安机关揭露出来的机密材料，不得在社会上公布。

但造反派不肯轻易罢休。6月13日，省政法揪寇（庆延）联络站向军管会提出要求：一、支持他们揪政法黑线中的寇庆延行动；二、向军管会领导汇报寇的情况；三、要答复他们对寇提出的处理意见。当时，鉴于寇庆延是省军管会委员，政法小组负责人之一，军管会既不敢拒绝造反派的要求，又不敢答应，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关于斗寇的问题，周总理走时曾交代过，凡是军管会的成员，要批斗，最好建议他们开不要太大的会，像省人委礼堂那样的小会，斗批完了，要放回来工作。

军管会态度含糊，造反派于是得寸进尺。到了7月31日，平地一声雷，公安厅联合总部星火燎原战斗队突然宣告封闭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由群众组织封闭军管会下属机构，这在军管以后还是头一回，不啻向军管会下了一道战书。造反派在公告上说：

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是由未亮相的当权派为核心组成的。组长寇庆延，副组长郭曼果、马芳。经我厅革命造反派查实，郭曼果是三反分子，马芳是走资派，寇庆延是彭、罗反革命集团在广东政法战线的黑头目。这个专政小组成立5个多月来，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仅没有起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而且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为此，我队决定，从1967年7月31日22时起对该小组予以封闭，并提出如下3点要求：

一、立即改组无产阶级专政小组。

二、立即把三反分子郭曼果拉下马，让他靠边站。

三、专政小组必须检查前段工作，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揭发批判。强烈要求省军管会，在三天内明确答复我们的三点要求。何时答复，何时启封。否则，将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

封闭的消息一传开，另外一些五花八门的群众组织，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无不飞奔前来凑热闹。就在联合总部封闭了专政小组40分钟后，省公安厅东方红公社也赶来再封一次。他们的封闭声明称：

一、我东方红公社决定从今晚 10 时 40 分封闭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

二、强烈要求省军管会立即改组省军管会无产阶级专政小组，寇庆延、郭曼果等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立即从专政小组滚出去。

三、在新的无产阶级领导班子未组成之前，厅军管小组负责无产阶级专政小组的一切工作。

四、强烈要求厅军管小组和省军管会支持我们这一革命行动，并立即答复我们的这一正当要求。

当 8 月初，两报一刊发表一系列关于“炮打司令部”的文章后，造反派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炮轰的调门也愈提愈高，封闭一个专政小组，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了，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的口号，遂鼓吹喧阗。

7 月 29 日，广州红司发出《告广州军区三军革命指战员同志书》，声称在广州军区司令部里，有一小撮走资派，“他们是镇压湖南、广西、广东文化革命的后台，他们是带枪的刘邓，他们是比陶铸更危险的人物！他们虽是一小撮，但他们却操纵着实权，他们掌握着枪杆子，印把子。他们就是人们常说的广谭主要构成者和总代表。”这份公开信甚至号召：“我们深信你们——人民的子弟兵，毛主席的红战士会同我们广大革命造反派一道，为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广谭做出贡献。我们也深信，当军内一小撮胆敢背叛毛主席，背叛党和人民，走陈大麻子（即陈再道——引者注）的老路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调转枪口，对准他们!!!”

同一天，八一战斗兵团总部发表《关于敦促广州军区、广东军区迅速改正错误的强硬声明》。声明警告：“军区必须马上、毫无保留地交回非法没收我们的队旗、袖章及其他一切物品，彻底交出一切所谓‘自首’‘交代’的黑材料。公开承认错误。形势迫人，军区某些人必须放聪明些，决不可看着较为积极主动的路不走，而重蹈武汉、湖南问题的覆辙。”

8 月 1 日，广州红司再发出《炮轰广州军区党委紧急战斗动员令》：“红司全体战士，立即行动起来，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彻底揭露批判军区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捉尽陶贼死党，把他们彻底干净地扫进垃圾堆里去！我们强烈呼吁：军内无产阶级革命派与我们并肩战斗，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向军区党委猛烈开炮！开炮！”

8 月 7 日，工联发出《给广州军区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为什么以前被你们的上司打成‘反革命’组织现在都平反了呢？为什么被你们的上司认为是正确的好文章《颠倒》，中央文革都认为是错误的呢？为什么……这些问题你们又是怎样想的呢？”“广州党内、军区的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始终要暴露出来在我们面前的，让我们共同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这些牛鬼蛇神扫除干净吧！广州谭震林式的人物，是逃不脱革命人民对他们惩罚的。”

8 月 8 日，广州三司炮轰广州军区党委联络站发表《严正声明》：“2 月 8 日所谓‘冲军区’完全是刘兴元、温玉成等一小撮人挑起的。二·八事件决不是反革命事件，而是革命行动，必须公开为二·八事件平反，在当前必须发扬‘二·八’的革命造反精神，猛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明提出“解放广州军区”的口号。

8 月 12 日，红司发表了题为《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社论。

红司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主编的《红色暴动》小报上，以“热烈欢呼毛主席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猛揪广州军内一小撮‘走

资派’”为通栏标语。一篇署名“本报观察员”的文章《反对右倾投降，迎接特大决战》称：

广州谭震林就是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人未下野，大印在握，专政机器在手，贼心不死，处心积累绞杀广东文化大革命。在3月黑风里，在7月血案中，他们已经向我们杀出了一刀又一刀了，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再杀出第二刀、第三刀！

.....

军民团结起来！把千仇万恨集中在笔尖上，集中在刺刀上，以最大的代价，把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拉下马！把枪杆子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手里！

华师红旗甚至耸人听闻地宣称，7月中旬以来，广铁分局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事件，“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包含着兵变的目的”。一篇题为《粉碎广谭兵变阴谋》的文章写道，“军事上，铁路是必争的要害部门之一。广谭控制北站，目的在卡住广州市的咽喉，切断南北交通。加上广州市北部兵力部署的配合，这是什么阵势！”文章惊呼，“事实上广谭已完全控制了北站，大批主义兵已集结在北站（广谭允许他们吃饭不要钱）；广谭已公开反对中央铁道部军管命令，动用机密的战备系统，公开走上叛逆的道路；广谭正在调兵遣将……兵变的阴影笼罩羊城。”

8月10日，由原省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戈枫领衔，九名原党政领导干部联署的大字报《彻底清算陶铸在党内、军内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广州军管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军内某些负责人还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大字报声称，军管会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一、对待左派组织问题：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他们不是支左，而是支保。他们不是有错必改，而是坚持错误，不肯回头。

二、3月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问题：在3月份来自陶、赵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党内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招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捏造革命造反派“牛鬼蛇神”多，围剿了革命造反派。

三、武斗问题：广州地区武斗越来越严重，武斗事件都是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所造成的……最近事件发展到一个极端严重的阶段，一些解放军手上的武器和国家的弹药仓库，竟任意由某些组织“夺”去，用以进攻革命造反派，而军管不“管”，警备司令部不“警备”。

四、对干部问题：……他们（军管会——引者注）一方面指责干部亮相倒向革命左派一边就是“拉一批，打一批”，并对他们进行恐吓和围攻，另一方面又亲自出马召开了一部分处以上干部的会议，策动他们“集体亮相”……以反地方主义复辟逆流来代替什么陶赵及其死党，转移斗争大方向，以不分革和保的大联合，抹杀两条路线的斗争，来支保压左……

由于署名者都是原省委的领导干部，并得到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的支持，因此大字报一贴出，马上引起轰动。当时，许多原省委机关领导干部聚集在第七中学开会，讨论局势问题。据说正在酝酿成立“中南、省、市革命干部造反联合委员会”。8月15日，原广州市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在北京路科技书店三楼开会，讨论成立“革干联”的计划与步骤。对此，军管会大为紧张，立即分头约请一些主要干部谈话。

8月18日，省军管会和原省委候补书记张根生进行了一次谈话，了解他对文革的看法。这只是一个开始。张根生告诉军管会：“关于原省委一些领导干部，

目前在思想上比较苦恼的是如何认识两条路线斗争，怎样检查自己问题；也担心军区犯路线错误，有不少同志对造反派错误看不惯，现在都在考虑这些问题。有些人在转，有些人仍在坚持。”

8月19日下午，军管会派人和原省委候补书记张云谈话，据张云说：

我跟军管会的人说：军管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保不支左，实际上是镇压了革命造反派。“颠倒”一文就是为镇压造反派做舆论准备的。总理4月18日的指示没有执行。我的看法是军管会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军管会领导作检查，改正错误，不要扭扭捏捏的，要公开表明支持谁。

张云提醒人们，“可以肯定广州军区有一小撮走资派，但广州军区不是武汉军区，黄永胜也不是陈再道。”意思是说，广州军区虽然“犯了错误”，但错误的性质与武汉军区不同，没有到那个程度。

张云说：“当前，武斗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频繁，社会治安混乱，生产会受到损失，也会被敌人利用。这是两条路线斗争激化的表现，是个值得重视的严重问题，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非常担心，希望军管会采取有效措施。”

与此同时，军管会也找省委候补书记李子元谈过话。8月21日，李子元向军管会反映了一个情况：“上星期五省委‘东风公社’负责人和一名副处长找我与张根生、张云在一起谈话。我说：你们炮轰军管会，打倒黄永胜、温玉成，把军管会搞垮了怎么办？他们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们认为：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焦点在于军管会，军管会支左有方向路线错误，不是支左，而是支保。总理来广州后，还是两面都支，看起来面面俱到，实际上是支偏保组织。这个问题不解决，广州文化大革命不能前进，他们还说：炮轰黄永胜，炮轰军管会，不是当‘走资派’打，而是想使他们不支保，真正支左。”

军管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认真倾听地方干部的意见，可能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广州军区的支左工作，受到来自中央的批评，刚刚作了检讨，处境颇为被动，迫使他们不得不虚心倾听各方面意见；二是全国形势，开始向结束内乱，恢复政权的方向转变，“革命干部”重新出来工作，亦为大势所趋。

一度成为社会舆论焦点的八一战斗兵团平反问题，在8月11日终获解决。经报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示，同意公开宣布摘掉其反革命组织的帽子；对于一小撮坏头头，须反复查明，证据确凿，才予处理，并应尽量缩小打击面；如无现行罪，应一律予以平反。原八一战斗兵团的跨行业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同意在摘掉帽子后不再恢复。该组织原来的成员可参加本单位的其他革命群众组织，或另组不跨行业的基层组织。但如果广州其他群众组织尚存在跨行业的，则应允许这个组织暂时跨行业，将来再归口。

8月13日，广东省军区就八一战斗兵团平反事，发出第3号公告：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现正式宣布摘掉“八一战斗兵团”反革命组织的帽子，政治上予以平反。“八一战斗兵团”现在仍被拘留的人员，除极少数有现行罪恶的坏人，要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的人一律释放，予以平反。被拘留的人员在拘留期间所写的检讨退还本人，讯问记录和其他材料由广州警备区在原“八一战斗兵团”派出的代表监督下集中销毁。在此，我们向原“八一战斗兵团”的革命群众和被拘留过已被释放的人员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并希望他们与其他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在斗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

根据中央指示，八一战斗兵团政治上平反，组织不能恢复，但他们早已自己给自己平反了，不仅恢复了组织，而且还相当活跃。当军区宣布八一战斗兵团平

反之际，他们正和工联、广铁总司、石井红农友、红司、部队文体红司、机关红司共同组成“广州地区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简称红联）。广医红旗指责第3号公告是“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继续坚持错误的反动面目的大暴露”，“是地地道道的假检讨，真反扑”。

造反派根本不把军队放在眼里。8月11日，由部分红旗派的民警、复退军人、工人、干部、学生组成的“广州红色警备司令部”（后归入红联，改称“广州红色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警备司令部”，简称红警司）正式成立，下设参谋部、政治部、作战部等机构，配备有三个“警备团”，另有一支“前线突击队”，还派出巡逻车在市内巡逻，号称肩负起“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责任”。他们指广州警司是“黑警司”，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8月12日上午9时，工联开了两卡车人到南方大厦，手执大刀、匕首、手枪、步枪、轻机枪，迅速守住了各个门口，逐层占领，直到六楼，并封闭了一、二、三楼，不准营业，做总部办公室之用。下午，红警司、八一战斗兵团也相继进驻南方大厦，声称黑警司已经垮了，他们要保护大厦，司令部要搬进大厦办公，并成立“人民百货商店（即南方大厦——引者注）市场供应管理领导小组”。他们甚至向军管会提出，由他们负责保护全市的电厂、水厂、粮仓、市场供应，并要求军管会发枪给他们。市面气氛极之紧张，各厅、局上班的人数，寥寥无几，只有10%左右。

造反派对广州军区发动一轮更猛烈的攻势。广州兵团叫喊着：“刺刀，刺刀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关键的时刻到了！”8月11日，红联发出《特急通令》，公开警告军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持枪是党和人民对你们最大的信任，任何人不得将枪口对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准自己的同志，对准人民，否则立即缴械，坚决制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能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枪，用政治统帅军事，打倒军阀主义、流寇主义，变相经济主义！”

《夺黄（永胜）、刘（兴元）军权，还我新广东》；

《广州兵变的序曲》；

《坚决打倒广州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抓紧战机，向广谭发动总攻》；

《夺枪以后》；

《发动群众反兵变》；

《广州告急！广州告急！广州十万火急!!!》；

这一类的标语、传单、大字报和小报文章，宛如惊涛裂堤，铺天盖地，转眼间淹没了广州。

8月20日，中共广州军区党委在造反派的猛烈攻击下，不得不作出《关于在广州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承认军区在介入地方文革以后，“没有首先肯定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斗争大方向和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绩，而是把他们的某些错误看得过重，并以对所谓‘四大事件’（即冲军区、冲广播电台、冲市公安局和旧省委假让权）的态度来判别群众组织的性质，以致模糊了识别左中右的界限，打击和压制了某些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

军区承认他们对省革联的立场是错的，承认镇压八一战斗兵团等军内外群众组织是错的，在迎接春交会而进行整顿社会治安工作中，也扩大了打击面，抓了一些不该抓的人。检查报告重申：

对过去被我们取缔和解散的军内外革命群众组织一律平反；过去所发布的有关取缔和解散革命群众组织的公告、布告、“罪状”等，一律作废。被拘捕的人

员，除个别有现行罪行、证据确凿的坏人，应当按照中央规定依法处理外，其余一律平反。在这里，我们特向被错误地取缔和解散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捕的人员，以及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受到压抑的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道歉。同时，有些群众组织在我们影响下犯了某些错误，其责任在于我们。我们感谢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给予我们的批评和帮助，并且希望继续给予我们批评、帮助和监督。

毛泽东一直认为，乱并不可怕，乱只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但现在他开始担心了。军队和农民愈来愈深地卷入动乱，不少军队开始明确表态支持某一派群众组织，甚至向他们输送武器弹药，或者自己也组织起各种各样的小团体；8月21日，广州部队内的造反派一千多人，在军区政治部门口召开“愤怒控诉广州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派镇压军内造反派罪行大会”。海陆空三军代表和部队工厂、农牧场代表，纷纷发言，并把军区文革办的负责人揪出来示众，这只是在全国无数同类凶兆中的一个。

当天上午，在省军管会大楼门前，贴出了一份由张云领衔，一共有21名原省、市委机关领导干部联署的大字报《最强烈抗议！最紧急呼吁！》，就广州地区的武斗，提出了以下看法：

（8月20日的三元里武斗）是党内、军内一小“走资派”操纵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保守组织的一小撮坏头头制造出来的。他们用变相发枪的方式使用了最残暴的法西斯手段，对革命派连续进行了血腥镇压，犯下了滔天罪行。血债要用血来还的……

我们就这次严重反革命事件，向广州军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对地总、主义兵、郊贫联等一小撮坏头头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你们要向毛主席请罪。这次惨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严重结果。因此广州军区、广东军区必须承担这次反革命事件的主要责任，要公开检讨承认错误。

次日下午，当这张大字报的第二稿贴出时，联署者增至31人；第三稿贴出时，联署者已增至93人。

8月31日，由工联、红旗工人、八一战斗兵团、工人红司、广州工人、财贸红旗工人、交运红旗、新地总等组织组成“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简称工农革联）。广州军区一改以往对红旗派的冷淡态度，由孔石泉亲自到成立大会上，把一面上书“广州工人革命联合委员会”，下署“广州部队全体指战员敬赠”的大旗，授予工农革联。这是一种亲善的表示。

孔石泉在讲话时，承认军区在支左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说：

由于军区领导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思想保守，因而在支左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在一段时间里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主要表现在……在2、3月份，我们压抑和打击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组织，错误地把“八一战斗兵团”等组织当作反革命组织或非法组织加以取缔和解散，错抓了一些人。4月份，在中央、军委发布了一系列指示，特别是总理亲临广州作了重要指示之后，对于上述错误，我们虽然有所察觉，但是觉悟很迟，改正很慢，因而使广州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9月12日凌晨，两派群众在轻工模具厂又发生严重冲突。9月13日，地总和郊贫联一万多人，冲占军区大院，执意召开大会，并静坐请愿。早上5时，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地区两县一区郊贫联代表时，对此大为震怒，立即指示：“一、你们的大会不要开了；二、马上从军区大院撤出，因为你们到军区大院是违反‘九·五’命令的；三、在农民、工人、学生从军区大院撤走时，旗派不要阻拦。”

经中央调查组和军区领导与东风派代表商定，东风派从9月14日中午开始

撤出军区大院。军区领导一再指示：为了保证安全，军管会系统要做好具体布置，此事关系重大，务必十分重视，特别要做好造反派的工作。

但是，东风派从军区大院撤出后，又有一部分移师到省军管会继续请愿。

周恩来对地总又跑到军管会，更为不满，9月15日，他接见广州地区代表，严厉批评地总不听劝阻，执意召开大会，到军区静坐；限他们在本日12时以前退出军区大院。

然而，此时此刻，广东省军管会内却一片混乱，一场有军队介入的武斗，竟在军管会内发生了。军队内部的分歧，一下子暴露无遗。

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详细写道：“这里的东风派准备4点多钟撤走。在准备走之前，三司红旗兵团来了一辆中卡，要开车撞人，后被东风派抓了四人，搜出一支驳壳，一把匕首，两个手榴弹。这四个人交给军管会，东风派很多人很气愤，要揍他们，但很多人说要相信解放军，他们还组织人力手挽手地保护。但5点多钟正要撤退时，四十七军来了两个连队，由于战士任务不明，而且徒步而来，东风派哨卡问他们，他们说‘我们是中央部队，任何人无权拦阻。’后来警卫连问他们，他们说警卫连是支保的，混蛋等。他们要抢那四个人。东风派手挽手来挡，挡不住就用手抱他们。他们就用手来打，就引起来武斗。武斗结果，东风派重伤二人，警卫连一人（听说那两个连队也伤两人），挨一般拳头的警卫连十多人。武斗劝止后，就做东风派的工作，他们23点50分开始撤退，到1点05分撤完。”

省军管会院内的武斗，显然使军区大感震惊，尤其是军队内部意见分歧，造成互相对立的情况，如果不及时解决，将造成难以想象的严重后果。9月17日，省军管会留在广州的领导在警备区召开座谈会，研究怎么制止广州地区的武斗。保持军队的统一指挥，成为制止武斗的先决条件之一。会议决定：“严格执行六六、九五命令，今后凡发生武斗使用武器，部队将采取武装包围、宣传、缴械。弄清原因，交出凶手，追查幕后指挥。设现场统一指挥，现场指挥有权批准抓凶手及武装自卫。”

直到广东省革委会成立后，炮轰军区的浪潮才渐渐平息。

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5）砸烂“旧省委”

注：文中所涉及的某敏感人物，一律以赵××代替。

广东军管以后，中央文革宣布广东省委交权是错误的，省委书记赵××等人便完全靠边站了。每天可以做的，唯有读大字报、写检查、接受造反派问话。广州成立了一个“批斗赵××联络站”。他们认为，前一段对赵××问题之所以“揭得不深”，主要原因在于：“一、赵××的真正面目还没有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由于广东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很快，赵××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记在自己的账上，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二、知情人还没有真正站出来进行揭发，省委常委和书记处成员中，虽有揭发，但是多限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而对赵××的‘三反’罪行揭的少。”他们制定了进一步揭发批判赵××的计划，“采取内外结合，大会小会结合的办法，把要害问题揭深揭透，发动已经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进行专题揭发，组织力量进行重点调查，发动地委第一书记们和省委内部知情人揭发，从各方面收集材料”。

从3月4日至26日，以机关为主的群众组织，连续召开三次大会和一次小会，斗争赵××。他在会上承认了一些问题，但只承认是工作上的错误，是“好人做了一些坏事”，不承认是三反问题。其中一次大会，发了6000张票，但只有3000人到会，中途又溜了一批。有些发言不知所云，赵××态度强硬，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便不得不散了。

3月31日，赵××和省委机关造反派“东方红公社”的几个头头进行谈话。这些机关造反派，堪称“省委内部的知情人”了。但他们也搞不出什么新材料，只好一味勒令赵××交待思想。

赵××说：“我想和同志们多接近，想和机关各造反派保持接触。一方面，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同志们，另一方面，想听听同志们的意见和批评。我脑子里经常起伏的是两个问题：一是我这个人广东应不应该被打倒？我有严重错误，在广东党内有相当影响。但是，我这个人真就这么坏吗？我今天还不完全通。在理智上通，在感情上不完全通。二是相信群众的问题。我不跟群众一起揭发自己的错误。陶铸问题出来，省委的盖子逐步揭开，我思想上有比较大的抵触，认为别人攻击一点，不及其余，总觉得只讲了我的一面，认为你们怎样讲就怎样讲吧，我是怎样的人，我自己知道。”

造反派要求他老实交待和陶铸的关系。但他语焉不详地回答：“我和陶铸的关系，的确是工作关系。但一下子说不清楚，以后会讲清的。同志们将来会理解的。现在要我交待和陶铸的关系，与同志们完全站在一起，谈出更多的问题，我有困难。所谓跟陶铸的关系，主要是文化大革命这一段。过去干了些什么，同志们都看到。我不交待，同志们都会揭。”

广东批斗当权派，相对于其他省份来说，还算比较温和。往往是一个组织需要表明自己的左派立场时，就拉当权派去斗上几场，平时几乎没有人对这些事感兴趣。军区认为，军管前后，赵××挨了几场斗争，“表现比以前更嚣张了”，就是因为大家不是敷衍了事，就是看风观望。军区总结其原因：

一、组织工作问题

“一.二二”以来，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两条路线上，对赵××的斗争，火力未能集中。斗赵的组织没人管，虽有一个“批赵联络站”，但只做一些汇集材料等具体工作，每次斗争都只是一些革命组织临时安排的。因此，组织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各次斗争的内容不少是重复的，有些材料不够落实。也没有人负责了解赵××的活思想，做他的思想工作……

二、深入发动问题

……最了解赵的情况的张根生、李子元、张云、杜瑞芝以及其他比较了内情的厅、局、地、县的领导干部，都没有真正揭发赵的问题……

三、要解决一个“看风”的问题

目前，在中上层领导干部中“看风”的情绪是比较严重的。据反映，由于林李明同志在斗争会上，没有喊打倒赵××的口号，调子比较低，于是，就有不少人猜测，认为林最近去过北京，他了解中央的意图，而他的调子却这么低，因而对赵存有新的幻想，不敢大胆揭发……

据了解，尹林平也有这样的意见。书记们都在看风，特别是林李明，因林的调子低，大家都不敢冒失“跳出来”，揭问题留了一截，赵因而嚣张。

由此可见，所谓批斗高潮，其实往往表里悬殊，只要造反派各路诸侯，能够保持大致的均势，当权派们的日子，也许还不算太难过。但如果一派得势，一派受压，前景就很难逆料了。军管以后，广州形势大约平稳了一个月时间，然后，群众组织开始出现剧烈的分化，4月以后，也是当权派们噩梦的真正开始。

4月14日清晨，周恩来和黄永胜联袂飞赴广州。他在接见群众组织时，批评地总“偏于保”，为了表明自己并非一个保守组织，地总在周恩来离开广州的当天，便与红总联合召开大会，批斗赵××、尹林平和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梁湘等人。随后，地总各分部在省柴油机厂、市二宫、员村、越秀山等地，分别举行了十几场批斗会。红旗派也不甘后人，竞相召开批斗大会。这成了检验革命与否的指标。斗争的方式，也变得愈来愈激烈和残酷了。

《人民日报》向全国发出战斗号召：“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他们所坚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大揭露，大批判，大斗争。”造反派们闻风而动了4月19日，尹林平的家被暨大一二.二六抄了，拿走了一些机密文件和个人自传；20日，华工红旗又来抄了一遍；21日，华工太阳升进驻他家二楼，把他赶到楼下住。4月21日，赵××的家被抄，华工八.一八进驻了他的家，还勒令他“立即滚蛋”，家属要在48小时内搬走；张云的家在同一天也被华工八.一八抄了。5月3日，刘田夫、寇庆延的家被造反派撬门而入，抢走了大批文件、笔记本。多数省委书记的家都被造反派进驻了，赵××、区梦觉的家整座被造反派进占了，林李明、尹林平、张云的家大部被占，准备进驻的还有刘田夫、张根生的家。

翻阅省军管会的值班日记，4月26日有这么一段记录：“行政处金同志反映学生撵赵××搬家，王阑西家属也说学生撵他们搬家，问哪里搬。没地方。行政处难办。家属不知如何办，请军管会帮忙。（已请他们和院校组商办。）院校组意见：刘政委有指示，不要去管这类事，由他们占去。以后如有这类事，可不管。如一定要我们表态：一、你们要占房子是你们的事；二、请按政策办事，给他们留必要的居住地方。”从4月19日开始，赵××被地总等组织一连斗了六天。据军管会的记录：

第一天，从4月19日晚9时至20日早晨5时，分别在四个单位斗争了四场。开始，由“地总”把赵××揪到工人文化宫大会去斗争，这场斗争主要是要打赵的威风，并揭发批判有关他镇压工人运动的问题。接着，红旗工人赤卫队广州总部揪出斗争（晚上11时半至次日零时45分），主要是斗他过去操纵红旗工人赤卫队所干的坏事。对此，赵××不作交代。会后，又由“地总”、“红总”联合召开小型的批判、斗争会，要赵交代拉一批，打一批，操纵一些组织打击工人运动

的事实……

第二天，20日凌晨2时半，由《南方日报》革命组织将赵拉去斗争，主要批判斗争他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放毒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言论。据说，赵××在工人组织那里态度比较老实，而在《南方日报》社时态度非常嚣张，很不老实。斗了两个多小时……

20日晨5时把赵拉回工人文化宫，让他休息，下午要他写出书面检讨材料。晚上，“地总”再开小型斗争会，参会约三百人……

21日，由柴油机厂、新珠影、广州电机厂揪去斗争。

22日，在海珠区斗争。

23日在重型机器厂斗争。

24日在员村区斗争。

25日准备在越秀山开大会斗争后再拉到黄埔造船厂去斗争。

25日下午的“批判斗争赵××大会”，由地总、红总等四十多个群众组织联合发起，三万多人参加，并拉梁湘陪斗。会后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4月27、28日，省直大联合总部在省人委礼堂连开两场斗争大会，斗争赵××。到会的1100人，分属农业、商业、工交、统战四条战线。4月29日，他们在省人委礼堂召开党群、政法、文教战线的斗争赵××大会。赵××被押到台上，“当群众喊打倒赵××的口号时，前两天他不举手，今天举手了。但对喊打倒刘、邓、陶的忠实走狗赵××的口号，则不举手。”赵××的倔强态度，可见一斑。斗争会罗织的罪名，计有六项：

一、一二二假让权后，造成农村基层组织普遍瘫痪。部分社队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起来夺权，在政治上、生产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二、学习“毛著”先进县遂溪县，是陶铸、赵××一手泡制出来的假模范……

三、在农村中推行资本主义经济政策，扼杀社会主义经济，1961、62年，陶、赵扼杀集体经济有“三把刀”：砍掉公社大队企业，将三级所有制变为一级所有；缩小生产队规模；联系产量责任制（实际上是包产到户）；

四、一贯来在干部中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五、在工业和商业工作中，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的经济政策；

六、在统战工作中不讲阶级斗争，实行右倾投降主义。

但据称，“在斗争会上，赵××在态度仍然很顽固，很狡猾，避开三反性质的问题，只承认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有些问题矢口否认，说‘我没有管工业，我不知道’，‘我是不赞成的，我错在没有坚决斗争，坚决制止’等等。”除了赵××以外，其他省、市委负责人也无可幸免，纷纷被押上批斗台。

省直大联合总部下工交总部组成“云广英专案组”，这是大联合总部“尹林平专案组”下属的一个小组，其目的是要“揭开以尹林平为首的地方主义翻案问题”。4月22日至29日，工交总部一连斗了云广英7个半天。云广英被迫交代他和廖似光、冯燊、林锵云夫妇等人的关系，承认鼓励过这些“犯过地方主义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起来揭发陶、赵的问题”，并交代了3月8日那次开会（被称为“三八黑会”）的情况，承认对军管不满，对军区处理冲军区问题和组织领导生产班子问题不满，对古大存的死因的怀疑等等。

所谓“三八黑会”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在原省委领导班子中，军区最早确定第一批站出来抓生产的书记是林李明。在军区内定将进入军管会工作的原省委干部还包括寇庆延、刘田夫、罗天、曾定石、李进阶、马甫、杨应彬、韩宗祜等人。而另外一些人则被剔除在名单之外。

省军管会一份材料称：

而一些尚未被群众批准，错误较严重的原省委、省人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含厅局干部），他们以尹林平等为首，正酝酿建立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成员，大部分是犯过地方主义和右倾错误……

尹林平 省委书记处书记

云广英 计委副主任

廖似光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陈慧清 邓发的爱人，已退休

冯 燊 政协副主席

林锵云 原省委常委、副省长、人大常委，现已免职退休

黄 康 农垦厅副厅长，前为党校校长，因犯错误开除党籍，61年第二次入党

林克泽 物资厅副厅长，曾开除党籍，61年重新入党

饶彰风 广州外语学院党委书记，犯过地方主义错误，曾受处分

这些人都是暂时不能参加三结合的。尹林平说：“3月6日前，第一次站出来的名单是八人，第二次名单是十人，我都是有份的，但在3月10日后，陈德同志在几十个革命造反派的负责人会议上宣布时，就没有了我和林锵云、李坚贞（真）了。”

50年代，陶铸在广东领导过先后两次的反地方主义运动，第一次是反方方，第二次是反古大存、冯白驹，几万地方干部受到株连。十年来，“地方主义”成了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当陶铸被打倒以后，许多广东地方干部便纷纷翻出旧案，希望能一洗当年的冤抑。

在广州地区，最早提出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是八一战斗兵团。2月7日，八一战斗兵团在其主办的小报《红工农》创刊号上提出了陶铸与古大存的矛盾和地方主义问题。

2月15日，冯燊和林锵云在他们共同署名的告全省干部公开信《放下包袱，挺起腰杆，投入战斗，挖掉陶铸赵××在广东统治的黑根子》中，批评当年反地方主义运动“两面三刀，排斥异己，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他们为古大存鸣冤叫屈。

50年代曾任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吴有恒，也在大字报中指出：“在广东揭陶铸，如不揭开他与古大存同志之间斗争的真实性质，那是不会搞得透彻的，那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尹林平把他与陶铸的分歧，归纳为五点，其核心问题是以下三点：

一、土改时，赵（××）把广东党组织踢开，重新扎根串连，讲广东党靠不住；

二、反地方主义把它扩大化，我只赞成反几个头头，中间干部不要搞；

三、广东没有大军不能解放，土改没有外援搞不好，我不同意。

在广东反地方主义问题上，尹林平与林李明之间，历史积怨甚深，对于林李明能够“站出来”，而他却被摒诸局外，尹林平感到愤愤不平。他解释说：“我到军区去了五次，询问对‘省革联’的态度，军区说：‘现在还看不准，革命的要支持，但不完全支持。’2月14日，我同寇庆延，第三次去军区，提出对‘省革联’的态度的两个方案，一是同‘省革联’一刀两断；一是不理不睬，不亲近。军区说：‘第二个方案好。’2月19日，我第四次去军区，把18日五人《踢开省革联》的稿子带去，军区说：‘大乱时才贴出来，现在乱不起来，如果现在贴出

来，怕你会被省革联拉走。’林李明在2月20日贴出表态的大字报后，军区才匆匆忙忙地叫我表态。”

尹林平认为，“干部‘三结合’不能搞调和主义，折中主义，不能把哪一个人排出来。‘三结合’和出来抓生产是两回事。抓生产不论哪一个人更应该更积极搞好工作。抓生产和领导不同，不能说出来‘亮’过‘相’就是革命的。”

尹林平和云广英、廖似光、冯燊等人，对混乱的局势，感到忧心如焚，3月8日，他们相聚一堂，谈论的中心话题，就是关于当前的形势。

尹林平说：“现在为什么不宣布军管，主要是工人、学生有意见，现在部队派人去做思想工作。”“大家认为，照现在这样下去，广东文化革命运动可能夭折”。大家还研究了三结合问题，尹林平说，“认为最合适的是我。这是冯燊、云广英二人中一人先提出来的。”于是，他们分头找原省委、省人委的干部做工作。

在谈到地方主义问题时，尹林平说：“现在应该用新的观点看问题，应允许人家讲这些东西，摆自己的观点……反地方主义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如果不是按照毛泽东思想，我主张让大家揭发出来，让大家来评。

（尹林平说）我们决定去找三个地方：一是监委，我去做，二是组织部，廖似光去做，三是省人委欧初，也是廖似光去做

会议决定：

一、向中央写一个报告。

二、写一个告全省人民书或大字报。

三、以廖似光材料为基础，写一个陶铸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廖似光写的陶铸的干部路线，实际上是为地方主义翻案。”据尹林平说，给中央的信函内容是：“一、军队组织生产班子问题。二、组织左派队伍问题，认为左派是军队给的。三、当前运动风向转了的问题。四、广州日报于2月28日军管，但军管后还是省革联当权那派当家，原来反省革联的占广州日报职工85%没有当家。”

他们本来还打算写一张大字报，阐明他们的观点，内容是“现在‘三结合’的班子有问题，现在机关运动的风向变了，认为出来抓生产的人，机关干部、群众都保他们；军队支左中的错误问题。”但大家一商量，觉得不能写，因为《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发表了，说矛头不能对准解放军。他们说，“如这么一写，就是把矛头对准人民解放军”，尹林平也劝大家别写了。

《红旗》杂志第五期的社论是《论革命的“三结合”》。其中一段是这么说的：“阶级敌人最害怕人民解放军，最害怕有军队干部参加革命的‘三结合’。他们费尽心机制造流言蜚语，捏造事实，妄图挑拨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的关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对于阶级敌人的这种阴谋，必须给以充分揭露和坚决的打击。”很显然，现在还不是讨论军队“支左错误”的时候。

（尹林平说）第二天我又叫廖似光来我家，我说昨晚《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出来了，几个东西不要搞了。廖说：你们不联名，我自己发。廖还说那份东西已送云广英去了。

到第二次开会那天（3月中旬），我迟到。我说：“这些东西我看了，不能发。与《红旗》杂志社论不符合，第二是形势还看不准，再看一看如何发展，方向看不准；‘三结合’班子问题没落实，根据这种形势，一、二、三人联名都可以，最好不要六人联名，联名就成为有组织的东西了。”

3月27日，军区记录着尹林平作的最后一次尝试。他打电话给军区找陈德，

没有找到。他要求值班人员转告陈德，“过去，省机关文化大革命由我管，有些领导干部已停止（职）反省，现在下面群众要求一些较好的干部恢复工作，他们来找我。请陈德同志明确一下，干部恢复工作问题，由革委会决定处理，还是由我决定处理。”陈德的答复是：“由革命群众决定，林无权处理。”

4月以后，批斗浪潮越掀越高。4月26日，文教战线单位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批斗区梦觉大会，对区梦觉提出的罪名有三条：

一、疯狂攻击庐山会议，否定三面红旗。说什么“……庐山会议后，又糊涂了，左的东西未纠正，又进行反右倾，因而把前段的工作冲掉了，几年来我们做了许多蠢事，干了不少无效劳动。”叫嚣平反要“一风吹”；二、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说：“目前的矛盾是要建设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与现实落后的农业国”，“阶级矛盾基本解决了，今后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搞经济建设”；三、积极推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抗毛主席1964年春节指示，1965年的“七.三”指示，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同志的信。1960年贯彻陶铸提出的中学党支部不能领导学校，只能起监督作用的修正主义主张，推行高校六十条、中学五十条。

4月28日下午，省教育厅和高教局召开两百多人参加的中型会议斗争区梦觉，晚上又轮到卫生厅系统开斗争区梦觉会议。据称，“区在以上两个斗争会上的态度不够老实，只承认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自己写的黑文章和证据确实的事情也承认一些，但在关键问题上则避重就轻，特别是卫生厅的斗争会上，好多问题推说不清楚，或者说是上面来的。”从28日开始，文教系统以厅局为单位，分别进行批判，以便集中材料，再开全战线斗争大会。

4月26日晚上，省人委东风公社、红色造反总部和人委办公厅全体干部职工召开大会，斗争欧初（人委秘书长）和朱明达（副秘书长）。从军管会所作“斗争会上战斗气氛较浓，发言比较集中、有力”的记录，可以想象当时会场上的热闹程度。

5月3日，省直大联合总部农林水总部，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揭发批判罗天推行刘邓陶赵反动路线罪行大会”，到会有农业战线一千一百多人，发言大批罗天在农业部门实行专家路线、技术挂帅，在农业学校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5月4日，省属11间农校学生代表，在仲恺农校召开“揭发控诉批判以罗天为首的在我省贯彻执行刘邓黑帮办校方针——社来社去大会”。罗天和农业厅厅长王维在台上挨斗，在台下陪斗的还有李子元、张大伟（农科院副院长）、吕白（省人委副秘书长）、叶彬（农业厅政治处处长）。大会开了一整天，晚上还把罗天留下来开小会批判。

5月5日，周恩来致电广州军区，指示“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并要求黄永胜把执行情况上报。据副市长罗培元追忆：“广州地区的，包括中南局的、省的、市的大多数党政当权派起初是分别监禁在各自机关的暗室、储藏室、防空洞、地下室里，后来通通集中到天河区的梅花园兵营里。”

赵××、尹林平、雍文涛、区梦觉、刘田夫、林锵云、张云、张根生、金明等人，都是梅花园广州警司监护室里的囚徒；另外一批人，饶彰风、周楠等，则远赴粤北，关押在乐昌的“31号办公室”里。饶彰风不久便病死于粤北。林锵云也身患重病，于1970年辞世。赵××、区梦觉、尹林平是监护的重点。警司采取了以下措施：

为贯彻总理5月5日关于“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经有关革命组织协商，广州市警备区司令部于5月5日22时30分之前，已将赵××、

区梦觉、尹林平三人送往监护驻地（军区白灰场特务营房）。警司确定，由工交武装部政委负责，并抽调参谋、干事三人，警卫战士二人，在警司成立一个监护组（简称二组），采取二对一的办法实行监护，另由特务营抽调一个班负责驻地警卫。对赵、区、尹在驻地的活动采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过远，三人之间不能互相往来和交谈。在某单位拉去斗争时，监护人员同行，斗争结束即返回驻地，监护人员主要负责安全、生活、思想活动，并及时向上反映。给每人订阅两份报纸及《红旗》杂志等。三人的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开支。监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初步考虑有五条：一、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二、要做好斗批的准备；三、事先看好会场；四、研究确定往返路线；五、掌握斗争时间。但据尹林平、刘田夫等人的回忆，他们被关的时间、地点，均略有出入。

尹林平是4月份被军区拘捕，罪名“反军”。据他自己回忆：“我1967年4月起，就被他们（指黄永胜等人——引者注）关禁起来。与世隔绝，经过种种折磨，一直关了六年。”他感慨地说：“比起死去的同志，我是劫后余生。”不过，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插曲，即5月12日尹林平被华工红旗从警司手中抢了出来，先藏匿于中山医学院，后来又转移到华南工学院。华工红旗在抢走尹林平后，发表“严正声明”，指责军队：

广州警备区司令部某些人在尹林平问题上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我们重申，在尹林平未（解？）放之前，我司令部负责保护尹林平的生命安全及给予人身自由。石牌一带出现了许多大标语：“尹林平我们保定了！”“尹林平是革命的领导干部！”在造反派的保护下，尹林平有机会参与了6月份那场关于古大存问题的“高官辩论会”。

刘田夫说他是7月份被关进广州军区在人和镇的一幢楼房内，里面还有赵××、雍文涛、李嘉人等人。换言之，赵××到7月份还未进警司监护室。刘田夫在那里关了一个星期，才转去警司在梅花园的监护室。警司监护室还有林锵云、王全国、杨应彬、金明等人。

据警司的监护报告称，赵××、区梦觉、尹林平到梅花园后，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分别与他们谈话，赵××和区梦觉认为，“这样很好，对于人身安全、学习生活都有较好的保证”。警司还提出了几点建议：一、目前揪斗赵、区、尹的革命群众组织很多（学生、工人、农民各系统都有），需要统一安排。现划由警司一组归口安排，文革专案组、机关组参与商定；二、需要尽快将总理的指示传达到较大的群众组织中去，充分依靠群众，帮助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可通过座谈会等方式，分别进行传达；三、赵××原配备的警卫员这次未随同来监护驻地，警司考虑，为工作方便，是否可以来。

对于批斗赵××的情况，警司的监护报告写道：“对赵××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曾经斗争、批判了五个通宵，但收效甚微。他对搞经济主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表示承认。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赵××’、‘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时，他也举手，但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刘邓陶’口号时，他坚持不举手。”

5月2日晚，地总、红总的工人和一批红卫兵捣毁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搜走大批关于刘少奇的历史材料；5月5日，广州钢铁厂召开批判焦林义大会；5月7日，地总、红总与“郊区贫下中农革命派联合委员会”（简称郊贫联）等组织，在省人民体育场召开“打倒刘少奇彻底清算刘少奇在全总旧址的罪行大会”，当场焚烧全总旧址的牌子；5月8日，广州重型机器厂、电池厂、人民胶厂、造

船厂等十几个分部，联合举行“打倒刘少奇，批臭‘黑修养’大会”；5月13日，广船分部召开批斗梁湘大会。

5月18日，地总、红总、春雷等群众组织，联名致电党中央、毛主席，“强烈要求将陶铸揪回广东进行批判斗争”；5月29日，地总编印“三反分子赵××反动言论集”；5月30日晚上，黄埔造船厂地总分部把赵××拉去斗争。5月31日，地总、红总、郊贫联等群众组织八万余人，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打倒刘邓陶，彻底捣毁黑省委誓师大会”。赵××、区梦觉在警司人员的监护下，被押到会会场“示众”。

每次从批斗会场回来，这几个人都精疲力竭，好像小死一回。赵××的胃病又犯了，晚上痛得辗转难眠。区梦觉的血压急剧升高，头晕目眩，呕吐不止。尹林平也有心脏病，晕倒过一次。据警司5月8日的报告反映：“现在赵××和尹林平情绪比较镇定，区梦觉有些悲观。”

进入6月以后，批斗会继续升温。红司在一篇题为《猛揪彭、罗黑线，夺回专政大权》的社论中高呼：“政法黑线，我们轰定了！广州谭震林，我们揪定了！陶铸的独立王国，我们砸定了！”

6月1日上午，批赵联络站、省委机联、三司、中山医东方红、统战战线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等组织，在省委礼堂召开斗争赵××大会。到会一千二百人，以学生居多。据称，赵××在会上“只承认执行错误路线，凡属‘三反’性质的问题均不承认，或则只承认事实而从主观动机上辩解，不承认事实的‘三反’性质。凡遇有机会，即争取主动解释。有几次质问他时，他认为事实有出入，即趁机辩解，不让他辩解时则喃喃自语，以示不服”。

6月6日，暨大1226部队、敢死队、锒未残、华师一月革命、东方红、东风和华师附中联合红卫兵发起，地总、红总下属一些分部和郊区贫下中农的一些组织参加，在暨大召开批斗赵××大会，在这次会上，赵××承认在广东十几年，“每逢刘、邓抛出一条反动路线，都总是受影响，执行了他们的路线，而到毛主席纠正时才跟着改过来”，但是，他仍不承认三反问题。同一天，以及次日，省委、省人委礼堂分别开了两场批斗区梦觉大会。

6月8日，省直大联合总部、省委东方红公社、省人委东风公社、统战战线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等组织，在省人委礼堂召开“批判斗争林李明大会”。林李明是已经“站出来”的干部，照样不能幸免。造反派扣在他头上的罪名计有：

一、林在海南工作期间大搞浮夸风，深得陶、赵器重；二、是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干将，在海南期间极力吹捧海瑞，大演海瑞戏；三、忠实执行刘少奇的建党八条标准，并宣扬叛徒可以入党；四、一贯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用人唯亲，包庇坏人；五、忠实执行李维汉在统战工作上的修正主义路线，掩盖统战工作中的阶级斗争。

6月9日晚，红司、三司、新一司、工联、红旗工人、红农友、省直站、省委东风公社、省委机联、海军卫校红总、广州军区卫校联络站等28个红旗派组织，在东风派开八万人大会的越秀山体育场，同样组织了一场八万余人的批判大会，批斗赵××、区梦觉。批判会的规模和次数，成了两派群众宣示其“彻底的无产阶级战斗精神”的手段之一。

揭发批判赵××的主要问题是：一、大反学习毛主席著作，说学毛著是实用主义。在党校搞高干班和普通班，学习30本书中，没有一本是毛主席著作。学员生活特殊化。二、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镇压学生运动。三、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四、在广东农村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

动。

罪名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条。群众对这类批判会其实兴趣索然，这次由红旗派组织的大会，秩序混乱，刚开始半小时，就有大批的群众陆续退场，到10时30分大会结束时，已经跑掉了一半人。“有少数群众自动拥上台围攻赵××，有时在发言中同时追问、喊口号，互相不配合，发言听不清楚”。

6月12日下午，中南局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和省委机联三个组织，在中山纪念堂召开“揭发、控诉陶铸、赵××罪行大会”。到会的组织有21个，约二千五百人。赵××又被造反派揪到台上。“赵对五个口号是不举手的，即①打倒三反分子赵××；②打倒修正主义分子赵××；③打倒陶铸的死党赵××；④打倒广州的谭震林；⑤捣毁黑省委。其他口号，包括‘打倒赵××’，本人都举手。”

6月16、17两日下午，省工交系统大联合总部先后在省人委礼堂和机械厅礼堂开会斗争刘田夫。前者是大会，有八万人参加；后者是小会，只有一百多人参加。批判大会“揭发出来的新问题”包括：

1、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1962年3、4月间，刘在“湛江高干训练班”上作报告，谈到大跃进、反右倾问题时，影射攻击毛主席说：“你们不要相信，世界上没有没有缺点的圣人。”胡说“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毛主席无条件服从。”甚至极其恶毒地污蔑说：“毛主席只当过二次左派，其他都当右派。”64年8月4日，刘在全省科研工作会上报告，谈到对旧知识分子改造时，抽掉阶级斗争内容，宣扬“可以通过科学实验，通过业务来改造世界观。”……

2、攻击三面红旗，煽动群众翻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刘在1962年湛江高干训练班报告中胡说，“三面红旗不完备，我们的错误是犯大了，犯重了”，“公社化后，大大破坏了生产力”，“大炼钢铁劳民伤财”，“技术革命也是劳民伤财”。同时借口加强党内民主，大肆放毒，说什么“庐山会议以后重新犯了错误”，“当时是‘左’，反右是方向搞错了。”把党内斗争描绘成一团漆黑，说：“党内斗争，众叛亲离”。并恶毒地污蔑说：“农民没饭吃是反右倾的结果。”还煽动高干班学员起来翻右倾机会主义的案，叫嚷“什么话都可以讲”，“大家要出气”，鼓动学员向党进攻，说什么为了民主“就是冤沉大海也要为真理，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你可把我压碎，不能把我压扁”等等……

3、在工交生产建设中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公然对抗中央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业部署，把原计划定点在韶关的重型工业，移到靠近沿海的广州市，还规划在广州建几个重型机器厂，把原计划在韶关的华南重型机器厂下了马，对机械工业采取大砍大压，80%的企业被砍，60%的职工被压缩，扼杀了广东的机械工业。

刘田夫回忆说：“我那时头生癣，脚又烂，不能穿鞋子走路，造反派迫着我们戴高帽游街，我只好提着两只鞋子，艰难地随游行队伍穿街过巷。在游街时，有个工人在行进时帮助我，用他的手抓住我的高帽，不让擦伤我的头皮，当时我很感激他，但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方便问。”据称，在16日的斗争会上，“刘一般尚承认事实，初步交代当时的错误思想，承认错误。如说61、62年间由于刘、邓、陶、薄（一波）的影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困难估计过重，对大跃进有动摇。”但在17日的小会上，刘田夫显露了倔强的性格。

17日的小会斗争，（刘）态度一度不好。矢口否认污蔑毛主席，当群众指出有记录可查，狡辩不了时，他还挺腰凸肚地说：“我不会讲这样的话，如果有，

愿意开除党籍。”激起了公愤。同时，还极力推卸罪责：一是把责任推向上头，说是陶、赵指示的，他只是照讲；一是回避实质，含糊其词，支吾以应，不作正面回答。

6月17日，工联发出《打倒陶铸、打倒赵××、砸烂黑省委》的“动员令”：“我们紧急动员：全体工联战士立即进一步紧急动员起来！我们紧急呼吁：红旗工人、机关革命造反派、红司、新一司、三司等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进一步紧急行动起来！地总、红总等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冲破上下左右的重重阻力紧急动员起来！全中南地区，全广东的广大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联合起来！行动起来！万炮齐发，一致对准中南地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陶铸，对准赵××为首的广东黑省委开火！开火！猛烈开火！”

东风派也不甘后人，6月19日，地总华工分部红色工人战斗兵团、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 315 部队、新华工红色造反团、教工八.一八革命造反总部、太阳升公社和红政工革命造反兵团，联合发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同仇敌忾，踏平陶赵黑店》的“告全省人民书”，强烈呼吁：“我们希望，所有的革命干部，放下包袱，勇敢地站出来！大造黑省委的反！反，反，一反到底！”

在一片批陶赵声中，反地方主义问题，再次引起广泛关注。据当过古大存秘书的杨立后来回忆，“由于对地方主义的打击面过宽，没有人敢出来公开翻地方主义的案。但积怨甚大，暗流汹涌，这就影响到下一代。1967年，广东已成立了‘批陶联’。红卫兵造反，有些人就出来翻反地方主义的老账。”

在广州市最热闹的地方，北京路的街头，不断地贴出“古大存的骨头是红的”等大字报，揭发陶铸迫害地方干部。后来，又来了一派，说古大存的骨头是黑的，反地方主义没有错，地方主义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等等。一时间争论的声势很大，非常热闹。其实，红卫兵并不知道反地方主义的经过，都是受他们父辈的影响的。所以说，在红黑两派的背后，都有人在支持。

两派群众组织的态度，大致上，东风派反对翻案，红旗派支持翻案。在双方组织的支持下，决定6月底就地方主义问题，在广州举行一次公开的“高官辩论会”。地点就在市中心的北京路。红方代表为尹林平，黑方代表为林李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尹林平并不是广东人，而林李明却是广东人。

尹林平虽然明白这种辩论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这是一个表达他们观点的机会，必须认真对待。“不辩由己，要辩则要胜利”。廖似光提出，现在要辩的广东最重要的问题：干部问题，各个时间土改、三反、两次反地方主义等问题，“不联系到反地方主义，是揭不开的”。必须通过辩论，甩掉以往戴在他们头上的五项帽子：一、矛头指向解放军；二、反对军管；三、怀疑中央；四、资本主义复辟为地方主义翻案；五、三八会议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纲领。

“高官辩论会”吸引了许多群众前来旁听。尹林平、林李明各自陈述自己的意见。双方唇枪舌剑，慷慨陈词。尹林平大声疾呼：“搞错了就要翻案！”可是，地方主义一案，不仅关系到陶铸，也关系到军队，尤其是土改时踢开本地干部，南下大军挂帅问题，牵涉到广州军区许多军队干部；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央文革正密锣紧鼓地准备“弄清广东地下党的情况，解决一批干部问题”，为大抓“南方叛徒网”罗织材料，这时尹林平想为地方主义翻案，不过是自树标靶，引火烧身而已，也印证了一句古话：“时不至不可强生也，事不究不可强成也”。

多年以后，文革已经结束，廖似光曾感慨地说：“实际上反‘地方主义’错误影响面很广，直至‘文革’期间还搞了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把尹林平、云

广英、林锵云、冯燊和我等人打成为‘为地方主义翻案集团’，林和冯都被折磨死了。”地方主义一案，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完全平反

“高官辩论会”之后不久，7月4日，尹林平被押回警司监护。临行前，尹林平和廖似光等人在二沙岛告别，大家互相鼓励。廖似光说：“要继续努力！”

这一轮惊心动魄的急风骤雨，直搅得广州天昏天暗，日月无光。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5-31 20:22:08

一听兄：“地方主义一案，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完全平反”这点不确，其实相当晚。最晚的是方方，其“地方主义”问题，直到90年代中（也就是赵本人也失去自由多年之后），才才得以完全平反。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2-05-31 21:35:318

晓刚兄原是在广东的吧？你对广东的情况很熟悉啊。

我所说的彻底平反，主要是讲第二次反地方主义，即冯古那次，因为在文革中引起较大争论的也是那次。198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基本上没有留尾巴，可以算是“完全平反”了。方方的问题拖得比较久。因此，我的文中应该说明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谢谢你的提醒。

晓刚兄：我想应该这样说吧，即使第二次反地方主义一案，虽然八十年代初已经平反，但主要是冯古二人，几万受株连的冤案，则不是一朝一夕就全部解决的。因此，你说拖的时间很长，也是有道理的。

作者：晓刚 Lv 5 时间：2002-06-01 08:19:24

说来惭愧，这方面的事我本来应该“很熟悉”，但很多详情却也是一年多前才知道。当时家父去世，回国奔丧，别人送了些出版物（内部的和外部的，其中包括杨立的《古大存沉冤录》），读了方知，原来先父还是陶铸当年点名的四个“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之一的头子。

再早一年多，一次在澳洲一位朋友家中做客时，遇到一位曾在广东“省直系统”工作多年的老者，聊起来，他竟知道家父名号，并问道“你父亲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吗，地方主义问题好象一直都不给平反的咧”。这是我首次听说先父的事原来还关系到“地方主义”，自己却一问三不知，唯唯而退。

记得幼年初到广东时，满口北京话，曾在街上被其他孩子追骂“捞松，捞松，唔塞芫荽葱。生在湖南，死在广东！”当时听母亲说过，“唉，广东人这点不好，排外，从前搞地方主义很厉害”。可哪想得到，原来家父之右派，却竟也与“地方主义”有干系！

其实，父亲虽祖籍广东，却是三代华侨。回国后求学和“混入党内”都不在广东，与冯古方等都无渊源，倒是与陶铸有点渊源（有些人将之形容为“是救过陶铸一命”；另一些人将之形容为“知道陶铸的丑事”）。出事时人又在北京任职，早已不受广东管辖。是出差数省，途经广东时被扣押下来的，所以其案颇有些特别之处。一听兄史料掌握如此丰富，想必对各次反“地方主义”的详情比我知道的更清楚。

楼主：一听 Lv 9 时间：2002-06-01 09:51:38

关于二次反地方主义一案，我曾经访问过古大存的夫人曾史文，也曾经访问过杨立。据杨立说，他写完古大存沉冤录后，还准备写一本新官场现形记，可惜还没写就去世了。很多精彩史料便随他而去。我想以他的官位（副省长），能写出古大存沉冤录那样尖锐的东西，真是非常难得的了。

陈一阳：纪念武传斌

今天下午，有朋友告诉我说，我们的老朋友武传斌逝世了。晚上，上网查了一下，在新浪网“阿陀阿陀的博客”得到了证实（见附件《悼念武传斌》）。

我与武传斌相识于1967年“811”事件——当时正逢文革两派“武斗”时期，我们十七中一班同学乘车要到白云机场营救据传被劫持的中央文革成员金敬迈，途经东风路省政府附近时遭到伏击，牺牲5人，伤二十多人。王希哲因伤而委托我全权负责，我马上找到当时的“红司”司令武传斌，向他汇报此事件，他立即指示我们马上撤到当时“红警司”所在地的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当时武传斌的沉着、冷静、理性而又果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与武传斌来往比较多是在我上山下乡到紫金古竹水东大队插队期间——当时他也刚好安排到古竹的烧碱厂工作。那时，我几乎一个月左右到古竹“趁”一次“墟”，经过烧碱厂都要到武传斌那里吃白饭、长聊天。他们夫妇对我都很客气，很关心，很有人情味。1972年，我“贫病又交无妄悲”，他夫人刘伟那时在从化当老师，听说从化要建殡仪馆，要招工，就问我敢不敢去，想帮我解决困难。在那时，下乡知青能够被招工当工人，可是一件非常渴望而难得的事情。尽管，后来未能如愿，但我一直对他们夫妇都心存感激。也正是在那年，他们还邀请我和莫振乾等朋友，一起游览从化流溪河，于是，有了上面这首词。

武传斌在《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中，提到了“李一哲”和我。

那篇文章共三部分，其一是讲“1967年初省革联夺权时期”、其三是讲“1989事件之后”的交往，而其二就是讲“《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之一。

1974年11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市北京路贴出。该大字报被毛泽东批示给全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进行大批判，广东省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在省革委会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我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我们“红司”的，而且和我个人关系密切。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结果通过几百场大型带有辩论性质的批斗会后，反而更宣传了“民主与法制”。当然，李一哲的表现也很好）。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文章刊于北京《记忆》杂志2013年9月30日第102期。本文为原文，和《记忆》

版本略有不同。来源：新浪网“阿陀阿陀的博客”2013-10-3)

在我看来，七十年代初那几年，武传斌与我多次的高谈阔论，多多少少也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我从武传斌那里，获益良多。

在习仲勋为我们“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时，曾经问过我们对文革两派头头的看法。我在“平反”过程中基本保持沉默，但在回应这个问题时，我对武传斌发表了“比较好”的看法。——那时全国还都在搞“清查文革三种人”运动，许多省市的“造反派头头”都被审查、判刑十五年左右乃至死刑，事后看，广东是少数的例外。

1979我“平反”后，躲在社科院图书馆这个“象牙塔”里很少社交，与武传斌也很少来往，尤其是他出国之后。但偶尔见到互相认识的朋友，也彼此转达关心与问候。

今天，还有朋友告诉我，武传斌的《回忆录》下个月就要出版，而现在，武传斌，这位当年广州的风云人物，却等不到看这部书一眼就乘鹤西去逍遥游了。

永别了，我的老朋友、老大哥，你不虚此生！

想起1972年与武传斌等朋友同游从化流溪河后写的赠给他的这首词，特予发表，以作纪念。

菩萨蛮 1972 游流溪山瀑布赠武传斌

流溪山顶云头落，
谁耍威风泻银河？
吼吼声不断，
欲辟山两半。
悠游忘百事，
捧水作杜康。
何不凿濂洞，
长此当猴王？

悼念武传斌

（来源：2014/9/26 新浪网阿陀阿陀博客）

武传斌，男，河南省济源县人，1944年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父亲在村里读过三年私塾，因为会打算盘，解放初被招工并当上会计，成了国家干部。1962年举家响应政府号召放弃城市户口迁回家乡农村定居。武传斌高中毕业后也回乡参加劳动，同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学习，并于1963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第一志愿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

大学期间，武传斌是当时被认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不但学习成绩拔尖，还担任了中大学生会的体育部长，四年级更被吸收为预备党员，是党的重点培养对象，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曾代理队长。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学校第一波揪斗反动权威、牛鬼蛇神高潮过后，武传斌才从农村四清归来，即北上串联，途中感受到毛泽东发动这次文革风暴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加上受当时“怀疑一切”的思潮影响，几个同行的要好同学商量决定成立一个造反组织，名称就取自他们在北京天安门受毛泽东接见的那一天——“八三一”。回到学校即宣布造反并贴党委领导大字报。

文革中期间武传斌任“中大八三一”和“广州红司”的一把手，也是“广州批陶联”和“广州红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为广州文革造反派的领军人物。曾作为“红旗派”代表之一，于1967年11月参加“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968年2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任职常委。该职务在名义上保留了十三年零十个月（期间曾三次被关押整肃时间长达十年，最后一次关押是在1978年“清理三种人”运动后）。

1981年广东省委正式结论：武传斌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年12月的广东省人大会议决议宣布解除武传斌省革委常委职务。

文革后主要在广东省惠州地区从事专业工作，有多项技术创造和发明专利，并多次得到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政府颁发的科技贡献立功嘉奖证书。

2002年退休移民加拿大，定居多伦多后，子女事业有成，夫妻相恩爱，生活安定，颐养天年。与此同时，由于文革中特殊经历，武传斌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把历史整理出来留给后人，于是近年开始致力于口述历史工作，把自己一生亲历的重大事件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其中：

《风雨苍黄三十年——我和赵紫阳的交往》一文2013年已发表于北京《记忆》杂志102期；

《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和《就广州文革历史问题访谈武传斌——周恩来说过旗派要“取代共产党”吗？》业已成文；

传记《武传斌口述历史》尚在整理过程中。

2014年1月，农历新年前夕，武传斌久咳不愈，检查发现是肺癌晚期，经精心治疗后突破了三个月的死亡预期，身体逐渐恢复，曾一度带来希望，不幸在8月发现扩散，已转移为骨癌……

2014年9月16日，武传斌在多伦多家中忍着剧痛最后一次接受传记整理人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访谈，在口述了未来传记的序言和结语以后，他为两年半以来的口述历史终于得以完成感到非常欣慰，了却一大心事。他还应邀为后年的文革五十周年纪念执笔题词：“如有机遇我当再中流击水 为将中国民主再推进一步”

最后他表示，这一生非常感激夫人刘伟无怨无悔的付出。

2014年9月24日下午两点五十分，武传斌在多伦多医院安然去世。享年七十。

2014年9月25日稿于芝加哥

武传斌谈“北航黑会”和“反共救国团”

（阿陀采访撰写）

1968年7月，是中国文革历史上很不寻常的一个月份：

7月3日，中央颁布针对广西造反派的“七三布告”。

7月24日，中央再颁布针对陕西和全国各地造反派的“七二四布告”。

7月25日，中央接见广西两派代表。

7月27日，毛泽东派3万工宣队进驻清华。

7月28日，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

其中两个最后通牒式的“布告”和两次厉言疾色的“接见”讲话，都和同在7月召开的“北航黑会”有多多少少的前后关系。

所谓“北航黑会”，是指广州“红旗派”头头武传斌（和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朱仁一起）7月中下旬在北京航空学院联手召集的一次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简单说，就是“7·3布告”后更陷入绝望困境的各地造反派坐到一起交换情况并探讨出路。

中央高层通过“记者特务”（戴维提语）第一时间掌握了会议详情并为之震怒。几天以后，针对全国造反派的（上图：武传斌）“7·24布告”颁布，是不是和“北航黑会”有直接关系无从而知，但紧接着“7·25”周恩来及中央党政军高层几乎倾巢出动召见广西造反派赴京代表，厉言疾色追查此一“黑会”，却是不争的事实。

周恩来在会上点名：“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并当众宣布“‘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你们广西有分团”。康生重复周恩来的话后，更进一步点明：“‘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

这等同宣布两广造反派，乃至全国造反派的死刑。

三天以后，毛泽东召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长达5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心就是一句：“现在是轮到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在这次召见中，毛泽东特别点了“北航黑会”：

“现在还在搞串联会，又在清华开会，又在北航开会，还在什么和平里开会，很多是外省来的，又是广西的‘四二二’，河南分出来的‘二七公社’，四川的‘反

到底’，辽宁‘八三一’的一部分，锦州的糟派，黑龙江的炮轰派，广东的旗派……

不要搞这套。”谈话中毛泽东还两次使用了“围剿”一词：

“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是包围起来，就要打围剿，继续顽抗，就要实行歼灭。”“报告上要写清楚，给学生讲清楚，如果坚持不改，抓起来。抓起来，这是轻的，重的实行围剿。”自“7·24布告”和“7·25讲话”、“7·28讲话”以后，文革以来军队一直坚持的对群众组织“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任何时候都不开枪的原则180度转变，军队全面出动，武力拔据点，荡平山头……有限度开放了两年的“结社自由”从此不再。群众组织在实现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归口“大联合”以后，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1968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全国山河一片红”，3年文革群众运动正式宣告结束，进入“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领导的后文革时期。

1968年7月的“北航黑会”，和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长期以来，除了一位会议参与者，“广西四二二”钱文军写过一篇回忆《从“北航黑会”到“7·25”始末》，以及原“北航红旗”头头戴维提回忆录《逝者如斯》其中一章谈到“关于‘北航黑会’问题”，几乎就没有见到任何主要当事人的回忆和学者的研究文章。

为此，笔者多次了专题采访当年会议的主要主持人武传斌，综合整理并经武先生反复修改以后，遂成下文。

第一部分：武传斌自述

关于“北航黑会”，有人说是1968年7月16、17、18号共开了3天，第一天是在清华开，清华井冈山蒯大富也参加了，第二才转到北航。这是不对的，因为会议实际只在北航开了两天——18、19号，蒯大富只是在18号北航会议第一天出现了一下。

17号在清华开的是碰头会，相当于一个非正式的预备会，是小型的，“广西四二二”、“青海八一八”、“贵州……”一共二三十人。我印象很深。清华蒯大富的代表陈岩开头出现过一下，大概坐了十来分钟就离开了。我是主持人，这我清楚。

1. 7月初上京告状“7·3布告”出来后，军队全面出动武装扫平山头，广东造反派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

7月初，我和“工联”邱学科、“广州工人”林基球等一共七八个人，带着海陆丰、阳江、封开、怀集还有海南白沙……等广东各地镇压造反派的材料上京告状。“广铁总司”给我们安排了一个软卧间，人都集中在那里。火车到韶关，军队上来查票，赶了一百多人下来。出发前我已经通知省军管会（报备），他们是知道的，可能是想以查票为名把我们截下来。

下车后，站台上的“主义兵”挥起武装带打人。当时我和邱学科、林基球在一起，都是“草头王”，也没有什么警卫员。（上图：武传斌在天安门前留影）皮带向我抽过来的时候，林基球挡在我前面，眼睛差点被打瞎（林后在“清队运动”时跳楼自杀），后来军人过来制止了。一百多人被关在饭堂，互相都不认识。最后军人问我：“你是不是武传斌？是不是要上北京？”我说是。他们大概是请示黄永胜后（应有记录可查），就让我们重新上车了。

2. 谢秘书说：“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大约是7月10号到了北京，先到北航，11号就给周总理的谢秘书打电话，算是报到。第二天（12号）我去了中南海后门，通报后谢秘书出来，我递材料给他，他接了。当时他说了一句话：“据我所知，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

（阿陀：当时他真的这么说？）

当时他真是这么说的！

把材料交上去。谢秘书答应一定转给总理。这样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既然到了北京，自然还想见总理，所以就没马上走。

3. 召开全国造反派串联会的起因我到北京后，首先找到“北航红旗”原来“驻广州联络站”的站长郑焕成，安排在北航落脚住下。文革前他是北航学生会主席，参加过广东省革联“一二二夺权”。我每次来都是先找他，我们和北航的关系很好。他不能直接带我见韩爱晶，还得通过“北航红旗”对外联络部的负责人段孔莹，才到北京体院见到了韩爱晶。

和韩爱晶谈话时，我希望他能把广东的情况反映上去，他们有渠道，地位也不一样。韩答应反映，不过他也向我吐苦水：“北航红旗”日子也不好过，只是比你们好一些。北京情况比较复杂，好比蒯大富要借枪，给也不是，不给也不是。

虽然我们在北航一统天下，还是感受外部压力……

然后我见了蒯大富，很普通的见面，主要还是请帮忙反映广东情况。这时都还没想到开会的事。另外还分别见了王大宾和谭厚兰。这样，除了聂元梓，其他四大“学生领袖”都见了一遍，主要表达的意思是：

现在全国造反派都处在受压状态，而且很厉害。文革的气味不对，造反派要完蛋了（用高翔现在的话讲，当时我们都处在“垂死挣扎”状态）。在我带去的材料里就有，海陆丰几千军警包围一个五六千人的一个村子，动用机枪迫击炮攻进村，估计死亡几百人。还有广东阳江、海南白沙以及肇庆西边和广西交接的封开、怀集等。当时沿西江一直出海流到香港的大批尸体不仅是广西的，也有广东封开、怀集的。

和他们见面时都还没想到开会的事，主要还是请帮忙反映广东情况，当时这个会在我脑海还不存在。

我还见了来京（告状）的一些造反派头头，是通过广西“四二二”头头朱仁联络的。

（阿陀：你除了递交材料，希望见总理，原来有没有也在北京见见全国各地造反派的打算？）

没有！当时完全没有！那是后来见到朱仁以后才形成的想法。我和朱仁原来不认识，去到后才认识的。发觉他们比我们更惨。我觉得把两广的材料集中一下，一起反映上去，这样也许比较可行。这是最初的想法。

广西“四二二”住地在和平里，那是一片十几栋七八层高的居民楼群，没电梯（当时规定超过 11 层才可装电梯）。这种苏式楼层过道是大走廊，楼梯也较宽，因而楼梯底空间较大。当时走廊、楼梯底、阳台甚至公厕到处都住了人，还支锅做饭。看见大人小孩衣衫破烂，有的妇女衣不遮体……像一群难民，真是惨不忍睹。至于为什么会安排广西人住那里，我就知道了。

当时还有全国各地进京反映（受压）问题的其他造反派，分散住在各地。朱仁的作用就是联系各地的造反派。各地造反派日子都不好过，见面就诉苦。大家见我来了，希望我能找人往上反映。我的人脉比较广，北京五大学生领袖，除了聂元梓不想见，其他以前都见过，也能见到。我到了北京就觉得全国造反派都很惨，情况远远比广州恶劣。最后我提出：“请朱仁联络各地造反派头头，不如大家坐在一起谈谈情况”。所以会议确实是我发起的。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就决定在清华碰头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于是我也就成了主要召集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周恩来后来这么恼火的原因。

4. 会场为何从清华改到北航？

17 号为什么选在清华碰头开预备会？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见蒯大富，见他和见其他人不一样，大家觉得他往上能说得上话。本来以为在清华开碰头会时他也会来，但是到了清华，陈岩来了一下，说找不到蒯。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联络不是那么方便。当然也可能就是故意回避。陈岩坐了十来分钟就要离开，我请他转告蒯大富，希望他能出席明天北航的正式会议。陈岩答应：“我去跟老蒯说”。

果然第二天老蒯在北航会场露了面。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陈岩只是作为清华的代表，主人，过来看看，表示表示，不算参加会议。

当时清华两派武斗正打得很厉害，到处乱糟糟的，于是商量改地点。

（阿陀：这里我还可以补充点背景材料。1967 年 7 月我也到了北京，正住在清华园一处中立的学生楼，就是逍遥派学生宿舍。我们几个同学听说全国造反派在这里开会，便到处打听情况想参加，结果什么也打听不到。当时每天进出校园，校道上常会见到穿着击剑铠甲，手持磨尖钢管（长矛）的学生武斗队伍，也看见武斗双方都利用双层床的床架，两边绑上生胶条，做成“大弹弓”，夹上砖头从窗口射向对面的楼……）

第一天只是碰碰头，我们想开的是一个“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大家商量结果，这个会第二天改在北航开，由我去北航联系。我当天晚上回北航，找了段孔莹商量这事，也说了请韩爱晶出席，还希望她能帮忙能找到蒯大富出席。段很快答复说开会地点没问题，可以在北航开（她可能当时请示了因病在北京体院休养的韩爱晶）。段本人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但是韩一直没有露面。我也给谭厚兰打了电话，她表示不会来参加。

我还再次找了“地质东方红”王大宾。他说你们到地院开，我一定来。但北京分“天派”“地派”，他们“地派”和北航、清华势不两立，如果在地院开，蒯大富一定不会来。蒯的影响比王大，我宁愿在北航开，这事是我定的。我和不了这个稀泥。这样表面上就变成“天派”比较支持我们。其实“地派”也支持，只是他们坐不到一块去。我记得开会时王大宾还是派人来了，只是在会上表现不大明显而已。在地院我还想见朱成昭，忘记因为什么原因没见成。

5. 只是“诉苦会”，并没成立什么“联络站”（阿陀：你们召开“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当时有没有考虑过可能引起的后果？中央早在1966年底67年初就明令取缔全国性跨地区跨行业的组织。）

你讲的是对的。全国造反派当时在北京聚集了有几千人，各地的人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常常这样聚在一起，说是开会也可以。我们开座谈会也只是一种串联，当时串联是合法的。1967年初取缔全国性组织起因是“反经济主义”，我们并没有打算成立什么组织，没想到这么严重的后果。会一开完，中央马上就知道了。有人报上去的。

我们开这个会，主要也是困境下造反派互相支持，造造声势，引起中央的关注。有说会上成立了“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这是没有的事。

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的提议，是18号下午3点左右，会议差不多结束时“辽宁八三一”提议的。“辽宁八三一”这个组织开始是得到毛远新支持的，关系很密切，后来毛远新改变态度了。1969年他当了沈阳军区副政委，整起“八三一”一点都不手软。“辽宁八三一”是很积极参加这个会的群众组织，我们早就知道毛远新支持他们，很奇怪现在为什么连他们也受压也要上京告状啦？

（阿陀：犯忌讳了）

谈到这个话题，蒯大富的代表陈岩不出声，很快就溜了，是不是回去请示老蒯我也不知道。我也征求韩爱晶的代表侯玉山的意见，他说：“哎呀，这事可能我们也不敢担啊，我得回去请示一下。”后来他也走了。当时我说：这怎么弄啊？要是真的要成立，那就看老蒯能不能牵头了？提出成立联络站的事比较突然。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事挺复杂的，得征求井冈山陈岩他们的意见，而且这事也不是由我们说了算，得由北京的造反派决定。再说我们广东的事已经够头疼了，我也不想揽下来。但是我不想直接得罪各地造反派，结果这事就成了有议无决，没有形成决议。我只是建议大家留下联络方式，以后彼此多联系。最后也就不了了之，散会了。

整个会议我和朱仁是主持人，但我很少发言，就是让大家讲。各省争着发言，都很激动。广西“四二二”代表发言控诉了他们受严重打压的情况，当时韦国清已经动手了，抓了不少人。他讲的时间比较长。另外还有也是来自广西的柳州白鉴平介绍他们造反派“成功”的经验。各地发言主要是诉苦。

北航 18 和 19 号两天会议，蒯大富只出现一次，就是在北航第一天上午。他除了表示：“我们清华是支持全国造反派的”，就没说别的。当时会上争相发言，控诉都比较激烈。蒯大富大约呆了一个小时就走了。

6. “北航黑会”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北航黑会”，使得中央、中央文革和造反派翻脸，导致造反派的覆灭。我认为说这个会是一个转折没错，但毛泽东抛弃造反派，整治造反派不是从这会开始的，前面有“7·3 布告”，布告原则就是针对造反派的。

（阿陀：前有“7·3 布告”，后有“7·24 布告”、“7·25 中央接见广西两派讲话”和“7·28 毛泽东接见五大学生领袖讲话，“北航黑会”这前后关系太微妙了！）

中央抛弃造反派，下手解决造反派的方针是早已定下来了。这从“7·3 布告”已经可以看出来。如果没有“北航黑会”，也一定会这么做，只是时间可能迟一点而已。“北航黑会”不是我个人错、罪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镇压的借口，起了“催化”作用，可能催化了“7·24 布告”，也催化出“7·25 讲话”和“7·28”毛的接见。

“7·24 布告”是针对全国的。而“北航黑会”，我坚信只是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这之前，已经一个个文件不停地下。“7·25”中央接见广西两派，会上就大讲韦国清上报的黑材料，什么坏事都是“四二二”做的。这些材料都是准备很久的了，不是因为“北航黑会”。当时韦国清是政治局委员，这些话，无中生有的东西，还通过周恩来的口讲出来。

“北航黑会”原来只是一个串联会，放在一年前不会有问题，只是赶上这个时候了。“7·3 布告”选突破口就是广西。“7·25 讲话”里面有很多“炸药包”，每一个爆炸出来都有很大杀伤力。其中两个炸药包和我有关，一个是“反共救国团”，另一个就是“北航黑会”。这样，对全国造反派的扫荡镇压就正式开始了！

（阿陀：1968 年“7·3 布告”和“7·24 布告”之前，两年文革，在全国绝大部分省市和地区，军队都严格执行不准开枪的命令，包括 1967 年夏天“全面内战”，武斗中各地纷纷抢夺军人武器装备，那样的情况下，军队都没有开枪镇压。但 1968 年 7 月这两个布告颁布以后，马上就不同了，不是开几枪那么简单，是出动军队武装镇压，围剿扫荡，铲平山头。）

背后是毛下决心要结束文革，要整要杀。整谁杀谁？当然是拣软的下手。整保守派整不下去，因为背后是强大的干部和军队。只有牺牲造反派，才能做到。

先是利用，然后打击，现在已没有利用价值了。

毛讲“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说明他要开始整造反派头头。他口中的“错误”，就是指走向对立面，往这一挂，就完蛋了。

（阿陀：这个决心——抛弃造反派结束文革的决心，是在武汉“7·20事件”以后开始的。1967年8月，因为“八一社论”号召全面“揪军内一小撮”，毛突然意识到把军队推到对立面的巨大危机，悬崖勒马，改弦易辙，牺牲造反派的后台中央文革三员大将“关、王、戚”。我在北京访问过江青秘书阎长贵，对他的回忆中提到中央宣布对关锋、王力审查处理时，江青流泪的细节特别感兴趣。“现在是轮到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这句话，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点，是在1967年9月中央下发的文件《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

当时明的就是要开杀戒，工宣队、农宣队不过是政治攻势，还是需要杀一批。

一月夺权后马上就反扑了，“二月逆流”已经让毛尝到苦头。才安抚下来。7月陈再道再闹，知道严重了，差点走不掉，军队成建制包围宾馆，相当于“逼宫”。

不相信“八一社论”毛没看过，说是关锋、林杰搞的，他们不是这个位置，也没有这胆量。重大节日的社论都要让毛看过，签发。我们其实也知道不会成气候，迟早要走到这一步。

我从参加筹建“省革筹”（阿陀注：即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立于1967年11月，武传斌当时为核心小组成员）开始，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很压抑。

成立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复课闹革命，人心都涣散了，归建制了。群众运动从来不会持久，不管什么精英掌权，什么建制什么结果。

7. 周恩来为什么说“反共救国团”“总团在广州”？

北航的会开完，我也就准备回去了。没马上走，原因还是想见总理。

这次找谢秘书的时间是离开北京以前，约20号左右（前后两次都是晚上八点多。周恩来一般都是下午休息，晚上8点开始工作，秘书也一样。早了很难见到）。见到谢秘书，把广东新送来的材料交给他。他出来，我交给他，提出希望见总理，就是这么简单。我没有讲开会的事。开那会在当时看来只是一个串联活动，稀松平常，并不当一回事。他好像也还不知道。谢秘书收了材料只说了一句：“你快回广东吧”。我就明白见总理是没希望了。至于开会的事周恩来是怎么知道的，我也不清楚。

我刚好是在火车上听到广播“7·24布告”的。离开北京时布告还没出来。

所以7月25日周恩来接见广西两派时突然翻脸，说“反共救国团”总团在

广州。

如果他不用这个说事，他原来对我们的支持，就改变不了啦。

（阿陀：要找台阶下。）

而且要一下子把我们打到不能说话（申辩）的地步。

（阿陀：不管无中生有也好，指鹿为马也好，他都可以有个交代是吗？）

对了。他知道党历来只要搞了谁的专案，下情就不可能再上达了。这一套他们很懂的。所以他干脆就给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扣上天大的帽子。周恩来讲“总团在广州”，康生就起来讲“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人家当然理解武传斌就是了。其实广州军区、军管会很清楚我不是，但老百姓不清楚啊。当时造反派内部也有两派三派，也有矛盾，无非像老百姓一样，恩恩怨怨，但是一旦把你打成“反共救国团”，所有人，包括你自己的人，都枪口一致对付你了。虽然谁也不知道武传斌是不是反革命头头，大家还是一起控诉你。“总团在广州”和“旗派的头头有的当了‘反共救国团’的头头”是连起来讲的嘛，分开来又不一样。他就是要用这个理由打散你，如果不是这样旗派不会散啊。打不散旗派，周恩来就还有责任，他没法交代，因为之前他跟我们的接触，讲那些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后来，1974年那次接见（阿陀注：指“批林批孔”运动中，赵紫阳和许世友接见原群众组织代表），赵紫阳敢当场大声问：“武传斌在不在”，他心里应该是有底的。

赵紫阳秘书1974年曾经告诉我，周恩来去世前有一次曾对赵紫阳说过一句话：“武传斌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这话我没有，也不好当面向赵紫阳查证。但不管怎么说，就算是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也不是我不判刑的根据。李正天和王希哲的回忆都提到过，习仲勋主政广东时期，曾经准备在全省批判我，后来形势变化不了了之。全国各地造反派都有判刑的，但我没判刑啊！我被抓来抓去坐了三次牢，但没判刑。因为我没判刑，广东造反派头头也没一个判刑。

（阿陀：“反共救国团”团长都不判刑，怎么解释？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是不是因为你出身好？）

不光看出身。我文革前是学生干部，党员培养对象，一直是被组织信任培养的，这和蒯大富有点不一样。

但主要原因还是，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判我刑，而是要打散造反派。

（阿陀：一下子打懵。）

打懵你，让你没有还手之力，那就散了嘛。你根本没有办法解释啊！隔离，

抓起来了，你讲话谁能听见？最多是军管会抓你时别人听到，抓走了就再没人听到了。

（阿陀：这很有意思！根本不存在一个“反共救国团”，他也很清楚你是一个牺牲品，这是不择手段解决问题，走棋到这一步，不得不把你抛出来，不这样收不了摊。这就是政治的肮脏黑暗。另外，就算你们只是议论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也是犯了最大忌讳，在中央看来，等于是“另立中央”，太敏感了，肯定捅到毛那里去了，要不然周恩来不会这么紧张。）

当时就有人捅上去了。北航在场开会的人，现职现任的省革委常委就我和邱学科两个，其他的都是草莽。

（根据 2012 年 3 月 24 日多伦多访谈记录及 2013 年 10 月 7 日、18 日和 2014 年 6 月 5 日、19 日、23 日共五电话记录综合整理。2014 年 7 月经武传斌多次审阅修改认可）

第二部分 阿陀九问

阿陀：关于“北航黑会”的相关回忆文字记录非常有限，目前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另外还有杨继绳和闻于樵两篇，不算回忆）：

A. 1968 年 7 月 25 日中央接见广西两派的谈话记录（注一）

B. 1968 年 7 月 28 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注二）（记忆 REMEMBRANCE 2015 年 2 月 28 日第 125 期·47·韩爱晶整理，《炎黄春秋》2013 年第 11 期刊载）

C. 戴维提回忆录《逝者如斯七十三章：关于“北航黑会”问题》（注三）

D. 钱文军文章《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注四）

这些文字有的交代不清，有的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前面先由当事人武传斌把整个过程回忆了一遍，现再就细节及疑点进一步求证。

关于名称，戴维提称“全国形势分析会”，韩爱晶提“串联会”，还有“全国造反派座谈会”等提法，这个会议有没有一个名称？

第一个问题：会议名称是什么？

武传斌：这个会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基本上就是一个串联会、座谈会的性质。

阿陀：第二个问题，会议日期是哪几天，开了两天还是三天？

戴维提没有出席会议，但他文章说，第一天开会 16 号，地点选清华，主

要是因为大家想见蒯，参观清华。戴维提还说有十九个单位参加，主要是控诉，蒯也在场。

钱文军是当事人，他回忆第一天清华预备会是 17 号，他没说明蒯大富出席，但也说在场有不少人（“四五十号人”），开了一整天，控诉很激烈。白鉴平介绍“柳州经验”的发言就是在清华会上讲的（而戴文说是在北航会议讲的）。

两人关于清华会的日期不一致。搞清日期，早一天晚一天都不一样，因为时间差直接关系到后面“7·24 布告”“7·25 接见”和“7·28 接见”这几件一环扣一环的大事。

“7·25 接见”有这么一段：“康生：白鉴平，我问你个问题，你参加几天黑会？北京有些什么人到会？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黑会？谁通知的？（白答：参加一天半，18 日一天，19 日半天）”——这是当年事发几天后的表述，比较可靠。

“北航黑会”应该就是 18、19 两天。问题是白鉴平是不是也出席了 17 日的清华预备会？（因为钱文军回忆说，他在 17 日清华会上大讲“柳州经验”）

武传斌：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基本认同钱文军，第一天预备会应该是 17 号。

但不同意他说有四五十人，开了一整天，控诉很激烈，还介绍“柳州经验”这几条。人数应该没那么多，大约二三十人。也没开一整天，应该只是下午。

阿陀：看“7·25 接见”记录，朱仁回答清华开会是多少人问题时，说是 30 人。另外，如果是上午开，一批人应该有个如何集体解决中午饭的问题。你记得在清华吃午饭了吗？

武传斌：我和外地造反派不认识，都是通过朱仁去串联通知，陆续来的。也可能上午就有人到了清华，议论（控诉）开了，吃过饭后才把队伍拉过来一块谈。

我们没在清华吃饭，会是下午开的，时间不长。白鉴平介绍柳州经验不是在这次预备会，是在北航讲的。这次开会主要是商量开一次全国造反派串联会（或座谈会）的事，等于是一次碰头会、预备会。“北航黑会”，只有 18、19 号两天，不包括清华的预备会阿陀：第三个问题，是否“伪造介绍信”上京和谎称自己参加了“北京市革委会”？

7·25 接见，周恩来说：“广东的武传斌，虽然他是革委会的常委，但他破坏林副主席所说的三性——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伪造介绍信，带一百多人来，做你们黑会的主席。

.....

去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我到广州，与造反派谈谈，那时‘三面红旗’是造反派，但不能总吃那三个字，不能吃一辈子。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

的。但是，他现在跑到北京来，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了！他们说什么黄永胜同志到北京来了，他们也来北京，这是借口。他们是造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对坏人的阶级感情却那么深。中央点名的，他要辩护，究竟站在什么立场？还开黑会。”黄永胜说：“武传斌这家伙是广东省革委会的常委，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他要一派掌权，到处造谣，说北京市革委会他参加了”。

请问上述两件事事实如何？为什么你前面谈到 12 号周恩来的秘书才说过：

“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两个星期不到。周恩来就撇清道：“他说什么周某人是支持他们造反派的”？

武传斌：周恩来说的“伪造介绍信”和黄永胜说的“参加北京市革委会”两件事都是无中生有的，不知从哪来的，根本不存在！我怎么伪造，伪造了什么介绍信？再说，我上北京也不需要介绍信，火车票有人安排，不需要我自己去买，到了北京住北航，也有人接待……我几次上北京都没带什么介绍信。还有黄永胜说武传斌“到处造谣，说北京市革委会他参加了”，这句更滑稽！真要造谣，广东跑北京，说参加人大还靠谱一些，那个“北京市革委会”，我怎么进去？我也不认识谢富治。我从来没说过这话！他们是在堆砌罪名。共产党要整治你，就会这样做。

你问为什么“7·25”周恩来态度大变？我想有三个可能原因可以考虑：

第一是毛泽东态度变了，周恩来马上跟风。最明显的例子是前面 1967 年 8 月 19 日接见，我在会上汇报“红警司”的情况，当时周恩来是支持我们旗派维持广州治安的，没有表态指责，还风趣地问我：你们的枪够不够？不够问黄永胜要。那口气是温和赞赏的。8 月 31 日还接见了一次，九月初，毛签发的收缴武器的“9·5 命令”出来以后，总理又接见一次，这次很严厉，说：你们要马上回去收枪（如果枪不收回来），你们是不是要取代警司？这次也一样，任何情况下，周恩来一定会紧跟毛泽东。

第二是广东作为周恩来亲自抓的一个点，现在形势变了，他不得不撇清关系。

广东文革总的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我们造反派比较听周恩来的话，这和外地不大一样。周恩来叫收枪就收枪了，而且比较彻底，保证“广交会”顺利举行，这恐怕也是周恩来对我，对我们造反派印象比较好的原因。周恩来一直是把广东作为一个他亲自抓的试点，推行他带有一定个人色彩的理念，对造反派主要还是收买拉拢，有些设想可能还来不及做下去，形势突然大变，特别是出了“北航黑会”这事，周恩来急于划清界线，保住自己。

第三也可能是秘书会错意，传错话。7 月 12 号对我说的那一句：“据我所知，总理还是支持你们的”，可能只是秘书个人的揣测。出来见我以前他肯定请示过总理，但他表达的意思也未必一定准确。

阿陀：第四个问题，到北京是要见黄永胜和温玉成吗？

韩爱晶在 7·28 接见时提到：“从广东来两个省革委会常委。一个是工人邱学科，一个是中山大学的武传斌，他们是找黄永胜总参谋长，他们说黄永胜支持他们。他们说与黄永胜、温玉成很熟，来见黄永胜、温玉成。”这段是否属实？

武传斌：当时黄永胜虽然已经是总参谋长，还挂名广东省革委会主任。温玉成当时已从广州调到北京任卫戍区司令，副总长。他们在广州时都表示过支持旗派，我反映情况他们都很热情接待，温玉成还多次标榜他自己就是广州军区的“八·三一”。所以我对韩爱晶说他们是支持我们的。但我们到北京没去见他们。就是想见也见不到，哪里找？不得其门啊。不像找总理，还有个见秘书的渠道。我当时跟韩爱晶讲过到北京主要是想见总理，韩爱晶没提这一点。

阿陀：第五个问题，韩爱晶事前是否说过：“北京开会就是黑会”？

7·28 接见，韩爱晶说：“我在体育学院接待了邱学科、武传斌。送行之时，他们提出要开一个全国形势串联会。我说北京不比外地，北京不能随便开会，北京开会就是黑会。”开会前你见韩爱晶时，他是这么说的吗？

武传斌：这是不可能的，他当时根本没这么说！如果有说过，后面两件事就不可能，一是会场地点不可能同意在北航，二是他们也不可能派人参加。还不是一般的人，除了段孔莹从头到尾在场，侯玉山作为勤务组第三把手也出席讲话。

韩爱晶后来压力很大，可以理解。在北航开会，侯玉山也参加了，追查下来，他不得不有个交代，表明自己事前是反对开会的。

阿陀：第六个问题提议，成立全国造反派“联络站”还是“总部”？

钱文和戴文都提到，会上的提议是：建立全国老造反派联络站，设在北航。

由五大领袖轮流当头。

7·25 接见记录有这么一段：“文元：你们准备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组织？

（朱答：辽宁‘八三一’在会上提出要成立一个全国性统一的组织）叫什么组织？

（朱答：全国‘造反派’总部）”。

杨继绳在《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也沿用了“总部”提法（见《昨天》2013年1月第十二期）。

为什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武传斌：当时辽宁“八三一”提出的是成立“联络站”，不是“总部”！如果真是“总部”，后果一定会更严重。事后追查也一直提“联络站”。朱仁大概是被

追问时很紧张，吓傻了，一时口误，讲错了。真要成立“总部”，怎么搞？谁能把大家统一起来？笑话，北京自己一个天派一个地派都打得不可开交。

阿陀:第七个问题，北航祝春生是不是“做了大段指责外地造反派的发言”？

当时会场上有什么反应？

武传斌：有这印象。祝春生只是“北航红旗”下面一个比较活跃的小组织头头的，就像我们“中大红旗”下面还有“117”等组织。19号下午比较后发的言，前面的发言都是控诉什么的，他一直在听，见到没人讲军队和中央文革好话，他按不住了，起来指责。当时大家对北航比较尊重，认为北航是全国少有的造反派堡垒，所以当场没有什么人争辩反对。他讲完之后，才是“辽宁八三一”提出成立联络站。这个时间大约是会议结束前一个多小时，一提出这个敏感的问题，清华的陈岩和北航的侯玉山马上就走了。

阿陀：第八个问题，主持人是谁，是一个还是几个？

关于主持人有三种提法，分别是：一个、两个和三个。

戴文明确提到会议的发起人和主持人都是武传斌；7·25 接见时周恩来说：

“两个当黑会主席的，一个是广东的武传斌，一个是广西的朱仁”；钱文说除了武传斌，还有侯玉山和朱仁也是主持人。

武传斌：周恩来的讲法比较接近事实，这次会可以说是我和朱仁共同主持的。

侯玉山作为接待方东道主，说是主持人也对，他只是讲几句开场白。我确实是发起人和主要主持人阿陀：第九个问题，你有没有说过“会议要向中央写个报告”？

7·25 接见，高寿仪说：“是广东旗派掌握会场，并说会议要向中央写个报告”，康生当场纠正他：“不对！你们是这样讲的：中央知道了，写个报告，争取主动”。有这回事吗？

武传斌：我没说过这话，也不知道这话是怎么来的，也没打过什么报告。我们这个会主要还是议论，没有形成决议。关于成立联络站的是也是争论完了，我最后表态，大意是能不能做；怎么做，这事还得由北京造反派头头决定。说完就散会了。

附注：

一、《1968.07.25 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同志和军队部分干部时的指示》1968年7月26日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广西班办公室记录整理，1968年8月7日原重庆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嘉陵印制厂105红

印兵团翻印。

二、《1968年7月28日毛泽东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谈话记录》（韩爱晶整理，《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刊载。

三、戴维提回忆录《逝者如斯 73 章：关于“北航黑会”问题》
<http://sulin.blshe.com/post/10398/386326>。

四、钱文军《从“北航黑会”到“7·25”亲历记》。

2014年8月26日二稿

阿陀文集：<http://www.hxzq.net/showcorpus.asp?id=210>

风雨苍黄三十年 ——我和赵紫阳的交往

作者：武传斌

来源：《记忆》杂志 2013 年 9 月 30 日 102 期

阿陀代序

一个气冲牛斗，如日中天的学生哥，造反派头头，正半睡半醒，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着虎落平阳的省委书记通宵达旦喋喋不休的自辩——简直是一幅绝妙的历史漫画！虽然针锋相对，各藏心机，但正所谓不打不相识，一位就始认识对手的“真”，另一位也感应到了对方的“善”。初识自此。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角色对换，轮到造反派虎落平阳。没有落井下石，冤冤相报，而是以善报善。身份不同，不可能有开诚布公的交谈，但几次短暂交往，三言两语的对话，彼此都心照不宣。一个“造反派”，一个“走资派”，竟在鬼使神差的历史碰撞中找到交汇点，因而相惜！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走资派向造反派“借烟”的那个细节——一种看似不经意的 close，一下抹去了彼此的鸿沟，接下来问如此敏感的政治问题，却又在轻描淡写的笑声中彼此彼此……

真正推心置腹是在度尽劫波以后：走资派权倾一国时，造反派没有上门（要批条），如今无权无势，门可罗雀，幽禁深宫，自身还被“控制使用”的造反派居然敢冒险赴京“上访”，走资派怎会无动于衷？也正是到这个时候，彼此的身份才相对“扯平”了。这是一个普通人和另一个普通人的 30 年交往后第一次真正坦诚相见！从另一层面上，也可以读作是一位垂暮革命老人对历史的痛切反思。因为谈话对象是这么的一位历史对手，这段关于 64 的谈话便赋有了特殊的意义。

一、“一月风暴”，不斗不相知

1966 年 11 月中，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当时中山大学的造反派亦是“三司”的主要成员），广州红一司，广东省委及人委机关的造反派组织和首都三司等在广州体育场召开“广州地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我当时作为造反派头头之一也在主席台上（那时一般群众也都可以随便上主席台）。当场有人给他戴上高帽，他并不反抗。我上台批判赵的言词也非常激烈，但我不同意给赵戴高帽，摘下了他的帽子，他也没有表示什么。

他一直在认真作笔记，没有发言作辩解，满脸一副“诚恳接受群众的批判”的表情。这是我第一次直面赵紫阳。之后，我还带队冲击过省委，冲机要室，抢黑材料，并多次组织或参与组织了批判“刘、邓、陶”，批斗“陶、赵黑店黑线

人物”等大型群众大会。

1967年元月，从上海开始的夺权风暴席卷全国，史称“一月风暴”。

1月21日下午6时左右，赵紫阳在省委接受机关造反派的批判后，我们以传达中央精神为名，把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和寇庆延等五人拉到中山大学。我们“中大红旗”和“中大八.三一”把赵单独软禁在八.三一的总部大楼，由我负责和赵谈夺省委的权的问题。

首先，我要他交待如何死跟刘、邓、陶，特别是陶铸路线的反党，反毛主席的问题。赵紫阳说：我没有反党，反毛主席，但是，我有严重错误。接着他便侃侃而谈，从他参加南下工作团谈起，一谈就是3-4个钟头，几乎通宵。期间我一直处在半睡半醒状态，因为我对那些不大感兴趣，一心只是等他把权交出来——“醉翁之意只在印”。

赵紫阳当时也只是抽象地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他的思路清晰。最后，我问他有没有看过《元旦社论》和最近的社论？赵说看了。我就安排他去休息了。第二天早上六时许，中大红旗公社社长陈家吉和我，还有我们八.三一派出的夺权代表蔡登望三人再单独找赵紫阳谈。陈家吉宣读了“省革联”的《夺权通令》（载《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后说，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我问赵有什么意见？赵回答，我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支持造反派夺权。赵还问我，夺了权，你们怎么办？当时我们只知道联合一些造反派组织去夺权，然后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文革邀功，等待承认。所以我强调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

“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这句话原来是《红旗》杂志林杰向我们中大红旗，八.三一的驻京代表王斌林刚刚说过的，我是借用。

赵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可以找我，我尽力配合。之后，在我们的要求下，赵紫阳给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陈、蔡等人拿着条子就去找林李明了。由于林李明坚持要等中央表态才肯交印，我们就把林李明、韩宗祐和张云都拉到了中山大学。我说，现在就开（省委）书记处会议，你们在场的已超过书记处的半数，全部签字就有效。结果，除赵紫阳已表过态外，林李明、区梦觉、尹林平、张根生、张云和寇庆延都表态支持造反派夺权并签了字。

省革联夺权后，我们派出陈家吉、蔡登望参加勤务组。在工作中，大家都不懂业务，于是我们决定请赵紫阳担任顾问。赵当时的处境也很困难，经常被各种群众组织批斗，连吃、住、睡都不正常，不但人格被污辱，工作成绩被抹杀，还要戴上“陶、赵黑线”的高帽……在这种情况下，他冒着被打成“黑后台”的危险，同意担任省革联的顾问，如果他心中不是装着全省人民，焉至于此？

1967年4月18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广州军区的珠江宾馆接见我们这些群众组织的头头们时，在讲话中说：省革联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犯了严重的错误，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方法是错的。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一个要印，一个让印，这是让权。在这里，赵紫阳耍了个小聪明。

文革后,我回头看,当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不是也把权让给了中央文革了吗!

二、“李一哲事件”，从相知到相惜

1974年4月,我接到通知从惠州回省城,参加了许世友将军调来广东任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省革委会全会,当时赵紫阳已调回广东两年,是省革委会副主任之一。

在会上,赵紫阳先是问:“武传斌来了没有?”我站起来答:“来了!”赵向许介绍说:“武传斌是咱们的小老乡,前一段因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受审查,现在(审查)结束了。”许大声说:“清查五·一六,这个东西很难说,我在南京也搞了,现在查清了,(武传斌)不是(五·一六)份子也就罢了。”赵不仅不计前嫌,而且很巧妙地让许世友出面讲话为我平反,实属不易,因为在专案组为我所列的罪状中,虽然当时已经删除了“反军、乱军”这一指控,但还是重典保留了“整理周总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把矛头指向中央”这一条大罪。

1974年11月,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在广州市北京路贴出。该大字报被毛泽东批示给全党中央委员人手一份进行大批判,广东省革委会当然不敢怠慢,在省革委会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我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我们“红司”的,而且和我个人关系密切。赵紫阳在会上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结果通过几百场大型带有辩论性质的批斗会后,反而更宣传了“民主与法制”。当然,李一哲的表现也很好)。也是在这次全会,在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我示意:“来,借支烟抽抽!”——我知道赵是不吸烟的,但我也见过他偶尔也会向别人借支烟抽。在我给他打火时,赵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我老实告诉赵说,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虽然实际上我也不是什么后台,但我当时就感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该文。

三、渡尽“风波”，患难吐真言

1989年底我上北京,以老乡的身份到富强胡同赵家看望赵紫阳。当时,富强胡同的两头各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赵家大门口也同样有两名武装士兵。大院内,一进的厢房还驻有大约一个排左右的解放军,表面看,他们都三三两两无所事事,二进以内就看不到有驻军了。

一位军人把我带进正房客厅,梁百祺大姐就迎上来了,把我让进客厅坐下。我说:梁大姐,我就是来看看总理和您的。梁大姐笑容满面地说,好,我去叫紫阳出来。待军人把茶端上来之后,梁大姐进了西屋,军人则从正门退了出去。之后,赵紫阳从里屋走了出来,我连忙起身迎了上去,用双手握住他的手,看着他满头的灰白头发说:“总理,您好!”赵的气色看来不错,依然笑声爽朗:“你这个武传斌,这个时候来你来看我了?!你怎么能进来?”我告诉他,我在胡同口确实看到军人挡住了几个想进来的人,我交出身份证并说明来意,等他们请示后,就放我进来了。我还说:“我们是老乡,而且,广东很多人都很关心你,我来是应该的,您能接见我,我很

高兴,您看上去还不错……”赵紫阳很关心地问了我的工作,身体和家庭情况,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转了话题之后,他就自我调侃说:“我这个总书记会反党,分裂党,真可笑。”他还告诉我,他现在只可以看到中央委员一级的中央文件。在谈话中我说:“您主张基层党组织都不应该脱产,您还说共产党再多人,在中国也只是一个党派,党的专职干部的工资等只能从党费中开支,而不应该花纳税人的钱,这些是否构成(你的)问题?”赵紫阳一挥手答:“我不认为那是问题!”我们谈起不久前的“六.四”事件。我说:“广东很多人都从香港电视中看到了军队开枪镇压的场面,有人统计说,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政府在大陆倒台,历届政府的军队杀死示威学生的人数加起来都没有这次多,文化大革命中解放军也没有开枪。”讲到这里,赵紫阳有些激动了,他一字一句地说:“我绝对不同意人民的军队打中国人民!”。他接着说:“那个四.二六社论是没有经过我同意的,我去朝鲜之前,(定好)不是这样的,这个社论在我出访期间发表,对学生运动上纲上线加以定性,我不能同意!”在谈话临结束时,赵告诉我:“(长子)大军他们都没有回来,(女儿)雁南每天回来照顾我,现在身体很好,请大家放心。”我说:“请总理保重!”最后,赵紫阳还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话:“看来,我只适合当总理,当初我就明确表示我不适合当总书记。”

1992年5月上旬,我第二次去到赵家探望赵紫阳。胡同口和家门口的警卫一如上次,只是前院里的战士更散漫了些,有几个甚至还在树下打扑克牌。在这次去赵家之前,我风闻中央要“解放”赵紫阳,所以谈话一开始我就说:“总理,听说您现在可以比较多地外出打(高尔夫)球了?”赵紫阳笑着回答说:“只要我提出去,就可以去,虽然有一队人跟着,那是正常的。”我趁势提出:“我可以以广东某个球场的名义邀请您去吗?”赵依然笑着说:“我离开北京可以,但是不能去广东。”随后我试探着问:“听说,只要您承认‘错误’,作一个检查,就可以‘解放’了,是吗?”赵的神情顿时凝重起来,“是的,我可以检查我工作中的严重不足,但是,我有三个问题是不会检讨的:第一,四.二六社论本身是有问题的,不通过我同意就发表这样的社论,更加不对!第二,对六.四的处理方式方法我不同意,解放军不该开枪!第三,我这个总书记没有也不会分裂党!我所说的党的真正掌舵人是邓小平,那是事实,而且是早已公开的事实。除了以上三条,都可以检查。至于‘解放’出来干什么,那都无所谓。”在这次谈话中,还从我的工作谈到了国家当前经济改革的情况,赵强调:目前我们还是大力大力发展民营企业,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那天的见面达两个多小时,中午吃了一碗汤面,据端面进来的战士说,这是梁大姐做的。我说,“真香!”赵紫阳笑了,说:“当年(指67年1月21日在中山大学)你请我吃腊肠饭,我现在请你吃肉丝面,平了!”

1994春节,我打电话去给赵紫阳拜年,梁大姐接的电话,然后转给了赵紫阳听。赵告诉我说,身体很好,其他方面也还是那样,并要我向我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祝贺。

1994年5月,由于车祸我住进了广州南方医院惠侨楼,在那里我遇见了也在惠侨楼住院的前海南省省长梁湘。在文革中,梁湘曾被打成我们的黑后台,文革后,彼此一直没有再联系。在六.四中,梁湘由于通电支持赵紫阳,反对镇压学生运动而被罢官。这次见面,梁湘亦很感慨。他十分关心赵紫阳,我便向他详细谈了我探望赵紫阳的近况。他说:“按照我对紫阳的了解,他至死都不会检讨(那三条)。”梁湘还表示非常认同赵紫阳的话:“他真的不适合做总书记,只适合做总理。”

补记:

赵紫阳逝世的消息传来,我已身在加拿大,我不停地拨电话去赵家,却一直不通,无奈,我偕我太太刘炜只好参加了多伦多民间举办的赵紫阳追悼会,以献上我无限的追思……

稿成于 2012 年

(文章刊于北京《记忆》杂志 2013 年 9 月 30 日第 102 期。本文为原文,和《记忆》版本略有不同。)

阿陀说明:

广州文革学生造反派“三面红旗”的两位代表人物武传斌和高翔,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总书记赵紫阳都有过不一般的个人长期交往。2012 年某方面计划出版纪念赵紫阳的文集,曾分别向二人邀稿。稿成后,出版之事却为某种原因无疾而终。笔者早阅过原文,边读边对蕴含丰富的历史细节击掌感叹,为了不让这段宝贵的历史被刻意湮没,便主动和两位作者再联系,协同对原稿作进一步的补充修改,公开发表。

感谢北京《记忆》杂志刊登了武文。需要说明的是:

- 1、文中的“小序”为笔者所撰,投稿时疏忽没说明,在此注明为阿陀“代序”。
- 2、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记忆》在尽可能刊登原文的同时,不得不作了两段删节。现文为原文,被删节的部分用蓝体字表示。

2013 年 10 月 2 日于加拿大边陲小镇 SERNIA

口述历史，就广州文革历史问题访谈武传斌——周恩来说过旗派要

“取代共产党”吗？

简介：

武传斌，河南济源人，1963-1968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生物系。文化革命中是“中大八三一”、“广州红司”、“广州红联”的主要负责人，也是“广州批陶联”的头头之一。为广州文革造反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武传斌1967年11月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是旗派核心小组人员；1968年2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任职常委；文革期间（自1968年中央“7.24佈告”后）曾三次被关押整肃；1981年广东省委给出正式结论：武传斌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同年12月的广东人大会议决议解除武传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文革后从事专业工作，有多项技术创造和专利，退休后现定居加拿大。

目录：

- 1、从傅萍谈到红卫兵的性犯罪问题
- 2、关于“造反派”的概念
- 3、周恩来是否说过广州旗派要“取代共产党”？
- 4、周恩来关于广州两派的定性？
- 5、造反派核心队伍的出身成分？
- 6、“联动宣言”是不是广州红卫兵起草的？
- 7、“七二三纪念堂事件”死亡人数？
- 8、中大“六三事件”阮向阳之死？
- 9、“吊劳改犯事件”死亡数字及善后？
- 1、从傅萍谈到红卫兵的性犯罪问题

阿陀：清华大学蒯大富的初恋对象是最早支持他造反高一女生，名叫刘刚。您太太也叫刘炜，也是造反派……

武：她是一师（第一师范学校），属新一司。我们一起上北京开会认识的，当时只是认识而已，并无交往。

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特别是造反派，不敢有任何差错。你看后来再怎么整（也是政治上的），没有一个头头犯作风错误。傅萍说（十岁）被红卫兵强奸，那是瞎编。

当时一是怕，我们造反派一般都比较谨慎，不能被抓住什么把柄；二是保尔、牛虻的影响，我们身上都还有一点“水泊梁山”的味道，不近女色。当然，也不是不谈恋爱，我在1963年就通过书信和河南农学院的陈敏谈恋爱，一直到1969年，我没有谈别的女性朋友。1969年我被审查隔离的情况下，中山大学工宣队通知我，要求我立即中断和陈敏的关系（因为我是省革委常委，而陈敏是地主出身。我服从了，此后，才和刘炜开始谈恋爱，因为那时她才冒着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到我被隔离的地方探望我，殊为不易）。

阿陀：清教徒。“呐喊”驻在财厅，夏天，晚上写完大字报，男男女女，有人睡桌面，有人睡长凳，有人地上垫一迭大字报纸就睡了，那会胡思乱想。一心就想革命。

不过文革中的性问题，性犯罪也不是没有，只是被掩埋得很深就是了。早几个月我在香港见到一个以前没见过面的低年级中学同学，他透露文革中我校主义兵曾轮奸过同派某一初二女生，这件事当时被摆平了，没有传出去。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我知道主义兵破四旧时过手无数金银财宝，绝大多数人丝毫贪念都不曾有，但我也调查过一个案例，借抄家一次卷走大约 50 两黄金首饰的也有。这在造反派也一样，所有人卖小报时一分钱都上缴，到吃饭时间自己掏钱街头买白饭拌酱油，或者回家吃饭。但也发生头头贪污报款，纵容抢劫的见不得人的事。

就性犯罪来说，文革期间有个别军干子弟特别狂妄，胆子也大，什么都敢做，发生这类事也不奇怪。记得当时街头就看过关于某中学轮奸案的大字报，只是无法证实而已。

至于傅萍讲的十岁时被红卫兵轮奸，首先当然要就事论事看是不是事实，但如果这是真的，也并不代表这个案例在当时有代表性，有典型意义；如果是假的，也不等于这样的事情在红卫兵中不可能发生。现在网上的讨论太情绪化，太表面。

就我个人的判断，傅萍自称十岁被红卫兵轮奸的事很值得怀疑：

第一是时间点不大对，傅萍出生在 58 年，那么被轮奸的事应发生在 68 年。——66 年红卫兵破四旧最凶残，傅家被专政的时候没有发生；67 年武斗最混乱的无政府主义时期没有发生；68 年已经进入文革群众运动的尾声，全国大部分地区秩序都逐渐恢复正常，却发生了？我 68 年 8 月正好到过南京，当时留下的印象是在贯彻“七三”、“七二四”布告，严厉打击“阶级敌人”。红卫兵组织大都涣散了，大家都自身难保。市面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但不时看到有人戴白袖章，上书“四类分子”。五台山体育场开万人审判大会我也去看了。那是一个很萧杀的严峻时期，不是红卫兵可以为所欲为的，若当时这样的罪案被发现，后果会极其严重。

第二是现在已经揭露出来这个人谎话连篇，她前后出的两本中英文就自相矛盾。

但要引起注意的是，傅萍事件的真假，和文革中红卫兵有没有性犯罪不能划等号。文革中不仅红卫兵中有性犯罪，其它造反组织、保守组织中也有性犯罪，专政机关人员中，支左的军官中，同样也有性犯罪……这是文革历史中最隐秘的一部分，不能因为文革群众运动总体而言带有清教徒色彩，原教旨色彩，就回避这个问题。

（2013 年 3 月 16 日电话）

阿陀注：傅萍是美国 3D 软件设计公司杰魔的董事长和创办人。最近由企鹅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宁弯不折》讲述她在文革中受折磨，被轮奸，后又因为揭露溺杀女婴被逮捕流放，最后成功蜕变为一家美国软件设计公司的领导者的个人经历，引起很大争论。

2、关于“造反派”的概念

阿陀：最近我思考“造反派”这个概念。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搞不清文革名词，习惯用笼统的标签，把历史简化成非黑即白。年青一代的报纸编辑，电视台编辑也一样，凡坏事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干的，例如凤凰卫视有一个视频报道：“老红卫兵痛哭：我亲手把母亲送上断头台”，讲的是 70 年的事，那时红卫兵已经成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学生团体，相当于共青团，和 66、67 和 68 年学生自发组织的红卫兵完全不是一回事。当事人现在确实是老人了，但他并不是“老红卫兵”。全国以自由结社的形式由学生自己组合起来的红卫兵组织，在 68 年年底，老三

届陆续毕业离校以后，已经自动解散了。

造反派的概念应该分“前造反派”和“后造反派”两段来看。我们通常说的造反派，实际上是指66年10月开始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同毛泽东当时文革路线，坚决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走资派的群众组织。是后造反派。在这之前，还有那些最早起文革第一把火的反当权派，反工作组的造反者，像清华附中红卫兵、北大聂元梓、清华蒯大富以及广州华附老红卫兵等，他们也都是造反派——前造反派。

无论那一时期的造反者，动力无非都是来自两个方面：1、接受毛泽东的文革理念 2、有个人的诉求。在早期这批点火者中，一部分人主要是出于政治理念，想当左派，如蒯大富；另一部分也有理念，但同时也还有恩怨，文革前就和领导闹矛盾。北京清华附中、广州华师附中和聂元梓就是这一类。

广州的主义兵，通常说是保守派，保爹保妈派，其实6月初最早造学校党支部反的就是华师附中干部子弟，后来都成了主义兵，也就是广州主义兵中的“老兵”。华附的大字报出现在66年5月27日，不但是广东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可能在全国也是第一份。清华附中红卫兵组织是5月29日在圆明园废墟成立的，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6月2号才贴出来。华附和清附的造反情况几乎雷同，都是干部子弟早已从内部渠道看到毛泽东和王海容的谈话等一系列批评教育系统的言论，文革爆发前已经对学校“不突出政治”提出批评，并和领导产生矛盾。

武：我早就觉得保守派其实也是造反的，红司中有些人不同意我的看法。孙亦武就对我说过，他们其实也是造反派。保守派斗赵紫阳，斗一些当权派，比我们还厉害。清理“三种人”时，他们都清下来了。孙亦武生活很困难，那时我条件好一点，尽可能帮他一下。1967年下半年，我在红司和八三一内部不止一次讲过：孙亦武是地总中的八三一，华工八一八也是造反派。

阿陀：文革造反，很大程度上是体现毛的意志，是奉旨造反，不能有什么明确的个人诉求，有的话马上就被打下去。像六六年底的全国临时工造反总部，全国上山下乡青年联络站，全国退伍军人造反总部……这些组织很快就被取缔了。

武：广州只有“老红军总部”、“八一战斗兵团”和白云农工商蔡海鸣的知青造反，是有个人诉求。67年3月军管后最先镇压的就是他们。

“老红军”66年12月就造反了，当时来找我，我不大了解情况，但还是很尊敬他们，只知道他们都是抗战或者更早参加革命的，东江纵队的很少，一两个。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被处分，但都不是作风问题。他们也参加了省革联。总理接见的时候我也提了给“老红军”平反问题，总理说，你们不懂。当然文革后还是都平反了

阿陀：三月抓去的《红卫报》晓兵，最后怎样了？

武：他比较风头那种，独来独往，后来是在狱中死的。我当时提出要海珠影东方红平反，周恩来说海珠影很复杂你们不知道。

（2013年3月16日电话）

3、周恩来是否说过广州旗派要“取代共产党”？

转武传斌看“老三”电邮：

《高举起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是汪岷和我一边商议，一边动笔的广州兵团报社论，叫嚣“造反派要有自己的专政工具，要有自己的军队，监狱……”等等。小报出街后没两天，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广州几派，商讨停止武斗大联合等问题，特地招呼了红司的武传斌和刘国旋，把手中的广州兵团报摊给他们看，说：“你们广州红旗派是不是想取代共产党？”

阿陀：周恩来有没有说过旗派要“取代共产党”？

武：我想了两天，没有这回事，不是这样说的。

我67年8月17号到北京，19号两派都给叫去，我就是那天晚上把材料交上去的。我在会上是公开汇报“红警司”的情况的，总理是支持我们旗派维持广州治安的，没有表态指责，还问：你们的抢够不够？不够问黄永胜要。那口气是温和的赞赏。8月31号接见了一次，9月初，收缴武器的“九五命令”出来以后，总理又接见一次，这次很严厉，说：你们要马上回去收枪（如果抢不收回来），你们是不是要取代警司？现场还有其它人，如果讲了“取代共产党”，我们在北京也不可能呆下去了，东风派也会抓住这句话攻击我们了，怎么会连小报都没登载？那是反党啦！当时是什么形势？黄永胜、温玉成、陈德、戚本禹等都在场。

总理找我单独谈话就是一次，那是关于“双陈事件”（见附注）的，我当时觉得很意外，“双陈”不过是厅级干部，总理有多少国家大事要管啊。

那篇社论我还记得，社论也不止这一篇，中南林马锦玉的观点也很激烈，连同制止打劳改犯的第二个通令（阿陀：那可能是李正天写的，红司呐喊当时是红联宣传部的一部分，红司呐喊应该讨论过这篇稿，我有点印象），很多材料，我一到北京就通过总理联络员，一包包交上去的。

听了总理这么讲，我们马上就回去收枪。我叫刘国旋先回，当时枪最多的就是广州兵团。刘国旋也同意。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命令，不能抗拒。我们是很认真的，我还专门去了16中和7中开大会讲话（收枪）。

我是四清后期填表成了预备党员，但没有宣誓，介绍人是系团总支书记钟明燃和班级政治辅导员刘振声。六六年八月从农村回到学校，运动还不是很激烈，就是辩论，我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组织。李嘉人，党委书记、副省长，他找我谈话：你是三好学生，学毛著积极分子，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我说，你们中大（中山大学）的党现在已变成修正主义党了，我要考虑退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当时毛和王海蓉的谈话，还有八月五号毛“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我就知道刘少奇不行了，所以我就没有宣誓过。

文革的社论是针对军管会、针对警司的。不是取代共产党。刘国旋可能记错了。

阿陀：也可能刘认为他没记错，在历史回忆中，同一件事常会出现不同的记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是有更多的旁证，交叉对比。同时也可以从逻辑上判断。我觉得你的讲法比较有道理。

（2013年3月17日电话）

阿陀：我刚才翻了一下薛声钦《十年人生梦》其中“广州‘红警司’”一章，提到“红警司宣言”有两个版本，原版本说要代替公安局和警司维持广州治安，等于是公然夺广州警备司令部的权，被北航郑焕成和哈军工凌云发现，认为是严重政治错误，后才改过来了。这事情发生在八月中，正是八月十九号总理接见前，老三电邮提到的“取代共产党”，会不会是“取代警司”或“取代解放军”之误？

武：就是要取代警司。当时起名“红警司”，是针对“黑警司”——“三月黑风”警司镇压造反派最厉害，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接总理通知两派上北京，八月十七号下午，在广州机场集中时发生枪战（后来知道和高翔一派有关），我们当时认为是警司的阴谋，把广州警司政委罗兴洲扣押了，一起带到北京，在新疆办事处招待所和我同房，等于软禁。饭都是我们打给他吃。接见时把他带去。我还告诉周恩来我们把罗兴洲也带来了，周恩来也没要我们放人。我那时说话胆子大，有点狂妄，当着周恩来的面对黄永胜说：如果黄永胜真的支持造反派，欢

迎到我们“红警司”当司令。当然这话是有点挖苦的啦，人家是大军区司令。黄永胜笑笑说：我可没有资格。周恩来当时也没说什么。

阿陀：那么可不可以理解为：八月十九号第一次接见时，周恩来对造反派组织‘红警司’，取代公安和警司维持治安至少是默许的。九月初，“九五命令”出来以后，形势变了，要恢复警司的执法权力，周恩来就严厉明确批评“取代警司”的企图？

如果这一段回忆属实，那正好吻合六七年八、九月间，“武汉事件”之后，毛改变态度，全国文革从高潮骤然降落，由放转收这一时间点。值得玩味！

（2013年4月25日电话）

4、周恩来关于广州两派的定性

武：我是67年4月初到的北京，大约9号左右吧，12号见到林杰，他说：北京现在反“二月逆流”，揪谭震林，广州有没有？总理马上要到广州，你赶快回去，要批“二月逆流”了。于是我马上赶回来。总理15号接见，16、17号也接见，18号是总结。

阿陀：这次周恩来到广州，表态支持造反派，非常突然，因为虽然当时三月造反派被镇压，并没有人上京找总理求救。就是说，是周恩来主动的。是吗？

武：总理肯定“三面红旗”，我们完全没想到，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2月中下旬开始，省革联就工作不下去了。陈家吉到北京，和王彬林住在一起，能见到的最高领导也就是林杰（阿陀：林杰是红旗杂志记者，总理联络员）。那时上一次北京也不容易。旗派对中央构不成压力。

周恩来接见时提都没提军队系统的三军联委造反派，他们也是省革联的。

总理肯定“三面红旗”，我都意外，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阿陀：根据叶曙明2005年访问迟泽厚，周恩来67年4月18号讲地总红总是“保守的群众组织”，后来是因为他们反应很大，军区也同情他们，反映上去，周恩来秘书发来一个文字的修正稿，变为“偏于保守的革命群众组织”

武：是“偏于保守的革命群众组织”，这个说法我们是从三方面来源得到，就是哈军工和清华（驻穗联络站），还有就是红旗杂志记者姜宏洲。其它人我们不信，包括军区。迟泽厚的讲话有很多不是事实，按他的说法，军区都是对的，错的都是旗派，这不符合历史。

（2013年3月18日电话）

武：……林杰是红旗杂志副总编辑。67年4月那篇反击“二月逆流”社论就是林杰写的。八一“揪军内一小撮”社论他也参加起草。所以后来揪出关、王、戚“小爬虫”，林杰就倒了。

阿陀：江青秘书阎长贵回忆提到，中央宣布这个决定时，江青哭了。

武：那一刻她知道不行了。从那以后造反派大势已去。

阿陀：转折点就是武汉事件，文革造反运动全面退潮从67年9月开始。

（2013年4月22日电话）

5、造反派核心队伍的出身成分？

阿陀：我最近读许爱晶《清华蒯大富》，提到“清华井冈山”实际上是由一个核心组织和一个外围组织构成，核心叫“井冈山红卫兵”，由劳动人民家庭、红五类出身的人组成。另一个是“井冈山战斗团”，家庭出身不好的都可以参加。当时有个统计，清华出身好的只占40%，不同于北航绝大部分都出身好。我马上联想到你们中大八三一和中大红旗的关系，也是一个核心、一个外围……？武：中大学生家庭出身的比例我不清楚，但中大八三一都要出身好的，比较纯，头头

几乎都是党团学生干部，我是预备党员，丛德伟是干部子弟，韦儒岩、刘兴宏等都是贫农，黄林是工人家庭（以上是勤务组成员）。张尔纲是孤儿，红旗头头陈家吉党员，许诚党员，八三一黄意坚是数学系学生会体育部长……这样我们八三一就可以在前面先冲，有问题我们担着，冲对了，后面红旗再跟上。中大红旗就什么出身都可以参加，只要是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结果团结了大多数。中大红旗 3000 多人，连老师在内。八三一 200 多人。整个中大也不过 4600 多人，除去一些逍遥派，我们占了绝大部分，革造会主要是一些学生干部，辅导员，保卫科和机要室的人。中大文革死的人不多，“6.3 武斗”死了两个，一边一个，机床厂冷枪打来死一个，文革初期跳楼自杀死了一学生部长（老师），还有毕业造册时发现失踪的学生（逃港？援越？），所有这些总共加起来不超过十个。中大斗教授很少很少，比较尊师重道。

（2013 年 3 月 18 日电话）

6、“联动宣言”是不是广州主义兵起草的？

阿陀：印红标书上提到，北京联动的成立宣言据说是广州主义兵写的，被造反派抄赵紫阳家时发现了。您看呢？

武：赵紫阳家是我们（中大）最先抄的，六六年十一月几号，当时重点是批资反线，抄黑材料，结果抄不出什么，都是很一般的文件。联动的事（时间上）还要往后靠。

广州中学主义兵以八一中学刘战为主，（赵紫阳的大儿子）赵大军在哈军工，二军不是很活跃，应该没有关系。主义兵最活跃的人不是（上层）一、二把手的孩子，基本上中将以上的孩子都不怎么参加，参加的是校级，少将级（孩子）。黄永胜的儿子有一段参加，也不是主要的头头。说“联动宣言”出在赵家，和赵当时的处境也不相符。

联动的事应该是年底，起码是 11 月底以后出现，那时赵家已经被抄过几次。再说西纠那帮人怎么看得上广州的主义兵？

我们抄回来的材料都放在八三一的机要室，有疑问的才看，不是每一份都看过。

（2013 年 3 月 18 日电话）

7、“七二三纪念堂事件”死亡人数？

陀：七二三事件，两派的小报都说各自死了几十人……

武：一个都没有死！那时死了人就是大事，报上来要研究应变对策。没有报上来。

阿陀：不对啊，小报有名有姓都有几个，其中有一个广钢红旗工人。2010 年我在广州开座谈会，其中就有两个目击者谈到这个工人在纪念堂台阶被打死的过程。可能你不知道。“七二三”是第一场大武斗，刚开始，造反派各个山头还没有统一指挥，“红联”成立是后来的事。

武：这有可能，我只是知道我们中大和红司系统的，包括下面中学生 17 中那些中学的“广州兵团”和 6 中为骨干的“红战团”，没有死人。我没在现场。黄意坚去了，受了伤。

（2013 年 4 月 17 日电话）

8、中大“六三事件”阮向阳之死？

阿陀：据我所知，阮向阳是在混乱中被打死的，参与的人大部分是中学生，事后处理好像是中大一红旗工人承担了责任，坐了牢。为什么？

武：中大红旗杨飞立被打死以后，革造会阮向阳从楼上跳下来被追上抓住，

我一听见消息赶快跑步过去，去到时成群人还在打，主要是学生，那工人也在现场，当时他没有打。我一看赶快制止。武斗双方对打死了人没多大责任，打死俘虏性质就不一样了。我叫王挺赶快把阮向阳背起来送到医务所去，学生都认识王挺，他背起来就没人再打了。事后追究，那个混乱的场面，你一下我一下，说不清是谁，互不认识的说不清，知道的，中学生、大学生，我们认识，当时也不会说出来。那工人先前也确实参与打了……

阿陀：事后处理对工人惩罚会比学生重。

武：不光是工人，教师，小教红司、中教红司都整得很厉害。

（2013年4月17日电话）

9、“吊劳改犯事件”死亡数字及善后？

武：收尸是我联系驻我们中大的“黄草岭英雄连”派车去收的。因为沿江是两派冲突的地方，军管会不出面处理。“黄草岭英雄连”支左，支持中大红旗。他们派车当然也是请示过军区的。具体负责这事的是公安红旗何河。公安红旗在红警司占主导地位，何河是党员干部，红联参谋。公安系统都参加造反派，分公安红旗和一二五，因为省革联问题不同观点，我们才把一二五说成“老保”。公安红旗骨干队伍以刑侦处为主，一千多人参加红司。一二五多是基层干警。

报上来的尸体大约一百七、八十不超过两百。这是指我们处理的，其它也有收的，我就知道了。

（2013年3月18日电话）

陀：收尸的时间？部队出动汽车是高潮当天一天？还是分几天？

武：具体我不知道，因为不是我直接处理的。我们在中大，开始不知道广州发生了什么事，听说附近有劳改犯被群众打死了，还以为是个别事件，下午才知道全城都发生了。是（高潮）当天还是第二天收尸，记不清楚了。当时不是打劳改犯一件事要处理，形势很紧张，千头万绪的。但有一条是肯定的，收尸不可能由我们出面，带几个中学生去，因为涉及到两派（分别）控制的地区，只能请解放军出面，收了尸体赶快处理，全部送去火化。也顾不上查身份什么啦，一个是因为天气热，担心引起疫情——我是学生物的嘛，还有就是稳定人心。我们马上发通令要求拆除街道联防的栏闸，让交通畅通，方便红警司巡逻维持治安。

（2013年4月17日电话）

阿陀：驻中大部队出动收尸是高潮那天——八月十二号白天，还是第二天？你是怎么得到打死人消息的？中大附近有发生吗？

武：何河是科长，不算当权派。红联设了一个参谋部，他是参谋。何河可以动用公安的力量。如果派出所收尸一定有记录，“黄草岭英雄连”收尸的记录一定在军管会。收尸要卡车，当时我们只有一部吉普，广船广钢有大卡车，过不来，还有两派防区问题，只能请军队出面。军管会不管。因为“黄草岭英雄连”驻中大，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找他们。

那天晚上（8月11日）我不知道因什么事离开陈列馆回中大了，是第二天早上听到消息以后，回陈列馆路上，吉普车到沿江路看吊死的人，都发黑了，心想：唉，都是些什么人？有人说是劳改犯。四面八方电话来报了，很紧张，当时的想法是：沿江一带死人最多，也是我们旗派的据点最多的地方。（阿陀注：红联指挥部就设在广交会陈列馆）当时怀疑这是军区的一个阴谋，搞白色恐怖吓我们，杀鸡儆猴。同时民众恐慌，心理压力，对我们也不利。居民联防，到处拦街，我们就被分割，那时也没什么电话，很容易被一个个消灭。从这个角度出发，一是赶快收尸，二是拆闸。街闸不拆掉，维持治安的巡逻车出动不了，军车也可能

被打冷枪。这样做是为了安定民心，掌控大局。那天晚上我睡觉都听见“打嘭嘭”（敲锣打盆）。拆闸是红警司出面，一两天就基本拆掉了（阿陀注：这里的栅闸主要是指设在是通汽车的大马路上，拦腰截断交通的那部分，如拦在文德路的栅闸。至于街巷口的栅闸，还在陆续增建，维持一两个星期，月底才基本拆除）。中大附近没打死人。阿陀：出动收尸就是那天吗？

武：上午看到了，召集开会最快也得下午，还要联系部队，部队得请示上级……恐怕是第二天早上。出动两部车，一次装不了多少，可能两三次？可能还遇到没断气要送医院？尸体都送去火葬那是肯定的。

阿陀：就出动一天？

武：那不记得了

阿陀：叶曙明去年7月在我那篇《孤魂无处话凄凉》的评论上有一段话：“据黄意坚告诉我：整个广州市所有主要街道，一晚吊了少则187，多则197个尸体，他们统计过，是一个一个点统计的，当时黄是红警司政委，号称领导着广州市半个公安局，因为公安红旗全部参加了红警司。他找派出所一个个点的，然后又找中学生由头到尾坐着车去点数。”我访问黄意坚时，他告诉我的也是差不多这个数字，但说是何河带中学生点算出来的，没有提他去派出所一个个点。现在你所说的数字也是一百多将近两百。但我都还是不大相信，因为：从时间上看，什么时间点数？点过几次？什么时间收尸？收过几次？都不明确，都像是指头一天或第二天。实际上“吊劳改犯事件”持续了好几天，后来不断零星发生的案例是否没有包括在这些统计内？从范围上看，突击性的收尸，人力、物力和权力都有限的情况下，不大可能是很彻底很全面的，可能主要是市区范围。至于西南郊芳村、白鹤洞。还有最近了解到的北郊沙河，南郊沥滘都是当时发案地点，点数统计会不会忽略遗漏？目前在无法看到档案的情况下，只能靠广泛的社会调查，逐一还原历史现场，尽可能把每一个发案点的大致死亡数字落实下来，最后反推出一个接近事实的确切人数。

（2013年4月23日电话）

武：我再回忆了一下，八月十二号还没有出动，应该是十三号收的尸，收了两天以来街上的死尸（阿陀注：严格说应是8月11日夜至8月13日白天）。十三号晚上我们从陈列馆出来，步行往西面，沿江路一带走，观察一下市面平静没有，看看还有没有人在谈恋爱。结果一片漆黑，静悄悄的。顾及安全，当时很多人和我一块走的，包括公安红旗刘沛良，他是红警司司令。远洋公司党委书记田明是红警司政委，他支持旗派很坚决，是我在红联会议上提出请他当政委，原因是群众组织都是草头王，一盆散沙很难管，可以利用田明的威望和能力整顿作风。黄意坚担任副政委。

阿陀：刘沛良和田明后来一定被整得很惨吧？

武：那当然。不过还好，没判刑。讲旗派掌握“半个公安局”那是真的。我们的抢公安局的枪就是公安带路的，不然不会那么顺利。

当晚我们走到二轻大楼就回头了。收尸的数目，就是在路上边走边谈，刘沛良向我汇报的。

（2013年4月24日电话）

阿陀：我读薛声钦《十年人生梦》提到田明是红警司顾问，只是请来帮助整风，你前面说他是政委，他是当权派啊，可不可能？

武：没错！是我亲自任命的。是我任命的我都记得。

（2013年4月25日电话）

——以上谈话记录（除 24、25 日以外）均已经武传斌本人校阅。题目为笔者所加。

阿陀 2013 年 4 月 26 日于芝加哥

附注：“双陈事件”（又称“二陈事件”、“两陈事件”）

“双陈”指的是解放初广州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陈泊和第三副局长陈坤。

陈泊 1926 年参加共产党，1937 年到延安从事安全保卫和情报工作，被毛泽东称为“延安的福尔摩斯”。陈坤是中共华南分局、香港分局的情报工作负责人。

1949 年，时任北京市长的叶剑英被周恩来委派到广东主持工作。叶的职务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为了稳定治安，恢复社会秩序，他调任陈泊和陈坤主持广东公安工作。二陈直接听命于叶剑英。在报请省委批准以后，二陈录用了一批国民党特工和数百名旧警察参加治安工作。据说二陈在稳定社会、肃清敌特方面是成绩显著的。

但在镇反中，1951 年 1 月，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到广州宣布逮捕陈泊和陈坤，其罪名是“长期混进我党的大特务”、“暗藏的英国特务”、“中统特务集团的黑后台”。1 月 24 日逮捕陈泊那天，谭政文当着罗瑞卿和叶剑英的面揭发陈泊、陈坤“背着党相信敌特，包庇、重用敌特”，“重用中统特务梁侠，私自给予秘密的外勤处长职务，在梁的领导下，已发展特务二、三百名，操纵了市公安局，使人民的专政机关变了质……”（罗瑞卿于 1949 年 12 月直接派谭政文下来担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兼广州市公安局长）。

“双陈事件”成为公安部门反革命大案。审讯中，由于受不了酷刑逼供，原打入国民党卧底的中共特工梁侠、程长清等被迫承认他们是中统特务头目，与双陈配合，在广东公安部门发展了近 300 名特务。在该案中，罗瑞卿在广州市公安局逮捕了 300 多人，在广东省公安部门逮捕了 700 多人。

1952 年，陈坤在该案审理中被迫害致死。1953 年，陈泊被判刑 10 年，但罪名不是“国际间谍”、“英国特务”，而成了“包庇反革命”。1972 年，陈泊死于劳改农场。

1982 年 5 月，继上海“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平反之后，陈泊、陈坤的冤案也得到平反。公安部在北京八宝山举行了追悼大会。曾经领导过陈泊的叶剑英、彭真、习仲勋、张秀山、陈正人等都送了花圈。

2004 年，谭政文夫人姜鹏发表“由《红色福尔摩斯》的失实谈‘二陈事件’”一文，为早已于去世四十多年的丈夫辩护：

“‘二陈事件’确实不那么简单。按照历史真实讲，二陈虽然平反，即使办案中确有定性过重、牵连过广等扩大化倾向，但不等于他们当初在工作中没有错误。连公安部的复查结论也没有回避当年他们工作上的问题。参与复查小组的同志在纪念陈泊的文章中明确写明：在翻阅公安部有关“二陈案”的全部档案后证明，“档案中没有看到任何个人的恶意陷害材料，谈到具体事情的也多是工作中的问题”。

广东省、市革委会“群众代表”的升沉轨迹

薛声钦，1940年4月出生于广东汕头潮南区峡山沟头村。1962年7月毕业于广州市广东省机械学校机器制造专业，同时入广州市广东渔轮厂当工人，政治干事，1965年10月任厂团委专职副书记；1967年4月，由“文革”群众组织推选为“工联”区负责人，8月调入“广州工联”总部勤务组；1968年2月，任广州市革委会常委；1973年后兼任广东省总工会常委，厂工会副主任，增城县朱村公社党委副书记，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市委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8月任广州重型机器厂工程师；1989年初任广州市食品工业开发中心工程师；2000年8月退休在家。所著文革回忆录《十年人生梦》一书，2007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阿陀（谭加洛），1950年出生于广州市。原广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现居美国。经商之余从事文革研究。1996年发起组建“芝加哥文革学会”并被选为会长，活动包括：组织芝加哥地区“纪念文革三十周年座谈会”；在芝加哥大学等地组织多次小型学术研讨会；先后访谈过陈若曦、林美霞、宋永毅、刘国凯等人。2005年开始研究广州文革；2007年发起创办《广州八中文革网》。调查广州文革悬案和知青偷渡史等，访谈过数百名文革当事人，其中包括十多位广州文革主要群众组织头头。2008年发起建立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地方文革史交流网》；曾往多伦多、纽约、香港、北京、武汉、长沙、南宁和深圳等地追访文革人物；目前正在做“北航黑会”的研究。2014年在香港中大访问期间，主持召开粤港两地编写《广州文革大事记》座谈会。研究文革成果主要发表在《今天》、《记忆》、《昨天》、《羊城晚报》、《炎黄春秋》以及美、澳的华人报刊杂志和互联网。主要文章收录在博客“福尔摩斯陀”<http://blog.sina.com.cn/u/2388286230>

1967年2月24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正式宣布定名之后，其他省（市）也都通过以解放军、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三结合”的方式，朝着毛泽东指明的“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叫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方向前进。

一年以后，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在广州市越秀山体育场召开十万人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广州市革委会也同时宣布成立。

由这时开始，一批群众组织的代表相继进入省、市一级三结合的“新生红色政权”，

这些群众代表的个人命运也不由自主地随着历史的大潮升降沉浮，其轨迹大概梳理如下。

第一阶段：进入革委会前后积极参与工作

1967年秋季两派大联合以后，随即筹备成立省、市革委会。1968年初，主要群众组织的代表正式进入“三结合”的新领导班子，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新政权的所有工作，这个最初磨合期约半年。

协商筹备

在省革委会成立之前，先有个“省革筹”的过渡。

1967年11月2日，中央《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宣布成立以黄永胜为首的军队和地方干部以及大联合后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省革筹）。省革筹协商小组约40人，其中两派群众代表约20人，于1968年1月初开始工作。当时的任务主要是协商省、市革委会组成人员和分配比例。其中群众代表委员名额是由省革筹小组统一协商分配比例，分到群众组织后再由该组织推荐协调具体名单。群众代表委员名额分配上侧重于工农界别，工农的比例较大。两派代表分配表面上按“一碗水端平”的原则进行，但实际上端不平。参加协商小组的群众代表不但要为本派争名额，还在协调推荐解放出来参加省、市革委会的干部名单上针锋相对。协商的程序，首先由省、市军管会组织介绍被推荐领导干部的革命经历和历次政治运动的表现，然后逐个评议，逐名协商，两派为了争取各自推荐的领导干部，经常斗嘴吵架……

1968年2月20日，省革筹协商小组最后一天在广州先烈路广州军区第一招待所召开会议，由原（代）省长林李明等4位老干部痛哭流涕检讨亮相，然后群众代表评议讨论是否可以出来工作。当时多数人满意，少数人反对抗议。下午5时，黄永胜宣布省革筹小组工作告一段落，经中央批准，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将在明天宣布成立。广州市革委会也将宣布成立。

“群众代表”正式进入省、市革委会

广东省革委会首届委员180人，其中属广州的群众代表22人，名单如下：
学生代表5人：常委4人：武传斌、高翔、林昌文（3人红旗派），易作才（红一司）；委员1人，梁仲文（红旗派）。

工人代表14人：副主任刘继发（红旗派）；常委4人，丘学科（红旗派），梁锦棠、莫超海（2人东风派。梁锦棠9月升副主任），刘均益（工交红旗）；委员9人，莫竞伟、陈振球、罗泽权、邱长青（4人红旗派），赵正业、黄强英、欧阳武、杨庆祥、（4人东风派），潘汝升（工交红旗）。

农民代表2人：常委梁秀珍（东风派，9月升副主任），委员罗××（红旗派）。
机关代表1人：委员周焱（红旗派）。

【广东文革两派分别为“红旗派”和“东风派”。前者是出自于周恩来1967年4月接见讲话中肯定了中大红旗、华工红旗和广医红旗这“三面红旗”是造反派的代表。后者出自于4月后两派对广东军管3月军管的不同评价，造反派认为是“乌云压城”，保守派认为是“东风浩荡”。另军管会认定的中间派为工人组织工交红旗，大学生组织红一司。】

首届省革委会常委一共33人（另有6名待选代表未计），其中军队9人，干部10人，群众14人，群众代表的比例看起来不小，但省革委会常委内还设有一个7人的“党的核心小组”，由5名军队干部和2名地方干部组成，没有群众代表。

广州市革委会的成立，与省革委会成立须直接经中央批准不同，它是在省革委会宣布成立之后，随即当场宣布经省革委会批准成立的。

广州市首届革委会委员100人，其中属广州的群众代表30人，名单如下：
工人代表24人：副主任孙亦武（东风派）；常委4人：薛声钦、潘成德（2人红旗派），简少泉（东风派），毕波（工交红旗）。市革委会委员19人：罗应尧、李选松、林丽台（女）、陈番禺、陈锡龙、卢良雅、陈宝×、易其茵（8人红旗派），陈坚松、吴文彬、张永立、王冕、张树雄、关驹、吕坤庆、×××（8人东风派），冯景成、黄家沂、温永（3人工交红旗）。

农民代表 6 人：副主任钟叙本（东风派），常委陈×满（红旗派）。委员 4 人：林细钊、林××（2 人红旗派），张伯辉、王××（2 人东风派）。

中学生代表因两派名额分配争持不下，暂由中学红代会派代表列席市革委员会（省革委会学生代表在大学生中推选，市革委会代表则是在中学生中推选）。首届市革委会常委共 29 人。党的核心小组由军队和地方干部八人组成，没有群众代表。

省、市革委会初期的工作

大联合组建革委会——

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帮助下级单位尽快实现大联合，成立各级革委会。

越秀山成立大会后，省、市革委在越秀宾馆召开全会扩大（厅局军代表）会议，研究贯彻中央有关大联合和斗批改问题。市革委会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促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从 2 月至 3 月底，全市共举办各种类型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共 1.3 万多期，参加学习的人数达 140 万人次。2 群众代表各自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极小少数常委抽调参加省、市革委大联合工作组，奔赴各地筹建革委会。3 月上旬，市革委主任黄荣海，指定孙亦武和薛声钦陪他在人民中路市委招待所，协助接待花县、从化县两派群众代表，协商成立县革委会。3 月底，市革委办事组通知薛声钦参加市财贸武装部大联合工作组，担任副组长进驻广州市肉食供应站，10 月成立站革委会。

稳定秩序恢复生产——

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市革委会于 8 月在原市军管会建立的“三结合”临时治安委员会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充实，成员由军队代表、群众组织代表和原公安人员代表组成，以后各区、街层层组建了这种机构，具体任务是组织队伍巡逻，收缴散落民间的枪支，维持社会治安。在此之前，还组织起广州工人纠察队。

市革委为了保证全市猪肉供应，稳定社会秩序，于 1968 年 3 月派工作组进驻曾发生过武斗，两派对立严重的市食品供应站，实现大联合，建立革委会。市革委会工作组组长是原市财贸武装部谷吉祥政委，武装部高部长和薛声钦分任副组长，加上组员（6 名武装部部队干部和 5 名原市人委处级干部）共 14 人。

政审及清理阶级队伍——

省、市革委会成立不久，就由政工组秘密针对群众代表亲属及社会关系进行政治审查。1968 年 4 月初，市革委政工组通知广州玻璃厂革委会：“经市组织组审查，易其茵同志有亲属在台湾，省革委会决定取消其广州市革委委员资格，并通知其本人。”

5 月，在市革委常委会上，市公安局军管会主任吴润（广州军区军事法院院长），向常委会报批，市革委委员林××（从化县农民红旗），以强奸罪判处 5 年徒刑。

6 月中下旬，广东省革委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进行学习，并发出关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通知，广州市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从此逐步展开。

根据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料——

7 月 23 日至 10 月，全市共举办了两期中小学校教职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有 3.08 万名教职工参加学习。在学习班中被批斗者共 3693 人，（其中中学 2056 人，小学 1637 人）。他们分别被扣上“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顽固不化的地方主义分子”、“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

“国民党残渣余孽”、“现行反革命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的反革命家属”等帽子。

与此同时，市文艺系统、公安系统和原市人委机关和各区、县、局、公社、大队等层层举办以“清理阶级队伍”为主要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7月至10月，全市从党政机关到各基层单位，共举办规模、时间、形式不等的学习班2.83万期，参加人数达216.78万人次。遭揪斗的达28738人。其中有49名为中上层爱国民主人士，他们被加上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等罪名，遭到搜捕和拘留。至年底，已结案或基本结案的只有7125人。越秀区1969年3月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共揪斗1886人，已定案处理303名，属人民内部矛盾的703名，尚未定案880名。“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虽然运动清理出一些有打砸抢行为的犯罪分子，但同时乱打乱斗、“逼、供、信”

的现象屡屡发生，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据市革委会的统计，1968年7月至12月，全市非正常死亡达585人。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归侨、侨属以及有海外关系的人深受其害。一些人被迫转行，下放劳动，甚至开除公职。

在清队运动中，进入新政权的两派群众代表都积极配合参与各项工作。

根据市革委会副主任钟叙本回忆，他和梁秀珍、孙亦武三位东风派的工农代表，当时是被指定负责组织“工人、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大、中、小学。

旗派的市革委常委薛声钦5月随工作组在食品站开始搞“清队”，其中一个案子闹得很大，是食品站工程师，技术股长黄世炎(红旗派)因为肃反时的特务嫌疑问题被重新翻出来，由财贸部武装人员逼供讯三天三夜，入狱一年多，后送梅县农村下放插队，家属也被株连，6个子女先后去新兴县上山下乡后偷渡香港。

还有参观推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献忠心”运动，慰问参加“三支两军”的解放军等。

总之，这一阶段省市革委会的各种活动，群众代表参与度较高，除了主要协调推动基层两派大联合，组建革委会，还比较全面地参与了各种政治运动和一些行政生产管理工作。

第二阶段：1968年秋清查运动后一派代表名存实亡

1968年7月底贯彻中央两个布告后，部分（造反派）群众代表被批斗收押审查，代表身份名存实亡；同时还有另一部分（保守派、中间派和个别造反派）代表继续参与各项政治运动和日常工作。这种情况持续数年，直到71年“9.13事件”后的第三年才有所变化。

1968年夏天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很快和贯彻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及9月掀起的“清查5.16”运动重叠，以各种名义清查打击造反派。秋天，广东省各级革委会相继成立，群众组织山头陆续被铲除，省革委随即向所谓“5.16反革命集团”发起进攻，掀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群众运动。省、市革委政工组对原红旗派委员全面清查，重点造册整理材料，不少人被押送警司、工纠或单位设立的“牛棚”审查批斗。

省革委常委丘学科（工革联）被省建一公司关押“牛棚”数年。省革委委员邱长青（海员红旗），被省航运厅军代表以莫须有的“电台问题”（把用于航运生产的电台说成特务电台、帮派服务电台）关入“牛棚”多年。市革委委员卢良雅（省航修厂红旗），被厂革委以牵涉“5.19”省总工会武斗事件为由关入“牛棚”。省革委委员罗泽×（市汽修厂红旗），市革委委员陈宝×（华侨糖厂红旗）等，都先在单位“牛棚”关押，后关进市公安局。市革委常委薛声钦（省渔轮厂红旗）自1969年起，一度不再被通知出席市革委的常委会议，外事活动也不让参加，

连省“工代筹”大楼轮值办公工作，所在单位渔轮厂革委会也不放行……

当时进入省革委的学生代表，大多数回到学校毕业分配。

新一司司令中山医学院的林昌文被分配去湖南省山区。

三司司令华工高翔 1968 年 8 月被押回学院接受批判和审查，全院大会批判和揭发的三个主要问题是 1、与旧省委的关系；2、为地方主义翻案的问题；3、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1969 年 1 月底，高翔在学校的审查结束了，被分配到广州军区在湖南省的江永生产基地，接受解放军再教育。因为离开了广东，所以被免去省革委常委的职务。1970 年 3 月，从部队农场再分配到广东省翁源县农机修造厂工作。被告知只能当工人，而不能像别的大学毕业生那样分配当技术员。工作以后，还被告知不能离开翁源。高翔这才知道，其实自己还在广州军区的控制之下。主要原因可能是为地方主义翻案的事情还未了结。

广东文革造反派中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是红司司令中大武传斌。他在 1968 年 7 月底即因在北京主持“北航黑会”【所谓“北航黑会”，是指六八年七月十八、十九日由广州红旗派头头武传斌在北京航空学院主持召开的全国造反派座谈会。几天以后，七月二 15 日周恩来、康生等接见广西两派时，把北航会议定为“黑会”，严厉追查。】，被拘捕交省革委扩大会议 600 多人批判，后交中大全校大会挂牌批斗。罪名先是组织“反共救国团”，后变成“5·16 反革命集团”在广东的代表。从 1968 年 7 月底到 1969 年初，大约半年多时间失去自由，前段是被关押拘留所，后留校关“牛棚”，还短期送郊区交联星大队贫下中农监督劳动。1969 年春，武被送到牛田洋军垦农场劳动，因表现好，成为活学活用毛著的标兵，回广州“讲用”。1970 年 3 月结束劳动，被分配到紫金县烧碱厂当技术员，但同年底又被关入正式监狱“柯木壟看守所”，时间长达一年半，1972 年中放出来后转送中大软禁，继续审查，直到 1973 年底才放出回到紫金。

这个阶段省、市革委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大部分受到整肃，但是在关押批斗的同时，他们的代表身份还是保留了，只是名存实亡，以后数年不再参与任何会议和工作。也有个别人一直留在领导班子内。据黄永胜秘书迟泽厚回忆，在贯彻两个报告以后，一些军队支左干部曾提出趁势把各级革委会的造反派代表清除出去。当时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刘兴元坚决不赞同，认为革委会保留几个代表有利于团结一派群众。市革委会常委薛声钦虽然受到冲击，但一直还保持常委的身份，参与一些工作，也曾参加过有外宾出席的省市国庆宴会。本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其没有直接参加过武斗，同时，在学时当过坦克兵，既是工人代表，又是工人干部出身，加上性格温和，两位书记焦林义和梁湘印象比较好，愿意使用。薛声钦印象比较深的三件事是：

(1)1969 年初和 1970 年初两次作为全市活学活用毛著积极分子分子和先进单位代表出席大会并参加“积代会”主席团工作，推动掀起“忠字化”运动高潮；

(2)1971 年 7 月到市委党校参加市处级干部以上“批陈整风”学习班 1 个月。作为群众代表的市革委委员（时称新干部）大部分出席，但此时市革委群众代表范围已扩大，除了原来的老委员，1969 年以后又陆续“掺沙子”，加入了许多被认为文革中没参加群众组织，没有派性的新委员，他们包括劳动模范贾大水，英雄人物家属向秀丽母亲，军烈属后代和一些中学生代表等，加上增补的老局（处级干部，参加学习班的总人数达 300 多人。

(3)1972 年 5 月被以市革委会工作组副组长的身份派往广州市房管局解放南（似少个街或路字——编者）房管站领导清队运动。

第三阶段：批林批孔后“补台”

1971 年发生“9.13 事件”。从 1973 年开始，有的被关押审查代表被重新安排工作；74 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所有代表处境都有不同程度改善；75 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代表的地位又有所提升。这段时间是代表们普遍感觉的相对宽松的时期，约持续两三年，直到 76 年毛泽东去世。

1973 年 2 月，高翔被广州军区政委，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孔石泉单独召见谈话，鼓励他吸取教训，重新振作起来，他马上意识到 4 年半的审查终于告一段落。当月，高翔即出席了韶关地区共青团团代会，并当选为团地委常委。5 月，结束了 8 年的党员预备，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随后又提为翁源县工交办副主任。

6 月，省革委副主任，省委书记王首道和广州市书记处书记梁湘派省市组织部门人员到省渔轮厂关切薛声钦的入党问题。一个星期后即填表成为中共党员。

8 月，（5 月份进京的）王洪文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宣布为党中央副主席，这对各地造反派地位的提升有间接的影响。

年底，前后两次连续关押，已经失去自由整整三年的武传斌，从中大被送回紫金烧碱厂，即由技术员提升为厂长，同时自动回复了省革委会常委的身份。

1974 年 4 月，高翔和武传斌被召回广州，参加由新领导班子赵紫阳和许世友主持的省革委扩大会议。会后，4 月 22 日赵紫阳单独召见高翔长谈，并通知他恢复省革委常委职务。

与此同时，广州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原红旗派和东风派头头，包括“在朝”（结合入革委）和“在野”（未入革委）纷纷集结串联。当时旗派在各级新政权里的代表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东风派虽然在革委会里的人数较多，但也觉得群众代表不被重视，没有实权。原红旗派的省革委副主任刘继发和东风派的市革委副主任孙亦武等两派主要工人头头开始密切来往。其时赵紫阳提出成立“刘、孙办公室”，出发点是防止两派产生矛盾。

但两派代表则想利用这个平台，共同向省市委提出落实新干部政策，要求“补台”，给“群众代表”安排实际职务。

5 月上旬，省市委主要领导围绕“补台”问题分别找群众代表个别谈话或召开座谈会。

6 月中旬，省委在越秀宾馆举办青年干部（属“草头王”的省市革委“群众代表”）

学习班，班主任林若（后当广东省委书记第一把手多年），为期四十多天。

8 月，省委组织部做出人事安排：梁锦棠入省总工会主持工作，刘继发调入省化肥办任副主任，刘均益入市团委主持工作，孙亦武分管市总工会，梁秀珍入省团委主持工作，武传斌调到惠州东江化肥厂当革委会副主任，不久，长期分居两地的妻子也由省委一纸调令调到惠州。

9 月，高翔被安排到广东省军工局（对外称第二机械工业局）任副局长和党的核心组成员。

1975 年 1 月，邓小平复出后搞整顿。群众代表被要求下基层挂职蹲点。

2 月，高翔作为省委工作组副组长，到红工煤矿开展整顿工作的，年底被安排到农村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

10 月，中共广东省委发文，工农群众代表十二人也分别下放到县、公社挂职蹲点，其中：梁锦棠任中共三水县委副书记，刘继发任中共四会县委副书记，刘均益任中共增城县委常委，梁秀珍任中共白云区副书记，莫超海任中共花县炭步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永立任中共从化县鳌头公社党委副书记，张伯辉任中共白云区××公社党委副书记，薛声钦任中共增城县朱村公社党委副书记。（市委曾

在这之前，安排薛声钦几次参加市委工作组当副组长下基层“打临时工”。1972年5月参加解放南房管站房屋调查工作组，1974年3月参加广州轴承厂健全企业规章制度工作组，1975年2月参加广州钢铁厂企业整顿工作组，时间各约为半年。)……

这段期间，不少群众代表在地位改善以后，利用批林批孔清查林彪死党的机会，或写大字报，或找上级反映情况，或在各种座谈会上发言……呼吁要求为文革以来的大量冤假错案平反。例如曾列席市革委会的原广州中学红代会头头李庆蜀，被审查毒打后下放边远农村，就是薛声钦奔走得到两位市委书记批示，此时落实政策调回广州。

年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展后，群众代表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少数人进一步安排领导岗位，做实职工作。

1976年3月，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凡省市革委群众代表挂职蹲点下基层的人，全部回广州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4月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仅保留党籍。

6月间，广东省委向群众代表有关人员发出任职通知，群众代表社会影响力明显提高，大约有15人被进一步安排领导岗位，做实职工作。具体如下：

梁锦棠任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莫超海、丘学科任副主席（脱产）。刘继发任省化肥办主任（脱产）。孙亦武任市委常委，主管市总工会（脱产）。吴文彬任市总工会主席（脱产）。刘均益任市团委书记、党组书记（脱产）。梁秀珍任省团委书记、党组书记（脱产）。钟叙本任市委常委，主管市农业工作（脱产）。

高翔任省军工局（第二机械工业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易作才调任省第一机械工业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周焱调任省高教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薛声钦调任市机电工业局市委常委、局革委副主任。宴守云(铁路局东风派，市革委成立后一个星期补为市革委委员)调任市工交办任副处长。武传斌仍“挂职下放”东江化肥厂，在环境恶劣的第一线指挥生产。

第四阶段：“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1977年初，广东开始“揭批查运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群众代表人人都要参加学习班，接受审查。有的人被批判斗争，正式关押。这场运动持续两年才结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1月，在广东省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省委号召全省人民“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

3月，省市革委群众代表，原两派群众组织头面人物及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安排到厅（局）以上当领导的人被作为重点，投入“牛棚”，有的“半托”或先“半托”后“全托”。

高翔从3月7日被隔离审查。

武传斌是5月被隔离审查。1976年9月毛去世时，他还上广东治丧委员会名单见报，几个月后就失去自由了。根据他的日记记录：5月15日“清查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工作队由惠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带队进厂。不久即开始写检查。5月下旬，惠州市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批斗。6月11日在全厂大会上被宣布停职，全天办学习班，不久即被抄家。隔离审查时就关在住家附近42军的炮兵营里，由惠州市一名副市长负责看管。

5月中旬，省委在中山纪念堂两次召开万人群众大会，分别对红旗派工人头头刘继发、东风派工人头头孙亦武揭发批判大会，当时的《南方日报》和《广州

日报》都有报导。

薛声钦 1 月下旬还作为市工交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省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大会，住五星级宾馆豪华套间，3 月初就被隔离审查，随后被广州市机电局党委两次组织系统群众 600 多人在局礼堂进行批判斗争。关入牛棚期间，为了逼供“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交代“篡党夺权阴谋”（包括 74 年关于群众代表“补台”的议论）连续车轮式逼供审讯，最长一次达三天三夜。还被反复抄家。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结束全国性的政治运动，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1979 年初，全国“揭批查群众运动”基本结束。

3 月中旬，被隔离审查的工人代表都结束了“牛棚”生活，可以回家了。其中一些人被宣布解脱后还要继续接受工厂工人劳动监督改造。薛声钦在“全托”22 个半月后，释放重新安排，在广州工具厂车间班组劳动改造期间，看病都被跟踪调查。1981 年初转去广州高压电器厂做技术工作，劳动监督改造 4 年，政治审查持续到 1983 年。学生代表高翔是 1979 年 3 月 16 日释放的。武传斌则是一年多以后，1980 年 6 月 9 日才被释放（7 月 7 日补发释放证）。他在前述 1977 年 6 月被隔离审查一年后，又于 78 年 7 月 13 日，被地区和惠州市两级公安局局长带队，出示拘留证，戴上手铐秘密押送广州市公安局黄华路第一看守所正式单独关禁整整两年。释放前，省公安厅一位处长宣布，由于他在文革中犯了“打、

砸、抢罪”，所以拘留审查。由于他态度好，问题又查清了，所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当即释放。武传斌后来回忆说，自己断断续续前后被关了 7 年，其中只有毛死后的这两年是真正坐正式的监狱，当时面临要判刑，被母校中大副书记以“小将犯错误”，没有刑事罪为由保下来了。武传斌还说，因为他都不判刑，广东的头头也就没一个判刑。而这段时间全国各地造反派头头被判刑的不少。武传斌释放回到惠州原单位后，1981 年 8 月至 1983 年 4 月，由原来的副厂长被安排为基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1983 年 4 月以后任厂承包办公室主任兼生产调度。

1979 年，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修改宪法的决议各级革委会改为各级人民政府，从此省、市群众代表身份和头衔自动消失，因而退出政治舞台（武传斌在 1982 年才接到省委通知，被正式免去省革委会常委职务）。但是大部份代表原来在基层的行政职务还是暂时保留了。揭批查运动中对这些代表的审查，最后也没明确结论。

第五阶段：清查“三种人”

1979 年释放被关押审查原群众组织主要头头和三结合的群众代表时，各单位专案组负责人交代，根据省、市委指示，被清查的人到工厂或农村劳动监督改造，是边劳动边补充交代问题，即审查并没有结束，到了 1983 年开始的“清查三种人”时，所有人又被再次审查，许多人被定性为“三种人”，是党员的被退党，是工人的撤销职务退回基层，对大学生则控制使用。

1982 年 7 月 3 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在提拔中青年干部时，必须对“三种人”保持警惕，决不能提拔造反派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对这些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必须坚决撤下来。”

同年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1983 年 11 月 16 日，中央公开《邓小平同志关于如何划分和清理“三种人”的谈话》，指出“最危险的是文革三种人”

1985年5、6月间，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部分群众代表做审查结论，一般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或犯“政治错误”，处理上“开除党籍，”或“自动退党。”并附上中共省委文件：免去×××党内职务、革委职务。据武传斌回忆：

广东文革听说由中组部文件下来划定的“三种人”一共五个：刘继发（红旗派、省革委副主任），刘均益（工交红旗派、省革委常委、省团委书记、中共中央委员），孙亦武（东风派、市革委副主任），高翔（华工红旗、省革委常委），武传斌（中大红旗、省革委常委）。

其中红旗派三人，东风派一人，工交红旗一人。其中职务最高的是刘继发，但他不是中央委员。工交红旗刘均益是中央委员。梁锦棠也是中央委员，但中央划“三种人”没包括他，原因不详。除了中央一级，省、市和地方各级也有权划定相应的“三种人”，好比中大红旗陈家吉，是中大革委会副主任，厅级，就是由省里定为“三种人”。旗派新一司林昌文没有划为“三种人”，因为他那时已分配工作在湖南了，划不划由当地单位说了算。东风派易作才也不是“三种人”，一是因为他的影响达不到这一级，二是省军区力保。

五人中的三位工人代表，不但被退回基层当工人，而且必须调动单位。7、8月间，广州市工交政治部发文，通知有关工人代表接受新的工作安排。孙亦武不同意从广州氮肥厂调到广钢焦化车间当工人，离职后贫病交困，已病逝。刘继发从广重厂调到广州动力机厂当工人后，贫病交困，常饮闷酒，已于1994年9月病逝。刘均益从轧延厂来到市柴油机厂当工人，医生妻子即带女出走并与他离婚，后刘又患上脑瘤，贫病交困，已病逝。

学生代表高翔和武传斌仍然从事和专业有关的领导工作，但被控制使用。当时根据中央1983年4月23日向全国颁发《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院校学生造反组织重要头头记录在案工作的意见》精神，他们不能担任正职，也不允许出国。武传斌在东江化肥厂主持工作和后来创建啤酒厂都只能以副职挂名。他在2002年才以探亲的名义出国，定居加拿大，2014年病逝。高翔原来在军工系统被信任提拔，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因为揭批查运动被关押两年，放出来后，根据中央整党的决定和中发【1984】17号文件精神，被定为“打砸抢分子”和“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尽管所在单位党组织力保，向上级提出留党察看的处分意见，最后在1986年仍被否定驳回，理由是根据中央文件精神，“三种人”不能保留党籍。

其他部分群众代表去向如下：

中央委员、省革委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梁锦棠没被划为“三种人”，实际按“三种人”处理。省总工会支部大会上被公开宣布开除党籍（但他个人表示不同意），所任领导职务同样全部撤销，同时也是属于前述市工交政治部文件通知被退回当工人的对象之一，从广州电机厂调到第一轧钢厂当工人。梁拒绝这安排，离职后自己开了电梯安装小公司养家糊口，现已退休。

省革委常委丘学科没被划为“三种人”，保留党籍，但所任领导职务全部撤销，后离职自行承包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部分小量包工工程，生活改善，已病逝。

省革委委员周焱没被划为“三种人”后来到省高等出版社任社长直到退休，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两位老干部省革委副主任王首道和陈郁出具书面证明，说当时安排他以干部代表身份参加省革委班子是周恩来授意的。

市革委副主任，农民代表钟叙本在所有群众代表中身份比较特殊，他是1958年4月毛泽东亲临广东视察棠下农村时接待组重要成员，受过毛泽东表扬。他在市革委会副主任位置上一一直是“不倒翁”，1973年已经当上市委常委，脱产领

薪上班，协助两任市长分管农业工作，也算有职有权。另一方面，从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到后来的“批林批孔”、“批判大会”、“反击右倾翻案风”，他都属于政治红人。但是 1980 年随着新一届“市人民政府”取代了原来文革产物的“市革委会”后，当了 13 年革委会副主任的钟叙本也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虽然不是“三种人”，一样回到棠下村当一普通农民。

市革委常委薛声钦，从没有人通知他是“三种人”，但由机电局组织部招去宣读了省委两个文件：鉴于在文革中犯有政治错误，作自动退党处理，同时免去局市委常委，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调入广重做技术工作。人事科长宣读完文件后补充说，技术工作仍属国家干部，即保持原来干部身份不变。薛声钦 5 年后离职，自谋挂靠广州市食品工业开发中心，2000 年 8 月按国家劳保条例满 60 岁退休。

市革委委员林细钊自办海珠区民政工业财务公司，现已定居澳洲。

市革委委员陈锡龙自己开办假肢制造服务公司，已逝世。

其他已逝代表有：林昌文、易作才、欧阳武、杨庆祥、陈振球、罗泽权、简少泉、卢良雅、张树雄、吴文彬、张永立。

综合来看，和以往历次政治运动后明确戴帽做结论不同，“三种人”既是一顶帽子，又不像一顶帽子，戴上去可能没有明显的标识，没戴上去不等于不戴。

陈云讲话表明，划“三种人”主要是作为干部使用提拔的一个标准。

广东在组织处理时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重点处理已经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的原群众组织代表，撤职或控制使用。党员要退党。

2、属不属“三种人”，不以职务、派别划线。因人而异，由各级党委内定掌握。划为“三种人”的，书面结论不一定都有“三种人”三个字，可能只是犯“政治错误”。

3、“三种人”里面，对仍保留一定职位的大学生干部，在提拔和出国等方面管控较严，对一般人则组织处理完就不再追究。

4、两派基本一视同仁。原属保守派和中间派的群众代表即使在文革期间没受到过任何政治运动冲击，但在毛去世之后的“揭批查”和“清理三种人”中，也和造反派一样下场。

5、一些没明确划为“三种人”的工农代表，同样被退党，被撤职，有的清退回基层还得调动单位，实际处理已经和“三种人”无异。

2015 年 10 月一稿

2016 年 1 月二稿

《赵紫阳：从革命到改良》扫描残片

其中“林彪体系”的提法，来源于陈一阳在乡下读了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后的感想。他认为年轻时候的恩格斯和马克思都是“青年黑格尔派”，但是后来他们扬弃了黑格尔的体系，高扬了辩证精神，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正符合黑格尔本人所说：我们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我们这一代人深受毛泽东影响，可以说我们都是“青年毛泽东派”，我们也应该扬弃毛泽东体系，高扬辩证精神。只不过“扬弃毛泽东体系”这话现在不能提，那咱们就转换为“林彪体系”

必须把青年时代的理想转变为反思的形式。黑格尔的话说得是何等的深刻。

应付江青

年轻人们对于这篇炸弹一样危险的文章，充满了信心。1973年12月，文章二稿定稿。他们把初稿日期故意定为1973年9月13日，以纪念林彪面目暴露两周年。此文连同其他三篇调查文章，被他们委派专人送往北京，途中被丁盛、孔石泉主政的广东军政当局截获，被称之为“四份反动油印品”。

可是很快，八大军区的领导对调了，许世友调来广东，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赵紫阳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和广州军区政委。许、赵配合要揭开广东省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要把广东群众的揭批林彪、黄永胜的热情再次调动起来。因此这“四份反动油印品”不但没有看成“炸弹”加以惩处，赵紫阳反而通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作斌在省委接待室接待了李正天，给予鼓励。张部长传达了赵紫阳书记的话：几个年轻人的文章“提出民主与法制，提得很准，抓到点子上了。”还说他们受了冤屈但是“不是仅仅申诉个人的问题，而关心的是国家的重大问题”，这一点不简单：希望他们“继续作社会调查，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尽管年轻人们都很兴奋，可是文章毕竟还只是停留在省委的领导们手里，并没有起到“炸弹”的作用，他们还是不甘心的。

于是从1974年的三四月开始，他们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成大字报，陆续贴到广州的闹市区北京路等处，这些大字报一反运动初期的胡搅蛮横，摆事实讲道理，很是引人关注。在第一张大字报《广东怎么办》贴出以后，陈一阳马上写了封信，贴了4分钱邮票寄给赵紫阳。他在信中提出大字报贴在最繁华的北京路口，看的人很多，恐怕会对交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建议广东省委设立一些大字报区，既能够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又不影响交通秩序。没几天陈一阳就发现，在他建议建设大字报区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前面，果然搭建了大字报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几天就又拆了。看来赵紫阳收到了这封信并且同意了陈一阳的建议。至于什么原因后来又拆了，不清楚。

到了1974年的10月，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其中有一条是：“抓紧专案清查工作……对于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林彪死党要继续清查批判。”

几个年轻人决定将《民主与法制》再度修改，然后以“献给四届人大和毛主席”的名义写成大字报，公开张贴出去。在最后的定稿里，这份大字报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

- 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 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

- 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
- 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
- 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
- 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作者声称他们的建议“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所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与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

李一哲大字报贴出不久，赵紫阳应召进京。1975年1月15日，广东省委常委委会开会，传达赵紫阳从北京打回来的电话内容。赵紫阳在电话中说：李先念、纪登奎同志和我谈了，支持广东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中央领导提醒我们，批判高潮一起来，下面容易搞大，要注意控制批判面。赵紫阳在电话中还强调：各单位不准抓小“李一哲”，不要抓其他反动大字报，这个问题要切实控制。

赵紫阳从北京返回广州之后，立即安排对大字报的批判。在到达广州前，他已通知各级领导、各群众组织代表集中到白云机场会议厅，一下飞机直往会议厅作指示。他先传达说：对李一哲大字报必须彻底批判、彻底批倒，然后交代政策：“在批判过程中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充分让他们说话，允许他们反驳。

关于这些“政策”，坊间广泛传说是“上面”发了话。至于“上面”到底是谁，各说不一。有人说是毛泽东，更多的说是周恩来。可是此时毛泽东正在武汉长沙等地修养，周恩来则因为膀胱癌正在做第二次手术，即使他们稍有空隙，也得忙于准备即将召开的第四届人大，特别是在人事上防止江青等人插手闹事，显然没有更多时间顾及广东的张大字报，所以无论是《毛泽东传》或者《周恩来年谱》上对这张大字报都没有提及。而且即使这张大字报涉及到江青，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此时毛泽东对江青到处插手已经极不耐烦。就在李一哲的大字报贴出的那段时间，毛泽东甚至当着已经出任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批江青，在江青写来的信件上批示说她积怨甚多，没有自知之明。

因此赵紫阳上北京，很可能是在不大的范围之内讨论这个问题提出了“只批判李一哲三人不再扩大”的意见并且得到了李先念和纪登奎的支持。而最后“政策”的确定，还有一个大背景。这个背景首先是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已经感到疲倦。在中央刚刚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在武汉所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话。以后类似的话又多次说过，表明他希望全国上上下下不要再发生什么重大的事情，也隐含着打算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意思。

而在民间，全国上下对于那种强词夺理、不让人说话的“大批判”已经厌恶，各级干部都尝过这种“大批判”的苦头，特别是赵紫阳。当时负责与这些年轻人联系的宣传部副部长张作斌说过：其实我们当时都是赞成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的，不认为是反动的，而认为是进步的，因为民主与法制这个问题本来就是进步的话题。赵紫阳认为不要把这篇文章的问题看的太重：他们就是话讲早了一点。现在既然说他们反动，就多印一些出来，让老百姓去辨别、去批判吧。²由此可见，赵紫阳对于极力拉拢自己的江青，表面是极力应付，其内心也是有原则的，用得上一句中国的一句成语：“阳奉阴违”。

经过评定其是“反革命”还是“反动”的争论，中共广东省委最终择其“轻”——在1974年12月初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定性为一张“反动大字报”，并迅速组织全省批判。其属下的广东省革委会不敢怠慢，在全会上组织了大批判，会上不少委员的发言，都隐指“群众代表”武传斌是“大后台”——因为李正天、陈一阳和王希哲在文革中都是武传斌领导的学生组织“红司”的头目，而且和他个人关系密切。

也就是在这次会上，赵紫阳提出要组织专家批判，要允许李一哲现场发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强调只准“文斗”。会间休息时，赵紫阳走过来向武传斌示意：“来，借支烟抽抽！”就在武传斌给他打火时，赵紫阳轻声问：“你是不是李一哲的后台？”武传斌实话相告：我不是后台，但这篇文章我比你们提前看过，也不同意上街。赵笑了笑说：“不用紧张，我们不查（你这个）大后台当时武传斌就感觉到：赵紫阳并不那么反对这篇文章。”

1974年12月3日，为批判做准备，广东省委印发了署名“宣集文”的批判“李一哲”的长篇论文，并下发到各单位，随后“宣集文”还写了“二批”、“三批”的文章，批“李”运动宣布开始。

紧接着有关部门将《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批判发言》等文章一道汇集成册，分发给各级单位和群众，人手一册。当时人们都有看“批判材料”的习惯，比看“正面”材料还积极。一个工人朋友连夜将这样的小册子送给了陈一阳，陈一阳简直是大喜过望：你想想，一份几十张纸的大字报用手抄，几个人得忙活一整天；刻一张蜡纸去油印，最多也只有几百份。可是省委现在像中央文件那样大规模的印了几百万份，又印得这样漂亮正规。这样宣传效果远非自己能力所及，真是不得了！

赵紫阳的态度，也影响到一些高级干部。比如在大会上有人高呼“打倒李正天”的口号，应者云集，可是在场参加批斗的一大片穿绿军装的军人就是不举手，有人问他们为什么，带队的人说“上级没通知。”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暗示，以后再有人高喊“打倒李正天”时，全场举手的人便七零八落了。后来听说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和下面的人打了招呼：这个李正天反不反动我不清楚，但是我欣赏他的气节，怎么打也不低头，你们没有我的通知别乱举手。12月24日，广东展开对于“李一哲”大字报大力度批判一个月多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国务院一个会议上说：“广东的反动大字报，发动了几十万、几百万人批，广东好，不怕大字报。”

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高层对此的关注和倾向性。

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宋永毅版本 文革数据库光盘》补充

李一哲 1974-12-31

（附注：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批判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李一哲批倒了“宣集文”。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不解。）

网友评论：您猜武传斌怎么过关的？赵紫阳一次会议上拉着他找到许和尚说：“这位小兄弟是咱河南老乡，以前犯过错误，现在认识了。”和尚大手一挥：“认识了就好。”

把赵紫阳揪上审判台——赵紫阳镇压省直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滔天

罪行

(1968.1)

赵紫阳是广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镇压广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是中国赫鲁晓夫在广东的最忠实、最得力、最阴险、最狡猾的代理人。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赵紫阳秉承中国赫鲁晓夫以及南霸天陶铸的旨意，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顽固地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企图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炮制黑纲领，转移斗争大方向

去年初，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具有最伟大历史意义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死党彭真、陶铸、赵紫阳之流，凭着丰富的反革命经验，预感到末日已到。为了模糊文化大革命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的目的，掩盖斗争的严重的政治性质，颠倒敌我关系，转移斗争大方向，南北呼应，分别炮制了《一月提纲》和《四月规划》（即《广东一九六六年学术批判》），企图“螳臂当车”，负隅顽抗，妄想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引入“纯学术”讨论的歧途。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主持制定的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一日《通知》的下达，宣判《一月提纲》和《四月规划》的破产，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但是，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和赵紫阳之流，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利用职权，采用两面三刀的手法，公然对抗中央的《通知》。一方面，从五月底到六月上旬，陶、赵在广州召开的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会议上，只把《通知》草草念了一遍，仍然按照《二月提纲》来部署文化大革命，会议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在会上决定各省批判对象，每省约三、四个。这些对象大都是反动文人和不掌握主要政党大权的党内走资派。并且邀集一些文艺黑手去写所谓批判的评论文章，派一些人去作“史料”调查。仍然企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纳入他们的“理想”轨道——“纯学术”讨论的道路。

另一方面，为了进一步扑灭革命烈火，陶赵挥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棒，大搞分类排队，抓“右派”，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

去年五月，赵紫阳在一次省委常委会议上，就明确布置要将群众“排队”：“左、中、右、极右”。并强调说：“过去我们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理解得很不够，因此划得太窄。”同月，赵紫阳在市委书记会议上布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

“要整理队伍，用新的观点排队，排左中右，把小赫鲁晓夫抓起来。”公然布置整理群众材料。在赵紫阳指挥棒指挥下，各厅、局、部、委的当权派对群众进行排队，内定一批“右派”和重点对象。例如××单位，五月中旬，党组织讨论全单位人员，内定“右派”××人。为下一步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作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不但如此。赵紫阳之流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还自以为得意！在去年六月份，在省航运厅、林业厅召开省直属机关抓“小邓拓”的现场会议，全面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经验。全面动员各部、委、厅、局，大抓“小邓拓”、“小秦牧”、“小赫鲁晓夫”。企图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把斗争锋芒指向广大革命群众。

据我们对几个厅局的了解，去年八月中旬以前，各厅、局围攻的重点，都是一般干部。群众被点名人数，占单位总数百分之三十左右。其中××局被点名群众占单位总数百分之八十，“牛鬼蛇神”占百分之十左右。相反被点名的当权派却寥寥无几。如××委，被点名的群众占单位人数的百分之二十八，而被点名的局长以上干部仅一人，大字报二张。由此可见，斗争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而是指向广大群众。

由于赵紫阳忠实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单是运动初期，在省直属机关中被打成“牛鬼蛇神”的就有一千人，受到压制和围攻者更是不计其数。当时，机关中呈现一片白色恐怖。

派出工作队，疯狂镇压文化大革命

去年六月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发表了聂元梓等同志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及《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燃遍全国。广州大专院校革命小将一马当先，火烧黑省委，炮轰省委和本单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黑省委大院起火了！

赵紫阳为了扑灭这场即将燃起的熊熊烈火，他公然对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杭州会议上的指示，从省直属机关、工厂、专区和县内抽调大批干部和工人组成了千多人的工作队（文化大革命的消防队），派往被认为容易“出问题”的大专院校和省直属机关，又把市内正在进行四清运动的省直属机关单位的四清工作队变为文化大革命工作队，直接控制广州大专院校和省直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

赵紫阳之流给工作队交待任务是：“千方百计地把运动控制起来”“加强省委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就是加强对运动的控制”，并且三番五次召开工作队长会议，全面地贯彻了刘、邓、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制定种种条条框框，说什么：工作队的领导就是“党的领导”，“领导有问题可以通过背靠背揭发，需要面对面斗争的要经省委文化革命小组批准。搞斗争，是非法的。”“大字报不要贴到别人家里去”“要群众听我们的话。”“要改变目前自发起来揭发的状态，力争领导主动权”他在这次讲话中，还不断转移斗争大方向，一再部署工作队围剿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胡说要“广泛揭”，“党内外都揭”，对那些所谓“别有用心”“动机不纯”的“坏人”“要掌握他们材料”。真是，磨刀霍霍，凶性毕露。

更为可恶的，赵紫阳一再限令文化大革命的时间，不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工农兵投入运动，以便控制局势，草率收兵。六月初，赵紫阳以黑省委名义发表了黑指示：“农村和工厂搞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学毛著”“工人就是以学毛著为主，中间不要插入文化大革命，不要转入文化大革命。”硬是不让工农投入运动，何其毒也！

六月六日赵紫阳通过他的干将区梦觉作了黑指示：限令文教战线的文化大革命搞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其它战线搞半个月至二十天。

在赵紫阳的指挥下，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省直属机关内斗争锋芒直指广大革命群众，运动冷冷清清，一片白色恐怖。工交战线各厅局开始宣布运动在六六年七月中旬结束，后又宣布在六六年八月二日结束。可见赵紫阳镇压机关文化大革命是多么“高明”和“出色”。

广东省直属机关的运动一直是纳入赵紫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的理想轨道上，阶级斗争盖子迟迟未有揭开。

“引蛇出洞”，大抓“右派”

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赵紫阳派出的“消防队”根本扑灭不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所燃起的熊熊革命烈火。

然而，一贯狡猾的赵紫阳，手不软，心也更恶，他要出了另一套反革命策略。在去年六月底和七月份，积极贯彻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陶铸、王任重的“引蛇出洞”“枪打出头鸟”和“秋后算帐”的反革命策略，连续召开各种会议下达各种黑指示，布置在广大革命群众中大抓一小撮“右派”“牛鬼蛇神”。说什么“对敌人，对不纯份子和不纯份子的活动，不到必要时候不揭底，可以挂起来，将来处理，不要轻易揭露，有些东西让他暴露一下。如果发现右派学生，一般的可以记一笔账，等到以后再处理”，“运动没有一定温度，牛鬼蛇神不会露出来”。

他还在给工作队长的报告中乘机放毒说：“要让他们有机会表演自己，给予温度和条件，要有意识地让它混乱一阵子”，“对前段形迹可疑的人要注意，但不要过早反击。”尤其毒辣的，赵紫阳在七月八日至二十日召开的专区、地委、市委文革组长会议，制定了一整套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行动纲领和具体作法，即所谓《大会纪要》。这个《纪要》提出：当前运动的第一阶段，着重解决三个重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揭露隐藏的“假左派，真右派”。《纪要》还要求各级的当权派“引火烧身”，“把牛鬼蛇神引出来”，又要“有意识地给予一定温度”，“使牛鬼蛇神来个彻底揭露，”不要过早回击，以免得“打草惊蛇”，要“对已经揭露了的真正的假左派真右派，领导上沉住气，记一笔账……”

就在赵紫阳的精心谋划和指使下，省直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搞得死气沉沉，而且冷冷清清，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气势非常嚣张，操纵一部份受蒙蔽的群众和干部把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广大群众，大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实行白色恐怖，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当作“牛鬼蛇神”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非法斗争，使机

关的文化大革命面临被扼杀的危险。

控制机关筹委，实行一条没有工作队的工作队路线

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又一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历史阶段。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又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从此宣告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彻底破产，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丧钟敲响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

赵紫阳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疯狂对抗《十六条》，顽固地推行陶铸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一方面在会上勉强检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并在八月七日抛出了一张《欢迎贴我的大字报》的大字报，想以此笼络人心，蒙蔽群众。另一方面，一回到广东就马上翻案，声称：“广东运动不能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同时，明目张胆地下令烧毁和转移大量黑材料，企图与革命群众顽抗到底。

不但如此，赵紫阳还利用这个时机，召开机关十万人的大会，借《炮打司令部》之名，把数以千计的处以上干部不分青红皂白统统列为炮打对象。勒令“退居第二线”，以作为自己的保护层和挡箭牌，继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在会上命令各厅、局迅速派出筹委领导文化大革命。赵紫阳心知各厅、局的群众还没有真正发动起来，他的党羽还能控制各厅、局的运动，选举筹委，实质上就是把工作队的招牌换一块筹委的招牌。以此继续控制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纳入他的“理想轨道”！事实正是这样。各厅、局去年八月选举的筹委都自觉、不自觉地贯彻了反动路线，成了赵紫阳镇压革命群众的工具。

各厅局筹委成立后，赵紫阳却令尹林平、李坚真主持机关文化大革命。他们又怕官办筹委不得力，还派出大量的变相工作队——“联络员”常驻各厅局以控制机关筹委，驾驭广东省直属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联络员”的任务和纪律是赵紫阳来亲自规定的。例如“到各单位要多看、多听、多想、少说话”（实际上不少“联络员”成为筹委的幕后决策者），“不发笔记本，研究对策，物色左派”，拉人下水，暗中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等等。就这样，白色恐怖比运动初期有过之而无不及。广大群众和中层干部，人人自危。广东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却逍遥法外，在他操纵下，群众斗群众的场面继续发生，许多群众被戴高帽子、游街、抄家，关入“牛栏”，剥夺种种政治权利，甚至连参加国庆活动，戴毛主席像章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赵紫阳在这段时间残酷镇压革命群众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罄竹难书的。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广大革命群众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充分发动起来了，经过一年多来的奋战，终于冲垮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出了广东党内最大走资派赵紫阳。赵紫阳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批臭批倒中国赫鲁晓夫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陶铸、赵紫阳一伙，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使广东变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广东！.

红东

（原载 1968.01 广东省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省直站）《一月风暴》第二期，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赵紫阳与广东文革

余汝信

一、亦步亦趋的1966年

1965年2月，四十五岁的赵紫阳，接替比他年长十二岁的陶铸，就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省一级党委第一把手。

翌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突袭中国。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通知》，以前所未有的严厉语气声称：“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

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等言词，振聋发聩，不能不引起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省委的极大震动。

三天之后，5月19日，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大会在广州中山纪念堂举行。国务院副总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大会上作了文化革命的动员讲话。会后，广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得不跟随着中央的部署，亦步亦趋地展开。

随着“彭、陆、罗、杨”先后倒台，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调陶铸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6月1日，陶铸离穗北上，惟广东问题，尚在陶的关怀注目之下。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6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及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大党委的消息同时由新华社公布。在赵紫阳的督促下，6月7日，广东省委决定：立即从省直各机关单位抽调干部900人，组成工作队，分赴各高等学校帮助和领导正在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并提出要坚决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将思想领域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1）同日，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与中南局主管的《羊城晚报》同时发表署名文章《全面系统地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株大毒草——评秦牧的〈艺海拾贝〉》，批判广东省作协副主席、《羊城晚报》副总编辑秦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6月9日，省委发出《关于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指示》，指出：“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尤其是文教战线各部门，大大落后于形势，跟不上群众要求，甚至处于被动的状态。这是异常危险的。”指示决定大学停课一个月至一个半月，高中停课一个月参加文化大革命。主要是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其斗争锋芒应集中指向那些党内党外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2)后由于运动发展远超预期，大、中、小学实际上长期“停课闹革命”。

6月22日，陶铸从北京打电话给赵紫阳，请他研究大、中学校里的夺权问题。陶铸提醒省委，派到学校里的工作组，要处于省委的严格控制和监督之下。学校里一哄而起的学生运动，一定要由工作组加以控制。他还特别指出，要慎防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敌人夺权。6月26日，赵紫阳召集广东省委派驻各单位的工作组组长会议，传达了陶铸的指示。(3)赵紫阳还称，“我们头脑要清醒，对形势要有正确估计。现在是有一些不健康的苗头，有些乱，还要准备继续一个时期。一些学校的运动，我们掌握不了领导权，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占了上风，个别的甚至可能为坏分子所操纵。……总的来讲，除了个别单位以外，至今我们还处在被动状态。所谓被动状态，就是说，这个运动我们还未真正领导起来，运动的领导权还未真正抓到手，学生还不太相信我们；或者有些是工作队已初步取得了领导权，但很不巩固，还时刻有脱离领导的危险，学生有一股革命热情，但缺乏经验，盲目性大，判断是非能力还差。我们跟不上去，他们就会离开工作队的领导。”(4)

7月2日，据《南方日报》报道：省委决定撤销广东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省广播事业管理局局长田蔚(已被责令停职反省的中南局宣传部部长王匡的夫人)的一切职务，并派工作队进驻电台领导运动。翌日，据《南方日报》报道：省委决定撤销中山医院党委第一书记兼院长柯麟和党委副书记刘志明两人的一切职务，改组学院党委，指他们是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

7月12日，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重新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鉴于文化大革命战线太长，部分地区出现动乱，为了稳定局势，决定缩短战线，重点放在中等城市以上的文化、教育部门，已揪出了“牛鬼蛇神”的单位，应组织力量进行批判，转入专案处理。并规定，不论机关学校或其他单位一律不许搞自发夺权，力求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7月15日，在北京的陶铸针对当时出现的乱斗乱搜乱抄家的严重状况，指示省委：“搜查主要是反革命，政治性的，藏有武器和反动信件。此外，便不要搜查，不是一般的不搜，就是不搜。”还指示“战线太长，同意收缩；宗教，暂不搞；文物不动。”(5)

7月18日至20日，全省地、市委文革小组组长会议，讨论运动情况。会议指出，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应着重解决三个主要问题：揭发右派；组织左派；暴露隐蔽的假左派真右派，从而掀起一个大揭发、大暴露的新高潮。7月21日，赵紫阳在广州高等院校工作队会议上称，“要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要有意识地乱一阵，给予表演的温度和条件。”“要把假左派、真右派引出来，要让‘红皮白心’的人跳出来，抓住它，聚而歼之。”(6)

北京的风向，很快就发生了变化。7月下旬，在南方半年多后返京的毛泽东，对北京地区文革表示极不满意，提出要改变派工作组的政策。此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北京市委发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7月29日，李雪峰在“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宣读了这个《决定》，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讲话，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称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大会结束时，毛泽东在主席台上露面，以此表示他对这个决定的肯定和支持。

7月30日，正在北京准备列席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的赵紫阳及准备出席全会的中央候补委员、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区梦觉，得知毛泽东已在工作组问题上

明确表了态，遂匆匆写信给省委，对撤退工作组作了紧急布置：从现在开始，就要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太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隔了一天，8月1日晚，赵紫阳又打电话给广东省委，指示尽快解决工作组问题。因为北京已经宣布撤销工作组，广东也应这样做。他说：“工作队可以集中，也可以不集中。一个系搞好了撤一个系，一校搞好了撤一个校，陆续撤。不用等我回来一起撤。”他还解释说：“所谓搞好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委员会，能够领导运动了。”8月6日，省委遵照赵紫阳“工作队马上撤出”的指示，匆忙作出了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7）

8月1日至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着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很快就要烧到各地各级党委头上。陶铸在这次全会上虽然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央的“第四号人物”，惟中南各省、区党委却不能因此有更多的受惠，从而逃脱受冲击的命运。

8月7日，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印发中央全会。毛的这段文字，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立即改变了全会原有的议题和日程。敏锐的赵紫阳闻风而动，通过电话亦口述了一份题为“欢迎大家贴我的大字报”的大字报，由广东省委的工作人员于8月8日贴到省委办公大楼入口处，表示“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贴自己的大字报，揭露、批判自己的错误。翌日，区梦觉、林李明、尹林平等广东省委的书记、常委们，也联名写出一张内容大体相同的大字报，以表示欢迎群众揭发、批判自己及省委的错误。（8）

8月17日晚，从北京回到广州的赵紫阳在省委常委会议上称：“机关很快要起来了。机关压制民主的不少，有些已有严重问题，有些就是屁股摸不得。文革小组这一段主要抓学校，学校还未转上轨道，还要相当一段。”“当然，机关也要管，但这一段，主要是抓学校的。”“厅、局、部委贴省委的大字报，可贴在省委，机关是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9）

8月31日，北京清华大学南下串连的两名学生给广东省委贴出一张与毛泽东的“大字报”同名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该大字报称，“广州的文化革命冷冷清清，很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其矛头直指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曾讲过，广东省委派出的工作队的问题没有北京那么严重，没有挑动群众斗群众。该大字报则说，华南工学院出现的群众相互对抗的现象应由省委负责。赵紫阳曾提出，选举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要由各派代表组成。大字报则认为，委员会一定要由坚定的革命左派组成，决不能搞各派都参加的议会制。最后，大字报的作者断言，广东省委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害怕革命的造反。（10）

9月3日，广州市红卫兵第一次大会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与会者有四千多人。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市委、广州军区、省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陈郁、赵紫阳、郭成柱、焦林义等分别代表中南局、广东省委、广州军区和广州市委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支持。（11）在此前后，全省大中学校革命造反组织蜂起。

9月15日，一名广东省委的普通干部，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针对赵紫阳的大字报，揭发赵紫阳出身地主，父亲于土改时被处死，要求将此事搞清楚（赵父

于1947年土改中受过火冲击后在家乡发病去世，并非如大字报所述被处死)。(12)

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或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商量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中央的批语则称，“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紧急指示》下达后，因所谓“黑材料”问题，广东省委陷入更深层次的被动挨打状态。

11月4日，赵紫阳被迫代表省委作检讨（当时全国大部分省、区的党委都作了检讨。赵不得不承认省委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承认省委在运动中“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冲破旧秩序，定了许多框框，在运动中采取了许多消极限制的措施，严重束缚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但赵也辩解道：省委并没有把学生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没有挑动学生斗学生，没有挑动工农群众斗学生。赵紫阳代表省委检讨后，广州和外地来的一部分红卫兵并不满意，认为检讨是假的，是阴谋，是为了蒙蔽群众。(13)

中南林学院红卫兵在10月成立了陶铸问题研究小组。11月，他们就“黑材料”问题，和省委负责人展开长达三天三夜的辩论，要求赵紫阳等立即交出“黑材料”。11月5日，赵紫阳请示陶铸：“材料问题，很尖锐。什么叫打成反革命？排个队也叫打成反革命？现在两派都往省委冲，说我们抗拒中央军委指示。”陶铸在11月6日以电话答复：“鉴于目前两派争执不下，处理材料有困难，材料暂时由你们保管，中央将有一个关于材料的补充规定，四五天之后就发下来，你们再按这个补充规定处理。”(14)

11月1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内称，“中央认为，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此前，11月9日，已有学生冲击了省委专案组、秘书组、地区组，抢走了一部分材料，省委组织部档案被封。此后，11月23日，大批红卫兵从下午3时至清晨6时，包围和冲击省委大院，围困赵紫阳长达15个小时，勒令他交出“黑材料”。赵紫阳在打给陶铸的电话中焦急地说：“现在广州情况越来越紧张，问题的焦点还是材料问题，很难处理。现在少数派（全市约一千多人）激烈得很。”“因为材料问题，省委同少数派的关系闹得很僵，本来从北京开会回来后是准备同少数派在一边的，但现在无法做到，反而越来越糟……平反问题，也与材料问题有互相联系，纠缠不清，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派与少数派的关系自然紧张，我们每天的时间，自己无法支配，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15)

11月27、28两日，本地和外地的红卫兵，继续冲击省委，搜查省委的“黑材料”。28日，省委被省直联络总部一些人和华工红旗、中大八三一、珠影东方红、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地质东方红、哈军工和中南林学院等八个组织抢走文件、刊物378份，笔记本23本，包括有组织部记载干部调动方案的笔记本。12月3日，赵紫阳以电话向陶铸报告：“最近学生到省委抢材料很厉害……在学校，少数派与职工多数派关系也很紧张。现在广州各大专学校的少数派联合行动，很容易冲突起来。”12月10日，赵紫阳向陶铸汇报说，造反派

的火力，“现在集中攻省委在十一中全会后和工作会议后，仍坚持反动路线，材料处理不下去，平反问题中央补充规定传达得晚，省委挑动群众排外，机关运动停下来等等。”12月11日、14日，部分群众组织连续两次召开十万人参加的“批判广东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赵紫阳被揪去大会接受“批判”。（16）

二、在夺权风暴的风口浪尖上

进入1967年1月，陶铸最终被打倒以及发源于上海肆虐于全国的“一月风暴”，使已饱受造反派冲击蹂躏的广东省委，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陶铸的地位在1966年12月下旬已岌岌可危。1967年1月4日下午，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派“并作”重要指示”。陈伯达称：“陶铸同志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关系的。”这些话，在场的周恩来未有异议。1月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就陶铸问题表了态，说：“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这个人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我起初就说，陶铸这个人老实，邓小平说，陶铸还可以。……”“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你们也没有解决，红卫兵一起来就解决了。”

1月5日，陶铸被揪出的坏消息传到广州，赵紫阳对其他省委书记和常委说：“陶铸被揪后，红卫兵小将对省委的看法将会根本改变，省委书记处的同志，特别是我本人，可能会被揪来揪去，今后省委书记处碰头的机会更少更困难了，希望大家独立作战，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同一天，在省委碰头会上，他还讲道：“看陶铸的问题是什么性质，广东省委就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陶铸被揪，省委很快就会瘫痪了。我是重点人物，准备被打成黑帮。”（17）

1月7日，省委发出一封题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致省内各级党委、红卫兵组织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的信，承认“省委过去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示“坚决支持造省委的反的人”，同时希望“同学坚决揭露和批判省委的严重错误”。（18）

同日，省委常委、副省长王阑西被指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经中央批准，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三十二个造反团体的贺电。贺电中虽然没有正面提及上海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既然公开号召全国“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不言而喻，就是号召和鼓励各地造反派向所在地区的党政领导机关“夺权”。前此，1月8日，毛泽东就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被夺权说过，“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几天以后，中央报刊对于夺权问题的宣传调子更为明朗。1月15日，新华社播发《红旗》杂志1967年第2期的评论员文章，内称，“我们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最根本的，就是夺他们的权。只有夺了他们的权，对他们实行专政，才能把他们斗倒，斗臭，斗垮。”“毛主席教导我们，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评论员文章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团结广大群众，在伟大统帅毛主席的领导下，展开全国

全面的阶级斗争！”“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1月21日，新华社播发《人民日报》翌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在开头即称，“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双手，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广东的夺权，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19）

1月20日，中大红旗、红旗工人、珠影东方红、暨大东方红与省直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省直站）等本地群众组织与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哈军工红色造反团等外地组织驻穗联络站在中山大学开会，商讨夺权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省革联”），先夺省委、公安机关、广播电台和报刊的权。

1月21日下午，省委机关的群众组织在省委党校礼堂召开“批判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赵紫阳参加了大会。会后，中大红旗、中大八一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根生（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等拉到中山大学。当晚，赵等人被留住在中大。一些造反派问赵对夺权有什么感觉，赵说，夺权问题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一种是派代表监督，一种是夺权。

1月22日清晨六时许，中大红旗的两名代表把赵紫阳单独叫进另一房间，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造反派夺了你们省委走资派的权！”然后宣读了省革联《夺权通告》。

当日在《南方日报》发表的《夺权通告》声称：“我们庄严宣告：今天，我们革命造反派夺了广东省委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权！”“长期以来，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持下的省委，结党营私，招降纳叛，阳奉阴违，欺上压下，干尽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把广东省搞成了他们的独立王国。……”为此，“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广东省委的一切权力归我们革命造反派所有，任何人不得有敌视，破坏的行为。”（20）

同日，省革联发出《通令》，宣布：“从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零时起接管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接管后，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决定均须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通过后方能生效。”（21）

学生念完《夺权通告》后，问赵紫阳有什么意见，并要他把省委、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文革办公室的印章交出来。学生说：“以后你们听我们的，我们听毛主席的。”（22）

赵紫阳表示，夺权是毛主席的号召，夺权要由革命造反派决定，你们夺权我支持。他当即给在省委值班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林李明写了一张条子：“本地和外地革命造反派，向省委夺权，这是革命行动。请把省委、办公厅、文化革命办公室三个印交给他们。”（大意）

林李明看到赵的条子后，表示交印的事最好由省委做个决定，并要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未待得到北京答复，林李明已被揪到中大，同时，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张云也到了中大。

林李明1967年2月3日和省委机关红旗革命造反兵团讲述夺权经过时说，他向赵紫阳提议，最好告诉中央一下。然后，红卫兵一个个问他们同不同意交印，大家都同意交印，他也说了同意，但要报告中央一下。赵紫阳说，考虑到请示中央也不能马上答复，就决定一边请示中央，一边交印，在场的书记都

签了名。

当大家同意交印以后，由赵紫阳亲笔起草，在座的省委书记处成员共同签署了一份交印协议。协议称：“省委书记处（一部分同志未到会）决定省委大印立即冻结（短时期），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并一律转移地方。上述印章在使用时，必须在造反派派出之监督人员同意时方能使用。钥匙掌握在造反派派去的人手里。”赵紫阳还口头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

“交印协议”与林李明所称赵紫阳给他的条子的口径显然有很大区别。“交印协议”强调省委大印只是“冻结”，办公厅、省文革的印章只是“由造反派派人监印”，而并非直接将“三个印交给他们”这么简单。

参与了省委夺权全过程的中大八三一负责人黄意坚后来称：“广东省革联的夺权与全国都不同。是‘我听毛主席的话，你听我的话’。它只派监督小组进驻省委，省委书记处是不解散的，还要继续工作，整个省委没有瘫痪……老周（指周恩来）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上海的夺权方法，老周是不能接受的。22日上午，那天我在八三一，老周办公室打电话来：你们的形式好。”黄意坚说：“老周是点了头的。”〔23〕

惟没有实行“三结合”的广东“一二二”夺权，中央最终并没有予以肯定。

1月22日下午，赵紫阳等被造反派“释放”。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起草广东省委《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同时决定当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省委各部委、各战线负责人出席，省革联也派代表出席。会议主要是表明省委对这次夺权的态度，并要求各部委、厅局支持这次夺权。赵紫阳在会上作了三点指示：（1）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对此错误长期以来觉悟得慢，认识得差，改正不够。（2）各级党委在造反派提出夺权时，只能接受，不得抗拒抵触。（3）我们不仅要像过去一样工作，而且要更加努力工作，各部门干部都要坚守岗位，机关工作、接待工作照常进行，不能瘫痪。赵强调，夺权以后，要继续积极工作，否则就是对抗夺权。〔24〕

1月23日，省委发表由赵紫阳审阅、省革联监督小组通过并批准印发的《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

该书称，“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由于我们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认识很差，改正很慢，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现在，省委置于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下，将更有利于我们改正自己的错误，更有利于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更有利于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告全省党员、干部、人民书》强调：“省委郑重表示；我们在革命造反派和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去所犯严重错误带来的巨大损失。省委在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之后，一定要更加积极工作，决不消极怠工，敷衍塞责。我们认为，任何消极怠工，敷衍塞责，都是同革命对抗的犯罪行为，是决不允许的。”〔25〕

1月28日，省委机关三个由一般干部组成的战斗队，“勒令”赵紫阳和省委书记处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搬出省委东一楼，将东一楼让给他们作总部。赵紫阳冷静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革命行动本应支持，有些具体情况是否可以商量一下，因为省委书记处在东一楼集中办公是与省革联商定的。”“夺权是象征性的，当时我们在中山大学提出两个方案，一是象征性夺权，由小将们监督，二是我们彻底

靠边站。小将们选定了第一个方案。现在省委是在省革联监督下工作，既然还需要工作，那就还要有办公地点。”赵明确表态后，“勒令”也就不了了之。（26）

2月8日，省革联发动属下三十多个群众组织冲击广州军区领率机关大院，以示支持受到压制的军内造反派组织，提出“万炮齐轰广州军区党委”、“打倒黄永胜（27），解放广州军区”等口号。省革联与已介入地方支左的广州军区关系迅速恶化。延至2月21日，广州军区联合办公室宣布省革联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代表”，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广州军区表态后，2月23日，赵紫阳在省委大院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对于“省革联”问题的声明》，内称：“1月22日，‘省革联’向省委夺权，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一、认为夺权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二，当时出面的是中山大学‘八·三一’和红旗公社，武汉大专院校驻穗联络站红卫兵，还有哈军工和北航‘红旗’驻穗联络站等，我一向认为这些单位是造反派，既然是造反派夺权，我认为只能支持，不能抗拒；三，对当时广州地区造反派的大联合，我是不清楚的。听说他们有很多单位参加。根据当时情况和我处的地位，不可能先问他们大联合的情况，然后再去决定对夺权是否接受；四，在1月22日之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关于夺权的一些重要社论和一些省的经验，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28）

同日，广州军区就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等问题，给中央军委等写了报告。次日，毛泽东就此报告写了一段批语给周恩来：“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29）、黄永胜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30）毛泽东似对赵紫阳站出来参加三结合寄予一定期望，赵等随即到京。

2月27日，周恩来报告毛泽东称：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广东方面同志有黄永胜、陈郁、赵紫阳、陈德（31）、区梦觉等七人。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阅后批道：“同意这样做。”（32）周恩来表态之后，赵紫阳站出来短时间内已无可能。他也没有如某些省、区第一把手留在北京受到保护的运气，很快就被令回到广州，继续接受批判。

3月15日，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标志着广东省的权力中心正式转移到广州军区。中共广东省委彻底瘫痪。

4月中旬，周恩来为处理交易会事到广州，多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进行了座谈。在4月18日的座谈会上，周恩来谈及了广东“一二二”夺权和原广东省委等问题。周恩来称：

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我们应该说“省革联”和一·二二夺权是有极严重错误的。我们要指出，我们很坦率，现在要说清楚，二月底三月初，我们当时看到广东省的工作已瘫痪了一个月，急得很，觉得非要找赵紫阳，陈郁同志，还有林李明同志，寇庆延同志，还有区梦觉这些人不可（当然陈郁是已经到中南局了），军区同志也找了几位，主要是陈德同志，把他们找到了北京，黄永胜同志当时在北京。主席看到这种情况就叫我们办了。那种夺权不能继续下去。虽然大方向对，实际上这个大方向对是抽象的，实践的结果证明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你不能够这样面向前方（前边所说的两种情形，特别第一点所说的情况），

不仅面临港澳，还有美帝、蒋帮、日本军国主义等敌人，不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使革命领导权中断，所以一定要也只有建立军管。赵紫阳、区梦觉他们是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是一种问题。小将们犯了严重的错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要把它弄清楚。到了北京，果然弄清楚了。在我们看，一·二二夺权前后，旧的省委以赵紫阳、区梦觉他们两人为代表，当然还有其他人，那次尹林平（到中山大学谈判交权）去了没有？去了嘛！签字有他嘛！中大同学可以证明。赵紫阳靠边站以后，还要尹林平召集书记处会议，是不是这样子？（中大同学答：是。）所以至少这三个人应该提出来吧，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他本来叫林平，是老红军，他是江西人，兴国佬，后来不知怎么转到南方留下转到地方工作，然后七转八转，到抗日战争就转到东江纵队），前省委以他们为首，在我们看来那是起了作用的，至少是利用了这次夺权。……

一·二二夺权当时就犯了错误了，成了一个秘密夺权，不公开的，参加夺权的只有两个学校的革命左派组织，一个工人联合的组织，一个机关的造反组织，加一个珠影，就是五个单位，加外地四个单位来支援，九个单位。夺权的形式成为一个不公开的谈判的方式，就是一个要印，一个让印，就是让权。这种形式是不足为训的，不可效法的，是错误的。夺权的方向是对的，但办法是不可取的。我们不愿意公开来指责，因为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式谈判，安徽也是这种方式。所以对夺权的方向我们都没回答。……赵紫阳和旧省委利用了这个错误，是他的责任。他很善于说话，到北京以后，我们批评这个让权不对，没有去强调夺权的问题。强调让权不对，你是省委书记，中央还没有免你的职，你怎么可以在一个小范围会议上，在中山大学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一谈判你就签字，就让

印了呢？革命的小将要夺印还有根据，咱们有出《夺印》的戏，掌权掌印嘛！那是戏里形象化的名词。真正的彻底的夺权，那个印有什么要头。所以后来夺了印的那些革命派，印拿到身上也没有办法，后来把印交给军区，代为保管了。

……

所以，应该说赵紫阳他们懂得，这不能够怪学生。因此我们说他让位不对。人家要印是有权利要的，你为什么让呢？你不签字，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比如开群众大会，群众大会就是斗嘛！你不交他也没有办法，而且你可以说要请示中央嘛，就解决了。你也不请示中央，连书记处、常委都没开会，就交了，这不失职呀！是极其严重的。旧省委的领导犯了很多的反动路线的错误，当时还说到反动路线。赵紫阳在回答的时候，他就集中到让位让印这个问题上，他说这是一个反革命犯罪行为。这句话他说了以后，我当时没有注意，回来一想，这个不妥。因为省一级的让权的很多，至于地委、各个企业、部门里头被人家把印抢去的更多得很。如果凡是把印交给人家就叫犯了反革命的罪，这个就不胜其数了。所以，在他走以前我就打了个电话，我说这件事可不能叫反革命罪，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让位让印这一件事，就叫反革命现行犯，这个案办起来也没有多大办头嘛！其它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套通通可以不管了？当时我没有觉察，后来一想，他这句话有点很调皮哩！所以我同时打一个电话告诉黄永胜同志。那晓得他回来以后，就把我说的让权不是反革命罪这句话扩而大之，说他没有犯反革命罪。这样他就躲开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都可以躲开了。现在看起来，他很调皮咧，所以，你们问我到底说了没有，我是说了。我是指的那一件事情不能说叫反革命罪，因为这类事情多得很哪，如果这一件事就说是反革命，实际上是避重就轻了，是不是？这件事，我应该把它说清楚。

……

在这个地方，要严防前省委的复辟的逆流。譬如说，刚才说的这些人，特别是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安知他们不利用另外一个机会搞复辟，当然那也不一定同一个对象，他可以找另外一些左派，另外一个对象，你们要警惕，严防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的复辟的逆流。（33）

赵紫阳得知周恩来讲话之后，给黄永胜写了一封信，说他没有讲过类似“反革命犯罪行为”这样的话，可能是总理记错了，请黄司令员帮助回忆一下。以赵当时的处境，并没有寄希望黄会帮他证明，只是想申明一下而已。几天后，黄的秘书来电话，说黄让他告诉赵，黄的印象与你（赵）是一致的。黄为人正直，此举令赵颇为感动。（34）

今天回过头来看，周恩来对广东省委及赵紫阳本人的指责，实在很难令人信服。（1）正如赵紫阳在2月23日声明中所申述，夺权在当时“是大势所趋，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周恩来自己也说“广东一二二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广东省委及赵紫阳本人没有理由公开抗拒，只得承认“造反派起来夺权是革命行动，应当支持”；（2）周恩来既然说“人家要印是有权利要的”，又说“你为什么让呢？你不签字，我们相信革命的学生也不会把你怎么样”，这段话本身就是相互矛盾的。为避免与响应毛泽东号召的“革命群众”发生冲突，赵紫阳等人只能出此下策。正如周恩来自己所说，“因为省一级的让权的很多”，“在南京也是用这样的方法谈判，安徽也是这种方式”。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卫恒般以死抗争的。毕竟是唯一的例外，但未见得周恩来是要求各省、市、区第一把手以卫恒为榜样吧？！（3）周恩来指责赵紫阳“你也不请示中央，连书记处、常委都没有开会，就交了，这不失职呀！是极其严重的。”事实上当时并非没有请示，而是中央（中央办公厅）没有答复。此外，交印时，在场的书记都签了名。四、赵称，中央“当时没有公布夺权是怎样夺法，我心中无底”，此为实情。如果说要追究责任，周恩来也有他自己的一份。况且，所谓交印，其实只是监督使用，“办公厅、省文革印章由造反派派人监印，省委大印由造反派派人监管”，赵还强调，“不是交印给他们带走，是派人监督使用。”

黄意坚更说，省革联“只派监督小组进驻省委，省委书记处是不解散的，还要继续工作，整个省委没有瘫痪”，这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最好的处置办法。

三、被“监护”的日子

1967年5月5日，周恩来向广州军区下达了“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并令黄永胜将执行情况上报。三天之后，执行监护任务的广州警备区向军区提交了题为《对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实行监护斗争的措施》的报告。报告称：

“为贯彻总理5月5日关于‘对广东省几个当权派实行监护’的指示，经有关革命组织协商，广州市警备司令部于5月5日22时30分之前，已将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三人送往监护驻地（军区白灰场特务营营房）。警司确定，由工交武装部政委负责，并抽调参谋、干事三人，警卫战士三人，在警司成立一个监护组（简称二组），采取二对一的办法实行监护，另由特务营抽调一个班负责驻地警卫。对赵、区、尹在驻地的活动采取半自由式，即可以外出散步，但不能走得过远，三人之间不能互相往来和交谈。在某单位拉去斗争时，监护人员同行，斗争结束即返回驻地，监护人员主要负责安全、生活、思想活动，并及时向上反映。给每人订阅两份报纸及《红旗》杂志等。三人的伙食，每天按八角至一元开支。监护中应注意的问题，初步考虑有五条：一，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

去有

回；二，要做好斗批的准备；三，事先看好会场；四，研究确定往返路线；五，掌握斗争时间。”（35）

实行军方所执行的“监护”之后，赵紫阳等人虽未“定性”，但已失去人身自由。惟比起在造反派手中无休止的批斗，他们的人身安全却有了最基本的保障，生活上也有了最低限度的安定。批斗已受到一定的约束和节制，有军队监护人员在场，起码可以做到“掌握斗争时间”，“保证安全，不许武斗，有去有回”。

关于赵紫阳等人的态度，警司的报告称：“赵紫阳、区梦觉、尹林平到警司后，副司令员和副政委分别与他们谈了话。赵、区反映较好。他们认为：‘这样很好，对于人身安全、生活学习都有较好的保证’，也愿意考虑自己的问题。”惟“对赵紫阳正面突破比较困难，曾经斗争、批判了五个通宵，但收效甚微。他对搞经济主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表示承认。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赵紫阳’，‘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赵紫阳！’时，他也举手，但群众在斗争时喊‘打倒刘邓陶’口号时，他坚持不举手。”（36）这也就从侧面说明，在恶劣的环境之下，赵紫阳仍对原则有所坚持。

自此，赵紫阳在军队监护、禁锢的氛围中度过了整整三年的光阴。

1968年2月21日，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除军队干部及群众代表外，原中南局陈郁（第三书记）、王首道（书记处书记）作为革命干部结合进省革委领导班子，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原广东省委常委林李明、罗天、赵卓云、寇庆延四人结合为省革委常委。成立大会给毛泽东的致敬电，黄永胜、刘兴元（广州军区政委）等在大会上的讲话均点了陶铸、赵紫阳的名，称之为“中国赫鲁晓夫和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及其在广东的代理人赵紫阳之流”。唯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广东省革委会成立而发表的社论《“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仅以陶铸“在广东的代理人”指代赵紫阳，稍留有余地，没有直接点名。

在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前夕，1968年2月3日，赵紫阳在“专案组”的要求之下，写了一份一万余字的《我的检查》。在检查中，赵紫阳只承认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及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执行了刘邓陶的路线，并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和“三反分子”。赵紫阳承认自己没有突出政治，没有狠抓阶级斗争，只注重生产而忽视革命等等。在与陶铸的关系上，他承认，由于陶铸对自己长期重用和支持，自己对陶有好的印象，长期形成“盲从”，并在文革中接受陶的指示，成为陶在广东的代理人。（37）

在谈到自己“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时，赵紫阳写道：“我之所以犯这么多、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的立场和世界观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改造，最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有问题。我没有真正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对毛主席的指示，也不是‘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在执行中去努力理解’。这是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根本态度上的不忠。我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很差，没有下苦功夫，没有坚持学习的毅力，不是如饥似渴，至今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还是粗枝大叶，一知半解，很不熟悉。因此当解决问题时，对于毛主席的教导，不是忘掉了，就是根本不知道，还是凭自己的‘想当然’去办。”（38）

赵紫阳接着检查道：“我过去对待许多重大问题，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处理问题时，往往不是首先去对照一下，看是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原则，着重地去考虑根本的、长远的、政治方面的后果，而是多从眼前的效果、

特别是眼前经济方面的效果出发去考虑，依靠自己的‘感想’自作聪明地去想一些小方法，打一些小主意。结果就不能不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39〕

赵紫阳在检查中写道：“对待毛主席的著作和指示，我理解了，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坚决、迅速，抓得紧，但遇到不理解的和不合乎自己的想法的，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坚决，抓得不那样狠，不是立即抛掉自己的想法，彻底排除自己思想的干扰，紧紧跟上坚决执行。更严重的是，我有时不是努力领会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和实质，按毛主席本来的意思去理解毛主席的指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带着自己的倾向去接受毛主席的指示，把毛主席指示中某些合乎自己思想的话，片面孤立地加以强调，这样形式上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更是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不忠诚。”〔40〕

当时的赵紫阳，是怀着某种负疚的心情来作检查的。凡是经受过文化大革命初期冲击的老干部，大都经历过这么一个思想阶段。赵紫阳在自己的检查中，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点。赵紫阳的检查，并不能使他免于被批判。相反，他的检查变成了射向他本人的箭靶。

1968年4月14日，广东省革委会召开全省电话会议，声称“特别值得广东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警惕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与‘二月逆流’翻案妖风北呼南应，于今年二月抛出了他的所谓《我的检查》的万言翻案书，向全省四千万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这说明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没有丝毫调和的余地，你不把他彻底批倒批臭，打翻在地，他就要反扑。”电话会议“号召全省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紧急动员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增强阶级斗争观念，提高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掀起深入持久的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打一场革命大批判的‘人民战争’，迎头痛击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及其在各地区的代理人翻案的妖风，把混进党里的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和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两面派统统揪出来，批倒批臭，彻底粉碎他们的翻案复辟阴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41〕

于是，一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骤然而至。赵紫阳以往的言论被精心收集、断章取义，编成所谓的《广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赵紫阳的反动言论摘编》，对赵紫阳的指责，可以说，是极端的牵强附会。例如，赵紫阳于1966年10月在北京开会时曾对一位领导干部半开玩笑地说：“在天子脚下嘛，京官难做。”这被说成是“恶毒地反对毛主席”。赵紫阳于1965年8月在广东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上讲：“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自觉自愿，不能强制，奉命学习，那是徒劳无功的。”这被说成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赵紫阳于1959年1月说：“粮食问题已成为农村舆论的中心，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焦点。”这又被斥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物质第一”。赵紫阳讲“产量责任制是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能调动农民个人生产积极性的最好措施，是经营管理方面的新发展，可以把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这被指责为“鼓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推行。三自一包”。赵紫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不赞成学生上街游行，这被斥为“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42〕

在广州“工人纠察队”组织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上，有一个干部上台揭发了一件所谓的“赵紫阳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事例，即1962年秋，当赵紫阳在省委扩大会议上传达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时，一位干部在下面讲了一句“刚刚好了一点，又来了”，当场即有“忠于”毛主席的干部站起来，

指出这是反对毛主席的行为，主持会议的赵紫阳只说这是认识问题，没有追究。这就构成了赵紫阳的“反动问题”了。（43）

这场对赵紫阳的“革命大批判”，从1968年4月开始，搞到五六月份，即成为强弩之末，揭不出什么“爆炸性”的问题，只好草草收场。

1969年4月20日，九大召开期间，负责赵紫阳专案的广东省军区第五办公室，向广东省革委会报送了《关于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赵紫阳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的审查报告》。报告开头便称：

“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的广泛揭发，专案组的深入调查，大量的物证、人证、旁证，充分证明广东党内头号走资派赵紫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勾结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顽固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又从极‘左’的方面，破坏广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44）

该报告在历数了所谓赵紫阳破坏文化大革命，死保陶铸等“罪行”之后，又专门讲到赵紫阳的“假让权，真反扑”：“1967年初，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广东四千万革命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伟大号召，奋起向以赵紫阳为首的广东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赵紫阳看到他疯狂镇压、笼络利诱革命群众的种种阴谋已经遭到破产，资产阶级司令部开始全面崩溃，特别是看到他的主子，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已经被揪了出来，更加惶恐万状，眼看‘权’保不住了，但他又不甘心失败，出于其反革命的‘寸权必争’的反动本性，打着‘支持革命造反派’的旗号，于1月22日玩弄一个假让权真保权的阴谋。结果，严重地破坏了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和革命大联合、三结合

的伟大方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赵紫阳反革命修正主义真正目的一次大暴露，是他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向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疯狂反扑。”（45）

省革委会将《审查报告》报到北京后，一直未得到中央批准。赵紫阳的问题被“挂”了起来，没有结论。

后来，赵紫阳曾与家人谈起文革旧事，说他最感绝望的阶段，是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党籍时。他当时认为，随后将会轮到像他这样的各省头号走资派，相继被开除党籍。他说：“我当时曾想过，如果通知我参加省党代会（当时以为刘出席了全会），我是否还能走得动？想的结果是，还是走得动的。”（46）

四、重新工作的五年

赵紫阳没有被开除党籍。且所幸的是，1970年6月间，赵紫阳的政治生命迎来了一线曙光。在失却自由整整三年之后，赵紫阳被解除监护，下放到工厂参加劳动。此一处置办法，标志着赵的问题起码已按“人民内部矛盾”看待了。

这一年的6月30日，赵紫阳化名赵明，下放到湖南省涟源县境内的地方军工企业——981厂（国营湘中机械厂）劳动。同行的还有夫人梁伯琪和两个十六七岁的子女。车间的欢迎会上，赵紫阳恳切地对工人们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大家就叫我赵老头吧！”（47）

赵紫阳以为，在下放劳动一段时间后，中央可能会安排他在湖南当地工作。譬如，到一个县里，担任抓农业的副手，把一个县的农业搞好，已心满意足

矣！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不到一年，他的命运又发生了重大转折。1971年4月底的一个深夜，赵紫阳突然被通知连夜乘汽车到长沙。行车一夜，深思一路，不知祸福。最后认定不致太坏，否则会有人押送。到长沙，广东省革委会一军人处长已在等候，即陪同换乘火车赴京，问何事，答一概不知。火车一进北京站，直接被拉到人民大会堂去见周恩来。甫一见面，赵诚惶诚恐地对周说：“我过去对自己的问题认识不深，……”周摆了摆手，打断他的话，说：“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一致同意，让你到内蒙工作，马上走，内蒙的党代会马上就要召开了。”赵说：“这么多年了，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周说：“已经为你准备了文革以后的全套中央文件。”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到北京饭店住下，赵一宿未眠。（48）

1971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军区内蒙古前线指挥部党的领导小组《关于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补台”工作的请示报告》，同意尤太忠任自治区革委会主任，增补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为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两天后，内蒙古“三大”在呼和浩特召开，尤太忠当选为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吴涛、徐信、邓存伦、赵紫阳当选为自治区党委书记。这样，赵紫阳成为了内蒙第五把手，分工主管全区的农牧业生产。

与赵紫阳同时被毛泽东“解放”的文革前夕的省一级党委第一把手还有两位：谭启龙，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被安排到福建任省委书记；张平化，原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被安排任山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虽然未“官复原职”，比起那些仍被关押审查的原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大批干部，三人已属相当幸运！

1972年3月，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半年之后，经毛泽东同意，广东第一把手刘兴元调四川主持工作；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接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调赵紫阳回广东，任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此时，排在赵前面的省委书记，还有孔石泉（广州军区第二政委）、陈郁、王首道。与在内蒙的地位相同，赵紫阳仍为第五把手。

3月24日，赵紫阳出席回到广东后的首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孔石泉在会上说：“丁盛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是个好班长；赵紫阳同志回省里工作，我们一致表示热烈欢迎。赵紫阳同志在广东工作了近二十年了，经验很丰富，我们要向他学习。”王首道也说：“赵紫阳同志回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是非常恰当的，也是必要的。”

在常委会上赵紫阳也讲了话。他说：“向同志们交心。我是犯了大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前，在文化大革命中，我都犯了错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到广东来工作，对我是宽大，是信任，也是寄予希望，给我在哪里犯错误就在哪里改正的机会。”“我身体还好，有积极性，过去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嗅觉不灵、模糊。今后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努力做好自己分工的工作，鼓足干劲，振作精神，以功补过，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50）

随后，在省委分工中，赵紫阳分管工农业生产和科技工作。

7月4日，赵紫阳在广东省农林科技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先说了些套话：“一定要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农林业生产和科研领域中，要清除他的流毒。”“现在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把批林整风和各个领域里的路线问题结合起来，同三个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同各个领域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批得深。”（51）

接下来，赵紫阳着重讲到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问题。他说：“目前我们广东，总的来讲粮食还是偏紧，群众的口粮还是紧张，市场也

比较紧张，归根结底反映了什么问题？反映农业基础薄弱，农业生产跟不上去。所以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和加快农业发展速度。一些同农业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有那样迫切的工业基本建设战线，还应当进一步的缩短，这样我们才可以挤出资金和材料支援农业，我看这是考虑农、轻、重关系中的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还讲到农业和副业的关系问题：“关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问题，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不能单纯搞粮食不搞经济作物，不搞林、牧、副、渔，不搞其他。其实，只搞粮食，粮食也是上不去的，就是上去了也是不能够巩固的。这是辩证的，不能有片面性。在指导思想必须明确这一点。另外也有实际问题，粮食如果绷得很紧，搞得群众一

月吃三十斤粮食，再讲发展也发展不起来。农民首先考虑的是吃饭问题，所以粮食如果搞得很紧张，农民担心口粮问题，他就没有心情去搞多种经营。”（52）

在赵紫阳的主持下，《南方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论述秋收分配问题。文章写道：“不折不扣地贯彻党的分配政策，是搞好秋收（年终）分配工作的保证。”“要坚持贯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要处理好集体积累和社员分配的关系，要认真搞好粮食分配；要进一步解决超支户的问题，切实兑现分配。”（53）当时，对于农村的分配问题，也只能讲到这个程度。

1973年1月26日，广东省委作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的决定》。《决定》要求进一步落实农村经济政策，继续贯彻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允许社会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等政策，认真加强经营管理工作，要尊重生产队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生产、收益分配等自主权。（54）

3月18日至31日，省委召开全省工业学大庆会议。在会议结束时赵紫阳讲道：“批判林彪一伙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罪行和谬论，教育干部、群众坚持‘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坚持‘政治和经济的统一’，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批林整风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引导到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上。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要批判‘政治可以冲击其它’也要批判‘生产就是最大的政治，防止在克服一种倾向的同时，掩盖着另一种倾向。”（55）这无非还是一些套话。作为省委书记，在公开讲话中，不能不使用当时的通行语言，情有可原。

8月，赵紫阳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十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

12月，中共中央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许世友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任地方党政职务。翌年4月4日，中央决定：赵紫阳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赵又一次成为广东的第一把手（而且是党政第一把手）。从1967年5月被监护到今天，赵紫阳离开这一岗位整整七年。

吸取文化大革命中整人的血的教训，重新成为广东省第一把手前后，赵紫阳在他力所能及的权力范围之内，对某些人和事采取了较为人性化的、宽容的处理。

原广州旗派头头之一、“华工红旗”负责人高翔，1968年2月曾作为“广州三司”的代表被结合进省革委会并担任了常委职务。当年8月，被令回校接受

批判审查，翌年被免去省革委常委一职，后被分配到广东省翁源县工作。1973年，任县革委工交办副主任。

1974年3月22日，赵紫阳和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孔石泉在广州找高翔谈了一次话。（56）

一开始，赵紫阳向孔石泉介绍高说：“他们在广州是最早造反的，就是那个‘北京来信事件’。那时还没有‘八三一’他们。以后，对北京来的人在广州写的那篇文章（指《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也是最早批判的，敏感性比较强。”高翔想不到赵紫阳会对他做出如此善意的评价。这个开场白就像在介绍一个老朋友给别人认识一样，语气中还略带一点赏识之意。

当高翔谈到广东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时，赵紫阳说：“七千人问题，我总有个考虑，你们怎么能调查到这个数字，我不是说七千人这个数字不准，我也没有调查。只是感到你们没有条件进行这个调查。”孔石泉说：“非正常死亡还不止这个数字。”高说：“我的数字是各地参加旗派人员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当地旗派组织报的，不是全部人员。赵紫阳说：“这些被杀的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杀的？是一派杀了一派还是怎样？”孔石泉说：“当时的形势很乱，有个历史条件，其中有坏人挑动。”高说：“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只有一派有力量杀人。”赵紫阳说：“我了解潮阳县杀了几百人，其中百分七十是一派的人。梅县地区就搞不清楚杀的主要是什么人，那个地区杀人最多的。”这时高感到赵紫阳是以平等的姿态在和他讨论问题，完全没有居高临下的态度了。

在高翔谈到干部问题时，赵紫阳说：“干部问题还有这么个情况，希望你们考虑一下。整个干部队伍中，大部分的骨干对文化大革命是不理解的，看不惯，但这些干部一贯表现很好。有些干部虽然支持了旗派，但一贯以来表现不一定很好。广州的干部中，一贯较好的，支持旗派的较少，这是个基本情况，能不能笼统地说支持旗派的干部得不到重用呢？如湛江地区又不一样，那里的老干部支持旗派的较多，站出来的也较多，那里东风派很有意见。”高说：“干部问题主要存在的是对同一类型的干部，却有不同的两种态度。反对过黄（永胜）的就抓得紧一些，小事变大，大事变性。反过来又不一样。”赵紫阳说：“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我认为是存在这种情况的。但支持旗派的干部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贯表现好，运动中又支持旗派的；一种是一贯表现不好，有不满情绪，运动中支持旗派的，不能说明他们的路线觉悟高。”孔石泉说：“当前干部确有对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新生力量看不惯的思想。这就要做长期的工作，而且将来还会有这种人。”高说：“一般情况下，这是认识问题，但也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反映的是路线问题。在当前来说，这种思想妨碍了政策落实，正是这次运动要冲击的。不完全是慢慢来，长期教育的问题。广州的问题是对那些一贯表现好，文化大革命支持了旗派，路线觉悟较高的干部的看法，还不如一贯表现一般而支持了东风派的干部。”在干部问题上，赵紫阳先是引导高看干部不能只看他是否支持旗派，还要看他的一贯表现。针对高的这段话，他又进一步分析说：“支持旗派的干部分三种，一种是一贯好，开始支持旗派，路线觉悟高，后来比较清醒；二是一贯好，支持旗派，但后期跟着旗派犯了错误的干部，对他们的错误看得过于重一点；三是一贯不很好，支持旗派的干部。”他层层深入的分析令高信服。

谈到落实政策的问题时，赵紫阳提出说：“落实政策不够全面彻底，和林彪、黄永胜路线的流毒问题是否有一条界线，是我们的工作做不到家还是林黄流毒的问题。”高翔说：“政策的落实是现象，阻碍政策全面落实的根源是林黄路线流毒的影响。”赵紫阳接着说：“‘一打三反’、清查‘516’都是中央有指示、

有部署搞的，与黄永胜在广州的路线之间要有一个区别，恐怕不能认为是黄的路线，这提法上要慎重考虑。”孔石泉说：“清查‘5 1 6’在北京总理、康老、江青等同志都是讲了话的，我们是按照中央的。”高翔说：“同样是中央传达下来的精神和部署，但各个省贯彻起来都有差异，如卜占亚在湖南搞‘一打三反’和清查‘5 1 6’就有路线错误的问题。”赵紫阳说：“有七、八个省份都有这些问题，但这些省都点出了上贼船的人，广州没有点出这些问题来。”高翔说：“中央也没有表态说广州没有问题。中央文件有指出黄永胜‘对反对过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等’，他在广东的具体表现是否存在呢？他的清查对

象是对着一派革命群众组织，而这个清查方向一直到‘9 1 3’事件以后还不变。”赵紫阳说：“‘一打三反’、清查‘5 1 6’能不能认为是黄永胜搞的还是值得考虑。”孔石泉说：“有些具体的情况你们不清楚，中央是有精神的。”高翔说：“省委对整个情况也未必很清楚，可能有人背着你们两位干一些事情也不一定。在发动群众揭开盖子之前，我们都不必先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我是倾向于广东会揭发出一些问题来的。”赵紫阳说：“我倒倾向于广州再揭也揭不出太大的问题。对刘兴元、丁盛中央讲了话，我是相信中央的，今天还是这个看法。”孔石泉说：“是要发动群众，对黄永胜问题，另立中央问题等群众有怀疑，有看法应该发动大家揭发，揭发以后还没有什么问题，这怀疑就解决了。”

谈到揭盖子的问题时，赵紫阳说：“考虑解决揭盖子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是重新挑起两大派矛盾。6 8年时有个历史条件，那时毛主席对几个学生领袖的讲话，在北京开串联会的问题中央有表了态，正是旗派犯错误的时候解决派与派的问题条件较有利。这次最好避免像四川那样翻来翻去的局面。这两大派的问题是当前比较难解决的。既要揭发矛盾，解决矛盾，又不希望走太大的弯路。老实说，我是有点留恋目前比较平稳正常的形势的，有点怕乱了。”

这次谈话，虽然他们之间的观点不尽相同，有时还近乎在辩论。但高翔感到了赵紫阳的坦率和诚恳，平添了对他的信任。

最后，赵紫阳还对高翔说：“我们还准备找你们这边几个人座谈，省委的同志也多来些。多听几方面的意见都是有好处的。”

3月26、27日赵紫阳、孔石泉、王首道等10位省委领导，两次与刘继发、丘学科、周焱等10位旗派的代表开座谈会。

以后，孔石泉调回军区，赵紫阳和王首道、林李明、焦林义、寇庆延等还多次找群众组织的代表开座谈会。

4月22日，省委二秘通知高翔晚上7：30到赵紫阳办公室开会。高去时，见到只有赵紫阳一个人。这次他和高谈到深夜。谈话的主要内容是：（1）赵详细地询问高对一些干部以及各派群众组织负责人的看法；（2）赵提出为了发动群众又防止两大派产生矛盾，打算由旗派的刘继发和东风派的孙亦武成立联合办公室，参加领导运动；（3）对广州问题严重性的估计，赵强调说：“对广州的问题要有一个基本的估计，中央对广州的问题是有处理的，残余势力总不能比原来的更严重吧。”最后，赵紫阳谈到恢复广东省革委常委的问题，问高有什么打算。高的回应是：（1）我是作为群众组织的代表参加省革委的，我自然要为他们解决问题。广东的遗留问题很多，希望省委认真落实政策。（2）我愿意协助省委维护广东的安定局面。我和一些东风派负责人的私人关系也不错，可以做联合两派的工作。

高翔说：“赵紫阳在广州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多次与各派群众组织代表

开座谈会，面对面的直接对话，既听取各方意见，又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事实证明，他的这些做法对保持社会的安定局面是行之有效的。”

1974年9月，高翔被安排到广东省第二工业局（军工局）任副局长和党的核心组成员。

1974年11月初，广州的李正天等三位青年署名“李一哲”，在市内北京路口先后贴出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序言》、《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长篇大字报。大字报名为批林彪，实质批江青，并对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提出了与官方口径不同的独特见解，一时引起哄动。广东省委迫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各种压力，于12月初印发了署名“宣集文”的批判“李一哲”长篇文章，下发各单位。

当月，广州市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全文印发“一张反动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和长篇按语，并与一些批判发言一道汇集成册，分发群众，人手一册，以供批判（其实无形中也扩大了“李一哲”大字报的影响）。

根据赵紫阳的指示，有关方面对李正天等人采取了让其讲话、不限制其人身自由等较为宽松的政策，召开了一百多场让其讲话的“大辩论”大会。当时流传一句话：“上面发了话，对李正天不要抓，不要杀，让他讲话，看你们有谁能把他驳倒。”

李正天后来称许道：“在四害横行的当时，在很多大是大非问题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条件下，当时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明知我们是反对江张姚的，他既不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也没把我们投进监狱，相反，他对批判会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保护了我们的公民权利，这在当时是有胆识、有魄力的。”〔57〕李正天所说的“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指的就是赵紫阳。

1974年，广东全省夏粮丰收，征购入库比1973年同期增长28%。全省三千多亩早稻大面积丰收，平均亩产量和总产量都比前一年同期增长一成多，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这在当时各省的政绩中是名列前茅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赵紫阳卓有成效的内行领导关系甚大。1975年，广东的农业生产在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仍取得早稻丰收，全省三千多万亩早稻，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保持了1974年大丰收时的水平，改变了历史上大雨大减产的状况。赵紫阳在这场抗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无庸赘言的。〔58〕

赵紫阳在广东取得的成绩，受到当时仍在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的重视。1975年10月，邓小平对赵紫阳、韦国清说：你们俩换一个地方，紫阳到四川，国清到广东。邓特别叮嘱赵：四川搞成这个样子！希望你能三年改变面貌！〔59〕赵随即到成都，就任中央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不负重托，只用了一年半时间，已使四川的面貌基本改观。

（2012年4月初稿，2015年6月改定）

注释：

〔1〕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页205。

〔2〕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5。

〔3〕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6。

〔4〕 赵蔚：《赵紫阳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2月版，页131。

〔5〕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6—207。

- (6)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自印本，页28—30。
- (7)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7—208。
- (8) 参见赵蔚：《赵紫阳传》，页138。
- (9)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37。
- (10) 赵蔚：《赵紫阳传》，页142。
- (11)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09。
- (12) 赵蔚：《赵紫阳传》，页143。
- (13) 赵蔚：《赵紫阳传》，页144—145。
- (14)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4。
- (15)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8—109。
- (16)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09—111。
- (17) 赵蔚：《赵紫阳传》，页151—152。
- (18)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12。
- (19) 以下夺权经过，主要参考了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48—156。
- (20) 《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
- (21) 《南方日报》，1967年1月22日。
- (22) 赵蔚的《赵紫阳传》则称学生的这句话是在1月21日晚对赵说的。
- (23)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56—157。
- (24) 叶曙明：《见证一九六七年——广州地区文革实录》，页157。
- (25) 赵蔚：《赵紫阳传》，页156。
- (26) 赵蔚：《赵紫阳传》，158—159。
- (27) 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
- (28) 赵蔚：《赵紫阳传》，页162。
- (29) 时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广东省省长。
-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页242。
- (31) 时任广东省军区政委。
- (3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页243。
- (33) 《周总理四月十八日在广州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页17—22。
- (34)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 (35) 赵蔚：《赵紫阳传》，页165。
- (36) 赵蔚：《赵紫阳传》，页165—166。
- (37) 赵蔚：《赵紫阳传》，页170。
- (38) 赵蔚：《赵紫阳传》，页170—171。
- (39) 赵蔚：《赵紫阳传》，页171。
- (40) 赵蔚：《赵紫阳传》，页171—172。
- (41) 《南方日报》，1968年4月15日。

- (42) 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页172—173。
- (43) 转引自赵蔚：《赵紫阳传》，页173。
- (44) 赵蔚：《赵紫阳传》，页175。
- (45) 赵蔚：《赵紫阳传》，页175。
- (46)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 (47) 中国·娄底网站，www.huloudi.gov.cn/Item/61594.aspx
- (48)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 (49) 赵蔚：《赵紫阳传》，页190—191。
- (50) 赵蔚：《赵紫阳传》，页191。
- (51) 赵蔚：《赵紫阳传》，页192。
- (52) 赵蔚：《赵紫阳传》，页193。
- (53) 《南方日报》，1972年11月11日。
- (54) 《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页250。
- (55) 赵蔚：《赵紫阳传》，页194。
- (56) 关于赵与高翔谈话及交往情况，资料来源于高翔：《文革往事——追忆我人生轨迹中的赵紫阳》（未刊稿）。
- (57) 李正天；〈在“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大会上的发言〉，1979年2月6日，载《李一哲事件》，香港：中国焦点出版社，2010年12月版，页309—310。
- (58) 赵蔚：《赵紫阳传》，页203、205。
- (59) 访问赵五军记录，2012年2月26日。

石圭平：赵紫阳在内蒙古

源地址：<http://wuguoguang.com/2012/08/30/1295/2>

1971年5月到1972年3月间，赵紫阳曾经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担任副书记，是排在最末一位的副书记，主抓农牧业生产，当时我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采访农牧业方面的记者，因采访关系与赵紫阳接触较多。

1971年5月13日至18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在呼和浩特隆重召开。“文革”期间，内蒙古自治区上上下下广泛进行的挖“内人党”运动，使内蒙古自治区从城市到农村、牧区的各民族人民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当时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文件上也明确指出：“挖‘内人党’事件，使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受到了伤筋动骨的伤害”。就连“文革”期间成立的各级“革委会”也几乎处于全面瘫痪状态，工厂停工，学校停课，交通运输中断，农村无人种田，牧区无人放牧，喊冤上访的人成群结队，内蒙古大地一片萧瑟狼藉，千里草原破败荒芜。

为了尽快解决这种非常混乱的现状，中共中央决定从1969年12月19日开始，对内蒙古自治区施行全面军事管制。以北京军区为主组成前线总指挥所（简称“前指”），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任“前指”总指挥，27军政治部主任迟浩田任“前指”办公室主任，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切党、政、财、文大权统一归“前指”掌握。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处于非常时期的军事管制结束了。

5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届一次会议，选出了以尤太忠、吴涛（蒙古族）、徐信、邓存伦、赵紫阳为书记的领导班子。会议还明确了分工，赵紫阳分管主抓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

当时，我和赵紫阳以及他的秘书蔡肇发大会、小会没少在一起开，有时我也常到老蔡那里去闲聊。我从老蔡那里知道了不少有关赵紫阳的情况：“文革”开始不久，赵紫阳就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翻在地”，直到1970年6月30日，赵紫阳化名赵明，拖儿带女来到湖南娄底市国营湘中机械厂劳动锻炼，他被分配在机械厂的三车间六班，在钳台和钻床上干活，一位姓刘的副班长是他的师傅。他妻子梁伯琪则被分配到仓库当保管员。初来时，他就很真诚地对工人说：“我是来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今后大家就叫我赵老头吧。”赵紫阳干活很认真，能弯下身来虚心向老工人学习，还经常和大家一起加班至深夜，他把自己当成工厂的员工，关心工厂生产建设，还不时向厂里提一些合理化建议，受到厂领导的重视。工人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不知道他以前曾任广东省的省委书记，但知道他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来接受劳动改造的。但是，谁也没有把他当阶级敌人来看待，工人对他非常好，经常从家里带些饺子、汤圆给他改善生活。有病时，工人会陪他翻山越岭去山外的医院里看病。

内蒙古自治区党代会召开的前两天，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还正在

车间干活，中央突然通知他到北京去。当天晚上周总理找他谈话，说内蒙古自治区第三次党代会明天就要召开了，中央决定派你去担任副书记。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事前他全然不知，他说：“总理，我得回去换身衣服”，总理说：“已经来不及了，你明天必须赶到内蒙古参加党代会的开幕式”。原定于上午九时按时召开的党代会，因赵紫阳没有赶到，竟推迟了 10 多分钟，当主持人向大家解释说会议要推迟一点时间的原因是：中央决定派赵紫阳同志到我区工作，现在他还没赶到。主持人的话音一落，台下立刻就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当穿着一身劳动布工作服的赵紫阳出现在会场主席台上的时候，台下又响起更热烈的掌声。

内蒙古自治区 5 位书记当中前三位都是部队的将领，邓存伦主抓工业，赵紫阳主抓农牧业，一把手尤太忠，对赵紫阳的工作大力支持，使他能放心大胆地干工作。

长期在广东工作的赵紫阳来到内蒙古主抓农牧业生产，工作的跨度是很大的。他履职不久，就深入到农村牧区调查研究去了。他走遍了内蒙古自治区四盟二市（当时内蒙古自治区辖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巴彦淖尔盟以及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他每到一处从不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迎送，而是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基层干部和农牧民谈心；他一次又一次地叩开农家的柴扉，走进农民家的茅屋，坐在农家的土炕上和农民促膝谈心，倾听他们的呼声、愿望和要求；他披一身风雪来到牧民的蒙古包里，向有丰富放牧经验的牧民求教问计。为了把农牧业生产历史和现状弄个明明白白，他每到一地就同农村牧区基层干部座谈，虚心听取他们对如何搞好农牧业生产的意见和建议。在土默特右旗河子大队，他曾两次来到一位多年担任村长的老农民家里谈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赵紫阳对当时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生产中的情况了然于胸。

赵紫阳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之后，他向自治区党委汇报了他所掌握的第一手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于 1971 年 9 月 6 日至 28 日在呼和浩特宾馆召开了农村牧区政策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是一些有代表性的生产大队、公社、旗（县）以及自治区的相关人员。我和《内蒙古日报》社的女记者刘谭是驻会采访的记者，每天的小组讨论会及晚上的汇报会都按时参加。这个长达 22 天的座谈会，认真分析了内蒙古农牧业生产的现状和历史，制定了发展农牧业的政策。差不多每天晚上赵紫阳都要来到这里听取各小组的情况汇报，特别是会议的最后几天，进行到各项政策的具体制定阶段时赵紫阳每天都来和大家一起讨论研究，在制定具体规定时微细到农家的自留地每人应该留多少？牧民的自留畜每户口应该留几只（头）？房前屋后的树应该留几棵？每次听取汇报赵紫阳都是谈笑风生，从善如流，所以每天晚上的汇报会都开得很活跃，有声有色。当时还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发挥到

极致，平均主义的歪风横行霸道，许多地方一天的劳动工分只有几分钱！有谁还愿意去劳动！自留地、自留畜等都是社会上最为敏感的神经末梢，这个时候如果谈自留地、自留畜等问题是要冒很大风险的。而这次的座谈会上却畅谈了这些十分敏感的而又亟待解决的问题，并提出来解决的办法。赵紫阳听取大家汇报时，假如有的小组汇报说每家的自留树应当留 3 棵，有的说应留 5 棵，最后赵紫阳都是选最高的数字拍板。如说到山区养的毛驴算不算在自留畜的数量内，与会

者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下时，赵紫阳说：毛驴在山区主要是交通工具，这个就不要算在自留畜数量里了。从制定具体政策上来看赵紫阳是一心一意为农牧民着想的。有一天晚上，我和刘谭坐在一起了，我感触很深的低声对刘谭说：“看来赵书记这个人很厚道，一心为农牧民着想，大家汇报上来的数字，到他这里都放宽了，他是想尽量多给农牧民更多的实惠，他就不怕人家说他右倾，第二次被打倒？”因为赵紫阳就坐在会议桌子的对面，刘谭没敢跟我嘀咕，就写了一个纸条给我：“我们报社的人都说赵书记真是怀着强烈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干工作的，是给老百姓办实事的实干家。”

这次座谈会制定了《关于农村牧区若干政策问题的决定》共 17 条。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对农村牧区，人民公社制度和经济制度的破坏，提出了纠正极“左”错误倾向，反对在农村牧区搞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破坏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的穷过渡歪风。提出了牧区以牧为主，农林牧结合，因地制宜，全面发展等一系列正确的生产建设方针。17 号文件明确指出，畜牧业是牧区的主业，农林业的发展必须为牧业服务。社员的自留畜每户可养羊 10 到 15 只，最多不能超过 20 只，骑、挽和乳用大畜由旗（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规定，自留畜已经收归集体所有的要按数量退给本人，多余部分要作价分期偿还，17 号文件还指出：“坚决反对平调，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不得以任何方式随意增加脱产人员和脱产人员的补助工分”，而且还提到了要大力“发展和办好社队企业”，明确提出了“反对平均主义”，认真贯彻执行“多劳多得”的原则，禁止在牧区开荒种地，防止草原沙漠化等等。这个文件的精神与“文化大革命”前乌兰夫同志在牧区推行的“两定一奖”（定畜群、定任务、超产奖励）政策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牧区也是行之有效的。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却作为乌兰夫的一大罪状遭到严厉批判，而当时乌兰夫同志还没有“解放”，他被关押到哪里去了连他的家人也不得而知。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这份文件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需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

这个座谈会上形成的文件，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讨论通过后，于 1971 年 10 月 18 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全区正式发出了《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文件的精神传达到农村牧区以后，农牧民欣喜若狂，敲锣打鼓放鞭炮，那些被极“左”路线残害已久的农牧民用这种最古老、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心中淳朴的渴望与内心的诉求。

今天，当你打开“百年风云内蒙古”的网页时《关于当前农村牧区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赫然在目。一个好的政策的实施成了草原人民永久的记忆。

在深入贯彻 17 条的基础上，于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6 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呼和浩特召开全区农牧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这是自 1964 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规格最高、人数最多的一次“学大寨”会议，赵紫阳在会上做了激情澎湃的报告。会后，大家去大寨参观学习，由赵紫阳和吴涛（“九大”中央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带队，代表团有 800 多人，从呼和浩特开了一趟专列，随行的有《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人民广播电台以及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十位记者。为了解除长时间坐车的疲劳，记者们在一起总爱聊天说地的闲聊，当然也有不少话题说到赵紫阳。大家谈到，我们这些农牧记者

下乡采访时，走到哪里，常常会遇到一些农民说：自治区的赵紫阳还来过我家呢。在牧区有些牧民也会说：别看我这蒙古包破烂不堪，赵紫阳还来包里喝过我家的奶茶呢。

我也给他们讲了一件事：11月初，我在呼和浩特市旧城区逛街时，突然遇到赵的秘书老蔡，我问他：“你到旧城来干什么？”他说：“我们刚从锡盟草原回来，那里已经下雪了，冬天到了，赵书记经常下乡，没有个皮帽子不行，我是来给他买皮帽子的。”我说：“赵书记冬天还是那样辛辛苦苦地往乡下跑啊？”他说：“他就是这个脾气，所以才来给他买顶皮帽子的。”赵紫阳爱下乡，这在内蒙古自治区各级干部中是尽人皆知的。

车过大同后，在山西省境内我们看见站台上叫卖花生、水果的了。内蒙古由于土质和气候的原因是不产花生、红薯、红枣的。而且当时由于挖“内人党”的严重摧残，内蒙古的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粮食及各种副食品即使全凭票证供应也是时断时续，经常是空排半天队啥也买不上。在山西境内可以随便买花生吃了，我很高兴地说：“我是最爱吃花生的，这次可要吃个够。”随行的这十名记者中，只有我们分社社长老于和资深记者老雷的工资上百元，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只有四五十元钱，于是有人就想了个绝招：叫赵书记花钱请咱们吃水果花生如何？大家说咱把这个“消费”转嫁到赵紫阳身上挺好。

由谁去给赵紫阳要钱呢？几个人起哄说：小石去最合适，因为你是咱们一行中年龄最小的又是唯一的女记者，赵书记不会驳你面子的，非你莫属了。既然大家推举我去给赵紫阳要钱买花生水果我也不好意思推辞，在他们的鼓动下，于是我就“肩负着大家的重托”，信心满满地向赵紫阳的车厢走去，当我兴冲冲地来到赵紫阳的包厢旁边，推门一看我有点迟疑了，原来我以为赵紫阳是一个人有单独的包厢，进去一看才知道他同吴涛同志是一个包厢，吴涛是内蒙古党委第一副书记、内蒙古军区政委，他是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辽沈战役等，他非常威严，不苟言笑，平时是没有人敢跟他开玩笑的。看见吴涛政委我还真有点发憊，不好意思张口了，但是既然来了就得不辱“使命”，我嗫嚅着冲赵紫阳说：“赵书记，我们那个车厢的记者要你掏钱请客给我们买花生吃呢。”我话音一落，赵紫阳就笑呵呵地急忙翻他上衣的两个口袋，什么也没有，他又翻腾下边的口袋，中山装的四个口袋全翻遍了，最后找出来一块柒毛钱，全交给我了，我拿着这点钱真有点泄气了，一个省委书记，一个大领导身上才有这么一丁点儿钱，这真是我们这些记者们怎么也想象不到的。

参观团到达昔阳后，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张平化同志从太原赶来与大家见面，陈永贵也表示了热烈欢迎。第二天，我们就跟随陈永贵去大寨的虎头山、狼窝掌等处参观。

我们这个参观团的其余的大队人马则由大寨的其他领导成员带领参观。当时参观大寨只能看治山治水的业绩，不管什么人都不能随便走进农民家里，所以我们并没有跟当地的农民有任何交流。当我们这一行人走到虎头山上时，见有十几位妇女正在翻地。赵紫阳问陈永贵：“这是铁姑娘队吧？”陈永贵说：“是的”，于是赵紫阳就冲着他身边周围的这些人大声说：“大家同铁姑娘一起劳动吧”，赵

紫阳首先拿起铁锹翻起地来，我虽然也从铁姑娘手里接过铁锹翻腾了几下子，并没有认真干，是好奇心驱使我看看赵紫阳是比划几下意思意思还是真干，于是就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他翻地，结果发现赵紫阳翻地还真像回事儿，动作娴熟，还真用力气干了好大一阵子，并非作秀。

中午，陈永贵按他的最高规格招待我们在他家吃饭，摆了两桌，一桌是张平化、赵紫阳、吴涛、陈永贵等领导，另一桌则是我们十位随行的记者。席间，我们这桌的人推举我去给陈永贵敬杯酒，我端着酒杯走过去代表记者给他敬酒，陈永贵还真的实实在在地喝了，还很高兴地说了声：“谢谢！”而我则假喝了一口，而这个假动作我自以为谁也没看出来，当我转身刚要走回到我们桌旁时，赵紫阳笑着大声说：“我要揭发，刚才女记者没喝酒”，陈永贵说：“我真喝了，你这个来敬酒的怎么不喝酒就跑了呢”，弄的我实在难堪，于是只好将一杯酒一饮而尽。我冲着赵紫阳说：“赵书记都怪你啦，要不是你揭发我就混过去了”，赵紫阳很得意地笑了笑说：“我这叫实事求是嘛”，张平化同志也笑呵呵地附和着说：“赵书记说得对，是应该实事求是”。

1971年12月22日，赵紫阳又主持召开了规模盛大的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会议，制定了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机械化的发展规划，他决心要把内蒙古的农牧业生产推上一个新台阶。

1972年1月初，我想写一篇记述内蒙古农民战天斗地“学大寨”的长篇通讯，初步定题为《战斗在鄂尔多斯高原上的人们》，于是，第一站先来到了特拉特旗采访，当时的内蒙古还是十分贫穷落后的，旗招待所全是平房，北边的一排平房内全是土炕，是供一般干部出差住的。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是高级房间，每间房子内放着四张单人床，靠墙壁处放着一张有两个抽屉的小长条桌子，房屋中间生着一个煤火炉子，我被安排到这个高级房间居住，因当时出差的女同志很少，又加上那年冬天奇冷，所以虽然是4张床其实只住了我一个人。有一天晚上，一个女服务员进来说：“自治区的一位领导来了，招待所没有地方住了，他们只好住在旗委会议室里，被子不够用了，我要把这个房间多余的被子拿过去。”

第二天，旗委宣传部新闻干事老杨来叫我吃早饭时，我问他：“昨天自治区的那位领导来了？”老杨说：“赵书记带着几个人来了，没地方住了，他们昨天在会议室住了一夜，今天一早就下乡了。赵书记下乡从来不事先通知我们当地政府，都是人先到了再说，我们事先一点也不知道他来，所以什么也没有准备。”

赵紫阳住会议室这件事叫我沉思很久：特拉特旗与包头市仅仅隔着一条黄河，大约一个多小时左右的车程即可达包头市。包头市的青山宾馆、包头宾馆、包钢宾馆等都建得非常豪华气派，尤其是青山宾馆是坐落在一座大花园里，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陈毅、乌兰夫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在这里下榻过。赵紫阳去包头任意一家宾馆住下都不为过，怎么在寒冬腊月去睡会议室呢？

（作者为新华社原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转自《炎黄春秋》)

附：

吴国光按：赵紫阳在内蒙古工作的时间很短，因此也很少有人了解当时他的工作情况。1986年，我亲耳听赵紫阳引用自己去内蒙工作的例子，批评中国的“不尊重选举人意志”（赵的原话）的选举制度。他说：文革后我去内蒙工作，上午下飞机，下午就当选，人家根本不认识我，这种选举有什么意义？（大意——原话可在拙著《赵紫阳与政治改革》中查到）石圭平前辈这篇文章，生动、具体、翔实地回忆了那一段（赵从湖南的工厂里被叫到北京，接着去了内蒙，连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都没有来得及换）。此文给我的再一个深刻印象，就是赵那种勤于基层调查的工作方法。在蔡文彬先生主编的《赵紫阳在四川》一书中（本书屋刊有我为此书写的导读），到处都可以见到四川干部对赵这种工作方法和作风的翔实回忆。原来并不仅仅在四川是这样；在广东，在内蒙，后来在中南海，赵都是这样。这篇文章充满了细节，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值得一读。

“粮食是有的”：赵紫阳的“反瞒产”与“吃干饭”

原载文革网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83779>

图片：资料出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罪恶言行汇编》（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赵紫阳）强行下令“每日三顿干饭”，造成人为的粮荒。为了推卸和掩饰罪责，悍然大搞“反瞒产”，残酷打击基层干部，使群众生活遭受更严重困难。

“广东今年粮食已经足够全省人民全年放开肚皮每日吃三顿干饭，并留足明年种子，同时每人还有七百斤的饲料粮和 500 斤储备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省委才肯定地宣布：广东的粮食问题解决了。”

（赵紫阳）（《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 年第 5 期

省委宣布一天吃三顿干饭，对全省农民是一极大的鼓舞。各地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并且一直坚持下去。

（赵紫阳）（《论农业生产的新阶段》。《上游》，1958 年第 5 期）

1959 年春，一日吃三顿干饭的恶果已经开始暴露，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时，陶、赵这伙混蛋，仍然一意孤行，蛮干下去。陶、赵两人还亲自出马，分别到东莞、徐闻两县大搞所谓“反瞒产”的试点，在那里创造了所谓“领导下决心，大反公社干部的‘右倾’，把矛头对准连排干部，对基层干部施加压力的“经验”，向全省推广，并规定各地、县委搞出的“瞒产”指标，要求每个县都召开大规模的干部会议，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县，命令地委亲自去掌握，查出“瞒产数字”，否则，就要挨斗争，被撤职，就是诋毁三面红旗的“右倾分子”。有的县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把基层干部集中到公安局交代。大搞白色恐怖，打击了大批农村基层干部。结果，陶、赵一伙真的捞到了不少空头数字。于是，又以省委名义命令各地：一定要坚持执行每天吃三餐干饭。这就给当时农村生活安排造成严重困难，不少社队，由于粮食不足，出现了水肿甚至饿死人等现象。

湛江、徐闻反瞒产特点是：决心大，方法对，只要三五天的艰苦努力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高潮。整个湛江可能搞到几亿到 10 亿斤。

从徐闻情况，说明二个问题：一、粮食很多，没有不瞒产的连（相当大队），连以下的干部 100%都有瞒产。而且生产愈好愈是重点，瞒产愈多……，大体每亩瞒产 200 斤，多的达 500 至 600 斤。二，凡是闹粮食闹得愈厉害的瞒产也瞒得愈厉害。看来每个公社搞出千把万斤粮食是可能的，因此，仍然可以吃三顿干饭。……

全省反瞒产搞出 50 至 60 亿斤粮食，全省每人平均可搞到 100 多斤（具体分配任务如下：海南 5 亿，高要 10 亿多，佛山 15 亿，韶关 6 至 7 亿，汕头 10 亿，湛江 10 亿）

干部会议要集中到县上来开，开万把人的大会，.....一要打通思想，二要突破一点，三突破后的干部就放出去斗争，四要不断反右倾，整顿队伍。

（赵紫阳）（1959.1.26 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拒不交代的，要发动群众检举揭发，给予处分，在运动期间仍然继续分散隐藏粮食的，要予以法办。

（赵紫阳）（1959. 1 《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赵紫阳 58 年在徐闻“蹲点”搞反“瞒产”，对干部实行残酷斗争结果，结果压出了一亿斤的假瞒产数字（徐闻年产才二亿多斤）。省委奖了一部苏联小吉普车，赵临走上车时还狡猾地说：“反出那么多，可能有虚假，但起码有五成。”

赵对广大农村基层干部采取扣押法办办法。1958 年 12 月 24 日赵说：“不动用行政不行，抓他几个好不好？”下命令要公安局抓人。当天在大会上就无理拘捕了八个人。有的判刑“劳改”二、三年，有两个在狱中死了。

（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徐闻调查报告》）

看来，在坚决反（注：指反瞒产）的条件下，用规定上级任务（即包干）的办法可行。

（对雷南县下桥公社东方红管理区解决粮食问题报告的批示）

省委认为赵紫阳同志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很好，其经验是成功的，做法是正确的，...粮食是有的，绝不能有所动摇和怀疑，必须坚决领导和进行好反瞒产，反本位主义的斗争，彻底弄清粮食真象。

（1959.1.31 《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广东省委的批示）

既然 1958 年粮食大丰收，为什么许多地方一度发生粮食紧张的现象呢？今年一月以来各地在整顿粮食工作中开展的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的斗争充分揭露了这一问题的实质。证明粮食紧张完全是假相，主要是由于生产队和分队干部（原来的农业社主任和生产队长）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引起的。本位主义思想之所以恰恰在现在表现得这样严重，这样突出，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人民公社化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但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却跟不上去的结果。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性质和人们的思想还停留在原来小社的水平，处处只有小公打算的本位主义是不能兼容的，因而在公社化后不久就突出起来。

(赵紫阳) (1959.2.17 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把本队的粮食交给公社，如果别队不交，自己不是要吃亏吗？粮食由公社统一掌握，不会被国家大量调走吗？原来的小社和生产队干部也是有顾虑，不放心的。这就是造成普遍瞒产和私分的心理状态和社会根源。另外，秋收前后公社初办，机构不健全、制度混乱；加上领导上盲目乐观，没有抓紧粮食工作；任务分配不够合理；入库工作有严重的混乱现象等等，就更加漏洞百出，为瞒产私分大开方便之门，以致几乎没有一个生产队不瞒报几万斤，十几万斤，甚至几十万斤，百把万斤的。

(赵紫阳) (1959.2.17 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

开展反对瞒产，反对本位主义斗争以来，仅在各级扩大干部会议上就已经交代出瞒报粮食四十亿斤，取得很大胜利，目前运动仍深入发展中。各地经验证明，凡是决心大，方法对头，运动已经开展起来的地方，不仅国家的公购粮食任务可以完成，群众的生活可以安排得更好，而且农村的形势很快好转，算帐派和保守分子很快低头，群众情绪大为高涨，生产劲头很快就再度昂扬起来。这就充分说明粮食是有的。

(赵紫阳) (1959.2.17 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农业问题的报告)

因赵紫阳反瞒产，克扣农民口粮，造成农村水肿病十分严重。按常年统计，一般死亡率为 0.6%，而 1960 年，根据二十个县的调查，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点五。

资料出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紫阳罪恶言行汇编》（中山大学革命造反委员会、市委机关遵义公社市党校兵团，一九六七年十一月）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ISBN 194-919761989-5

